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

著者/[美]波林·罗斯诺
译者/张国清



上海译文出版社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

著者／[美]波林·罗斯诺
译者／张国清

上海译文出版社

Pauline Marie Rosenau

POST – 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SIGHTS, INROADS, AND INTRUS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译出

图字:09—1995—007号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

〔美〕波林·玛丽·罗斯诺 著

张国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吴县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199,000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000册

ISBN 7-5327-2050-0/G·011

定价:15.70元

译者的话

一

本世纪70年代，正当中国人民开始全面实行拨乱反正，进行改革开放，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且要求哲学和社会科学变得更加科学些以便更好地为新时代服务的时候，一场以“后现代主义”命名的文化运动正在大西洋两岸获得日益广大的声势和声誉。这个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运动在8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并逐渐地成为一种时髦的文化现象。中国的理论界起初是小心翼翼地引介这股文化和社会思潮。后来，这股思潮逐渐成为中国理论界和文化界的一个讨论热点。人们开始广泛地译介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哈桑、萨义德、罗蒂、哈贝马斯、艾柯、鲍德里亚等西方后现代主义著名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著作。一些中国作家开始有意或无意地尝试“后现代主义”的创作实践，一些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或以后现代主义相标榜的作家和作品开始

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评价。以至于到了今天，这股被某些文学家和评论家们炒起来的文化泡沫似乎大有在中国风行一番的势头。

二

尽管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宣称理解的不可能性，真理的不可能性，沟通的不可能性，尽管他们片面地强调现代理性与真理观念的消极方面，但是我认为，在务必正确地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实质这一点上，我们是决不能有丝毫动摇的。

首先，作为一场消解性、批判性的文化运动，后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对于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进行激烈批判的精神，后现代主义首先意味着对于现代性的摈弃。它从各个角度揭示了现代性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和缺陷。与启蒙运动以来的近现代文化运动相比，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全然不同的文化运动，它似乎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于周围世界的原有经验和解释。

现代性是作为一种许诺，作为一股把人类从愚昧和非理性状况中解脱出来的进步力量进入历史舞台的。后现代主义者无视这股力量在近现代人类文明史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是从消极性上来反省现代性，并且不放过现代性犯下的每一个罪恶和错误。他们抨击现代性造就的一切，认为现代性已经不再是一种解放力量，相反地，它变成了奴役、压迫和压制的根源。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表明了一部分人对于现代性的失望和绝望。

其次，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或一种学理形式，后现代主义对近现代的各种世界观念提出了诘难，它把它们作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础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普遍性的预设叙述统统给以消解。后现代主义的目标不在于提出一组替代性的假说，而在于表明建立任何一种诸如此类的知识基础的不可能性，在于消解所有典章制度的合法性。后现代主义者遵循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路线，揭示出西方传统哲学的企图都是一种逃避历史的企图，一种去发现任何可能的历史发展之非历史性条件的企图；揭示出传统哲学总是企图使自己相似于或高于文化中最合理最客观的部分，扮演着某个最公正无私的调解者或审判者的角色。他们认为，传统哲学的永恒化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传统哲学的客观化努力则是自欺欺人的。他们判定，由于哲学神圣化的不可能性，由于哲学科学化的不可能性，由于哲学作为文化基础的不可能性，由于哲学不占有特殊的问题域，哲学论题随时可能被其他学科的论题所分解和取代。随着哲学的无主题化、非专业化、非职业化、平凡化或非神圣化，哲学将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润滑剂、纽带、中介、点缀、伪装而继续生存或繁衍于诸学科的边缘或缝隙之间。

第三，后现代主义也表现为一种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后现代主义者厌倦了快节奏的分工精细而明确的都市化生活方式，而向往某种落后的未受现代文明侵扰的牧歌式的田园生活。他们重新评估传统、神圣、怪诞和非理性的事物，他们重视被现代性所摈弃的一切，诸如不确定性、零碎性、非原则性、卑琐性、反讽性、异质性、虚构

性，等等。他们拒绝被现代性所看重的事物，诸如权威、规则、崇高、真理、正题、圆满，等等。后现代主义者拒斥各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论和方法论，他们深入到现代性的核心，并从根本上支解了那个核心。他们试图在现代性范式之外确立自身，提倡在现代性之外的自我确证和自我创新。

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崛起，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真正失败或走向穷途末路，而只是意味着现代性存在着有待改进的大量余地。作为一股极端个性化的社会运动，后现代主义形成不了一股强有力的社会变革力量。这一点已经从进入8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运动在西方开始走向衰落这一事实中得到了证明。

三

在一定程度上，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恰恰说明了知识分子、哲学家、人文科学家和某些社会科学家在当今社会生活舞台上的地位和角色的变更。后现代主义证明了他们中的某些人正在被社会所同化、抛弃、淹没和边缘化这一事实，证明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进一步失势、失意甚至失败。但是，它并没有证明另有一些人发现了新的真理、新的力量或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

有关知识分子地位或角色的这种转变，福柯曾经有过一番生动的评说。福柯认为，长期以来，崇尚文以载道的知识分子一直以真理和正义之宗师的身分在言说，人们也公认他们具有这种言说的能力和权利。他们是普通

大众的代言人。因此，做一个知识分子好像就意味着他代表了整个人类的意识和良知。但是现在，知识分子大多已经不再以“为普天下大众求正义”的“普遍性代表”的形式出现，而是习惯于在各种具体部门从事具体的工作。他们虽然仍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身分和良知，但是他们已经变成了面对专门问题的“专家性”知识分子。与专家性知识分子相对的是普遍性知识分子。普遍性知识分子的没落也就意味着探讨普遍性问题并以正义和真理之化身自居的知识分子的没落和边缘化，意味着某些探讨普遍性问题的学科的没落和边缘化。由于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互惠关系，专家性知识分子对于专业知识的垄断也意味着对于相关权力的获取。因此，后现代主义者关于作者之死、权威之死、主体之死、人之死的诸多提法只是权力由普遍性知识分子身上移交到专家性知识分子身上的一个确证而已。死掉的只是柏拉图式的哲学王！专家性知识分子不仅没有死，而且越来越具有生存能力和社会重要性。相反地，普遍性知识分子越来越处于（趋于）生存的边缘或社会的边缘。因此，作为一个社会运动，后现代主义反映了不同学科不同性质的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的不同命运。

四

最后，后现代主义是一股首先发端于人文科学领域的思潮，它起初在社会科学领域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其发起者也没有把它当作一种更加高级的学术活动来宣

传。即使到了今天，后现代主义仍然是人文科学留给社会科学的一笔糊涂遗产。作为一股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尽管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方法，然而它们的影响范围更多地局限在人文科学的领域，并且多以否定性的、消极性的、破坏性的形式而不是以肯定性的、积极性的、建设性的形式出现。后现代主义的这一特点也许有助于强化人文科学的批判性功能。相比之下，今天的社会科学的主导功能仍然是建设性的，批判性功能在社会科学中只能是一种辅助功能。那种摧毁一切、解构一切、无视任何建设性事物的思想倾向和实际行动显然同社会科学的根本旨趣格格不入。因此，我们认为，源于人文科学的后现代主义从根本上是不适合于社会科学的。

波林·罗斯诺是当今美国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一位著名学者。她原任魁北克－蒙特利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现任得克萨斯州立大学休士顿医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罗斯诺教授在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的多所大学开设过有关后现代主义的研讨班。在本书中，她站在"现代性"立场上，对后现代主义的诸多观点及其在社会科学中的表现作出了客观的介绍和中肯的评价。鉴于国内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对于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之关系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我们便决意翻译本书，以便为人们深入研究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它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提供一些材料。相信本书对于中国读者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实质会有所帮助。

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毕裕华先生和赵月瑟女士的提携与合作,感谢导师夏基松先生的悉心指导。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指导,本书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与读者见面。

张国清

1995年8月27日于杭州求是园

中文版作者序

很高兴有机会为中文版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写一个专门的序言。我首先得感谢本书中文版译者张国清先生和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通过他们的艰辛劳动，本书得以同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我为此深感荣幸。一想到中译本所蕴藏的巨大潜力，我就感到无比兴奋。毕竟，汉语是一种拥有四分之一世界人口的语言！

我认为，翻译工作不只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一项机械而消极的不同语言之语词转换活动，而且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除了母语英语以外，我还会西班牙语和法语。我曾做过一些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我以各种方式重新组织了原著，并且无意中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也加了进去。正如现实所一再地证实的那样，翻译工作导致了不同语言的相互交融。

著作之被人译介是一种荣耀。不过我也为此感到不安。当我用英语著述时，我能料想到我的思想之被人接受和拒斥的程度。任何一部著作都存在着有待改进的余地，都会遇到被人误解的情况。但是随着某部著作的被转译，这个过程便具有了双重性。在其到达读者那儿之前，每一个观念都获得

了双重的理解，先是作者，然后是译者。后现代主义者也许并不像我这样担心这一点。有人之所以会持这种后现代态度的理由将在本书的第2章里得到阐明。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作者死了，读者是决定一切的，一部著作有它自己的生命。不过，我只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作者，我为自己当前的处境而忧虑。此外，这是一部难以翻译的著作。我曾花了两年时间来阅读后现代作品，并且到后来才逐渐地使自己能够像一个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地书写。而且我的文本具有多义性。为了创造出一种鼓励读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重新书写文本的氛围，我以各种非常规的方式使用着某些语词。正因为这样，本书的翻译工作给译者带来了许多困难。我为此恳请译者的谅解。

英文版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比作者和出版者起初料想的要成功得多。它已经再版。我当时只想把它写成一部学术著作。但是现在，在不同的学科领域里，诸如在建筑学、文学和科学领域里，它已经被一些教授作为教科书来使用。一些研究生给我来信，对我写作《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表示感谢。因为它帮助他们了解了一个曾令他们感到手足无措的思潮。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告诉我，本书引导并促使他们去为后现代分析而努力，因为它如此清晰地表述了后现代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另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则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本书，因为它使得后现代主义成为某种可以理解可以亲近的东西。他们认为我破坏了后现代主义的神秘性(不可言传性)，并把它简化为类似于任何一个其他的学术思潮或哲学思潮的东西。当然，他们说的也有几分道理。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英文版《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某些片断已被改编成某纽约

现代舞蹈团的常备节目。它的终极"荣耀"还在于，自它问世以来，已经有另两部同名英文著作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这免不了会造成某些混淆，而模仿则是媚俗的一种显著形式。

就在写作这个中文版序言的时刻，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后现代时代可能面临的苦难和窘境。我在收看电视新闻时感受到了这一点。电视把在世界范围里每天都在发生的民族灾难和悲剧一下子呈现到了我的面前。回首往事，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最近四年里，我居无定所，到处奔波。从1990到1992年，当我写作《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时，我的家在洛杉矶。而现在，我住在得克萨斯的哈斯顿。而且就在前不久，我还在蒙特利尔住过一阵子。我现在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1990年，我是一名政治学家。而现在我是得克萨斯医学中心的卫生科学中心公共卫生教授。我有了不同的同胞、同事和同伴。在1992年，我还没有遇到我现在最亲密的朋友马丁·罗森伯格。我对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主义曾有过刻骨铭心的体会。我发现，它会给人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让我连续地拥有那种体会的一个因素竟然是我的孩子韦罗妮克。为此，我得感谢韦罗妮克。

虽然后现代是一个推陈出新、标新立异的创造性源泉，但是它也将因其自身固有的弱点而被后人一再地拒斥。不过就现在而言，无论后现代强加于我们的将是什么，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和睦相处的可贵。

波林·罗斯诺

1995年12月13日写于

美国得克萨斯州哈斯顿市

前言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力图不偏不倚地评价后现代的思想方式简直是一种"赢不了"的冒险行动。赞成后现代主义基本原则的人可能觉得我的评价是不公平的，或是误导他人的，或是试图再现那不可再现的事物的徒劳之举。反对后现代主义基本前提的人则可能担心我是在替他们认为在心智上不健全、在道义上有危害、或在其他方面不可取的某些研究活动寻求辩护。因此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决不指望它能够迎合于所有读者的每一个旨趣。

与此同时，我提出的某些重要话题对于这样一些人或许会有所帮助：他们既认为后现代主义确实提出了某些重大的问题，但又对它感到无法理解。我的目的无非是，本书如能传达出后现代主义的本质主题（或各种替代性解释），并因此有助于理解曾使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感到迷惑不解的后现代主义，那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活动引发了激烈的争端。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其本性使然，因此是毫不奇怪的！关涉我们的存在和人性的最深层领域的诸多问题正面临着危机，它们是：我们如

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我们如何考虑个人的努力和集体的渴望，进步究竟有没有意义以及应该如何求得进步，如此等等。后现代主义对因果性、决定论、平等主义、人道主义、自由民主、必然性、客观性、合理性、责任和真理都提出了责难。它对作为未来社会科学之深刻基础的诸多论题提出了异议。

由于这些问题具有内在的争议性，所以我试图既不根据我本人的价值取向、也不根据后现代主义者本身对他们自己的看法，来评价各种后现代主义者的见解。但是我可不想有所掩饰。这是我的著作。我的价值取向的确自始至终贯穿于其中。最明确的一点是：我相信，在改善人类状况的永无止境的斗争中，社会科学是大有可为的；与此同时，我也为社会科学的全部潜力只得到如此之少的开发而感到悲哀，不过我还是相信社会科学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之中。因此，如果不去考察后现代观念会对这个过程有所贡献的话，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要衷心感谢在过去几年中读过本书的部分章节并对它们提出过批评意见的许多朋友、同事和学生们，我尤其要感谢理查德·阿什利，哈里，马里莉茨·布里德迈耶，罗伯特·考克斯，迈克尔·迪尔，伊莎贝尔·格伦伯格，霍瓦德·肯德勒和巴巴拉·罗斯克兰斯。在魁北克大学选修我的“社会力量和政治生活”课程的学生，在欧文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参加过我在1988年春季作为访问教授时开设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班的学生，以及现在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参加我正开设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班的学生，都对本书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讨论作出了贡献。我还要感谢利萨·诺瓦克·杰里，她称职地、仔细地、迅速地编辑了本书的原稿。最后，我要感谢斯蒂芬，谢克特，让－居伊·

瓦扬古和埃里卡·韦尔巴，他们对于最后书稿的校订给予了帮助。在这一方面，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女儿韦罗妮克·瓦扬古。

我是一位“现代”作者，所以我理所当然地对于这个文本及其“错误”负有“责任”，我希望读者们不要急于对我的文本作出解释。我尤其不鼓励读者借助“解读活动”去“重新创造出”这个文本。

注：波林·玛丽·罗斯诺以前曾用波林·瓦扬古(Pauline Vaillancourt)为名发表著述。

后现代术语词汇表

agent, agency 代理人　被断定拥有权威和权力、因果力量的某个人。

author 作者　写就或创作某文本的人，或对某个后果负有责任的人。

celebrate 赞美　赞同某件事情，欢迎某个观点。

chronophonism 年代语音论　一种现代假定，认为时间是编年的或线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反对年代语音论(Derrida 1981)。

countermemorializing analysis 反追本溯源分析　否定相关现实、摈弃基础、无视起源的一种分析(Ashley and walker 1990b:400)。

de-centering 边缘化，分散化，使空心。取缔任何中心事物或任何压倒一切的真理。这意味着把注意力集中到边缘事物上去。

deconstruction 解构　一种后现代的分析方法。它的目标是摧毁所有建构之物。解构拆解一个文本，揭示它的矛盾和假定；不过，它的意图不在于改善、修正或提出关于该文本的一个更好见解。

differend 差异　关于语言之意义的争论、冲突或不赞成方面的差异(Lyotard 1988b:193—94)。

différance 分延　一个构造原则，它提出定义不依赖于实体本身而依赖于它同其他文本之肯定或否定的参照关系之中。意义因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终极意义上意义的归因永远地被拖延，被耽搁，被延期(Derrida 1972;1981:39—40)。

discourse 话语　所有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所有引起对话或交谈的东西。话语"甚至促进它自身的改革"(Agger 1990:37)。

evoking 唤起　对再现或表象的一种可接受的后现代替代。它的任务是使某人可以自由地分析对象、事实、描述、概括、实验和真理主张(Tyler 1986:129—30)。

foundationalism 基础主义　使研究或思想以预先给定的原则为基础的一种企图，那些原则超越"纯粹的信念或未检验的实践"而被断定为真的(Fish 1989:342;Bernstein 1986:8—12)。后现代主义者是反基础的。他们认为，"关于事实、真理、正确性、有效性、明晰性的问题既无法提出，也无法回答"(Fish 1989:344)。

genealogy 系谱学　为了了解今天而对过去进行探索的应急性历史。它以"局部的、不连续的、不合格的、不合法的知识"为焦点。系谱学否认作为某个"理论统一体"的历史观的可能性，"借助某种真知识和关于科学及其对象之构成的独断观念的名义……那种历史观点是力求精益求精、层系化和秩序化"(Foucault 1980:83)。

heroic 英雄的、崇高的　现代社会科学家有时以某一事件或人物为焦点；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些社会科学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创造了英雄，他们赋予某单一个体改变或影响特定的、戏剧性的事件的能力以极端的重要性。后现代主义者反对这种方法(英雄分析)，他们既不关注个体也不建构英雄。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呼唤主体的终结，作者的死亡。

hyper-reality 超现实　现实已经崩溃，在今天，现实不过是图像、错觉和模仿。模本比它想要表现的现实更加真实。超现实是"已经被再创造的东西"(Baudrillard 1983c:146)。它是"没有起源或实在性的某个实在的"模本(Baudrillard 1983c:2)。

hyper-space 超空间　一个后现代术语，它指称如下事实：我们的现代空间概念是没有意义的。空间并不是按照现代的假定而活动的。空间已经被消灭，空间障碍已经消失。每一事物都处于地理上的流变

之中，处于空间上的不断的和不可预期的变化之中。

imploding, implosion 内向爆破　指在一个后现代世界里，各种现象都倾向于内在爆破，其结果是自我摧毁并摧毁人们对它们的诸多假定(Baudrillard 1983a)。意义彻底消失(Baudrillard 1983c:57)。

intertextual 文本间性的、互为文本关系的　一系列无限复杂的纵横交错的相互关系，"两个文本之间无穷无尽的交谈，既没有预期的目的地，也不指望取得一致意见"(Bauman 1990:427)。绝对的互为文本关系断定每一事物都是相关于每一他事物的。

logocentric 逻各斯中心的　一个用来描述某种思想体系的修饰语，这些思想体系依照外在的、普遍地真的命题来断定合法性。后现代主义者反对逻各斯中心的思想。他们认为，诸如此类的体系实际上是以自我构造的逻辑为根据的，它们是循环论证的、自我指称的和自我满足的。按照后现代主义者的看法，不存在为之辩护的外在有效性或实体性的根据(Derrida 1976:49)。

moment 端点　具有不确定的延续性或不具体的地理位置或场所的在时间上的某个不定点。后现代主义者也用这个术语来指称社会分析的诸阶段或诸步骤。

move 运筹　如博弈一样，它是战略性的。"运筹"意味着为某一立场作辩护，或者向着某个确定的方向展开讨论或作出分析。

narrative 叙述　关于这个概念，后现代的见解是依据讨论中的叙述类型而有所不同的。后现代主义者猛烈地抨击了元叙述、整体性的世界观、母码。元叙述是现代的并假定它们自己的真理主张具有有效性，然而琐碎的叙述，微观的叙述，局部的叙述，传统的叙述则是一些没有提出真理主张的故事，因而更容易被后现代主义者们所接受。

paralogism, paralogical 谬误性逻辑推论　指未知之物，也就是被公认为是错误的知识的东西。但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它也可以指称这样一些实践，这些实践"揭示了关于真理的语言游戏的不稳定性"，以便指出我们实际知道的是多么少，而我们真正知道的东西在怎样的

程度上是关于某个随意性语汇的纯粹的语言学习惯(约定)(Smith 1988:xxiii;Lyotard 1984:60)。

pastiche 拼凑、混合物　一种关于观念或意识的自由流动的、由碎片构成的、互不相干的大杂烩似的拼凑物。它包容了诸如新与旧之类的对应环节。它否认整齐性、条理性或对称性;它以矛盾和混乱而沾沾自喜。

performativity 述行性　根据实用行动或结果来作出判断的一个现代标准(按照 Benhabib 1984:105 的提法,它指的是:"能力、效率、控制")。绝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Lyotard 1984)对它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它是对理性之现代信念的一个扩张。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述行性(操作性)阻碍了多样性和自主性、灵活性和开放性。

phonocentric 语音中心的　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认为,现代分析以说和话语文本为焦点。他批评了这种倾向,因为它赋予了被说的语汇以特殊地位,他称这种倾向为语音中心的。德里达认为,被书写的语汇优越于被说的语汇(Derrida 1981:24)。后现代主义者是反语音中心主义者(Berman 1990:14)。

privileged 特许的　给予某论题、某人、某事或某文本以特殊的关注或优先性。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特许任何一个特殊的观点。

project 规划　有组织的、正规的、现代冒险事业或活动。它意味着有一个战略,一个游戏计划,一个设计,一个自我证明,它们通常是隐藏着的目标。例如现代政党有"各种规划"。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应予批判的术语。

le quotidien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分析或每日生活焦点。后现代主义者把它看作是对于整体理论的一个积极的取代。

reader 观察者、读者　后现代主义是从读者出发的,它给予读者以解释某个文本的权力,而用现代术语来说,那个文本原来是属于作者的。后现代读者被戏剧性地赋予了各种权力。

readerly text(法文术语"lisible")阅读者文本　带着传达某一特定的、精

确的信息的意图而写就的一个现代文本。它假定了某个仅仅接受信息的消极读者(Barthes 1970;1979:77)。书写者的作用是表象,即再现现实的作用。可与"书写者文本"作比较。

reading 解读、解释　用后现代术语来说,一个人谈起"我的解读","你的解读"或"某个解读",并没有考虑到所说解读的适当性或有效性。

re-present 再现　现代表象的基本假定,认为再一次呈现某物是可能的,以另一对象代替某对象(概念、人、地点或时间)而不损及内容或违反意图,是可能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rhetoric 修辞性的　在现代意义上,"人为的夸张"是对应于严肃的、刻板的、科学的话语的。但是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它在其更加经典的定义上被使用着,用以指示演讲术,即对玩弄符号的各种思想的艺术性呈现,以及一个开放的文本中的意义的建构,那个文本并没有要强行灌输某个主导思想或坚持它自身的优越性的计划或意图。

simulacrum 模仿的模仿　对于没有原型的某个复制品的复制(Baudrillard 1983c;Elgin 1984:877—79)。在实在和模型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差异。

site or space 场所或空间　不仅仅指地理上的位置;场所是无法从定义上给予确定的。它也可以指机遇。有时它暗示正被研究的课题或问题。

story, storytelling 故事,讲故事　参阅叙述;不作出真理主张但是承认说者的见解是以他自己的经验为根据的一种解释。传统的、局部的叙述都是故事。

subjectivity 主体性　后现代主义者用这个术语来指示将主体作为社会分析的一个焦点来强调的做法。后现代主义批判了主体性。后现代主义者不在其哲学相对主义或暂时性、作为客观性之对立物的现代意义上使用这个语词。

text 文本　指所有现象、所有事件。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每一事物都是一个文本。

totalizing 总体化　假定某个全体性、某个总体的观点。在引申意义上，这个观点摈弃其他的见解。后现代主义者批判了总体化的理论。

voice 声音　关于作者之见解的现代观念。后现代主义者对把特权或特殊地位归属于某种声音、作者或某个特殊人物或观点的做法提出了诘难。不过，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公众的”声音是比较可取的，因为它民主化了修辞学，它使话语更广泛地被人们理解，与此同时它破坏了“它自己的专家文化”(Agger 1990:214)。

writerly text(法文术语为 scriptible)书写者文本　一个后现代的文本，它之书写是为了由读者在每次解读中再次对之书写。这个开放的文本欢迎解释和再解释(Barthes 1970;1979:77;Jefferson 1982:100—101)。读者的作用在于创造和建构。可比较“阅读者文本”。

目次

1 涉入纷争:危机、延续性和多样性

后现代主义像幽灵一样时常缠绕着当今的社会科学。在许多方面,几分可信几分荒诞的后现代方法对最近三十多年来的主流社会科学的基本假定及其研究成果提出了诘难。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挑战似乎无穷无尽。它摈弃认识论的假说,驳斥方法论的常规,抵制知识性的断言,模糊一切真理形式,消解任何政策建议。[①]

假如社会科学家们想要迎接这种挑战,并要利用后现代主义不得不提供的东西而又不致成为其极端观点的受害者,那么准确地理解这种挑战就是至关重要的了。本书试图提供评价后现代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重大意义、它的基本要素、中心问题和构成前提,它的长处和短处,它的吸引力和易犯的错误。假如情况就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我们所面临的是有关这种挑战的是非功过的激烈争论,那么澄清其基础和含义将促成建设性的对话,并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科学中"由后现代导致的无政府状态"(Dear1988:5)。为了促成这种对话,本书内容将基于以下四个主要目标:第一,探索后现代方法的范围和复杂性,尤其注意考察其在人文科学中的起源;第二,解

释并具体说明后现代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第三,考察社会科学采用后现代方法所造成的某些后果;第四,给出初步的一般性评价。

种种迹象表明,人们对运用于社会科学的后现代方法的兴趣正在浓厚起来:有人开设了致力于研究和讨论这些方法的课程,并编撰了有关教材;大学里的某些系科也因其对后现代的重视而正在获得声誉;某些学者已经脱颖而出,成为这场运动的公认领袖;公认的学术杂志已在发表后现代支持者们的观点,及其被激怒了的对手们的反应。[②] 后现代在人类学、法学、妇女研究、规划、城市研究、地理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领域中的影响比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影响要大得多,就后两个领域而言,后现代的发展要缓慢一些。[③]

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出现不仅仅标志着另一种新颖的学术范式的诞生,更确切地说,一场崭新的全

① 本书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绝大多数提法也适用于后结构主义。虽然这两者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它们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相互重叠,有时甚至被认为是同义的。人们之所以懒得在两者之间作出区分,也许是因为即使弄清其差别似乎也得不到什么结果的缘故。(参阅下列与这两个术语相关的论述 Callinicos 1985:86; Hohendahl 1986:49; Honneth 1985:147—57; Huyssen 1984:37—45; Sarup 1989:131; Walker 1988a:86。许森认为,“两者存在着根本的非同一性”,但是其他大多数人认为两者是相似的。)我认为,两者的主要差异是着重点的差异,而不是本质方面的差异:后现代主义者更倾向于文化批判,而后结构主义者强调方法和认识论的问题。例如,后结构主义者致力于解构、语言、话语、意义和符号,而后现代主义者则涉及更加广泛的领域。在对待主体和客体的地位问题上,似乎也存在着某些分歧(对此将在第3章予以讨论)。后结构主义者仍然义无反顾地坚持着反经验主义的立场,后现代主义者集中考察的则不是理论,而是在“Le quotidien”(日常生活)形式里的具体事件。鼓吹回到前现代去的那些后现代主义者是古典的经验主义者,他们对感性经验——一种高度主观的、个人的、非概括的、情绪的知识形式——予以特许(Vaillancourt 1986a:31—36)。

然不同的文化运动正在对我们如何体验和解释周围的世界的问题进行广泛的重新思考。从其最为极端的表现形式来看，后现代主义是革命性的；它深入到社会科学之构成要素的核心，并从根本上消解了那个核心。从其比较温和的声明来看，后现代主义提倡实质性的重新界定和革新。后现代主义想要在现代范式之外确立自身，不是要根据自身的标准去判断现代性，而是去思考它和解构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时候这种夸夸其谈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只不过进一步强化了那些在社会科学中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后现代观点的发展线索同现代社会科学中比较正统的批评家们提出的那些观点的发

---

② 例如参阅以下专题论丛：《理论，文化和社会》第5期(1988年6月)；《国际组织》第38期(1984)225—328；《抉择》第13期(1988)：77—102；《一千年，国际研究杂志》第17期(1988)，特别是迪尔·德里安，阿什利，克拉托赫维尔和布朗的文章；《得克萨斯法律评论》第60期(1982年5月)；《文化批判》第5期(1986—87年冬季号)；《泰勒斯》第62期(1984—85年冬季号)(尤其是有关当代文化争论的专刊)；《南加利福尼亚法律评论》第58期(1985年1月)，"阐释论文集"；《新德意志批判》第33期(1984年秋季号)；《政治学理论》第16期(1988年5月)；《国际研究季刊》第33期(1989)，尤其是约瑟夫·拉皮德、K·J·霍尔斯蒂和托马斯·比尔施太克的文章；《国际研究季刊》第34期(1990)是一份特刊，名为"讲述被放逐者的语言：国际研究中的异议"，其中大多数论文是后现代的批判；《历史与理论》第28期(1989)，第29期(1990)提供了安克斯密特和扎戈林之间就后现代历史功过方面所进行的交谈。

③ 即使在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里，后现代主义也正在获取某些重大的成果，这些成果将在往后几年的出版物中得到反映。在某些出人意料的地方，从商业快讯和应用科学杂志到自然科学的学术性刊物，讨论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文章也开始出现。例如后现代主义已经在如下领域引起讨论：森林学(Wikstrom 1987a;1987b)，工程学(Platten 1986)，管理学(Carter and Jackson 1987)，产业结构(Swyngedouw 1986)，房地产开发(Seidl 1988)，商业(Anonymous 1982)，系统分析(Nodoushani 1987)，组织分析(cooper and Burrell 1988)，会计学(Arrington and Francis 1989)，公共关系学(Wolter and Miles 1983)，公共行政(Caldwell 1975)和企业规划(Crooks 1984)。在这些应用学科领域里普遍流传的一个明确信息是，后现代主义是一件"好事情"。从公共关系的观点看，它在经济上是有活力的和有竞争力的。

展线索是互为交错的。因此，后现代主义并不总是像它初看起来那样地完全新颖独到，不过，综合起来看，后现代的极端方法和温和方法共同构成了对于20世纪现有知识的最伟大的思想挑战之一（Wisdom 1987：159）。

现代性是作为一种许诺把人类从愚昧和非理性状态[1]中解放出来的进步力量而进入历史的，但是人们可能很想知道那个许诺是否得到了证实。[2] 当我们西方人走近20世纪末的时候，关于"现代"的诸多记载——世界大战，纳粹的兴起，（东西方都有过的）集中营，种族灭绝，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广岛原子弹，越南战争，柬埔寨战争，波斯湾战争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Kamper and Wulf 1989）——使得我们对进步观

---

① 有人认为现代是指从15世纪到19世纪这段时间，因此，后现代主义已经演进了150年（Nelson 1987：4）。另一些人认为后现代起源于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Ferry and Renaut 1985；1987；Heller 1987；Huyseen 1984）。他们在如下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现代和后现代是互相交错的还是明确有别的，后现代主义标志着与现代性的真正决裂还是仅仅是它的逻辑延续（Hassan 1985；Graff 1979；Calhoun 1990）。

② 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异质的现象，在这里我不想探测它的深度或考察它的各种主流。有几本重要的著作涉及到现代性本身的问题，包括图尔明的《国际都市：现代性隐藏的议事日程》（1990），科拉科夫斯基的《无穷尽试验的现代性》（1990），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1990），和赫勒的《现代性能生存吗？》（1990）。

在本书中，为了论证的目的，我赞同后现代等同于现代诸多主要思潮中的一个思潮的观点。那个思潮体现了启蒙传统，并促使社会科学向着某种实证主义的方向发展。当然，这股思潮舍弃了某些现代因素，诸如解释学传统或历史主义，这些因素对许多后现代批判来说没有多大价值。正如R·W·考克斯指出的那样："解释学传统——维科，经过德国历史主义，到索列尔、克罗齐、韦伯和葛兰西——可以被追溯为与启蒙运动思想和实证主义同时存在的东西，但是又与之完全不同。对于那些从按纪年表编撰历史的历史学家们那里，尤其是从布劳德尔那里汲取灵感的人来说，它仍然是充满活力和欣欣向荣的"（私人通信，1990年12月13日）。

念和对未来的任何信念似乎都产生了怀疑。后现代主义者批评现代性已经造就的一切:西方文明已积累的经验、工业化、都市化、高技术、民族国家、进入"快车道"的生活。他们对现代的诸种优越性提出了诘难:职业,办公室,个人责任,官僚政治,自由民主,宽容,人道主义,平等主义,不偏不倚的实验,评价标准,中性程序,客观法则,以及合理性(Jacquard 1978;Vattimo 1988)。后现代主义者们断定,有理由怀疑有关现代性的道德主张、传统规范和"深刻阐释"(Ashley 1987:411)。他们认为,现代性已经不再是一种解放力量;相反,它是奴役、压迫和压抑的根源(Touraine 1990)。

后现代主义对囊括一切、面面俱到的世界观提出了挑战,不管它们是政治的、宗教的,还是社会的,都无一例外。它一视同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世俗人道主义、女权运动、伊斯兰教和现代科学,将它们统统作为预设了所有的问题并提供了先定的答案的、逻各斯中心的、超验地包罗万象的元叙述而予以消解。[①] 所有诸如此类的思想体系都与巫术、炼金术或原始崇拜相差无几,即都是建立在不确定的假设之上的(Shweder 1986:11)。后现代的目标不在于提出一组替代性假说,而在于表明建立任何一种诸如此类的知识基础之不可能性(Ashley and Walker 1990a:264;Culler 1982:155;Norris 1982:31—32),在于"消解所有占统治地位的法典的合法性"(Hassan 1987:169)。最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要我们满足于确定性的缺乏,学会无需解释地生活,接受新的哲学相对主义(Bauman 1987:

① 参见本书为诸如此类的后现代术语而编撰的词汇表。

3—4)。

后现代主义认为现在未必优于过去，现代未必胜过前现代(Vattimo 1988)。他们反对抬高知识分子之复杂的都市化的生活方式而贬低乡村农民之田园式的日常生活(Karnoouh 1986)。因此，他们重新评估了传统、神圣、个别和非理性(Touraine 1990)。被现代性所摈弃的一切，包括情绪、情感、直觉、反应、沉思、亲身经历、风俗、暴行、形而上学、传统、宇宙论、魔术、神话、宗教情愫和神秘体验(Graff 1979:32—33)，都重新焕发出它们的重要性。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以怀旧的心态看待过去，尤其是前现代时代的"自我管理，自我再生的"大众文化(Bauman 1987:67)；个别后现代主义者甚至浪漫化了先人的洞穴生活时代(Gebauer 1989)。后现代人"回忆者、追忆者"，并且确信，新时代没有什么特殊价值(Vattimo 1988:101)。

后现代主义者怀疑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文学之间，在文化与生活之间，在小说与理论之间，在想象和现实之间，以及在人类从事的几乎每一个领域中，存在着严格的学科划界的可能性(Gregory 1989:68; Lash and Urry 1987:287; Lyotard and Thebaud 1985; Vattimo 1988)。① 他们把大学背景下学科间按常规所作的严格划界和分类简单地视作现代性的残余。因此毫不奇怪，冲破了这些界限的后现代时尚不仅出现在社会科学中、并逐渐出现在自然科学中，而且也显见于建筑、艺术、舞蹈、电影、新闻学、语言学、文艺批

---

① 在后现代主义的跨学科特点方面，福柯是一个例子。他既是一位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理论家，又是政治学家。德里达是又一个例子；他既是哲学家，艺术批评家，又是建筑咨询专家。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些其他学科的专家(Giovannini 1988; Seabrook 1991:74)。

评、文学、音乐、哲学、摄影、宗教、雕塑、戏剧和音像等领域中。

下面的实例能说明后现代主义的彻底的学科交叉渗透的特征。对现代理性组织的后现代挑战辐射到了众多领域。因此，后现代艺术重视审美甚于重视功用。在建筑领域，这意味着抛弃对体积与空间所作的现代主义的、实用的和实惠的布局设计，代之以"向人们提供与其心绪相吻合的建筑"，即反映异己、焦虑、混乱的建筑（Seabrook 1991：126）。外表和形象优先于技术、实用和效益（Hutcheon 1986—87）。在文学中，对合理性的挑战导致后现代小说家们中止了对于情节的严密和线性描述：任何有序的故事要素或构思都必须由每一位读者来提供、来创造。在心理学中，它怀疑有意识的、有条理的、连贯的主体（Henriques et al. 1984）。在管理与市政规划领域，对合理性组织的怀疑促使人们放弃中心规划，解除对专家和内行的信任。在政治学中，它怀疑等级森严的官僚化决策机构的权威性，这种层层相因的决策机构在分工精细的不相关领域里各司其职。在人类学中，它鼓励人们保护地方性的、原始的文化，并鼓励人们反对试图改变（重组）这些文化的"心怀善意"的第一世界的有计划干预。在哲学中，它表现为对主观事物的重新尊重，以及对理性和客观性的日益怀疑。

所有学科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摈弃常规性的、学院式的话语方式，他们偏爱大胆的、煽动性的讲话方式，喜欢作风、风格和表现中的朝气蓬勃、引人入胜的因素。后现代主义自身的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确实部分地就是这些特性的一个功能。这样的表现形式令那些自以为是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大为震

惊、出乎意料和不知所措。这些形式之提出显然就是为了提倡标新立异的、令人无所适从的后现代阅读活动。当现代话语以风格的精确性、确切性、实用性和严密性为目标的时候，后现代的表达更注重与自身特性相适应的文学性。不过，后现代对风格与表现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它不关心内容。

后现代社会科学把焦点对准可供选择的话语和意义，而不是目标、选择、行为、态度（Potter and Wetherell 1987）和人格。后现代社会科学家们乐于把以下事物重新确定为焦点：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被忽视了的事物，有阻力的领域，被遗忘的事物，非理性的东西，无意义的事物，被压抑的东西，两可之间的东西，经典之物，神圣之物，传统之物，怪诞之物，崇高之物，受鄙视之物，被遗弃之物，无足轻重之物，边缘之物，外围之物，例外之物，脆弱之物，湮没之物，意外之物，被驱散之物，被取消资格之物，被延误之物，被分离瓦解之物——所有那些“现代人从不愿去深入了解和特别关注的事物”（Nelson 1987：217，Pfeil 1988)。把一切事物都界定为某个文本的后现代主义者，与其说是想要“发现”意义，不如说是想要“设置”意义。他们回避判断，他们中最通世故的人从不“拥护”或“反对”什么，而只是说“关心”某个话题或对某件事情“感兴趣”。他们提供“读物”而非“观察”，提供“阐释”而非“判决”；他们“思虑”此事物或彼事物。他们从不进行检验，因为检验需要“证据”，这是一个在后现代参照系内无意义的概念。

有必要给不熟悉后现代观点的读者一个警告。这些读者不要以为上一段落中所罗列的那些概念蕴涵着某些微妙的重新确立起来的新方向，不要以为它们就是一些专业术语，或者

是智力活动方面的细微区别。这些不同的术语体现着各种对立的世界观。学习这些语词并掌握其用法涉及的不仅仅是新的沟通方式的问题。这个智力活动要求人们转变自身的思想进程，重新组合人们在社会科学分析中所正规使用的各种代码。

后现代主义者重新安排了整个社会科学事业。具有现代信念的人们试图先设法分离诸因素，再揭示其相互关系，最后予以系统综合；后现代主义者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给出的是不确定性而非决定论，是多样性而非统一性，是差异而非综合，是繁复而非简洁。他们注重的是独一无二的事物而非一般性事物，是文本间的关系而非因果性，是不可重复的事物而非反复出现的事物、约定俗成的事物或循规蹈矩的事物。按照后现代的观点，正如真理让步于猜测一样，社会科学变成了一个更为主观和谦卑的事业。对情绪的信赖取代了对客观观察的努力。相对主义优先于客观性，片断优先于整体。把自然科学研究模式运用于社会科学的尝试受到了唾弃，因为后现代主义者把这些方法看作是源于西方而扩散到全球的、更大的科技没落文化规则的组成部分（Lyotard 1984）。后现代主义者揭露了现代性在智力上的弱点、无节制和滥用。他们涉及到了一些“难题”，并力图“阐明”某些一般性的问题。不过，假如与此同时他们必须作出努力以避免提出某种替代性的观念的话，那么上述所言就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了。

即使光从时间上来看，后现代对社会科学提出挑战也不是偶然的。它的到来是与社会剧变、文化嬗变、政治变革、核心价值的深层次哲学争论和学术危机同时发生的，并且可能是对它们的反应。它的到来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是在近来其

他时刻不可能出现的一种现象(Featherstone 1988:207—8)。尤为重要的是,它的那些抱怨,它所喜欢谈论的主题,也同上述纷乱的真实本性所表现出来的意义遥相呼应。

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也许仅仅反映了广大社会中的思想潮流,但是,在社会科学中,它还是对于现代科学的无批判的信任态度和对客观知识的自我陶醉的反应。历史上,科学曾攻击过教会和王权的独断权威,那两者都将其合法性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现代科学将其声望建立在客观性、严格的研究程序、事实材料的基础上,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科学转而也逐渐地声称自己垄断着真理。科学的权威扩张起来并取代了它的那个带有更多非理性和任意性的前任曾拥有的位置(Levine 1987:39)。后现代主义者同其比较因袭传统的同事们难以相处,那些人不加批判地接受哲学上的基础主义、启蒙传统和现代科学的方法论假定。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科学的挑战可以同更早期的、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模式运用于研究社会的努力进行比较,那是一个充满了冲突和纷争的岁月。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当时的社会科学家对现代科学持有实证主义的和决定论的观点,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要仿效其研究自然科学的同事,这样,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假设和方法就发生了变化。正如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遇到了借助于硬性科学的行为主义观点和方法论一样,近年来已经出现了同样范围的另一场范式性危机。这次危机以发端于人文科学的后现代侵扰为基础。不过有一点不同。将人文科学的后现代主义运用于社会科学的那些人与其说想“改进和完善”社会科学,不如说想使其基础性假设变得清晰明白起来,并且逐渐从根本上

削弱社会科学的基本主张。

只要关于这种范式之成功的普遍看法还是不可动摇的，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和理性－逻辑的现代科学模型就仍然是社会科学的核心。可是那种一致性意见是难以维系的。随着明显的缺陷使得对于现代科学的限制似乎合情合理起来，后现代的机会便来了。首先，由于现代科学的最热心支持者所许诺的那些戏剧性结果迟迟没有到来，人们的不耐烦情绪便促进和助长了在社会科学（Brich 1988a；Shweder and Fiske 1986：4—6）和硬性科学中的犬儒主义（Widgery 1989：897）。[1] 研究成果的积累极其缓慢，愤懑的心情就表现出要改进预见能力的种种努力。假如现代科学是一个漫长的自我修正过程，那么在其短期内被误认为真现的那些谬误，在某些情况下就是灾难性的（如在莎里多迈德事件中）。据说，期望被加以夸大，而许诺则都成了空文。第二，注意力开始集中到现代科学的滥用和误用上。显而易见，有时候，现代科学使得对于有影响的、合理的常规立场的偏好合法化了。可是这些偏好只是偏好而非"科学事实"。"科学的"研究结果被用来以某种特别的方式来"证明"主观的政治策略偏好的价值。现代科学受到了指责，说它掩盖了民主社会中的政府暴行并服务于专制政治体制的维系（Krippner 1988：131）。第三，现代科学在理论上应当起的作用和它实际上所起作用之间存在着一段明显的差距（Kuhn 1970；Toulmin 1985：28—29）。现代科学被认为与它自己的正规标准不相符合（Feyerabend 1975）。第四，与科学

---

① 这导致了后实证主义者的全面反对，他们决不都是后现代主义者。施韦德尔和菲斯克（Shweder and Fiske 1986）是一个例证。

能治百病这一毫无根据的信念相对立的是：现代科学显然无力根治20世纪的主要问题。面对核武器和剧毒化学浓缩物的威胁，科学能做些什么呢？面对"饥饿、贫困、环境污染或对地球的生态系统的侵害"（Harman 1988：122；Capra 1982：22—25），科学又必须说些什么呢？第五，现代科学忽视人类存在的神秘方面和形而上学方面，更确切地说，它使得这些方面显得微不足道，不必重视。最后，它几乎不对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不对科学知识和其他知识应该或能够提供的目标发表意见。"体验的实在不相容于科学家们在科学课堂上所告诉我们的'实在'，'科学世界观'不能适当地指导现实生活，不能适当地指导对一个社会的治理"（Harman 1988：122）。现代科学把每一件事情都搞得过于具体，它忘记了诗学（Lyotard 1982：65）。总而言之，社会科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至少部分地，是对科学的社会科学之已察觉到的不妥当之处的一个反应。

后现代主义的吸引力广泛而多变，难以一一予以确定。它的部分魔力在于，它的非封闭性和不明确性一下子吸引住了全世界的得意者、失意者和醒悟者。部分地，后现代主义或许是一代人的奢侈品，对他们来说，匮乏似乎已十分遥远。这代人醉心于自由而不是必然，是个人而非群体。这也许能说明后现代主义没有在东欧、中国或俄国得到足够重视的原因。在那些地方，现代性的吸引力仍然是新奇的，与现代性相应的消费社会仍有待于人们去充分体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后现代主义只有在人们已经习惯于现代性并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之后才能兴盛起来呢？

后现代主义也是绝望的产物。例如，后现代主义在人文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某些领域中得到热烈的欢迎，这也许恰恰反映了西方知识分子处境的广泛变化。经济贫困使学者们容易怀古恋旧、忿恨不满(Stauth and Turner 1988)；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学术研究者面临的是一个极为萧条的就业市场，许多人找不到工作(Habermas 1986:150)。自身的懦弱无能和安全感的失落，使他们再也无法提供"证据以证明人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普遍正确的事业，是绝对地真善美的事业"(Bauman 1988:221)。

后现代主义之受到青睐，也许还反映了人们在大彻大悟以后所表现出来的某种乐观情趣。正像我在第 8 章中将要讨论的那样，希望的落空，梦想的破灭，使得一些人在种种阻力的摧压之下沮丧地放弃了他们正在实施的计划(Sorel 1987:193)，并最终投入了后现代主义的怀抱。假如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后现代主义也可以用来使当前政治与社会的懒散状况合理化，使"世人既无道理也并不快乐的自满自足，甚至世人对自己的生活所应承担的责任〔的否认〕"合理化(Shusterman 1988:353)。

迷恋后现代主义的人并非均等地分布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研究生和资历较浅的教员比在事业上一帆风顺的人对后现代主义更感兴趣。那么后现代主义之吸引人的选择性根据是否仅仅表明了，标新立异对那些已在其他范式上投入颇多的人构成了威胁呢？或者说，后现代主义是否只是简单地反映了青年人的反叛，中年人的职业危机，反映了那些感到自己的权力被剥夺的人们对其所创立的"业绩"的抗争呢？后现代主义的内容，包括它对边缘者、被忽略者、非中心者和被剥夺权力者的重视是否恰好说明了在不同学科之内的这种不同

吸引力呢？正如以后诸章所揭示的那样，这些问题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们的答案又是令人难以捉摸的。

后现代谱系：某些思想先驱

后现代转折并非土生土长于北美；相反，它是一个欧洲大陆的养子，以德法血统为主。就像某位重要的法国知识分子沾沾自喜地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就像博若莱新酿葡萄酒一样也在北美的思想市场上销售（Morin 1986：82）。[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法国人获得了发展后现代主义的绝大多数荣誉，但是实际上是德国哲学家，主要是尼采和海德格尔，促成了后现代主义。虽然有这种思想上的债务关系，但是当代德国哲学家们，尤其是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81，1983，1986），却属于后现代主义的最激烈批判者。不过，后现代主义在法国也并非一直受到如此赞同性的认可。某些重要的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尤其是雅克·德里达，近来已在法国失去了人们的信任（Ferry and Renaut 1985）。然而，后现代主义的吸引力在法国以外的国家仍然有增无减。

后现代主义在法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明里衰落是否意味着它在走下坡路呢（Bonnefoy 1984）？我看未必。更细致

① 法国人习惯上称博若莱新酿葡萄酒为“废料”葡萄酒。它是由当年秋季收摘的新鲜葡萄酿制的，并且只供那些无力购买更贵的陈年葡萄酒的人饮用。由于法国公共关系的努力，国际葡萄酒市场已相信这种“大受欢迎的”葡萄酒将供不应求，以至于法国政府必须协调在每个国家的销量，以及它每年上市的确切日期。在某些国家，人们通宵排队以求成为“有幸”买到几瓶这种酒的人之一。

的研究将揭示出其他一些动态。后现代主义不是正在消失，而是正在成为人文科学许多领域的研究本身的代名词，以至于人们无需对其术语作出明确解释。例如，许多大学的文学批评都暗含着一种后现代的、解构的方向。此外，今天社会科学中的许多讨论都是在后现代的议程范围内进行的，这些讨论毫不犹豫地采用后现代的术语，沿袭其思想脉络。各种概念方法，包括后实证主义、新结构主义、后当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实际上交叉重叠，并占有大量的思想活力。最后，某些对后现代主义至关重要的议题，在那些据说后现代主义已被“超越”的国家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主体的死亡和复归（Frank 1988；Vattimo 1988），个人主义（Lipovetsky 1983），个体的同一性（Ferry and Renaut 1987；Renaut 1989），反人道主义（Ferry and Renaut 1985；Soper 1986），犬儒主义（Sloterdijk 1987），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哲学（Farias 1989；Fedier 1988；Ferry and Renaut 1988；《争鸣》，1988，1 月），虚无主义（Vattimo 1988），和 1968 年巴黎五月传统（Ferry and Renaut 1985）。

和那些看起来具有戏剧性变革意义的事物常有的情况一样，后现代主义并不完全是独创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不难追溯（Strathern 1987）；后现代主义是众多不同的、经常处于冲突之中的倾向的混合，它挪用、改造和超越了法国结构主义、浪漫主义、现象学、虚无主义、平民主义、存在主义、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和无政府主义。虽然后现代主义与每一种学说都有共同之处，但是它又同它们存在着重大的争议。

某些实例能够说明后现代谱系具有的各种特性。后现代

主义者们赞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如下观点：现代科学是神话，启蒙的遗产是极权和统治（Horkheimer and Adorno 1972；Marcuse 1956，1969）。批判理论竭力怀疑工具理性和现代技术，怀疑现代消费社会中媒体的作用（Kellner 1989a），后现代主义者也采纳了这些观点。法国结构主义怀疑人道主义、主体和作者。与尼采和海德格尔一样，后现代主义者怀疑真理、理性和普遍道德的可能性，相信像善与恶这样的术语是不适当的，并坚持主观的和冲突性的阐释是人类达到"相互理解"的最便捷途径（Granier 1977；Deleuze 1983；Miller 1981；Vattimo 1988）。虚无主义和某些形式的后现代主义同样地对生活持悲观态度；他们强调理解人类状况的不确定性，强调知识是一种矛盾的终极认识。来自人种学方法论（Garfinkel 1967）的观点是："意义在不同语境中自由地变化"（Gergen 1986：140）。符号交互作用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由我们归之于社会关系的意义是人类的建构，而不是一个客观实在（Goffman 1959；Berger and Luckmann 1966）。埃德蒙德·胡塞尔和现象学（Schutz 1962—66）鼓励重新考虑个人知识，抛弃逻各斯中心的世界观，怀疑从过去、从历史传给我们的"教训"（Husserl 1960）；后现代主义继承了这些论题。与平民主义一样，后现代主义赞成自发性和在一定程度上的反唯智主义，赞成把大众及其个人的和私下的抵制活动理想化的趋向（Featherstone 1988：212—13；Stauth and Turner 1988：524；Benhabib 1984：125；Baudrillard 1983a：40—48）。同无政府主义一样，后现代主义者怀疑权威，怀疑将任何单个的、系统的观点武断地强加于人的做法；两者对不同的甚至相矛盾的观点都抱着宽容的态度。从萨特所阐述的存在主义那里，他们汲取了反人道主义。解

释学对后现代主义的贡献在于对经验主义、合理性、普遍性科学以及直接的机械的因果性的批判。后现代主义者从浪漫主义那里继承了一种与客观性相对立的批判立场，它反对被假定为永恒的一切事物，反对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浪漫主义者可能还大大地启发了后现代主义者对如下事物的关注：幻想、感觉、情绪、超感觉的事物、神圣的事物、奇特的事物、超越性的事物、原始的事物和不寻常的事物。通过论证不存在真善美的真正的普遍性标准，浪漫主义者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美学价值提出了质疑。同浪漫主义者极为相似，后现代主义者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没落的世界中，它处于令人不满的现在和无能为力的过去之间的转换时期，……一个传统的社会地图"已不再有效，但是新地图仍有待绘制出来的世界中（Gouldner 1973：327—33）。

与此同时，这派或那派的后现代主义者又同所有上述观点中的某些观点展开了争论。假如解释学在对解释的探索中假定了某种阐释优越于另一些阐释，假如解释学的目标是为了揭示某一政治或社会行为的单一意义（Bauman 1990：425—26），那么，他们就不赞同解释学的观点。他们怀疑结构主义对科学、合理性、理性和逻辑的信奉（Morris 1988：345），并对批判理论强调的有关社会现象的超越文本的解释提出了诘难。他们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工程看作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其为了强调社会整体性而牺牲了局部的琐碎的日常生活（le quotidien）的做法，并且认为批判理论家对真理的探求是天真之举（Ricci 1984：第5章）。某些后现代主义者摈弃了诸如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 1989—90：50）等无政府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后者鼓吹一般民众的民主、联

邦主义和理性社会。

后现代主义的这种东拼西凑的特点，它之缺乏统一性，既是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陷。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某种可以认同的东西。不过，由于它不是一个“无形的学院”(Grane 1972)，所以各种选择的无限制结合便允许下列情况的发生：人们可以以不同的、变化着的方式来对构成后现代主义的诸因素加以组合。无怪乎它的和谐性因争论而被破坏；无怪乎它的特点与其说在于正统性，倒不如说在于多样性，在于相互竞争的各种思潮和不断的分裂(Hassan 1987:167)。一个人把后现代主义究竟读作怀疑论的和犬儒主义的，还是读作肯定论的和乐观主义的，或者读作完全是别的什么东西，部分地依赖于是哪些作者和哪些传统启示了他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后现代主义是鼓舞人心和引人入胜的；同时它又始终处于陷入混乱状态的边缘。

肯定论的和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

假如我们真的想要能够谈论后现代主义的话，那么就有必要针对各不相同的、甚至矛盾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各种阐述，区分出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倾向。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可能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Featherstone 1988:207)。情况要不是如此糟糕的话，我们原本是可以谈论后现代主义者的。不过，如果从社会科学所关心的角度来看，在各种各样的后现代声明中，我们大致可以勾画出两种主要的一般性倾向：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或仅仅是怀疑论者)持有某种悲

观[1]、消极和沮丧的立场，主张后现代时代是一个片断、解体、抑郁不安、无意义、含糊不清的时代，甚至是一个缺乏道德准则、社会秩序紊乱的时代（Baudrillard 1983b；Scherpe 1986—87：101）。这种后现代主义受欧洲大陆哲学家、尤其是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启发，它是后现代主义的阴暗的一面，是绝望的后现代主义，是谈论死亡的临近、主体的死亡、作者的终结、真理的不可能和废除表象秩序的后现代主义。这种倾向的后现代主义者采取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似乎“他们已经看透了一切”，并且断定不可能有真正新的东西（Gitlin 1989：103）。他们认为，现代性的破坏特点使得后现代时代成为一个“彻底的、无法超越的不确定性”的时代（Calinescu 1987：305），一个以冷漠无情、残忍凶狠、陌生疏远、令人绝望、愤世嫉俗和模棱两可为特征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什么社会的或政治的“方案”值得人们去为之献身。我们面对着如下事实：人口过剩，种族灭绝，原子武器的毁灭性打击，大灾变，环境的毁坏，太阳爆炸，45 亿年后太阳系的消亡，以及宇宙因衰变面消逝。因此，纵使真有幸福和欢乐、笑剧和讽刺诗，纵使真有对“欢乐的肯定”（Derrida 1978：292），它们也只是暂时的，空无意义的欢乐形式，它们只是一个等待灾难降临的时期的标志（Scherpe1986—87）。假如真像怀疑论者声称的那样不存在真

---

① 当我把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特色规定为悲观主义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他们是一些丧失信心的人。他们强调事物的消极面，对任何事情都缺乏信心或希望。他们倾向于对事情的可能结果作最坏的推测。我在此使用的悲观主义一词不同于索列尔的用法（Sorel 1987：192—95）；索列尔认为悲观主义者是实用主义的实在论者，他们局限于人类状况所强加的各种限制。他认为，悲观主义者与这种状况是相适应的，他们重视每一种对上帝（Truth）的天真追求的功效。这同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不是一回事情。

理，那么剩下来的一切便是游戏，是语词和意义的游戏。

虽然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也可简称为肯定论者）赞同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但是他们对后现代时代持有一种更有希望的、更为乐观的观点。由于更多地受到盎格鲁－北美文化而非欧洲大陆文化的先天熏陶，这些乐观主义的肯定论者一般都倾向于变化。他们要么欢迎积极的政治活动（斗争和抵制），要么满足于认同不切实际而又广受赞誉，主观而又非教条的各种规划，这些规划分布在从新时代信仰到新浪潮生活方式的各个领域，包括后现代社会运动的整个范围。绝大多数肯定论者寻找一种哲学上的和本体论上的思想实践，那是一种非教条的、尝试性的和非意识形态的思想实践。不过，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并不回避去肯定某种伦理观念，去作出常规选择和寻求建立用以解决具体问题的政治联合阵线。许多肯定论者认为，某些价值选择优于另一些价值选择，这是一条会招致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的推理路线（Bordewich 1988；Frank 1983：405；Levin and Kroker 1984：15—16）。

肯定论的和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都有一系列从极端到温和的形式，两个值域间又相互交叉。对肯定论者和怀疑论者来说，极端主义者和温和主义者的区别主要取决于其观点的强烈程度和他们愿意把其后现代信念运用于极端过分的结论的程度——不管其结果或后果如何。一般说来，我们关注的中心是只有在偶然情况下才指向极端的和温和的后现代主义的怀疑论者和肯定论者。

把后现代主义者划分为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有利也有弊。两者在边缘上是互相重叠的，

并不构成现代社会科学所期望的那种纯粹“相互排斥、泾渭分明、无所遗留”的清晰分类[①]。不过，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的划分是有用的，我在以后的章节中还将谈到这种划分。因为它们不但能够把具有相似观点的个人划归到一起，而且有利于促进对后现代主义内部存在的明显矛盾的理解。两者之间的区别使我们能够解释后现代主义在社会科学中具有那么多含义的原因。这种分类也使后现代主义将来在社会科学中的各种可能的情况变得清楚起来。

任何一个为本书所引用的作者的思想，以及任何对于某个怀疑论的或肯定论的后现代方法的具体阐述，都不可被视为完全可靠或绝对恰当的。任何实例都未必同本书归之于后

---

① 本·阿格（Agger, Ben. 1990）提出要划分建树性后现代主义者（他们支持以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哲学）和极端的批判性后现代主义者两大类型。他的划分同我的划分是交叉的，但又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术语方面的而非实质性的差异。虽然他称建树性后现代主义者为“肯定论”的，但是我用这个术语指谓的是这样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他们维护某个积极的政治或社会计划，可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却被阿格划归为极端的和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者。托德·吉特林（Gitlin, Todd. 1989）提出了“冷漠的”后现代主义和“热情的”后现代主义的分类，这种提法在艺术和人文科学领域也许还有文化社会学领域比在一般的社会科学领域更加引起人们的兴趣。在他的“冷漠的”后现代主义与这里称之为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之间，以及他的“热情的”后现代主义与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交义关系。戴维·格里芬（Griffin, David. 1988a: x－xi）区分了“解构的或消亡的”后现代主义和“建构的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而他自己则企图在后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范围内建立起一种后现代科学。出于某种相似的情绪化努力，G·格拉夫（G. Graff 1979: 55－60）比较了“愤世嫉俗、悲观绝望”的后现代主义和“耽于幻想、放浪形骸”的后现代主义。哈尔·福斯特讨论了反应性后现代主义和抵制性后现代主义的差别（Foster, Hal. 1983: xi－xii）；前者歌颂现状，后者则反抗现状。在另一个上下文中，福斯特还区分（1984）了“新保守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的”后现代主义者，前者与肯定论者比较接近（保留了叙述的传统，传统的历史、主体，表象和人道主义），后者与怀疑论者相似（反主体，反表象，反历史和反人道主义）。

现代主义的每一个描述性因素完全一致。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并非是静止不变的；相反地，它一直处于运动之中，变化之中。

鉴于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已经逐渐地成为象征着争论和批判的东西，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避免使用这个标签。一些人认为，后现代这个词宣扬一种单一的实在观，它鼓励封闭，否认复杂性。因此他们从中退却出来以避免作为某种怪诞荒唐的东西而与其有不光彩的牵连。他们用不太会引起争议的术语，譬如后当代(post - contemporary)来指称自己。或者他们可能会暗示说自己的工作仅仅是“解释性的”而已。

几项约定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后现代这个术语的运用是如此地广泛，以至于它似乎可以运用于任何事物，同时也无法运用于任何事物。有时它被用作“未来”的同义词(Barilleaux 1988 和 Rose 1988 就是例证)。不过在本书中，我是在更加严格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的；我指的是一种特定的哲学视角，这种哲学视角中充满着各种认识论假说、方法论偏爱和重大的中心论题，尽管其中每一个方面的确切性质都可能引起争议。

“社会科学”这个术语也可以作同样的理解。虽然在学术圈子内部最广泛的意义上，就其学术学科分类所包容的内容、就其对人类社会的总体关注而言，人们对于“社会科学”也许存在着某种普遍的一致性意见。但是一旦涉及到特定的内容，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一致性便会迅速解体。这些后来的

争议不是本书的主要兴趣所在。我避开了狭义的、排他的社会科学定义，我所列举的例子来自众多的学科，纵使它们未必总是被置于每一本大学指南的“社会科学”的标题之下。当然，有的时候，在某些场合，特定的学科的确会有特殊的地位，不过，我认为，这些实例不应妨碍在这里对它们的考察。最后，当我谈论社会科学时，我好像把它们同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分析上区别了开来，这是一种被认可的简单化做法。所有这三大门类在边缘上都是相互交叉的，有关它们相互之间的界限常常引起争议。

本书以后诸章内容既不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敌视，也不是对后现代主义的同情或辩护。我也不想努力追随后现代的研究方针。相反，这些研究方针很有可能会遭到违背，虽然不是出于蔑视或恶意。更确切地说，任何一种违背都可以被理解成试图克服文体方面的、有意识的含糊不清——有些人将其称为蒙昧主义，它是后现代主义者的书写特点——的必然后果，也是试图与后现代团体本身以外的更多的读者相沟通的必然后果。

考虑到读者预先不具备后现代主义的专门术语方面的知识，本书卷首开列了一份常用的后现代术语词汇表。众所周知，由于后现代主义者擅长于杜撰新术语和抛弃旧术语，术语和语言的应用便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他们对各种术语和各种特指的具有新含义的词汇的创造活动，恰恰是通过后来的摈弃以及以其他术语和词汇相替代的活动而得以认可的；语言所具有的风险性要求人们把它当作随时准备被拆除的脚手架来对待”(Kellner 1987:9)。对社会科学来说这种见解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学院派通常认为这种专业性语汇具有促进

沟通的作用并以此来替这些术语作辩护。从传统上看，批评者则埋怨这些术语把门外汉拒之于千里之外，而只限于让那些为获得必要的知识而投入大量精力的人去理解它们。不过后现代主义者对这两种观点都不赞同。怀疑论者怀疑完全沟通的可能性。他们假定，"语词并非在一一对应的基础上取决于它们假定描述的观念或事物"(Jefferson 1982:108—9)，因此他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几乎没有理由需要作出极其艰难的努力以便准确地传达出语词的确切意思。他们认为，作为玩弄语词游戏的术语本身自然成趣。这样，在总体上不甚严谨的后现代语言特性有利于语言的生动灵活，但是同时也实在地导致了混乱和含糊。因而本书的词汇表也是消除潜在的术语混乱的一个努力。

假如现在由于语言上的约定妨碍了中立性，那么要讨论像后现代主义这样一个有争议的论题就难以达到公正性。即使是人们怎样书写这个语词的方式——是"后现代"(postmodern)还是"后 - 现代"(post - modern)——也表明了某个立场、某种偏见。没有用连接符号的写法含有对后现代主义抱着一定同情或承认其合理性的意思，而有连接符号的写法则表示一种批判的态度。[①] 已经有人指出过，后现代主义的保守的反对者们使用连接符号，激进的拥护者们则省去连接符号(Hassan 1985:125)。不过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说法，因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见解在左右阵营中都有所渗透(参阅本书第 8 章第 3 节)。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个连接符号的使用都

---

① 这条规则日益频繁地出现例外。例如，杜姆(Dunn 1988:224)是极度赞成后现代主义的，但是他却使用连接符号，因为它使人们想起"现代性的种种困境"。

反映着语法方面的信念，即认为这是最恰当的用法，它之使用不应当被解释成某种关于常规判断或恶意中伤的陈述。

此外，我试图对后现代主义达到自觉的认识，试图对它作出说明或使其理论化，而对于那些把这种尝试看作是必然会导致错误的东西，看作是企图达到系统化的、有缺陷的尝试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我的这些努力也许自然是令人不快的(Ashley and Walker 1990a:265—66; Featherstone 1988:204;Lyotard 1988b:xi)。由于寻找后现代观点的起源、基础和过去的足迹，由于指出后现代观点在社会科学中的先例和先驱，由于努力使"未加深思熟虑的东西"尽可能地"可以被接近"或可以被表述(Hoy 1989:450)，由于为促进理解而进行的分门别类工作，我已经得罪了一些人。但是在这里，除了借助这样的研究活动来达到超越以外，我们的确别无选择。这项工作必然地要求对综合和统一予以现代性的重视，而不是后现代的那种对于维持差异性和复杂性的偏爱。假如其核心圈子以外的人想要了解后现代主义，那么与诸种现代性观念的比较似乎就是必不可少的；这个目标激励我们走向归纳化和简单化。如果把每件事都当作是一个单独的偶发事件，那么人们除了描述以外便无事可做了。

后现代主义已经在文学、语言学、文学评论和哲学中得到发展，本书集中探讨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贡献。后现代主义在艺术、摄影、建筑、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领域里是同样重要的，但是对社会科学来说，文学和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则是更加常见并且反复出现的参考点。此外，形式和内容上的相似性表明，关系密切的、相邻的学科更接近于社会科学所面临的问题。即便有这个限制，本书也只能对后现代主义的方

法论核心及其特定的实际意图作抽样式讨论。那些学理上的和方法论范围内的问题最有可能同本书所评述的诸社会科学家相关联，它们包括作者、文本、阅读、主体、历史、时间、地理或空间，真理、理论、表象、解构、解释、科学和政治学。虽然它们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未必是自明的，但是后面的讨论将证明它们是实质性的。

尽管阐述说明是本项研究的主要课题，但是批判也占据了一定的篇幅。真正负责任的考察必须指出被考察对象的各种局限性。就所有批判而言，最有力地得到阐明和最充分地得到论证的见解是最有可能受到抨击的。有鉴于此，通观全书，我对极端的后现代形式给予的信任要少于对较温和的后现代表述所给予的信任。本书所列举的每一个批判都可以使用各种例证，但是没有一个例证能够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①

在许多方面，后文对后现代主义的评价在语调和性质上都是现代的。必须承认的是，对于后现代社会科学的实际贡献和方法论上的贡献所作的现代评价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些评价所采用的标准同被评判的对象无关：它们是按照现代标准而不是顺着后现代的思路来进行批判活动的。但是人们实际上是无所适从的，尤其是涉及到怀疑论者的时候，因为后现代主义者们自己也没有明确地说明一个人该如何评价有分歧的各种文本，或者如何在两个互不相容的解释之间作出选择。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里，真理已经不存在，这导致评价和判断

① 读者应该注意到，我用括号指示的正文参考资料是有多种用途的。有的是为了表明一段引文或一个思想的出处。有的涉及支持我正主张的那个观点的某项工作。在有些情况下，他们还表示我正在探讨的那个话题的某个例证。最后，它们有时是为了引导读者更加深入地探讨某个课题。

都相对地失去了意义。在不存在任何可取的评价标准的情况下，除了用一个现代标准去衡量后现代主义以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不过，这种态度不应该被当作是对于现代主义的非批判的和盲目的接受。它流露了现代人的愤怒和不满，它表明现代人明白，某个不完美的范式总比一个后现代的无声牢笼要好得多，在那里，正如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所表白的那样，没有一种语词是可以接受的或适当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条理地讲话，因为真正的、准确的沟通是不可能的。不过，根据后现代社会科学自己的术语来评价它的贡献还是处处可行的，尽管这种评价也是按照现代的标准——因为该评价就存在于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仍然顽强地保留着现代性的世界当中。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在运用某个后现代的观点来判断现代社会科学时，他们也在做着与此相类似的事情，相比之下，上述以现代标准来评价后现代社会科学的做法难道就真是那么不公正吗？

本书概述

在这一章里，我已经对后现代主义，它的思想先驱，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作了一个一般的介绍。我觉得对本书以后各章的内容作一概述是有益的。通过这种做法，我希望能使读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内在连贯性有所感受，而这一研究领域本身却是愿意以不连贯性为荣的。

第 2 章考察了后现代主义如何修正了通常被人们接受的

作者、文本和读者的关系。有关每个术语的正统观点都同它的后现代变体进行了比较。作者的重要性，即既作为个体又作为负有责任的代理人的作者的重要性，在一个后现代的视野之内被取消了。作者的假设性死亡象征着责任的衰落和对作者（权威）的抗议。后现代主义使文本具有优先权，并且抬高了读者的地位。后现代文本是开放的，并且没有客观内容。读者被赋予确定并创造文本意义的重大权利。一切事物都被规定为"文本"；这样，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范围扩大了。具体例证引自成文法，国际关系学，新闻学，政治学和人类学。

在第3章中，我们将看到当人文科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者呼唤主体死亡的时候，无主体的后现代社会科学受到了严格的限制。[①]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抵制"作为一个人或一个具体参照点的那种一致的、连贯的主体。他们怀疑主体的静止不变的同一性，批判使主体获得自由意志的各种假说，批判由主体的存在所蕴含的哲学人道主义。有的怀疑论者建议用后现代个体取代现代主体。一般而言，肯定论者更同情主体。他们要求主体的回归，要求在社会科学中重新确立主体的地位。总之，在社会科学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与其说是主体的死亡，不如说是后现代个体的诞生和"新主体的卷土重来"。本章实例来自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妇女研究。

第4章大致论述了后现代反对传统历史、线性时间和可预测的地理和空间的理由。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同意，以上

---

① 消除主体在逻辑上与作者之死重合。这两个后现代概念作为范畴是交叉的（Edelman 1988:9），但是我在这里分开来考虑它们。作者是主体的一个亚型，但是并非所有主体都是作者。

这些变量的传统看法束缚了思想，限制了理解。在一个后现代的研究方法中，历史的地位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后现代主义者怀疑专注于认识过去和描述过去的各种研究活动。怀疑论者把历史撕裂成阴阳交错的即时瞬间；时间变得不均匀，往复交织，分层的和非线性的，而不是均匀的，循序渐进的，合目的的和有规则的。后现代的多维空间既可以被创造出来，也可以被消灭掉。假如时间和地形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社会的，那它们就会拒绝按照人们的期望行事，或拒绝在暗中微妙地相互作用。后现代规划学、国际关系学、政治社会学、城市政治学、政治理论和地理学提供了具体例子。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时间和空间的修正向社会科学提出了实质性的挑战。假如他们的作为不可驾驭的和不可预测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得到了承认，那么被后现代主义者称之为大杂烩的混乱就会盛行。怀疑论者谈论后历史，他们的主张同历史终结运动的主张并行不悖。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消解，无物可以被断定为完全地在场的或不在场的。时间秩序成了未经说明的东西。但是并非有关后现代的时间、空间和历史的所有阐述都是如此地极端的。其中有些观念受到了社会科学中另一些观念的预设，它们可以被吸收容纳而不致产生重大的争议。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对必须改变他们称之为带有更强的压迫性的时间、空间和历史的观点持赞成态度。他们向新历史寻求启示，建议用微观叙述和系谱学取代那些历史的传统现代形式。他们给予局部的和地区性的空间以优先权。他们与其说想要摈弃传统的空间和时间，不如说更希望使它们相对化。每一个有关时间、空间和历史的肯定论者的建议都没有走到阻止社会科学前进的地步。

第5章集中考察了理论和真理概念。在一个后现代世界里，理论已经不再是超然地“无辜的”；真理也不再是在中立性和客观性意义上纯真无邪的。对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放弃真理和理论，投入哲学相对主义的怀抱。他们认为，语言把真理和理论转化成了大致上的语言学约定，对于怀疑论者来说，这意味着不可能充满信心地谈论任何一件事情。存在着某个多少带有平等观念的多元论，在其中，怀疑论者认为所有事物都是有趣的和值得引起人们关注的。

在肯定论者看来，真理的缺失导致了知识的谦卑和宽容。他们把真理看作个人的和特定团体的：虽然它或许是相对的，但是它不是武断的。对于这些后现代主义者来说，理论的地位虽然已经衰落，但是他们既没有全盘地抛弃它，也没有要求所有理论都具有绝对性。对肯定论来说，理论是非系统化的、散乱的、异质的，理论并不自以为有什么特许的权利。有的肯定论用对于局部、对于日常生活、对于传统叙述的实质性关注取代主流社会科学的主导理论。这一章在妇女研究、公共行政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具体阐述了后现代的真理观和理论观对于社会科学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第6章考察了后现代的表象观念。后现代主义者大多拒绝现代表象。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表象在认识论上、方法论上和实质性上都是欺诈性的。最重要的事物决不会得到表象(再现)，即：宏伟壮观之物、非凡超脱之物、独一无二之物、神秘莫测之物、“崇高(冰清玉洁)”之物(Lyotard 1982:68)以及卓然不群之物。他们要求“表象的秩序”的终结，因为表象否认差异并导致封闭。不过，一旦没有了表象，现代社会科学就成了问题，比较分析就不可能了。肯定论者也对现代表

象提出了异议，不过他们仍然保留了认识论表象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它将一事无成。我对表象危机在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回应作了评论和评价。

在后现代主义对民主和表象的关注中存在着某种张力。当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诋毁表象的时候，许多人便自发地(情不自禁地)丢弃了民主。对于肯定论者来说，摈弃现代表象导致了对于更可靠的表象的要求，或对于更多更好的民主的要求，纵使这些要求仅仅停留在每一位公民只能"代表着"他或她自已的层次上。公共场所理论受到了许多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欢迎，因为它认为表象的重要性不大。不过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则指责公共场所理论家们，因为后者强调理性并且假定了理性的沟通。

第7章考察了关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后现代观点，并且描述了关于解构和直观阐释的后现代方法。怀疑论者和肯定论者对现代社会科学主张的客观性、因果性、某个唯物主义的实在和普遍的研究规则等观念提出了挑战。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主张，实在是纯粹的幻象；每一事物都是互为文本的、非因果的或不可预期的。他们比较喜爱的方法包括反客观的、内省的阐释和解构。相对主义和不确定性构成了他们的观点的特点。他们怀疑理性的价值，认为要想为判断智力产品建立正规的标准是不可能的。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也对现代社会科学表示了不满。他们自已对实在的理解是建构主义或上下文主义的。解释不仅是怯懦地互为文本的而且是目的论的。积极的价值取向和特定的常规目标公开地指引着肯定论者的社会科学观念。方法论依赖于情绪、直观和想象力。虽然对于理性怀有矛盾心

理，但是没有几位肯定论者真的愿意完全地抛弃它。他们有时根据常规爱好或社团标准来评价知识主张。

第 8 章考察了肯定论的和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政治倾向，以及这些倾向对他们关于社会科学的期望所产生的后果。怀疑论者是政治不可知论者，主张所有政治观点都仅仅是建构，并且他们大多不愿提倡任何类型的政治观点。有的怀疑论者对变革社会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因此他们认为在后现代时代不参与是最革命的态度。还有的怀疑论者认为，游戏和心情愉快是传统的、现代的政治活动的最好替代品。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用这些东西来取代社会科学。在极端意义上，一些怀疑论者把恐怖、自杀和暴力当作可以利用的唯一真正可靠的政治姿态来谈论。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在政治上持一种更加乐观的态度。他们支持各种大规模的新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提倡多元主义和宽容，反对派别主义和教条主义（武断）；但是并非所有的肯定论者都坚持这些价值观念。虽然有的肯定论者支持针对特定主题的政治运动（围绕和平、生态和环境等主题的联盟活动），但是另一些肯定论者，诸如新世纪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更加倾向于精神方面。在第三世界，肯定论的后现代政治学的表现采取了平民主义、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后现代社会运动的形式。这些组织号召反对第一世界的意识形态、技术学和经济学，并提倡返回到原始的、神圣的和传统的世界中去。

第 8 章讨论了一门后现代社会科学是先天就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问题。有关后现代主义固有的左的或右的政治特点的一系列广泛的观点在本章得到了考察，包括马克思主义者、

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不存在一致的意见。我的结论是，后现代主义是如此开放，或如此模糊，以至于它几乎可以被容纳于任何一种政治信念之中。

第9章提出了一个针对读者而言的结论。一门后现代社会科学的确切的形式和特点被勾画了出来；作为一个概要，它涉及到前面诸章所涵盖的内容。我解释了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在思想一致性和相关性之间作出的艰难选择，并且指出了其他地方没有讨论过的某些批判领域。最后，我对通向社会科学的一种后现代方法的未来作了评价。



抛弃作者，转换文本和重置读者

我们总是喜欢谈论各种有才能的或有天分的作家；其实我们还应该对某些天才的或聪明的读者刮目相看。

米洛拉德·帕维克引自 Bruckner 1988:15

为了不致给通往文本的道路制造麻烦，作者最好在他完成写作时立刻死亡。

Eco 1983b:7

后现代主义者戏剧性地变更了作者、文本和读者的传统角色。他们削弱了作者的重要性，加强了文本和读者的重要性。事态几乎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作者、文本和读者都一直在为了引人注目而竞相争斗。当后现代主义者抛弃了作者的时候，一个空缺就出现了；文本和读者则弥补了这个空缺。"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Barthes 1977:148)。

后现代的读者进入核心舞台并且取得了某种空前的自主

权。读者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娱悦、被教化或被逗乐的消极主体。他(她)被授予某种自由权,可以随心所欲地赋予文本以意义而不必计较任何后果或责任。但是后现代主义者不想把读者塑造或一个作者(权威)的新核心。他们也不允许读者去建立某个元叙述或者为知识确立某个新根据,因为后现代的读者在如下意义上是平等的;谁都不能声称自己具有特别的见解或洞察力。在极端的意义上,所有见解都是旗鼓相当的。

后现代文本也具有一种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它独立于作者,并且不装出一种客观的立场。在一个后现代的上下文中,每个事物都可以被当作一个文本来规定,不过这个文本是以缺乏任何具体而确切的内容为标志的。

读者和文本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他们轻易地“变换着位置……,读者建构文本的说法摇身一变为文本操纵读者的说法”(Culler 1983:118—19)。意义并不内在于文本;它存在于文本和读者的交互作用之中。尽管两者在表面上可以平分秋色,然而其间的约定并非总是风平浪静的。读者可以建构文本,文本也可以反过来控制邂逅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每一次相互作用的结果,每一次交锋的结果,都是不同而又单一,短暂而又绝非终极的。有时,后现代主义者甚至提出了反直观的观点:读者是由文本创造的,同时文本是由读者写就的。

在后现代的境况中,人们并非像现代科学的启蒙设计所想象的那样是为了追求真理或知识而阅读和写作的。相反,人们是为了获得体验的愉悦而阅读的。人们可以从一本书的结尾处读起,可以跳到书的中间部分,再返回到结尾,然后参考序言结束自己的阅读(Barthes 1975)。作者为顺序的安排而提出的任何“理由”都被抹去。不存在让人诚惶诚恐的单独内

容。不存在比其他解读更加有根有据的唯一而明确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解读。既然正在实在地发生的事情决不可能得到确切的陈述，那么那个事件在任何情况下就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对任何文本来说，都不存在着单个的意义。

虽然作者、文本和读者的被改变了的境况对于建构一门后现代社会科学而言，好像不会立即显出特殊的关联，但是它们确实为认真地重建社会分析铺设了阶梯。每个术语、作者、文本和读者在社会科学中都有自己的副本。除了最明显的对应物之外，除了其他的角色之外，作者还可以是一个代理者。例如，文本可以被理解成某个事件。读者也既是一个行动者，又是一个接受者，既是一个参与着的观察者，又同时是一个观察着的参与者。通过以几乎一视同仁的态度把给予作者的重视（权力）重新分配给作者、读者和文本，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新的和更有趣的见解将会产生出来。

本章陈述了有关现代作者的传统观点以及对于这种观点的后现代否定。我们简略勾画了后现代转换的起源和演进的轮廓，并且考察了关于作者的诸种后现代观念。我们还解释了作者之死的含义，以及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文本和读者的重新定义问题。随着阅读成为在文本建构中的一次亲身面对而不是一个获取知识的过程，有关文本和读者关系的传统观点同后现代的转变就有了比较。让我们从作者开始。

作者

传统的作者角色

在一个现代的背景中，有关作者及其角色的定义存在着某种总体的认同。断定现代作者在决定其意指的意思方面具有优先权，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为作者是一个创造图书、文章和小册子的个体。如果作为结果的文本被认为是“天才之作”，如果人们“是以崇敬的心情、以期待有所发现的心情来阅读”它的话（Fowler 1987），那么作者的威望就得到了巩固。但是即使从不怎么肯定的眼光来看待作者，作者仍然被假定为是有特权的——纵然不是终极的话——“意义的决定者”（Skinner 1969）。假如事情果真如此，那么一个文本的意义就是作者自觉或不自觉意图的一个简单的功能，读者只需发现这些意图便可明白文本的确切意义（Hirsch 1973：3；Skinner 1969）。

由于现代作者被假定为处于比较优越的地位，他或她的角色就是去教育读者，向读者灌输各种道德价值观念，或启迪读者（读者没有受到如作者那样高的尊敬）。同这种有关作者的观念相一致，如果我们想要充分地理解一个文本并评价它所写的内容，那么明智的做法往往是要考察一下作者的传记和社会经济背景。作者的意图、动机、见解以及作者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背景都被当作影响作者写作的因素。

现代作者的定义或许比仅指从事创作书写作品的人要更加宽泛一些。有一个拓张性的观点把作者转换成为一个代理者，他要么创造了某个境况，要么对某些事态的重大演变和某个特定的社会后果负有责任。这个现代作者在社会里是一名“立法者”，被称为专家、经理、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或教育家。同现代文学家一样，所有这些个体都具有优先接近真理、

理性和科学知识的特权;他们通过权衡正反两个方面(利弊),通过决定“真的”事物来“了解”和“取舍(定夺)事物”。就对处于争论中的相互对立的观点作出选择而言,这些现代作者兼立法者是独断的。可是他们选择的东西却变成了“正确的和有约束力的”(Bauman 1987)。现代作者,从广义上说,可以是单个的或多元的,可以是某一个体的代理者,也可以是某一集体的代理者;著述活动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效果,产生有意或无意的后果。

后现代主义者关注的是:在所有形式上解除现代作者在当代的无所不在的魔力(Bauman 1987:4,122—24)。在人文科学中的作者之死和在社会中的立法者之衰落是平行不悖、并驾齐驱的。通过主张作者并没有创造出“最好的社会秩序”,后现代主义者向作者在社会科学中的权力和权威提出了挑战。没有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真正相信立法者拥有解决一个后现代世界问题的“正确答案”。例如,在人类学中,人种志学者,作为作家兼作者,一直因其对于权威的垄断以及有意地拉开自己同读者的距离而遭到了谴责(Strathern 1987:258;Hatch 1987:272)。一些后现代的人种志学者主张改变这种状况,途径是同那些被研究者分享作者的权力,作者的责任(Clifford 1988:51—53),与此同时让每个事物都向着一个更积极的读解活动开放。

后现代主义者为改变作者的角色和废除作者的权威提出了一些理由。他们首先主张,给予现代作者以判定其文本之意义的终极发言权是一个错误。著书立说是一项暗昧不明的工作。后现代主义者诘难道,我们怎么可能在一种主观的作者陈述和作者想要创造一个心灵框架、一个效果的那种企图

之间作出区分呢。文本一旦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被写成，诸主体的复合性也就产生了(作者和第一人称)。这种境况是欠决定的(under-determined)，因为要想知道作者对文本的关系是不可能的(Barthes 1977:142)。要想在作者对于某工作的意图同其对于某工作的信念之间作出区分也会遇到困难。此外，作者对于自己所说的话语的言外之意未必总是有自知之明的。例如，一位法官写就了一个带有某个明确意图的决定，但是经过反复解读之后，他发现其中蕴藏着某个他始料不及的意思(Dworkin 1983b:259)。再来看看这样一个实例，远在妇女取得选举权以前，所有的选民就有权参加陪审团。那些被授权将选举权扩充给妇女的人也使妇女有了陪审责任的义务，而对于他们来说，这并非是有意识的或带有明确意图的，不过，这种事情的的确确地发生了(White 1982:483—39)。最后，在解释某个文本时，遵从作者的意图可以作为强行注人人们自己见解的一种掩饰(Dworkin 1983b:251，258)，这使得现代作者仅仅成为一个权力工具而已。

现代作者的兴衰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作者这个概念不是一个自然概念，它只出现于历史特定时刻的某些领域（Barthes 1977; Foucault 1979)。米歇尔·福柯考察了作者的谱系并且认定在原始人中间不存在作者。原始叙述是唯一地以口头传诵和集体复合为特征的。福柯把著书立说设想成现代资产阶级试图为控制或管理作品而确定责任的一个虚构过程。没有作者的话，那么当有麻烦的文本出现时，惩罚该如何实施，或者法律责任该如何归属呢？福柯接着指出，在中世纪，著书立说活动

最早不是出现于文学领域而是出现于科学领域。对于真实可信性来说，作者的威望是需要的，而科学陈述的权威性就有赖于此。只是到了后来，在17世纪和18世纪，科学文本才逐渐由科学团体而不是特定的个体所支持、所保证；对于个人的著述活动的需要也随之减弱了（Foucault 1979：148—149）。然而，文学作者，直到现代以前，并不是重要的。他（她）几乎与英国经验主义、法国唯理主义和对于宗教改革的信念同时产生——所有这一切都强调个体的重要性（Foucault 1979：143）。

前不久，在社会科学领域后现代主义的结构主义先驱预示了对于作者的后现代变革。他们的见解在有关作者的传统现代观念和后现代再定义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Jefferson 1982：99）。对结构主义者来说，作者制作文本，引导其出版，然后就悄然隐退了；作者允许文本去过它自己的独立生活而不具备去规定它的特殊权利。结构主义者反对把作者视为“从事某项工作的特殊创造者”，因为创造性工作据说是“来自于他们的背景（文化和知识）”（Kurzweil 1980：152，210）。作者有意要写的东西，说者故意想说的话，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从结构主义者的观点看来，意义不是由“说者的主观意图和愿望”所传递的，而是“制作它的作为一个整体的语言系统”的产物（Jefferson 1982：87）。譬如，结构主义者提出，在作者（教授）得到机构支持的情况下，这些机构实际上“创作”了那些被制造出的文本，因为这些机构确立并控制着著书立说活动的环境（Said 1976：40）。这些结构主义者竭力否认作者的权威；主张文本必须独立自主。

正如后现代主义者主张作者有一个相对晚近的历史发展一样，他们还认为作者在不远的将来会完全地销声匿迹，他们把这视为后现代时代的一个恰如其分的趋势。他们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特殊作者的独特的创作活动，认为它们都不具有真正的独创性；每个事物都是一个副本，一个影像（Baudrillard 1983c）。[①] 在现代意义上，对于商业广告、电视脚本、广播对答或者由政党候选人或被当选的总统递交的演说稿来说，不存在作者。在每一种情况下，作者（御用文人，广告代理人，影视作家或制作人）可能制作了一个文本，但他（她）无力驾驭它，也很少被得到承认。集体创作（权威）按照自然法则也将作为官僚机构的功能而日益衰落，谁也不承认代理机构，谁也不承担责任。

对现代作者的后现代挑战

对"经典的作者功能"（Wood 1979:23）的后现代挑战——有些后现代主义者挑衅性地将之称为"作者的死亡"（Barthes 1977:148；Foucault 1979）——在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之间存在着略微不同的理解。在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转而解除了作者将某个单一的、"正确的"意义归之于他（她）的文本的特殊权威。[②] 这些后现代

---

① 正如我的学生们欣喜地指出的那样，剽窃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在作者的角色已经如此削弱的后现代世界里，这个概念没有自己的立锥之地。

② 有人指出，作者的衰落是人文科学中文学评论家们的一项发明（杜撰）。这些评论家们千方百计地淡化作者解释的优先权以便为自己确立更多的合法权利。在我看来，这种怀疑一切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作者的死亡是如此自如而协调地适合于后现代主义者分析的所有其他因素，而其中没有一个因素是特别支持文学评论家的。

主义者确信，有关某个个别作者在创作某文本时的有意识意图或动机的知识，对于那个文本的理解来说，助益不是很大。他们认为，为了研读某个文本而去研究作者的生活背景或考察其人格都是同样地无济于事的。因为文本自身超拔于个别作者之上，同作者的意图则毫不相干。解读文本“同作者其人毫不相关”。作者所写的东西一般来说不是他意指的东西(Derrida 1976:158)。

最极端的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断定作者是先天地可驳斥的。作者蕴涵着一种意识形态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于后现代社会科学来说，既是政治的、难以接受的，又是异己的。他们说：现代作者充其量也不过是借助现代主义框架的分析假定，来寻求规定和限制，试图强行控制和加以责难而已。他或她让读者任凭作者摆布。对作者的关注蕴含着文本的所有权和一种特殊的身分(Foucault 1979:159)。它假定了理性主义、个体动机、创作和设计。现代作者不仅是一个个体。他(她)还是一个“维度”，一个心境，一个功能原理，一个信息源，一个模型，一个为某个逻各斯中心主义观念、强权和权威(作者)提供的手段。最后，“作者的声音”扶持了一些“专家”，他们声称拥有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的特殊途径(列宁论马克思；马太、马可、路加或约翰论耶稣；或张三论李四)。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反对所有这些被假定的、特许的解释。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隐蔽的作者和明确的作者一样都必须从社会科学中清除出去。国际关系中的盟主(hegemony)概念就是一个例子。盟主是“被常规化的可以认可的实践的一个总称，它同一于某个特殊的国家和主权社会……它被看作独立国政治主体性和行为的一个实践范式。”

它的机能在于建立各种标准，通过否定来确定什么是非常规的东西，制定议事日程，建立“有约束力的仪式惯例”，却又不曾明显地完成其中任何一项任务(Ashley 1989b)。尽管盟主概念包含着一种关于作者的明确假定，但是因为它没有把个体指称为作者，所以结构主义者对于这个概念非常满意。但是后现代的国际关系专家认为盟主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隐藏着某个有关作者或代理人的非主观形式，这个形式由于成功地从不以有组织的、故意的成有意向的方式出现，所以它是有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者主张，作为一个概念的盟主固有的权力关系是不明确的。它不是一个自觉地向着某个特定目标努力的问题。盟主的统治权是虚假的，它依赖于“它占据领土的能力，强有力地执行那里的被自然化的权力仪式的能力”，以及秘密地和“悄悄地实施全球战略并对国际目标产生影响的能力”(Ashley 1989b:269)。同它以更不会引起人们误会的、明显的作者形式出现的情况相比，这种情况并没有使盟主(概念)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更多欢迎。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以不那么戏剧性的术语来理解作者的衰微。他们没有完全地抛弃作者，而只是否认作者的意向“完全地制约着”文本的意义。他们只想削弱作者的权威(Norris 1988:131)。作者仍将生存下去，但是以一种被改变了的、受贬抑的形式生存下去的。

当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坚信社会科学中“作者的死亡”产生了后现代的解释者的时候，他们使作者以一种更加折衷的角色复活了。解释者不像立法者，他(她)不提出普遍的真理主张，也不提供任何指令。他(她)只是勾画出各种选择，并以一个平等者的身分参与各种“公开的争论”(Bauman 1987:

5—8)[①]。解释者的见解只有当它个别地富有意义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Rorty 1979,1982)。任何一个特殊的真理只有针对它得以构成的团体或社团的成员而言才是相关的和有效的。因此,知识是相关于社团的,根据某个社团的信念为真的知识在其他的社团看来则为非真;任何知识规则只适用于社团内部(Fish 1989)。

解释者在社会科学中扮演着一个附加的角色。这个角色在人文科学中不存在对应者。解释者对不同社团内部存在的关于真理的不完全的、种类繁多的论述进行调停,他向生活于其他社团中的拥有不同真理观的人们解释和"说明"这些论述(Bauman 1987:191)。他(她)"时刻提防着在沟通过程中对意义的扭曲"(Bauman 1987:5),但是他并不坚持此解释对彼解释具有优越性。[②]

对社会科学的意义

在社会科学中,"作者的死亡"终结了对于有些课题的研究,增强了对于其他课题的研究,并使另外一些课题的研究得以开始。首先,最明显的是,后现代主义者削弱了作为文本作者的作家的重要性。这样,后现代社会科学将不必花大力气去查找"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其次,如果从广义上来理解作者,把作者当作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扮演着各种角色的人物,那么"作者的死亡"的影响力将更为巨大,因为在这种

---

① 这个概念在第6章第4节关于公共场所中将予以讨论。

②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总是向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如下主张提出诘难:解释者的目标旨在达到完美的沟通。

情况下，"作者的死亡"具有代理者、权威、义务性、因果性和代表性之死亡的含义。某些实例有利于证明它给社会科学带来的这些后果。

后现代的"作者的死亡"最明显不过地取消了一种学术研究形式。作者的缺席剥夺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们的合法权，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想剖析单个个体，诸如亚里士多德、凯恩斯、弗洛伊德、马克思或德肋撒的生活经历。政治传记，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有关过去的过时了的工作。后现代主义者更乐于分析或"解构"这些传记的"文本"，而不是去窥探作者的意图或动机。

后现代的"作者的死亡"使得历史上的作者(很久以前的作者，其作品对今天的我们仍然一直具有特别重要性的作者)大多变成了累赘，社会科学中的许多课题也是如此。例如，假如作者的身分被取缔的话，那么制作某个文本——诸如一个契约——的那些人的"确切"意图，便无需与试图应用该文本的政府或司法专家有任何关联。在后现代上下文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Ⅱ协定》可以独立于其作者的愿望而获得解释，因为文本被认为是独立自存的。后现代主义者还对在司法体系中的法律判例或裁判规程(被理解或以前的相关决定的作者的意图)进行了诘难。[①]每个决议都必须被重新考虑为对法律体系会潜在地造成混乱后果的东西(Posner 1988)。没有人认为有必要考虑或尊重美国制度缔造者的确切意图。同样地，

---

① 有关作为作品的法律以及相关问题的概述，请参见米诺(1987:86—89)。波斯纳(Posner 1988)对后现代作出了一个有趣的反应，他主张文学和法律文本不是一回事。

尽管有些法官主张，在处理某个遗嘱或遗言的情况下，“发现”作者的意图是重要的，但后现代主义者却情愿留意“书面的意思”或“明确的意思”(Hancher 1982:510—11)。

后现代主义者不同意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如下观点：作者代表着因果力量，著书立说蕴含着社会责任。他们要么否认因果力量和因果关系的存在，要么完全地颠倒了那种关系。在后现代主义的术语中，因果关系变成了“暴虐”(Zeldin 1976:242—43)。有时，因果关系被重新界定得极其复杂和相互影响，以至于无法使之分开并对未来的结果作出可行性估算。于是想确定任何特殊的因果关系也就不可能了。这被称为后现代的互为文本关系(intertextuality)，从极端的意义上说，它意味着，一事物都是相关于他事物的。[①]因此，对于后现代的社会科学而言，在某个无作者的、完全地互为文本的、代理人被省略掉了的世界中，根据现象的来源或起源对诸原因的研究必须中止。[②]因果关系的缺乏导致了一种对实证主义的、或量化的社会科学之可能性的怀疑主义。

作者和因果关系的消灭还允许后现代主义者为道德代理人义务的终结而欢呼雀跃，而不管这种义务是归结于一个个体(诸如一个被选出的政府官员或一个公司总裁)，还是归结于一个集体(诸如智囊团之类的决策团体)。就掌握原因输入量而言，由于单个个体无法对某种情景负责，所以谁也“创作”不出诸如此类的文本和事件。对社会科学而言，作者的死亡导致了人类主体的责任的消除(Pinter 1987:147)。[③]我无法对我子女的成长负责；我没有创造他们的生活，没有创造(认可)他们的努力，也没有权力干预他们的选择。决策者不决策，所以他们对于任何特殊的政策后果(文本)都不负有责任。同样

地，如果美国的中美洲政策（一个文本）是独立于其作者的意图的，那么卡特（布什或里根）政府将不被视为作者（有责任的代理机构），而无需对该政策的结果负责。结果将导致一个标准的模棱两可的状况，一个道德真空，一个无义务无责任的状况；这全都有损于人们希望看待它的方式。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在政治竞技场中颠倒了因果关系。在现代世界里，政治责任意味着被选出的领导者因其积极的政绩而受赏（连任），也因其在履行政府职责时的明显的决策失误而受罚（被罢免）。在后现代世界里，这种关系被颠倒了过来，在其执政时期，领导者既不因其伟业而受赏，也不对在其执政时期所发生的灾难负有责任。领导者是"某个复杂事务中微不足道的因素"。他们"无力提供担保或领导变革"（Edelman 1988：第3章）。

尽管后现代创作并非总是不可避免地需要全盘摈弃在社会科学中以前曾经发生的一切，但是它仍然构成了同现代观点的重大区别。后现代创作（写作）和对于文本作品的后现代态度不适合于传统的社会科学家，后者精通被谨慎写就的文本。虽然某一个实实在在的作者确实研究并写就了一个文本（以一本书或一篇论文为形式的有形信息），并以此来向读者（有形的读者）传递信息或知识，而不管这些读者是学生、同事

---

① 互为文本关系在本书词汇表中有定义，并且将在第7章第1节中进一步讨论。

② 这个被省略掉的作者的方法论意义将在第7章中专门给予讨论。

③ 这种怀疑论后现代主义者的语言学相对主义（将在第5章予以讨论）也许可使作者逃避责任。"如果我们总是口是心非，那么显然地，我们不会因我们说的话而受到谴责"（Schwartz 1990：36）。与此同时它赋予个体以重大的权力：他或她作为一个后现代读者可以"赋予任何另一个人的讲话以我们所选择的任何一种意义"（Schwartz 1990：30）。批评家们尖锐地指出了赋予不具责任的个体以权力的危险性。

还是一般群众，但后现代主义者仍拒绝给这样的作者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诸如教授、作家、学者）。

后现代的作者在一个未被考察过的后现代世界中承担着一种新奇的角色。他（她）努力以如此模棱两可、不可思议的风格书写着一个开放的文本并千方百计地把它构思得如此含糊不清，就是为了促进后现代解释的无限性。他（她）努力地拓张对读者有益的空间，以增进意义的多样性，以发明一个赤裸裸的、无拘无束的、不用定义解释的文本，一个包容并促进了许多解释的文本。在后现代阶段，人们写作或创作，不是像启蒙时期倡导的那样是为了追求真理或知识，而只是为了经验上的愉悦。

传统的社会科学家们通常采取很不相同的行动策略；他们想限制解释，确定责任，澄清权威关系。他们旨在“抑制含糊性，控制意义的增生”（Ashley 1989a）。在社会科学中，作者在不损害内容、不曲解意思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地把准确的信息传递给读者。其意图就是要严格地书写，合逻辑地推理，使得读者（学生、同事等等）不得不赞同作者的见解。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和后现代作者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接下来讨论文本和读者。

文本和读者

赋予文本以特权

一个现代文本传统上被视为已写就的交往工具。它是向一组特定的、同一类别的读者传递精确信息的一个尝试。

由于受制于某个境况，某个历史阶段，某种文化，它必须在其所处的社会的、心理的、经济的或政治的环境中得到理解。现代读者有礼貌地“倾听”正对他们说话的那个文本。文本具有一个可知晓的内容。那内容由作者决定，作者之写作有其个人的、可识别的动机和意图。

后现代主义的结构主义者先驱借助于按照他们自己观念重新改造文本的方法，预示了后现代文本的演进。他们拒绝把理解文本的活动当作达到作者和读者之间构通的一次简单的尝试。在结构主义者看来，文本更是“由文学机构和文化的散乱代码所产生的一系列形式”(Culler 1983:82)。它有一个客观的内容，尽管这种内容是隐藏的。一旦写就之后，文本就在如下意义上被视为独立的：从文本的渊源、作者的声音或文本的上下文来寻求文本的意思和解释是毫无结果的(Barthes 1979:77)。

后现代主义者比结构主义者走得更远；后现代主义者拆解了规范的结构，并主张不存在两个相似的文本，也不存在有关同一文本的两种相同的读解。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把文本当作毫无限制的，已抛弃任何客观内容的东西。他们认为，对于某文本的任何一种单独的、鉴别性的、有条理的解读并不优越于任何一种其他的解读。他们赋予文本以特权，当且仅当他们假定文本自身具有重要性时。“文本即一切，文本之外别无他物”(Derrida 1976:158)。[1] 这样，对于怀疑论者而言，后现代文本是一个“相对地不关联残篇的”集合，“它向文学代码提出

---

① 鲍曼声称德里达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我们可能知道的一切就是一个文本；在我们努力地把握某文本之意义的过程中，它能够向我们提供的唯一东西是另一个文本；除了以那种方法去了解文本以外，我们找不到更好更确定的途径”(Bauman 1990:427)。

了挑战，那个代码使读者醉心于寻求条理清晰”(Fokkema 1984：44)。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与其说要否定、不如说要矫正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文本观。他们认为，文本并不是完全地随意独断的。他们也不相信所有解释都是等值的。

后现代文本是一个多元的文本。由于它的开放性(或模糊性)而可以作出无数的解释。它之所以被称为“书写者文本”(scriptible)是因为它可以被每一位邂逅者重新书写(解读)。它是“阅读者文本”(lisible)的对立面。后者被人阅读是出于对某个特殊信息的考虑，“阅读者文本”是为某个消极的读者预备的，它反对被读者重新书写。[1] 书写者文本被看作优越于(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回避这些等级性术语)阅读者文本，因为“一个文本越是多元的，读者就越不可能发现文本的原意，不管它是以一种作者口吻的形式，一个具有陈述内容的形式，还是以一个哲理性的真知灼见的形式出现”(Jefferson 1982：103)。文本越是开放，潜在解释的范围也就越是广泛。后现代的文本“是一架制造解释的机器”(Eco 1983a：2)。

后现代主义是以文本为中心的。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经历，一场战争，一次革命，一次政党集会，选举，人际关系，度假，理发，购车，谋职，等等，都是一个文本。甚至演说也具有文本的地位(一个口头文本)。[2]批评家们指责后现代主义者取消了“同某文本相关的所有外在因素”(Harari 1979：41)。[3]在人文科学中，这意味着分析文本是在脱离其背景的

---

① 有人认为由巴尔特发展起来的书写者文本和阅读者文本之间的差异与其说是后现代主义的，不如说是结构主义的(Culler 1983)。不过不管怎样，这两个术语与后现代主义的文本观有着相当大的关联。

情况下进行的。在社会科学中，它意味着现象是在不考虑其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背景的情况下被研究的。后现代主义者用互为文本关系的思想回答了这种批评。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每个文本都相关于每个他文本，这导致了"互为文本关系"(Kristeva 1980:36,65;Morgan 1985:8—12)。来自某文本的效果对所有其他文本都有影响力。存在着一个整体混合，一个类似于中世纪狂欢节的共时关系，在那里每个环节都相关于任何一个他环节(Bakhtin 1973)。在某个最深刻的意义上，所有文本都是对于其他文本的重复。文本的相辅相成(互为文本)关系是日常生活的特性(Lipsitz 1986—87)。最终，没有一个文本是原版的。"每个文本都处于另一个文本的交互文本关系之中，因此都是属于互为文本的"(Barthes 1979:77)。最后，站在一个差不多是形而上学的

---

② 在不久前的历史中，演说一般被视为优越于书写，因为它更即时更直接。听众马上明白了演说者的意思。书写被视为更遥远、更间接，要借助笔和印刷机才得以传递。演说者可以当众答疑，描述和澄清是非曲折；然而书写者是不在场的，有间距的和遥远的，阅读者发生不了直接的交互作用或反馈。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企图摧毁演说高于书写的等级分类；他称这种见解为语音中心主义或语音逻各斯主义(Derrida 1981:24)，并严厉地批判了它。他认为，书写比演说要求更高，书写包容了严肃性和智力活动。书写优越于演说，因为它提供了被思之物的一个永恒记录，它不会像演说那样转瞬即逝。

从表面上看来，现代技术——电视、广播、影像——赋予演说以特权，它使演说变得更为重要；但是这些表象是欺骗性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电视上的政党演说活动，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书写和演说的差异已经被取消了；两者现在互相纠缠在一起。里根在讲词提示器面前读着大部分"演说稿"；他"说着"一个被写就的文本。

③ 并非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主张绝对孤立地去思考文本。福柯提倡平衡，他批评德里达过于强调语言的自主性，忽视了文本的历史和政治含义。福柯(Foucault 1972)强调文本和权力的关系，强调许多力量影响着文本的产生和文本的终极形式。

立场上，怀疑论者得出结论：文本无处不在，只是在任何一处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呈现。它几乎没有确定的本质，没有具体的内容。肯定论者不打算以如此绝对的方式取消文本的内容，他们比怀疑论者更关注文本的确切本质。

不过，绝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都同意，在考察一个文本时，我们不应该只注意文本说了些什么，而且还要留意文本没有说出的东西，以及它含沙射影地暗示的东西。对怀疑论者而言，其表层内容没有多大意思。文本要表达的诸思想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正如我们将在第 7 章中看到的那样，文本自我解构以揭示被遗漏或被遗忘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文本创造了它们自己的“意义的多重性”。读者可以是这整个过程的见证人，但是文本无法自我澄清（Cantor 1989：363）。

重置读者

从读者出发的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意义不是源于一个文本（由作者创作）的制作，而是源于（读者）对它的接受。任何人都可以阅读一个文本，且在阅读中重新创造出它来：记者，社会科学家，市民以及其他人。这暗示着，对任何一个文本而言，肯定存在着私人的、多样的解读和理解。从极端意义上说，后现代读者在阅读活动中，“书写”或解释着文本，而无需特殊的作者（权威）（Derrida 1974b）。读者与其说是一个单称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复合概念。因为后现代读者是一批情趣各异、精神饱满、争强好胜的人。

历史上，人们一直以为现代读者的状况是理所当然的。在作者和文本的复杂关系中，读者处于接受的一端。他们的态度是一种消极的态度：重构作者的“目标和态度以便为建构

其文本的意义引申出标准和规范”(Hirsch 1967:227)。生活作为一种阅读结果,本来要丰富得多,但是除了花钱买书和花必要的时间读书以外,人们并不要求读者对于沟通过程能够作出更加严肃而积极的贡献。在极端意义上,现代作者被要求去千方百计地“征服读者和约束读者的行为”。有人指出这使得读者成为“一个潜在的牺牲品”(Fortin 1989:28—29)。[①]

在人文学科中,后现代读者与其说是一种戏剧性的创新,不如说是一种渐进性演变的结果(Suleiman and Crossman 1980)。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在新批评论的以文本为中心的世界中,读者的角色是举足轻重的。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文本逐渐地被视为具有某个可以由科学程序决定的客观内容;于是,读者的思想就无足轻重了。文献研究被说成是“以日渐积累的知识实体为基础的,这个知识实体是概念、工具、分类和发现程序的集合体,它使批评家能够精确地规定其研究对象,并以‘科学的’方式处置其研究对象”(Freund 1987:69)。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事态又有了变化。结构主义的读者观(形式主义者的文艺批评)向着后现代的读者观运动。不过,它继续保留给文本一个客观的、甚至科学的地位(Freund 1987:69)。结构主义者强调读者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① 现代政治作者很注意如何去激起读者的阅读口味。但是后现代主义者从一个不同的观点来保护读者。例如,一位现代评论家会认为好莱坞的电影工业“悄悄地迷住了观众,使他们成了这个总是显得构造完美、独立自主的世界的不受注意的旁观者”。各种手法既精致又奇特,它们的被采用旨在留给观众(读者)一个印象:他们是自由的,而实际上他们的“阅读”是完全地受控制的(Allen 1987:89—96)。后现代主义者,尤其是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会认为这种现代观念是机械的、阴谋的、左翼的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

不是一个"自觉的、有目的、有情感的个体"。尽管他(她)是一个经受过文化熏陶的人,尽管他(她)积极地处置着文本而不是消极地接受文本,他(她)却被"消融于非人格的'阅读'活动之中"(Abrams 1981:189)。沃尔夫冈·伊泽尔(Wolfgang Iser 1978)主张一个文本召唤起一个"蕴含的读者",从现象学的角度看,这蕴含着文本和实际读者之间的交互作用,蕴含着一个关于沟通的双边关系。在英加登的启发下,他提出一个文本具有各种缝隙,在阅读活动中读者澄清了各种含糊之处。"读者自由地填满了书页的空格,不过他同时受到文本格式的限制;文本提出建议或作出指示,读者予以处理或进行建构"(Ingarden 1973;Freund 1987:142)。在伊泽尔的结构主义形式中,文本放弃了它的一些客观的地位。逐渐地,与之相关的读者有了一点主动权,但是受到"利益体系的隐藏代码"的制约(Abrams 1981:189)。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 1980)则走得更远,认为文本实际上是由读者建构起来的。不过菲什提出了一个主要的限定:读者在其阅读活动中并不具有绝对的自由。他认为读者们受到专业社团的引导,他称这种专业社团为"解释社团"(它与其说是个体的,不如说是集体的策略,或成套的公共规范)。读者"创造"文本,不过是在他(她)从某个"解释社团"中学到的知识的背景之内进行创造的。[①]

后理代读者采取了决定性步骤并掌握了控制权。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允许读者在阅读时拥有不受限制的自由权,完全的自主权,可以随心所欲地解读文本而不受任何制约。

---

① 拉卡托斯(Lakatos 1978)批判了这种"学者社团"的方法并称之为精英分子。鲍曼(Bauman 1978)在"互为根据的意义"的形式里利用了它。

既然文本不具有任何客观内容，那么它对任何一种解读都是开放的。它们的后现代读者以其批判性和创造性，通过主观地建构意义，获得了从未有过的重要地位。最后，后现代读者“写就了文本”(Derrida 1976)。在极端意义上每位读者都拥有绝对的权力，有权作出任何一种解读而不必受证据的制约，不必受文本客观线索的制约，也不必受作者愿望的制约。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不同之处与其说是性质上的，不如说是程度上的。他们也强调读者的权力和自主性，不过，只有极少数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同意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赋予读者的过分权利。

但是，有人也许会问，后现代主义者不是把他们以前在作者手中发现的、受到如此多的攻击的所有权力和权威都交给读者了吗？这个问题会给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带来很多麻烦，不过它给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造成的麻烦会少得多。怀疑论者主张，现代作者声称具有特殊的优先权和专长，而所有后现代读者却是平等的。后现代读者并不认为自己的解读就是真理，而是赞成其他解读都是同样地有趣的。怀疑论者认为，这仅仅反映出，独立于观察者的真实而客观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不同读者被期待着作出有关某文本的不同理解，因为在一个后现代世界中存在着多重现实。阅读是文本的建构，而不是知识的创立。

后现代通过把每个事物都规定为一个文本的做法来扩张文本的定义，这种努力导致了某些不利的后果。后现代主义者被说成是这样一类人，他们神秘化了文本，盲目崇拜书写，创造了一个孤芳自赏的读者，这个读者，像后现代的个体一样(将在第3章予以讨论)，显得极其自高自大、自鸣得意和自以

为是。“这种特许的读者到处寻找着，却只找到了文本，而在文本中又只找到了他自己”(White 1978:265)。通过如此地全神贯注于文本，后现代读者还斗胆消除了“同文本相关的所有外在因素”或者把它们贬低为一个文本的功能(Harari 1979:41)。但是如果一切事物都是文本，那么文本这个词就不精确了，如此全面、包容一切的概念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现实只不过是语词而已”(Graff 1989)。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处置文本“只能通过诸解释系统，它们的选择和排斥把自己‘题写’在解释的结果中”(Graff 1989)。这样的世界可能充满着神秘的诡计，但是也可能会产生焦虑和愤怒。

后现代文本和读者对社会科学的后果

传统的社会科学家通过阅读以求发现作者的意图。他们的阅读不是为了寻求在舍弃作者意图的情况下重写文本的快乐。即使有的话，也只有极少数社会科学家会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多地确认读者的权威性、自由性和可靠性。许多社会科学家总是心怀妒意地提防着那些期望参与意义归属活动的读者。他们不太可能鼓励读者按照读者亲自体验语言、符号和信息游戏的方式去重新创造文本。很少有社会科学家致力于把建立文本的开放性或模糊性作为创作目标本身，在社会科学中的政策问题或实际应用问题而临危机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他们的目标是一个精心写就的文本，它限制着语言游戏，也限制着适用于读者的可能的意义。此外，与后现代主义者不同，现代社会科学家很少在没有文本的起源和背景的情况下考察文本。尽管结构分析和系统分析可能允许过这种做法，但是其中没有一种办法曾经成功地取消过起源、历史或背

景。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后现代的读者观和文本观的意义摇摆于戏剧性和常识性之间。在极端形式里，后现代观点似乎同传统的社会科学是不相容的。其中有很大成分还是取决于语词、文本和读者是在其原初意义（作者作为作者兼书写者）上得到评价，还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作者作为作者兼代理人）上得到评价。文本定义的扩大增加了后现代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潜在应用范围；假如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整个世界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文本，那么整个社会科学就变成了后现代分析的一个候补者。扩大读者的解释力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从本质上说，有关文本、作者和读者的后现代变革的一些最重要的后果是方法论上的后果（参阅第 7 章中的讨论）。

后现代的解读活动重新回到了对于社会分析的重视。例如，后现代主义者把政治发展（或文本）作为读物来处理，作为"关心它们的公众的产物"，"而不是把政治新闻看作民众对之作出反应的一些事件的报道。"（Edelman 1988:2）。这重新确定了知识产品在社会科学中的方向。社会科学已经不再是企图去理解并带给某课题以客观性的一种尝试；相反，如果它还想存在的话，那么它就是对于某个新奇变量的生动叙述。在这个叙述－描写的上下文中，模糊性和主观性"既不是离题的也不是病态的"（Edelman 1988:95）。[1]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指望读者角色在社会科学中的这

---

① 后现代小说被描写成"不具备可识别情节或动人角色的混乱描写的混合"（Culler 1983: 10; Harland 1987: 136）。如果人们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认为对于本质的适当性无法作出仲裁的话，那么离奇古怪的内容就完全是连贯一致的了。

些变化能为更广大的读者谋得更多的利益，甚至能丰富社会科学活动，包括舆论参与。在人类学中，后现代读者“参与人种志学家和被考察主体之间的对话”。后现代主义“允许读者对新奇事物本身直接地作出反应”(Hatch 1987:171)。这是一种亲身实践的人类学，在那里每个公民都成了他(她)自己的人类学家。

给与读者更多权利可以被理解成在如下意义上对于批判的公民性的鼓励：强调每个个体对于一个候选人的演说、一项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一个外交政策决议(所有的文本事件)[①]都具有一个有用的和切实可行的意见。后现代主义者会进一步指出所有公民的主张(理解)——譬如对于某选举结果的看法——都是等价的。权力一般来说使人自我感觉良好，后现代读者或许会感到他们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至少在他们认识到如下情况之前是这样：如果权力被赋予了每一位读者，那么更多的权力感就纯然是一种幻觉。

后现代的文本观改变了社会分析，使它抛弃了诸如年龄、性别、种族之类的传统社会学变项，抛弃了历史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既不是把秩序和理解强加给某个文本，也不试图在两个不同的分析之间作出选择，而只是被要求去崇敬这个文本的无序并视之为“同其他文本之关系[互为文本]的无限游戏”(Morgan 1985:2)。假如美国的中美洲政策被理解成一个开放的、复合的、后现代的文本，那么就会出现各

---

①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主张，今天的现代政治背景使人感到软弱无力，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投票是微不足道的，并主张普通民众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是遥远而极其微弱的。

种各样的解读。一些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会将下面的解读置于同等的基础上:第一,反政府人员是"自由战士",他们推进了尼加拉瓜的民主;第二,反政府人员是美国为达到它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而扶持起来的反共产主义雇佣军。其中没有一个陈述,或它们之间的任何一个陈述,可以被断定为优越于任何其他的陈述。后现代主义者对于下列情况也不感到惊奇:"如果有人把美国军队对第三世界的干预视为对和平的威胁和对弱小国家的压迫,而且就是这同一些人又把这些干涉视为对于共产主义进攻的防卫"(Edelman 1988:93)。这些文本,"在其核心中"具有"意义的相对性,这种意义相对性能得到不断的、肯定的证实,从而损及对客观知识的所有论断和不为前假定所决定的意义"(Wortman 1987:171)。

后现代主义者关切的对象是文本自身而非事件。后现代主义者满足于断定:正在实在地发生的事件决不可能得到确定地陈述;不管怎样,这无关紧要,因为对任何一个文本,任何一个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事件而言,都不存在单一的意义。对任何影视脚本作出无限数量的解释都是可能的。

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后现代主义者对诸如作者、文本和读者之类现代概念的再定义是如何得以被直接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考察某个更有争议的观念转换的个案。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后现代的社会科学家也许更偏爱他们自己对于主体的重建,而不愿接受源自人文科学的、关于应该彻底消除主体的建议。



3 颠倒主体

主体不可以被当作是融贯的行动、书写或其他表达形式的起源……解释各种客体和行动的语言也构成了主体。

——Edelman 1988:9

在后现代主义术语里,"主体性"指的是"个体性和自觉性——某主体的生存境况"(Henriques 等人 1984:3;Hohendahl 1986:59)。当后现代主义者自称是"后主体"的(postsubjective)时候,当他们谈论"主体性"的衰落的时候,他们指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向往客观性。更确切些说,他们要求少强调主体,不要把它说成像"文化与历史经验的预定核心"那样的分析焦点(Giddens 1984:2)。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太重视思考"主体"这一观点。研究科学话语的现代哲学把"主观的"定义为指涉各种情感(规范物)的东西,而"客观的"则指涉某个独立的外在现实。后现代主义者们不这样认为。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体持一种基本否定的态度,但是其

内部存在着某些实质性的差异。我们将看到，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一般是反主体的，而肯定论者的观点则比较复杂。不过，两者都不得不调整与主体的关系，因为虽然主体之死或许在人文科学中是切实可行的，但是主体的缺乏却使社会科学的概念变得模棱两可和无足轻重了。

怀疑论者怀疑某个统一的融贯的主体的价值，诸如作为一种具体的参照点或对等角色的一个人的价值（Baudrillard 1983a：167；Booth 1985；Derrida 1978；Foucault 1970：261—62；Wellmer 1985：436—49）。他们认为，主体是虚构的；在极端意义上它只是一个建构（Edelman 1988：9），“只是一个面具，一个角色，一个牺牲品，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建构，至多也不过是一个使人怀旧恋昔的肖像”（Carravetta 1988：395）。他们批评主体篡权、认定意义、高高在上和专横暴虐（Henriques 等人 1984）。他们把主体看作是过去的陈迹，现代性的遗老，自由人道主义的杜撰，不可取的主客二分法的始作俑者。他们认为，诸如此类的个人统合（personal identity），纵使存在过的话，也只不过是一个幻影，今天，在一个后现代的背景下，它已经再也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了。

最极端的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把主体看作是一个语言学的约定或思考语言的一个效果（Edelman 1988：9；Flax 1990：219；Schwartz 1990：38）。[①] 主体不是“行动、书写或其他表达形式”的起源；相反，语言构成并解释了主体和客体。像德里达

① 正如在第7章里我们将予以讨论的那样，如果说怀疑论者似乎要把“个体置于语言的暴虐之下”而被压得粉碎，那么他们又想赋予后现代的个体以颠覆这种处境的力量，“使他们通过自由地解释语词并且随心所欲地制造语词而施暴于语言”（Schwartz 1990：38）。

和福柯那样的后现代主义者主张，自我只是一个“在语言中的处境”，一个“话语的效果”(Flax 1990)。主体是非本质于他们自己的分析的，那种分析集中在语言、飘忽不定的踪迹、符号、读物和解释上面，所有这一切都逃避着为主体所需求的各种具体的规定和参照点。

但是怀疑论者企图从他们的分析中消解和清理掉的这个现代主体究竟是什么货色呢？他们又是怎样描述他（她）的呢？怀疑论者很少详细地讨论主体的确切特点。不过，有关主体人格的某些假定遍及于他们的分析之中：主体最后成了对现代性进行总批判的一个工具。怀疑论者用在他们看来是完全贬义的术语来描述现代主体，虽然这些特征从现代观点来看通常是很受好评的。怀疑论者指出，现代主体是一个工作勤奋，严以律己，富有责任心的人。他(她)“勤”字当头，“尽”心“尽”力，并有着“努力工作”的自我形象。他(她)没有个人的怪癖，或至少并不强调这些问题。他（她）总是未雨绸缪，做事有头绪，不满足于现状。现代主体可以献身于政治计划并且为实现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各种目标而努力。他（她）可能相信自由意志和个人自主权利，但是一旦采取表决的形式并且作出了决定，他（她）就会赞同多数人的意见(或党的路线)。换句话说，现代主体愿意使自己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他(她)尊重理性规则、总体意志、社会传统和看似公正的固定标准。他(她)真诚地追求真理，并希望这种追求最终不会一无所获。这意味着现代主体对理性、合理性和科学充满了信心，并且把所有这一切都放置于情绪性事物的前面。他(她)乐观地看待人类的未来和进步的可能性(Lipovetsky 1983)。他(她)声称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他(她)

有一个明确的、固定的个人统合性(a distinct,set personal identity)。

怀疑论者对现代主体持全盘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他(她)是一个"严以律己"而又过于专心致志于"自我确认"(selfauthentication)的人。他(她)追求一种"自我克制"(self-denial,克欲,禁欲主义)的"正当生活"(Sennett 1977)。他们反对关于这个特殊主体形式的哲学、知识主张和活动倾向,而这个特定的主体形式是现代性本身的一个极其特定的产品,它与后现代的世界观格格不入。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一些怀疑论者认可了某个特殊的个体——后现代的个体——将其作为现代主体的替代者。

肯定论者则认为主体既不是统一的也不是完全融贯的(前后一致的)。有些肯定论者没有给予主体以任何优先权,相反地他们寻求一个更广阔的参照框架;他们集中考察了主体的中心性质。另一些肯定论者非常赞同某种人类中心的后现代主义,他们欢迎主体以一种新形式回归,对此我们将在后面予以论述。批评家们认为,主体的这种回归仅仅是挽救人道主义传统的某些方面的一个努力而已。但是肯定论者认为,这是对于现代主体的重置而不是它的一次简单的再循环。

追本溯源:后现代反主体姿态的起源

怀疑论的后现代对于主体的反对并不完全是创始性的。弗洛伊德(Blonsky 1985:264—65)和尼采(Booth 1985;Miller 1981)这两个来源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许多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包括福柯和德里达,在发展自己的反主体观的过程中,

都曾受到了弗洛伊德和尼采哲学著作的影响。

尼采曾怀疑某个有思想、有情感、合逻辑地和因果地进行推理的主体的存在。他对"确定的、实质性的自我"的有效性表示异议(Miller 1981:247,258)。他认为主体是自欺的、缺乏觉悟的、意气用事的、伺机报复的和追逐权力的东西(Nietzsche 1979:79—97),是对于某个"受压抑的、怀疑一切的权力意志"的表示(Booth 1985,132—33)。总而言之,尼采认为主体是一个虚构(Laffey 1987:93),这个观点是他的"人的终结"哲学的核心论点(Schrift 1988b:131—34)。尼采预料到了后现代的主体之死,提出了"全面消解自我、个性或主体的观念"的主张。尼采抗议他那个时代的人道主义,也包括这种人道主义同主体、基督教和先验世界的联系。他把主体当作是某个"诡计,颓废者企图用它来抑制力量的良性自生"。主体把"存在的理念强加于生成的事实之上"(Booth 1985:132—33)。

弗洛伊德也怀疑某个融贯的、协调的、统一的现代主体的身分。他清除了自我意识的主体,而用一个散乱的、片段的和异质的、通常对自己的无意识一无所知的主体取而代之(Flax 1990:59)。他的主体不是一个"认识"主体而是一个精神分析主体,用多重性、非统一性和自欺性来规定他是最为恰当的。后现代主义者迅速地利用了弗洛伊德的个体观(作为非理性的和不能进行客观合理论证的个体)以支持他们自己的关于主体的相应结论。但是弗洛伊德给予后现代主义者的支持存在着某些限制。弗洛伊德从来也不会完全彻底地放弃主体。[①]他也没有诋毁启蒙、科学、物理现实,没有放弃对于理性反思的解放能力的信念(Flax 1990:53—55,208,218,228;Schwartz 1990)。

在宣布主体死亡的过程中，怀疑论者还受到了在文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里的更加晚近的结构主义先驱的影响。对于结构主义者来说，消灭主体意味着降低在文学中个体和人物发展的作用。主体先是被剥离了任何真实的统合性，他们仅只成了代码，或者成了各种代码之转瞬即逝的和使人迷惑不解的产品。然后，结构主义者的小说不关心“真实的”人而关心“通过语义学代码对各种品格的命名活动而产生的各种效果，那些效果后来通过某个恰当的名称的归因而具有了个体性和现实性的外表”(Jefferson 1982:103)。相似地，在后现代小说、戏剧和诗歌中，人物和人物的发展至少在理论上并非是举足轻重的。

人文科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者追随结构主义者的引导。在后现代文学里已经不再存在关于人物的长篇描写。我们从中不能知道某个特定个体的特定肤发以及身材的高矮胖瘦情况。后现代文学不关心焦点或形式意义上的个体。正如昂伯托·埃科在《玫瑰之名》中指出的那样，“在以后的篇章里我不想着力描写各种人物，因为没有东西会比外在形式更加转瞬即逝的，外在形式就像秋天田野里的花儿一样，是会凋谢和发生变化的”(Eco 1980:7)。

人文科学领域里的后现代作者仍然保留了主体，而这里的主体是有意识的，意识到了“自己的虚构性”。这样的主体以一种滑稽可笑的方式做出出格的行为。他们拒绝倾听作者

---

① 雅克·拉康启发了后现代的心理学，但是他仍然保留了主体，也许这是因为“他更喜欢在本质上是黑格尔的而不是尼采的或海德格尔的哲学构造”的缘故(Anderson 1984:55)。

的意见或拒绝承认作者的权威。这些主体兼人物千方百计地躲避、蔑视或反对他们的作者。他们做着他们的作者所不想做或甚至可能禁止去做的事情。有时候，这些主体还对自己之被写进某个文本而表示懊悔和痛苦（McHale 1987：120—23）！

就像结构主义曾经为作者之死开辟了道路那样，它也不仅在人文科学里，而且在社会科学里为主体之死开辟了道路。结构主义者认为，主体是一个神秘化的东西，因为他（她）被假定为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关系的代理人。通过消除对于个体的强调，通过关注更大的结构，关注某个体系之机能的正式法规，关注这些结构的语言学建构，关注它们所承载的符号（象征）意义，以及关注在结构转变方面而表现出来的变化，结构主义者开辟了一个从作者（主体）中摆脱出来的新趋势。接着，结构主义和系统分析否定了带有某种主观能力去维持或改变社会关系的某主体的可能性（Althusser 1971：160）。在结构主义者的传统里，主体是一个“下落不明的人”（失踪者）。例如，莱维－斯特劳斯指出，他的研究的终极目标不是“去构造人而是去消解人”（Lévi-Strauss 1966：247—55），后现代主义者对此表示赞同。[1]

因此，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们都倾向于考察没有主体或个体的社会。主体失落在冲垮个体的各种结构的滔滔洪水之中。结构主义主体的消失为后现代社会科学家提出如下

① 尽管结构主义者为创立一门无主体的后现代社会科学开辟了道路，但是后现代主义者比他们走得更远，他们把主体之死作为清除科学、理性和合理性之强制性的一个工具来使用。

观点提供了条件：个别主体不是社会过程的建构材料。结构主义的观点鼓励他们去怀疑作为具有决定其周围环境或对政治结果施加影响的力量之代理者的人类的效用。“人类代理者在由某些大规模的社会机构所构成的世界里活动，那些机构不是任何人的计划或意图的产物”(Ball 1987:7)。结构主义者将结构定义为人类干预所无法触及的东西，后现代主义，尤其是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也是这样来定义结构的。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现代主体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现代主体至少是出于三个理由。首先，他(她)是现代性的一个发明(杜撰)。其次，对于主体的任何关注都假定了某种后现代主义者不予赞同的人道主义哲学。第三，主体自动地需要一个客体，而后现代主义者反对这种主－客二分法。

主体作为现代性的一个象征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把主体的焦点和现代性及现代价值取向联系起来，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他们对它表示怀疑的充足理由。他们认为主体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发明，是启蒙和理性主义的产儿(Wellmer 1985:349;Derrida 1978)。正如现代科学取代了宗教一样，理性的个体(现代的主体)取代了上帝。现代概念——无论是科学的(外在实在、理论、因果性、科学观察)还是政治的(“权利政治学”，民主代表，解放和自由)——都假定了一个独立的主体(Hawkesworth 1989)；所有这一切都是“随着主体的定位而得到定位的”(Miller 1981:261)。因此，

消灭主体同时也就是消灭了与它相联系的所有现代观念。例如，没有了主体，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其他人赋予地位、团体、人或阶级之类的现代范畴的重要性便变得毫无意义；而权力则被消散于交互文本关系之中（Henriques 等人 1984）。随着主体和作者的被消灭，诸如因果性和代理人之类的现代研究的核心工具也消失了。此外，否定主体使得有关人类干预、人类规划、合理性和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效用的后现代悲观主义得到了确证，因为主体对于它们当中的每一方面来说，都是本质性的（Wellmer 1985：346）。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对于主体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所充当的核心角色持批评态度。例如，怀疑论者批评主流政治学家的如下主张，主体是一个中心，一个“至高无上者”，一个分析的“英雄”，一个“拥有对外在的和内在的现实作出直接理解和非凡洞察力的”个体（Hawkesworth 1989：551）。后现代的政治学家们反对这种主张，认为主体实际上是在一个特殊历史背景里语言或政治活动的“随机效果”（contingent effects）（Ashley 1988：94）。他们还认为个体几乎没有机会去创造或改进那些控制他们的力量；政治科学在没有现代主体的情况下将会变得更有意思（Ashley 1989a；Ashley and Walker 1990a：261—62）。

主体是人道主义者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摈弃主体，因为它是人道主义的核心，而人道主义在许多方面都使他们感到失望。他们认为人道主义是一个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元叙述，它试图提供仅仅根据它自身的毫无疑问的、内在有效的和确定的参照框架而

得出的各种答案。人道主义驱策人类主体成为中心(Hoy 1985a:46—49),它蕴含着"人是宇宙的主宰,是治理万物、控制万物和决定万物的主人"的意思(Vattimo 1988)。后现代主义者指责人道主义假定了有关"人"的某个几乎是形而上学的存在或本质。它假惺惺地强调个体是某个潜在地有效的、理性的代理人。人道主义者被说成是对于人类的本性、对于改善人类状况的潜力和对于人类成就的范围持有天真的乐观主义见解的人。一个后现代的人性观不承认人道主义者所暗示的这些倾向和关于道德之善恶层系的等级划分。

怀疑论者认为人道主义在强调人的尊严和个体的价值方面是伪善的。他们对人道主义者的哲学和实践感到绝望,认为它们是"强制性的",与此相联系,主体是应该受到谴责的(Kellner 1987:1)。他们认为,人道主义尽管标榜要寻求正义和平等,但是它一直被自由社会用来使非正义和不平等合法化。它"既是社会特权的一个掩饰,又是社会特权的一个确证;而且它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他们还揭露了人道主义的口头目标和实际实践之间的差距。怀疑论者认为,人道主义者虽然声称要改善人类的状况,但是他们却把人类错误地引向了马克思主义、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Foucault 1987:168—69;Touraine 1988a,1988b)。[1]它确实"并没有比基督教教会更好地发挥出作为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有效武器的作用"(Laffey 1987:89—90)。

---

① 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把纳粹主义和人道主义相提并论。纳粹主义在如下意义上变成了人道主义:它有一个"普遍的使命",它赋予雅利安人以某个特殊本质(Lacoue-Labathe 1987;Ferry and Renaut 1988:12,第3章)。

人道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而且，虽然它采取了许多不同的、有时候是相互交叉的、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形式，但是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对所有形式的人道主义都采取严肃的保留态度，因为每一种人道主义都需要一个主体，都特别地关注人、关注个体。某些例子有助于说明这种情况。首先，自由的人道主义主张奖赏和鼓励敢于接受竞争和成就之现代挑战的那些人，但是人道主义者又认为社会有责任为虽经努力但终于失败的那些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在自由的福利国家，这种责任甚至扩展到那些并不显得十分努力的人身上。人道主义者假定，现代主体具有不同的能力；他们只能要求每个人类主体作出自己的最大努力，充分地利用人类发展的所有机遇。机会均等存在于某个不均等主体的世界里。其次，被人称为“技术定位论”的人道主义(Soper 1986:14)表达了对于解决人文问题的现代科学力量的信任。例如，技术定位产生了处于产业关系之中的主体；它提倡有效的管理，那种管理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增长生产能力，并提高在工厂和社会里的每一个体(主体)的生活质量和整体繁荣。第三，“启蒙人道主义者”反对教会教条的狭隘性，并使人类超拔于教会权威的控制之上；这样，借助于理性和刻苦的探索，他们把无神论和某项追求真理的事业结合了起来。这项启蒙工程需要有主体去实施它的计划，证明它的意义，并保证它的成功。最后，后现代主义者同样地不满于“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者”，尽管后者没有像赞成个体的自由和解放，赞成每个人(主体)的潜力的全面发展那样地赞成现代科学和技术或理性。

怀疑论者认为，人道主义一直被用于证明西方的优越性和文化的帝国主义。例如，虽然为原始民族带去现代医学也

许好像是有目的的、利他的、富有同情心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但是它也具有由引进现代性的所有其他方面所产生的虽非故意的破坏性后果。它通常导致了语言和文化的消失。在如下意义上新殖民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它断定有责任去教育原始民族，去教会他们阅读和书写。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教育变成了向着殖民主义势力文化的同化活动，变成了教授阅读和书写某种外国语言的活动。相似地，美国的土著人被迁移到某些居留地，原因是据说他们不善于自我照顾。但是与这种“人道主义”相伴随的是土著人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是土著人口的减少、土著人对其伦理统合作用的自豪感的失落和疾病的不断增加。

后现代的社会科学家认为，虽然人道主义者批判了实证主义的种种弊病，但是他们的批判是肤浅的，因此他们对于各种不良后果负有直接的责任。譬如，虽然“种族关系上的人道主义方法”使工作关系个性化，但是它也“不知不觉地再生产了现有的权力关系”（Henriques 等人 1984：13）。

主体蕴含着某个客体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主体自动地需要一个客体。这样，消除了主体，也就中止了任何关于世界之为主体和客体的划分。它破除了主－客二分法，摧毁了一方胜过另一方的权威地位，中断了同主体范畴相联系的独断权力关系，并由此消除了其隐藏的层系（等级系统）。这个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内容将在第 7 章得到更加详细的讨论，不过主体所蕴含的诸多意义必须在这里立即予以阐明。

后现代主义摈弃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划分，那种划分指

定观察者为主体，同时给予被研究对象以客体的身分。[①] 怀疑论者认为，把主体规定为积极主动的和人的，而客体规定为消极被动的和视为物的这种做法蕴含着某些不公平性。许多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对人的科学分类将导致对象化(objectification)。主体的存在蕴含着一个人处于另一个人的控制之下、依赖于一个他者的意思；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主体)引导学生们(诸客体)参与一项实验，采访者(主体)指导被访者(诸客体)填写民意测验试卷中的问答栏目。[②]

在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种主客划分使得人类被用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方式、用使所有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地陷入卑微和压抑的方法，给转变成了主体(Rabinow 1984:7—10)。这不是一个关于可以对某个被压迫的下层阶级称王称霸的统治者的简单的机械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者指出，

---

① 后现代主义中止了客体和主体——它们对于现代科学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之作为独立的认识者和被认识者的关系。虽然现代科学在专业沟通中不再用"客我"("me")、"主我"("I")、"我们"("we")等词，但是它仍然保留了研究的主体和客体。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只会造成这样一种假象：不存在像科学家那样的能够给出客体性的幻觉的全能叙述者(Richardson 1988:203)，可实际上，作为主体的研究者一直是存在着的。

② 在心理学里，主体和客体有时在矛盾的和对立的形式上被应用。主体这个词也可以指参加某个实验的那些人。在这里，主体（主观方面），即正被研究的那个人，被假定为无理性的（相关于内心世界，但不是主动的），而客体（客观方面），即研究者，则是理性的、疏远的和不介入的。请考虑另一个反面例子：君王统治臣民（subjects）。不过，在文学和语言中，一个句子的文法主语是"主动的"，客体是"被动的"。R·W·考克斯指出，大量不同的互相矛盾的定义都被归属于主体。"我会想起（1）笛卡尔或康德的思想，借助他们的范畴，世界（被假定为外在的）被认识，即主体是现代认识论的基础；（2）作为个体或社会阶级的历史创造者（历史的主体）；（3）感觉或情绪（主观性）的王国；（4）身分卑微的人，如皇帝的臣民，和福柯的屈从性状况或作为客体的主体状况"（私人通讯，1990年12月13日）。

二分法本身提倡“划分实践”,鼓励人们把自己看作仅仅是某些团体的成员,鼓励人们以一种简单化的方式将自己进行分类。于是产生了“自我主观化”,而且人们积极地将自己规定为客体。主体“要么区别于内在的自我,要么区别于他人”(Foucault 1983b:208—13)。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还对主体以及主体在认识和真理主张方面的成果提出了挑战。如果没有一个声称逻各斯中心的元叙述的主体,没有具有主体或客体地位的其他人来表示承认和赞同,那么诸如此类的设计物便失去了任何发言权,理论也不可能持续下去。这与后现代关于理论之可能性的怀疑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这一观点将在第5章予以讨论)。

没有主体的社会科学

几乎在社会科学的每个领域里,后现代主义者都一直用一种无主体的方法从事着他们的研究。其结果因学科的不同而不同。大致说来,社会科学远没有像人文科学那样地对“主体之死”作出热烈的反应。

在心理学领域,后现代的心理学家们竭力抛弃理性的、统一的主体观,将“主体性”重新理论化为多重的、矛盾的和大体上非理性的。一些后现代的心理学家认为,散乱的实践构成或创造了“主体地位”或“境况”而不是一个个体,一个作为一个代理人的“主体”。精神分析和对于诸如莱希、拉康和弗洛伊德这样的理论家作出的某些不受主体限制的解读通告和促进了将主体予以边缘化的这个过程(Sheridan 1980:93)。后现代主义消解了主我(I)和客我(me)之间、分析者和病人之间的

本质差异。分析者不是超然的，相反地，正如病人被自己的幻想所缠绕一样，他(她)也容易被语言的幻影、被他(她)的由"文本"所建构的无意识的幻影所缠绕(Kugler 1988)。此外，后现代的心理学家得出结论说，主体是决不可能"完全地易于接近的，因为它是如此深深地埋藏于无意识之中"(Henriques等人 1984:225)。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主体的缺失已经是一个热门话题。鲍曼提供了有关无主体的后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一个例子(Bauman 1989)。乔治·马尔库塞和迈克尔·费希尔为人类学做了相同的工作。但是在历史上，主体一直是社会学的许多分支领域的核心，在那里，诸如生活史探究的方法论(Bertaux 1980,1985)，民族方法学和符号相互作用(哈罗德·加芬克尔和A·西库雷尔的工作)都离不开主体。对这些社会学家来说，主体应该重新获得充分的挖掘。他(她)就是他(她)的"所思、所言和所行"。行为和意义构成了一个全体，这个全体围绕着没有任何预定范畴的某个特定的人兼主体而聚集起来(Rafie 1987)。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现代人类学领域里，在那里有那么多的人相信人种志学者的存在也就蕴含了一个主体身分。但是有的人觉得，取消人种志学者和被研究主体之间的区分将意味着抛弃这门学科本身。

后现代的政治学也已经在竭力地超越自主的主体，[1]超

---

[1] 正如其他社会科学的情况一样，无主体的政治学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独一无二的创新。例如，国际关系中的政权理论赞成一种无主体国际关系的生存能力(Kratochwil and Ruggie 1986:764)。它寻求在特殊的论题或内容领域中建立国际关系，而不是寻求由确切个体所从事的正式得到确认的代理机构和组织的作用。

越个体之间或个体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以便为创造性和变革性提供新途径作出努力。[①]后现代政治学家怀疑在结构里的局部活动分子和人民的适当性。摈弃主体使他们改变了在其他方面的研究焦点，使他们不再去关注在这门学科里主体可能采取的任何多重形式，包括"所有权个体，民族国家，民族共同体，科学家，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家庭的父亲，妇女的呼声，总体意志，人类的内在律令，西方，……上帝，国王，阳具或子宫"（Ashley 1988：93—94）。后现代的政治学家们还要求修改关于政治领袖的潜在的主体范畴的概念。语言和社会状况在构成某个文本之意义的同时也造就了领导者。领导者之作为领导者不在于他们"固执己见地"从事诸项活动，也不在于他们夸夸其谈地为自己作出的各种辩护，而在于他们是他们所面对的某种局势的反映(Edelman 1988：9)。领袖不可以被视为各种政治行动、政治话语或融贯政策的"创始人"。但是在个别主体不在场的情况下，在政治学的某些从属领域，诸如美国政府，就难以设想从事什么研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但当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量化研究方法都假定了个别的主体。在这些情况下，除去主体也将削弱这个从属领域，因为它是如此地依赖于调查研究的个别而又特殊的材料。

---

① 有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主体可能是故意的误传和篡改的一个源泉。例如，敌人，作为主体，被认为是可怕的。他们被利用来使公众的注意力从其他事务中转移开去或"整编成某个政权或某个事变的支持力量"(Edelman 1988:66)。"被当作最强烈意向的目标的敌人可能是毫无危险的"，而"明显地给别人以严重伤害的那些人往往没有被当作是敌人"。划分敌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意识形态或各种符号"(Edelman 1988:86,94)。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主体的政治学将变得更好。

妇女研究反映了在对待主体之死上的矛盾态度。一些女权主义者断定后现代主义的反主体姿态是“带有性约束和性偏见的”(Flax 1990：225)。后现代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争论涉及所能想象得到的每一个领域。即使对后现代主义表示同情的女权主义者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关于主体性的叙述是不适当的”(Flax 1990：210)。取消主体可以被解释为对于妇女经验的任何特殊地位的否认。解构被说成是“使主体性失去任何可能的意义或内容”(Flax 1990：231)。正当妇女们（以及其他边缘团体）在历史上第一次把自己作为一些有力量的主体组织起来的时候，后现代主义却要消灭主体(Hartsock 1987)。假如主体没有了发言权，那么在社会科学中就不存在对妇女的见解给予特别关注的地盘。

从上面列举的几个例子来看，人们不会感到奇怪的是：对于一门主体不在场的社会科学的热情并非是一致的。尽管有结构主义者的先例，但是在后现代社会科学中对消除主体的做法仍然存在着某种矛盾态度。怀疑论的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都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与其重新采纳主体，不如重新给主体安排个位置。这种趋势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它发端于社会科学而非人文科学，后者一直是后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启示源泉。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怀疑论者提出了现代主体的一个替代者——后现代个体——与此同时肯定论者更倾向于通过呼唤现代主体以某些新的创新形式的回归来修改它。这些努力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话题。

后现代的个体：怀疑论者对现代主体作出的取舍

一些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一个后现代世界里，现代主体几乎是没什么意义的，但是存在着针对后现代个体而言的某个核心角色，纵使它不是人道主义的，纵使它不蕴含着人们是自由、自觉和自决的人的意思。[①] 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并不打算去复活现代主体，而是以某种不同的形式用另一个人物或角色取代现代主体。杜撰后现代的个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项精细的工作，因为它务必在一个反人道主义的哲学范围内、在不复活客体——该客体是一个如此沉重地压抑着现代主体界化的阴影——的情况下被完成。怀疑论的后现代个体将具有某种几乎是无个性特征的生存状态。他（她）仍将是一个人，但将是一个对事件、行动或后果无足轻重的人；他（她）也不将是一个重视"关怀"关系（人道主义）或创造性的个体主义的作者。他（她）将如此地独立于所有可以认同的寻求真理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他（她），简而言之，根本就不是主体！

杜撰出后现代个体为后现代主义者既抛弃主体又保留某种个体主义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手段；但是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那么在社会科学中主体和个体的意义就必须保持在分析方面的分离（参阅 Lipovetsky 1983）。这个方案使得如下声明成为

---

① 参阅费里和勒诺（Ferry and Renaut 1988：98—103）对于利波韦茨库（Lipovetsky 1983）提出的关于后现代个体的崛起的观点所作的杰出综述，以及对于"主体的回归"所作的评论（Ferry and Renaut 1990：第 7 章）。

可能：现代主体恰恰死于后现代的个体充满活力的时候(Ferry and Renaut 1990：66—67)。[①]

后现代个体是松散而灵活的、以感觉、情绪和内在化过程为旨归的，并持有一种“成为你自己”的态度。他(她)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他(她)建造着自己的社会现实，追求着对意义的自我解答，但是他(她)不对结果作出真理性的断言。他(她)耽于幻想，喜欢幽默，醉心于欲念文化，向往即时的满足。他(她)偏爱暂时甚于偏爱永恒，他(她)满足于现状，抱着一种“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自然随意比刻意追求更令人赏心悦目，后现代个体也迷恋传统，迷恋过去的一切、舶来品、神圣事物、不寻常事物，迷恋地方性事件，而不是一般事件或普遍事件的发生场所。后现代个体关心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特殊的主观满足和自我发展。他们不太关心老式的忠诚和现代的亲密关系，诸如婚姻、家庭、教会和国家，他们更关注他们自己的需要。

后现代的个体，对于现代意义上的集体亲情和公共责任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们把它们视为人格发展的一个障碍，视为对个体隐私的一个威胁(Bauman 1987)。现代社区据说是压迫性的；它要求亲密、奉献、自我牺牲和互相服务。正因为它是“合情合理和理所当然”的，所以它也是“专横跋扈和使人蒙受耻辱”的。后现代社区是可能的，但是它必须建立在“没有统一性的社区”的基础之上(Corlett 1989：6—7)。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后现代个体才会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

---

① 费里和勒诺认为，在法国，后现代个体是作为60年代的一个哲学的和智力的建构而出现的，这为20世纪的其他事件创造了条件(Ferry and Renaut 1990：64—67)。

后现代个体是以缺乏强大的单一统合为特征的。这相当于弗洛伊德所谓的孩童阶段，某个主体以片段性为特点，缺乏自觉性，也作不出自我意识的声明。他(她)是一个变动不定的个体，没有明确的参照点或参数(Lipovetsky 1983:60,80,125)。被现代主体描述为冷漠的东西，后现代个体则将之称为宽容。现代主体或许具有政治觉悟，而后现代个体则是自我意识的。后现代个体赞成分散反对集中，赞成未经预演的即兴之作反对精心组织的雕琢之物。他(她)强调选择、自由表达、个别参与、个人自主、人格解放，不需要普遍适用的主张或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后现代个体追求自由(摆脱他人的强制)和解放(摆脱自我抑制)。他(她)取消了所有常规假定，取消了认为某种价值或道德规范可以被证明为优越于任何另一种价值或道德规范的可能性。后现代个体小心翼翼地提防着思想的一般性准则、综合性规范和指导性体系。

后现代个体与个人化的政治学相处融洽。他们观点的独特性在于摆脱诸如社会主义之类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计划。他们怀疑投身于那些计划的积极分子的意图和动机。尽管持有一种对一般政治的冷漠态度，但是后现代个体可能会不时地声称同国家和制度展开斗争。他(她)公开地参加和充实到离经叛道而独领风骚于一时的各种社会事件和社会运动之中。这种情况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后现代个体喜欢多重现实，不喜欢去寻求融贯性(Lipovetsky 1983)。而且考虑到后现代个体之上下波动、甚至变动不定的人格特性，这也就合情合理了。

那么，等待后现代个体的将是一个怎样的未来呢？我们有充分理由为后现代个体担忧。假如后现代个体认为存在只是“散乱的踪迹和碎片”，或只是某个“源于过去的正在消逝的标

记”(Vattimo 1988),那么他(她)将只能有一种“无个性特征的”生存方式;按照现代性提倡的指导原则,他(她)将不具备有关某种实际个性的积极统合感(Megill 1985:203)。他(她)将更成为一个人格面具(persona)的胡乱凑合,那个人格面具具有一个分裂的人格和一个潜在地混乱的统合。他(她)屈从于大量互不相容的并列逻辑,所有的逻辑都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而永久性的解决或调和的可能性则是不存在的。在一个后现代的背景下,任何一种新式的被整合的个人格调都是不可想象的。每一事物“都已经被发明出来”;每个人所能做的就是去模仿(Jameson 1983:114—115)。在极端意义上,后现代个体或许会屈服于那些有问题的、说不定更加黑暗的思想和行动的王国。在某些情况下,他(她)会倾向于过分的自我批判,怀疑一切,目空一切,孤芳自赏,享乐主义,冷漠无情,自私自利和反智主义(Agger 1990:11;Hassan 1987:17)。后现代个体的见解很有可能既没有导致一个具有创新性结果的后现代社会,也没有带来持续或稳定的经济增长。那也不会使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并不是后现代优先关心的问题。

那么,主体能否被重新整合于后现代的社会科学之中而又不会导致严重的矛盾,不会破坏后现代主义自身的内在一致性呢?正如本章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后现代对主体的摈弃表明,要想使现代主体回归后现代主义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对后现代个体的整合活动更加产生不了什么结果,并且对于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的智力完整性也不构成多少威胁。

后现代个体的出现在许多方面吻合于后现代所关注的焦点。后现代个体进一步确证了后现代主义对于诸边缘现象的重视,因为他(她)自己通常就是居住于那些边缘的各种团体的

一名成员。他(她)与其说是独断的,不如说是不下判断的(模棱两可的)。就是这种姿态保证了后现代个体可以很容易地同后现代认识论取得和解。他(她)取消了把态度和行动基于理性之上的需要,也取消了提出获得真理之主张的需要。他(她)不想对各种并存的多元实在观进行仲裁。后现代个体要求终结必然性、推理性论断、现代合理性、客观的现代科学、以法理学为根据的法律以及屈服于根据规范标准而作出评价的艺术。

主体以一种后现代个体的形式的回归是同后现代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相一致的。后现代个体由当代文化所塑造(Lyotard 1984)。他(她)对人道主义立场无动于衷,对进步观念的信念不闻不问,对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要求漠然处之。后现代个体拒绝人道主义所强加的责任,那是一种每一个现代主体都担负的责任。他(她)采取一种后现代的反因果观,因为他(她)没有承担责任的愿望,也不想坚持他(她)作为代理人的作用。20世纪的终结将意味着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对个人责任的否认将更受欢迎,甚至可能将更加合乎情理。政治上的境况包括世界大战,环境灾难,大屠杀,越南战争,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世界范围的贫困和无法预料的饥荒。在缺乏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后现代个体无法被要求去担负起主观责任,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碰巧发生的"。

后现代的个体解决了在怀疑论的后现代分析中存在的某些潜在矛盾。[①]首先,我们已经知道,后现代主义给予了读者

---

①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都将接受后现代的个体。毕竟,他(她)仍将是一个个体,即使他(她)的观点是独一无二地适合于后现代时代的,许多人仍将难以与他(她)和睦相处。

以比作者更多的优先权，给予了他们以解释文本的自由。这同后现代主义者要求主体的终结是相矛盾的，因为乍一看来读者的确表现为一个人，一个主体。那么又怎么可能在谈论主体的死亡的同时又抬高读者呢？假如读者被理解成一个后现代的个体，而不是一个寻求权威性的主体，这个矛盾便得到了消解。被确定为后现代个体的读者将心甘情愿地欢迎解释的自由，而那种自由是某个后现代的解读活动所需要的。其次，主体的死亡似乎取消了现代的个体统合，因为假如主体不再存在的话，那么理所当然地个人主义在学理上便是不可能的了。主体的终结甚至已经被解释成是对后现代的"无自我性"(selflessness 无私性)的指证。但是这将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说法，因为后现代时代不是一个自我牺牲的时代；而且有人甚至将其特性归之为"个体的黄金时代"(Lipovetsky 1983；Hassan 1987:17)。在一门无主体的社会科学里，杜撰出一个后现代个体至少部分地解决了在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反主体姿态和他们对于个体权利和自由的同情态度之间的明显矛盾。假如有责任心的、自我牺牲的、从集体性出发的现代主体区别于自我中心的后现代个体，并且被后者所取代，那么上面的不一致性便不存在了。这样，在缺乏现代主体的情况下，个人主义就仍将可能存在下去。

杜撰后现代个体的举动并没有使对缺乏主体表示反对的所有现代社会科学家们沉默下来。这个后现代个体无疑地更合乎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而不是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心意。许多肯定论者针对传统的现代主体的死亡作出了另一种取舍性的反应，而许多社会科学家觉得这是一种更加吸引人的反应。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主体的回归

有迹象表明：至少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对主体来说，宣判其死刑是一种过于极端的惩罚。假如已经存在过一个“主体暂时死亡”的阶段，那么那个间隙正在走向终结（Agger 1990：20），[①] 而对于某种在根本上更加宽厚的态度的支持正在抬头，这种倾向尤其发生在这样一些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中间，他们反对全盘解构自愿的、有意义的和公共的主体认同（统合）。

在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中，有的人要求主体作为一个人，作为社会中一个重新得到认可的主体来回归。他们断言主体的回归同后现代主义的其他知识倾向并非相左。他们的目标不是要重新设置主体和客体的区分，不是要重新肯定人道主义，[②] 也不是要使现代主义恢复元气，东山再起。他们认为，对于边缘的和被除外的事物的关注，或者对于新社会运动的关注，未必是同主体的身分不相容的。实际上，正如在第 8 章中将予以讨论的那样，肯定论的主体对于保证新的后现代社会运动所要求的“抗拒”来说，或许是必要的。他们

---

① 阿格认为，有关主体的后现代的暂停的思想对于提供一个阶段，“以便以某种方式重新构想政治学”是必要的，“我们可以用那种方式来造就和实施对立和重构的新式模型……以一种充满力量的方式重新考虑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各种形式”（Agger 1990：20）。当然，评价他的这些抱负是否已经实现还为时尚早，不过主体的回归无疑地正在进行之中。

② 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要么是 20 世纪 60 年代新左派的流亡者，要么是幻想破灭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批人对于反人道主义和否认主体的主张尤其感到不安。

问道，后现代主义者为什么不能半信半疑地对待理论（参阅第5章）而保留一个并不追求使那个理论生效的主体呢？一个新生的主体为什么不可以反对逻各斯中心的、面面俱到的解释呢？主体的卷土重来会导致严重的认识论或方法论的痛苦和矛盾吗？

假如后现代主体如同肯定论者希望的那样而回归的话，那么它将不是原来被消灭的那同一个主体，他(她)将不采取某个单一的形式或人格。回归的主体将不是“一个自觉的、有目的的和有情感的个体”。他(她)将是一个散乱的主体，一个“突如其来的”主体，他(她)将无法得到现代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的认可。他(她)将是一个具有某个新的非统合感(nonidentity)的后现代主体，他(她)关注的不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而是边缘地带的日常生活。这个主体将反对各种总体性解释，反对蕴含着某个统一参照框架的逻各斯中心的观点，但是他(她)无需反对人道主义的所有方面(Megill 1985:203)。

对于使主体在社会科学中重现生机作出的众多努力的审视阐释了这些论点，并且指出：这个运动是新近发生的，它涉及范围广并具有一定的方向。这里考虑的重新创造主体的努力并非都雷同于肯定论的后现代的主张。一些人企图提出一个新的富有创意的主体焦点，诸如皮埃尔·布尔迪厄和阿兰·图雷纳的尝试，这可能是出于他们对结构主义忽略主体的举动的不满，而不是出于使后现代主义更具活力的某种需要。他们的工作已经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因为不管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已经对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保持比较密切联系的那些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不仅在政治学家中间，而且在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里，同样地都存在着一种向与政治有牵连的主体回归的趋势。理查德·阿什利的后现代主体就是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主体，是“各种观念，论题，解释和实践模式之间的政治斗争”的结果。这个主体“只能”被“同一”于“由多重异化形式之持续的战略性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复合解释要素的不稳定平衡和分布之中”（Ashley 1987：410）。阿兰·图雷纳顺着相同的路线主张主体的复活是以对某个世界的“抗拒”为根据的，在那里脱离于社会的、自主的自我规定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他的主体为获得自主权而斗争，并且努力地通过借助于生活、个人自由和创造力来建构一个新的统合体。他的那个最活跃的主体——曾经在性、情感、政治和心灵上有积极表现的主体，努力地从“先验原则和公共规则”中解脱出来以获得自由（Touraine 1988a：38—41；1988b）。这个新主体不是一个寻求征服的“现代”主体。出于自卫，他（她）更喜欢寻求独立于任何重大的全盘性计划或现代集体的自我确定的断言。这种主体加入了各种不固定的联盟，这些联盟是暂时的、问题型的联合体，它们把富人和穷人，男子和女子以及各不相干的伦理团体都统一了起来。曼弗莱德·弗兰克认为，过程研究必需（要求）自我意识的主体回归到社会分析上去。他的主体属于社会，这个主体沉浸于共有的自发意识之范围广阔的结构之中（Frank 1988）。

弗雷德·达尔迈尔努力地超越统治性的个体(主体)，因为这种个体渴望控制和服从。他用一个“无拘无束的非占有性的个体”的幻想物取而代之，这个个体具有地方自治、联络、共有和期待解救的实践能力。与此同时，他的新主体不是启蒙

运动的有理性的、人道主义的臣民(Dallmayr 1987)。

朱莉娅·克里斯泰娃不否认主体,但是她也把产生于她的精神分析实践的主体理论化为"过程中的主体"(subject-in-process),而在她的精神分析实践中,主体无论是作为分析者还是作为患者都是"真实而必要的"。在精神分析的境况中,解释自身也导致了一个主体(Kristeva 1986:第3章)。克里斯泰娃把现代主体转变成她所谓的"一项在进行中的工作",一个"说着话的主体",他(她)"既是想象又是想象中的"。在这种形式里,主体为统合提供了一个基础(Kristeva 1974:142—45;Moi 1988)。

在80年代中期,安东尼·吉登斯进行了"构成"(structuration)分析,企图使作为代理人的主体与现代结构主义为制约其行动而加之于这个主体角色之上的各种限制调和起来。吉登斯赞成"边缘化"主体但是不赞成它的"消失"。人类利用语言进行沟通。主体作为代理人,对结构产生了影响,但是在缺乏结构的情况下,某个代理人的所有行动都是无意义的。这两者据说是互相建构的。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主体之半回归的要求(Giddens 1984)。在1990年,吉登斯进一步主张,反思性自我统合的积极过程在今天是可能的。[①] 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寻求拥有一种完美和令人满意的生活的"自由",而不是从不平等和奴役状态中摆脱出来的"自由"。这种主体不是把生活概括为一场我赢你输的得失所系的赌博。它更成其为一种适合于主体的后神圣的世界,在那里,如此地根本于自我统合的"自我激励"

---

① 他视当前为"极端的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性。

(self-actuation),在不要求任何另一个人承受损失的情况下是可能的(Giddens 1990:150,155—57)。社会学家伍德和泽克采用一种更加经验的分析方法以确立与后现代主义相关联的自我观念的转变。他们视新的后现代主体为与“驱力和过程”相联系的主体,而不是一个“制度的终极产物”(Wood and Zurcher 1988)。

主体通过由皮埃尔·布尔迪厄的“习惯”(habitus)所提供的观念基础达到回归,而不管这是不是他的意图。“习惯”是一个概括性术语,它指的是文化经验和个人经验之累积的和持久的总体,每个人都将其作为各种生活经验(言语,举止,穿着打扮,餐桌礼节,仪表,体态)的一个结果而持有着。人们发现,所有这一切都影响着某个人被认可的途径,影响着他与别人交往的方式,并影响着控制诸多社会后果的各种参项的形成。习惯是一个针对主体而言的特定的概念,它是无法被构造和被聚合的;它是独一无二于每个个体的;它必需有一个特指的、非集合的主体。这种观念鼓励并改变着研究对象,引导它朝向一个被更新了的主体。虽然它是经验的,但是它公然地蔑视科学概括,因此它是反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不过,被特殊地造就的主体的习惯是研究的焦点(Bourdieu 1984:179,191,210;并参阅 Angenot 1984:21)。

戴维·格里芬既要求主体的回归,又竭力保留客体和主体范畴。他做这项工作是通过否认使主体和客体分离的权力差异来进行的,也正是那种权力差异使主体和客体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诘难。他认为,主体和客体“并不是在种类上有所不同,而只是在时间上有所差异而已”。这些范畴不是持久不变的而是流动不定的。客体可以影响主体。“某主体的本质,

作为某个一时的经验性事件，在于领会或接纳来自以前事件的各种感受于自身，使之成为它自己在时间上的自我创造的根据"(Griffin 1988b:155)。由此规定出发，格里芬得出结论，主体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外观得到回归并且可以被保留在一种后现代的方法之内。当后现代的人类学家们把被研究的主体提高到同人种志学家相平等的地位并由此克服了主客体的权力差异的时候，他们遵循的是相同的推理路线。他们断定，假如在信息资料提供者和人种志学家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那么某个被更新了的主体将会发展起来(Clifford 1988:第2章；Strathern 1987)。[①]

---

① 安妮·诺顿，玛丽·霍克斯沃思，迈克尔·吉本斯和米歇尔·福柯提出了有关某个被更新了的主体的其他一些形式，它们更相似于怀疑论者的后现代个体而不太相似于肯定论者所回归的后现代主体。吉本斯的主体不是个别人的愿望、信念和感受与某个客观实在之"符合或表象的一个反映"。主体更确切地说，是这种符合的缺乏。这一点在自我反思中，在挑选和培育生活方式的活动中，在自我的明晰中，以及在自我的表达方式上是一目了然的（Gibbons 1987：161)。诺顿的主体之回归是将统合（认同）建立在自我和政体，肉体与心灵，朋友和敌人之间的差异的基础之上的。她感谢尼采、弗洛伊德和梅兰尼·克莱恩，因为他们看到了暴力在建立自我规定之物方面的重要性。总之，诺顿含糊不清地对待任何一个最后的个人定义以适应后现代时代的要求（Norton 1988：6—7）。出于某种相似的意向，霍克斯沃思把主体发展成一个"不稳定的自我，是诸多无意识的欲望、恐惧、恐慌和互相冲突的语言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的汇集"（Hawkesworth 1989)。福柯向着几十年来人类个体的任何特殊身分开战，但是在他的晚近作品里他表达了对主体的某种怀旧心情；这代表了他的思想上的一个重大修正。他借助于"肉体和快乐"复活了主体，将它作为针对自发性和表现性而言的"某个审美态度的对象"。他赞成反对"主体身分"、反对压迫、屈辱和"服从"的斗争（Foucault 1983b：207—9)。虽然所有这些作者都涉及到了主体，但是他们正在谈论的话题的实质更接近于怀疑论者的后现代个体，而不是肯定论者的后现代主体。

结论和综述

主体在后现代主义的内部引发了一场热烈的争论，最终，他(她)的身分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任何一个最后的统合都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与人文科学领域的情况不同，主体之死的思想没有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确立起来。后现代主义者大多反对现代主体，但是一门没有主体的社会科学的生命力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是反人道主义的，他们虽然谈论主体的死亡，但是其中有些人提出了后现代的个体作为一个适当的替代者。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作出了让步，并且提出了重新设置主体的许多途径。"主体的回归"运动既发生在后现代主义者的阵营之中，也发生在这个阵营之外，这个运动表明了主体的消亡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它是在回避现代主体的那些令后现代主义者们最为生厌的方面的同时，以新颖面奇特的方式保留主体的一个途径。

4 轻视历史，转变时间和篡改地理(空间)

历史是西方的神话。

——Descombes 1980:110

但愿艺术能够变出一套使自己消失的魔术来！不过人们也开始逐渐地相信它确实正在消失，因为艺术已经成为过去。

——Baudrillard 在汤姆金斯 1988:241

后现代主义者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反直观的关于时间、地理或空间和历史的观点，其中每一个概念都在一个互相支持的、虽然不是完全统一的大背景中得到了重新定义和重新构造。[1] 他们对被有关这些概念视为理所当然的几乎每一件事情

---

① 在这里所采用的关于时间、空间、地理和历史的安排并不是唯一可能的安排。正如后现代主义者把地理和空间组合在一起一样，有时他们也把时间和历史组合在一起(Dear 1986;1988;1989)。

都提出了诘难；对了解现在而言，某种历史知识是至关重要的；时间是线性的；空间是固定的、经久不变的和可测量的。通过要求多关注时间和空间少关注历史，后现代主义颠倒了这些术语被赋予的优先次序。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了各种修正意见，他们认为这些修正意见对所有这些领域来说，是大胆和勇敢的见解。但是他们的批评者把有关时间、空间和历史的后现代说法斥之为轻薄无聊、毫无意义的东西。在这一章里，我首先考察了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现代的空间、时间和历史观念的责难。接着，我考察了后现代观点和历史终结哲学观、新历史运动观之间的平行关系。最后，我考察了后现代主义者关于重新对现代的时间观念、空间观念和历史观念予以概念化的要求。

约定俗成的历史——毫无希望的现代

历史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条通往许多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途径。因此，这里所谈到的关于历史的绝大多数话题对于通往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各种历史途径来说，也同样是相关的。虽然作为一门学理性的学科，历史介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但是对历史的后现代批判却适用于所有的领域，而不管人们将它归为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在对于约定俗成（正统）的历史观提出挑战的众多努力中，后现代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种努力。这些挑战中的大多数都是互相交叉和渗透的；它们几乎都假定了一个整体的、统一的、单一的和“古老的”历史，而后现代主义者将之批评为不适当的(Scott 1989)。大致说来，它们对如下观点表示了怀疑：第

一，存在着一个实在的、可知的过去，一个关于人类观念、制度或活动之演化进步的记录；[①] 第二，历史学家应该是客观的；第三，理性使历史学家们有能力去说明过去；第四，历史的作用在于一代接一代地解释和传递人类文化和知识遗产。因此，除了后现代主义以外，新历史运动和历史终结哲学是反对传统历史观的重要中心。我们将会看到，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与历史终结运动有着许多共同点，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则更接近于新历史运动。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论历史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批评了传统的历史，并将其归为人类事务较大范围内的一个边缘角色的地位。他们赋予历史本身以无足轻重的作用，即：作为延续性的见证；作为进步观念的证明；作为诸起源的研究；或作为直接因果认识的证据(Baudrillard 1983a；Derrida 1976)。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也没有把历史看作是时间的各个阶段，它们可以有规则地展开，可以被分隔，被抽象，被表现，并且借助本质特征而被描述(Benhabib 1984：104)。他们反对把历史当作以特殊事物或一般事物为焦点的推理性分析，因为两者都假定了“实在、统合和真理”(Foucault 1977：151)。他们尤其反对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即认为人类代理者形成了诸社会的个体经验和集体经验，人类干预可以引导历史的进程。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几乎没有对历史抱友好的态度。

① 历史上的进步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是可反驳的，因为它蕴含着一个“人们持之以恒地向之运动的事先给定的目标”(Flax 1990：33)。

他们认为，历史是逻各斯中心的，是神话、意识形态和偏见的源泉，是一种封闭的方法。历史特许"这一个或那一个主体为最高的中心，为真理和意义的终极起源和记录者，而所有其他的事物必须借助于那些术语才得以被理解和被解释"(Ashley 1989ab:282)。历史是现代西方国家的创造物，因此据说它"压迫"第三世界民族和非西方文化的民族。[①] 历史没有现实。它要么被认为是不确定的(Himmelfarb 1989a)，要么决定于"异常的灾祸"(catastrophe)，决定于同现在的"中断"。它代表着"永恒的失落"(Kamper and wulf 1989)。怀疑论者主张，历史是枯竭的，生活在现在的人类总是竭力地想要忘记过去，超越历史、超越知识的任何普遍性根据。按照这种分析，正如J·鲍德里亚所主张的那样，"每一事物都已经发生过了……；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再会产生。"因此，毫不奇怪，他和许多其他怀疑论者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还会有历史呢？(Baudrillard, J. 1983a, 1983b)

怀疑论者对历史的批判适用于它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当代形式。他们反对把历史当作长时间——结构主义者的长时历史观(Braudel 1972:20—21)，因为那种历史观声称要去发现独立于每一其他事物而存在的一系列不受时间限制的关系。在那种情况下，历史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记录了"为某个社会全体所特有的一个抽象的逻辑真理"。怀疑论者指出，历史被认为是一项关于"深层的、持久的和自主的结构"的研究活动；历史是一种努力，它要建立与某单一论题或本质相联系的一

---

① 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 1989:210)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虚构的但是富有启示性的关于第三世界论辩的例子。

个广泛的、总括性的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它假定了一个事实世界,一个未受文化和审美情趣影响的外在现实,在那里,“至少某些意义可以从自然中直接地被引发出来”(Clark 1985:192)。怀疑论者还批判了瞬时历史观——对固定事件的分析(Braudel 1972:20—21),因为它强调历史是戏剧性的事件,是产生重大后果的实践,是重要的个体(“伟人”)、外交家、国家领导人、纷争、会议、战争以及协定。在这种形式里,历史声称是以经验为根据的,是客观的和科学的。但是从后现代的观点看,它狡诈地表现出重新占据过去和再现过去的企图。怀疑论者也不接受历史的情境化方法(contextualization),那种方法断定:虽然在经验上重建历史事件、观念和制度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人仍然可以根据它们自身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对其进行富有意义的考察(Hollinger 1989:618)。怀疑论者同样地怀疑关于革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历史理论(Kellner 1989b:212)。

对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历史,假如它是真正存在的话,是一门卑微的学科,它依赖于现在,而不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当代是最为重要的时间构架;我们生活在作为文本的现在,生活在一系列零碎的“连绵不断的现在”之中(Jameson 1983:125),在那里,未来只是一个“预期的在场而过去则是一个先行的在场”(Culler 1979:162)。历史只在如下程度上才是重要的:它的踪迹对当代有所影响,并且尽管如此,那些踪迹是复杂的和互为文本的。据说让“现在去讯问过去”是有充分理由的(Harlan 1989:608)。[①]

那么历史还能充当什么角色呢?一些怀疑论者受人文科学领域中后现代的折衷主义的启发,试图挑选并重新利用以

前的某些历史观念，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拒绝将任何特殊价值归属于"新事物"。他们表现出了对于原始事物的深切敬意和对于传统的热切迷恋。在此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怀旧恋昔"的(Vattimo 1988：第6章)。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如瓦蒂莫(Vattimo 1988)，在主张终结某个可认同的历史方向方面不是孤立的。历史终结，后历史，或后历史运动是同时发生的(Baudrillard 1983a，1983b，1989b；Kellner 1989b：212)。历史终结指的是进步观念的终结，"关于……第一原理的人类思想之演进"的终结。福山，一位当代的历史终结理论家，指出在将来，"阐明某个既真又新的哲学主张"将是"不可能的"事(Fukuyama 1989—90：223)。按照他的说法，历史终结意指西方观念、自由的多元论民主、消费社会、"普遍的、同质的国家"的胜利，和所有其他意识形态包括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失败。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不会赞成他的这种观点。对怀疑论者来说，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某个较优越的善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不意味着某个最后的真理已经得到了揭示(Flax 1990：34—35)。

历史终结哲学与怀疑论的后现代观点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双方都反对特许历史上的某些元叙述。两者都赞同文化、意识形态、意识的中枢性(centrality)，断定观念自身具有决定生活状况方面的力量。两者都反对右的唯物主义者(例如《华尔街杂志》) 和左的唯物主义者(唯物的马克思主义者)。

---

① 这一点同怀疑论者借助语言和话语来理解社会现象的做法是一致的。不过，怀疑论者因如下做法而受到了批评：他们企图用"不规则地出现和消失的话语孤岛(islands of discourse)"来代替历史(Habermas1987a：251)。

两者都不太重视经济学、决策或对未来的预测（Fukuyama 1989：12）。历史终结的理论家们赞成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关于意识形态的终结，关于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任何动机的终结（Fukuyama 1989：18），关于“一切拯救性政治学和一切乌托邦主义的或救世主运动”的终结（Heller and Feher 1988）的观点。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于合理性的不同评价上：历史终结理论家们比后现代主义者更加相信人的理性。[1]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论历史和系谱学

像怀疑论者一样，肯定论者几乎都对传统的历史持批判态度，不过他们力图修正和使其相对化，拯救它，重新描述它，或重新发明它，而不是简单地消灭它。例如，弗雷德·达尔迈尔把历史说成是“一系列部分地时断时续的框架或暂时的和占有一定空间的世界背景”（Dallmayr 1987：181）。其他肯定论者也要求对历史作出根本的修改，使之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为焦点，以“渺小的”事物（论题）为焦点（Zagorin 1990：273），或者他们用传统叙述取代更加常规的

---

① 福山可以被读作提出自由民主的元叙述的人，这一点当然不为后现代主义者所赞同。不过他也可以被读作仅仅是观察了它的优势而并非提倡它的人。他确实没有用理想化的全盘肯定的口吻来粉饰自由民主；他也没有像推崇黑格尔观点的某个辩护士那样地为它作辩护。福山认为，西方的胜利是个祸福兼有的事物：历史的终结将是一个幽暗、单调、无聊的时期，在这个期间，没有冒险的必要，没有对个人勇气或想象力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为英雄、将军或外交家留下地盘（Fukuyama 1989：5）。福山对其批评者的回应也可以被理解成，他确实相信自由主义的优越性（Fukuyama 1989—90：28），但是这与他最初对于他的观点的陈述不是同一件事情（Fukuyama 1989）。

历史形式。[1] 他们所描述的后现代历史不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活动，而是一种"讲故事"的活动（Ankersmit 1989）。[2] 在这种故事形式里，"描述"变成了像"解释"一样的有价值的活动。后现代的历史学家们还承认矛盾，因为他们料想到将会有许多关于历史的不同"说法"（Scott 1989）。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在寻求有关这门学科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以取代关于它的那些已经比较确定了的描述——的过程中，受到了"新历史"的影响。[3] 新历史采用解构、主观解释和关于实在的象征性建构的方法，而不是量化的、结构的或功能性的方法。像后现代主义一样，它竭力揭示文本，对文本的意义提出质疑，发明微观叙述作为历史的替代方法（Hunt 1989）。

从本质上说，新历史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探索意义问题的。它集中考察普通事物，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日常生活，所有"微不足道的琐事"（Hassan 1987:91—2）。例如，一名

---

① 顺着新历史的道路，后现代主义者也谈到了作为叙述的历史（history-as-narrative），但是他们意指的作为叙述的历史不是在现代意义上的（Jameson 1984a:54），不是作为显要的理论（Hassan 1987:91—92），也不是作为"对于一系列事实或事件作出反省并建立它们之间的某种联系的活动"的历史（Fowler 1987:156）。作为叙述的历史仅仅是对于某故事的讲述活动，是一种不确定的历史形式，或者是对历史的一次根本性取代（White 1978）。

② 在第5章中我们将看到"不起眼的"后现代叙述是如何取代理论的。

③ 新历史不是具有一系列特定观念的某个单一的无形学会。它包括了女权主义的历史学家，黑人历史的社会历史学家，新马克思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精神分析历史学家，以话语为出发点的历史学家和后现代主义者。这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家族，除了对"旧"历史表示不满以外，它们几乎没什么共同点。例如，新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后现代主义者从历史中取消阶级和国家的做法。女权主义者说新历史忘记了男性的统治。黑人历史学家则指责它忽视了白人压迫者。有关新历史的评论和批评，请参阅希梅尔法布（Himmelfarb 1987）。

新历史学家会认为“对于理解30年代来说，米老鼠实际上起着比富兰克林·罗斯福更加重要的作用”(Susman 1985:103,197)。新历史是提倡大众主义的，它看重普通百姓而不看重精英人物；它特别关注受害者的观点而不欢迎制造受害者的那些人的辩解。[1]有时，它又把目标指向边缘事物。女权主义的新历史提出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观点，认为女性的经期史与君王的统治史一样富有意义(Stearns 1976:250)。新历史不主张特殊真理；它取消了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差异(Foucault 1980:193)，主张就了解生活而言，两者同样都可以提供许多知识。

作为针对各种更现代的历史观而言的一个替代者，福柯的系谱学也是后现代主义者——特别是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一个启示来源。系谱是“构成式的”、生成性的过程，它涉及历史知识、斗争、颠覆、通俗知识、关于敌对冲突的回忆、约束与话语的相互联系(Fraser 1989:20)以及统治策略。但是在描述它们的时候，福柯强调它们都处于持续的变化中。他的系谱学着重于考察破裂之物、中断之物、“局部的、不连贯的、不合格的、非法的知识，并反对关于某个统一的理论实体的各种声言，那些声言打着构成一门科学及其对象的某种真知识和某种随意性观念的名义……而那个理论实体则(被认为是)会不断地走向优化、层系化和有序化”(Foucault 1980:83)。这个系谱学并无个别的或集体的行动者(主体)的表现空间，而它的确关注的是被排斥之物和边缘之物(Foucault

---

[1]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会对新历史的这一方面持批评态度，因为它需要一个主体，并且确立了一个关于善与恶、高贵与卑贱、受害者与制造受害的人之间的等级系统。

1980:83,117)。它注意诸力量的关系,但不作出常规判断或给予意识形态上的评价(Fraser 1989:20—21),不去发掘深层意义,而是专注于"表面事件的单一性,……很小的细节,不起眼的变化和微妙的轮廓……不连贯性和随意性"(Burrell 1988:229)。

正如某种后现代方法一样,系谱学不需要起源、因果关系、综合、真理(历史的法则)、隐藏的意义、深度和内在性、对进步的信念(Dreyfus and Rabinow 1983:105—23;Harlan 1989:608)。系谱分析不同于现代历史,它不是通过当前的视角来解释过去。"在如下意义上",系谱学更是一种"关于现在的历史,它在与时下论题相关的问题中找到它的出发点,并且在它能够产生对现在作出分析的范围内找到它的抵达点和有用性"(Henriques 等人 1984:104)。它探索的既不是普遍的结构也不是普遍的价值。它"向科学和人道主义开战"(Foucault 1973:95;Harland 1987:155)。

置换现代的时间和空间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反对对时间作编年的或线性的理解;他们把一个贬意的术语"编年语音论"(chronophonism)加诸这种观念之上(Derrida 1981)。现代的时间观念被说成是压迫性的,用来测量和控制人的活动的东西。它"属于生产力的重要方面,并被用来替代工作和庆典活动的节奏"(Baudrillard 1987:67)。线性时间被看作是令人生厌的技术的、理性的、科学的和层系的。由于现代性十分重视时间,这就从某种角度上剥夺了人类生存的欢乐。此外,时间是人类

的一项发明创造(Latour 1988),是语言的一项功能,因此它是随意的和不确定的。

怀疑论者认为时间是无政府主义的、不连贯的、非线性的;而不是线性的、进化的或意向性的(Dallmayr 1987;Derrida 1976;Megill 1985;Vattimo 1988:第6,7章)。时间是无法控制的,也无法以某种确定的方式置入于话语中或讨论中(Lyotard 1988)。在他们自己的分析活动中,怀疑论者向关于时间的所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见解都发起了攻击。例如,鲍德里亚指出,假如我们对现在的世界感到不愉快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跳过这个世纪剩余的时间……直接地从1989年跳到2000年呢?"(Baudrillard 1988:17)。他还声称核毁灭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在阐述上述见解时他对所有现代的时间观念发起了猛烈的攻击(Baudrillard 1989b)。

最极端的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完全抛弃了时间,他们借此取缔了如下观念:某物是完全地在场的或不在场的。受海德格尔的启发,德里达在他自己的书写作品(活动)中取消并否认了在场/不在场(the present/absent)的划分。他发表的某些著作看上去像是印刷得极为粗糙的草稿,某些词汇策略性地和具有象征意义地穿插于其中(Derrida 1976:19,33,44)。他创造了一个"被抹去的世界",在那里,语言是一个"踪迹结构,在显示其清晰踪迹的同时它抹去了那个踪迹结构"(Spivak,发表于德里达的著作1976:xviii)。这意味着被抹去的东西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的东西;"诸事物在两种状态之间摆动,或迟缓,或延伸,……从物理上看它已被删除,但它在删除状态下仍然是可见的,即便当这些符号已经从话语(谈话)中被排除出去的时候,它们在被抹去的情况下〔sous rature〕仍

然继续发挥着作用”(McHale 1987:99—100)。只有在一个不具有现代的时间观念的世界里,对于在场和不在场的这种违背才可相信。

企图把对于传统时间观念的这种后现代挑战作为荒谬的东西来拒绝的做法将是一个错误,因为,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它获得了现代科学的意想不到的支持。就在几年以前,在宇宙中的新时间观,诸如光年和宇宙维度(cosmic dimensions),简直是令人无法想象的,而它们恰恰触动了后现代的脆弱情感。“生活在有限时空之中的个体已经变得毫无意义。随着传统的时间感之意义的丧失,现代的时间已经变得无穷无尽,人的生活似乎完全地消失于其中了”(Wulf 1989:52)。在《时间的短暂历史》中,斯蒂芬·霍金,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认为“想象的时间真正地是实在的时间,而我们称之为实在时间的那种时间只是我们想象的一个虚构”。在实在的时间里,“宇宙有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这一特点形成了一个时空界限,而科学规律不能越出那个界限。但是在想象的时间里,不存在上述特点或界限。”他坚持认为,不存在“唯一的绝对时间”,认为“不同观察者所使用的钟表未必是一致的。因此时间变成了一个更加主观的概念,它是相对于测度它的那个观察者的。”此外,“在想象时间的前后方向之间不存在重要的差异”(Hawking 1988:139,143—44)。[1]

空间是另一个维变化的场所。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把

---

[1] 虽然这或许使霍金的说法听起来像一名后现代主义者,但是这很可能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理解。在终极意义上,霍金也许主张“想象的时间”很有可能像各种流行的时间观那样遵守某些法则,虽然相关于“想象的时间”而言的这些规则在目前仍然无从知晓并可能是非常复杂的。

地理看作是等同于超空间的东西(正如詹姆森所说,这是关于空间的幻想的彻底破灭)。后现代的超空间既可以被杜撰出来也同样容易令其消失,或者可以借助于通过纯粹的智力建构而取得的心智训练来使其拓展。后现代领域的错位已经发生,至于弥合它们的适当协调手段是什么,人们在现在仍不清楚(Dear 1986:380;Jameson 1985)。后现代的空间和地理超越了"个别的人的肉体放置其自身的位置、从知觉上组织它的直接的周围环境以及从认知上在一个可绘制的外在世界里绘制出自身的位置等的各种能力"(Jameson 1984a:83)。

通过仔细地考察它,通过将它重新阐释为一系列由心智构建的关系,这些怀疑论者对于被按常规认识的地理空间的每一方面都提出了诘难。后现代的超空间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科学的哲学意义上的物质世界,在那里,定位于某个客观的地理空间中的具体的客体,是借助于经纬线才得以绘制的,地图上的一英寸相等于地球上的一个线性里程。传统的地理学断定,一旦被定位以后,事物要么原地不动,要么,假如它们运动的话,它们也是按照可预测的方式运动的。超空间不作这样的假定。它谈论"事物的解体",每天都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我们丧失了"把我们自己安置在这个空间之内并且从认知上将它绘制出来"的能力(Stephanson and Jameson 1988:7)。

和怀疑论者一样,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也对现代的空间和地理观念表示了不满。不过肯定论者关于传统观念是不适当的看法引导他们用带有较浓政治色彩的术语来修正空间。他们探讨区域空间和社区方位。这同他们热衷于地方抵制活动、强调尊重别人的"空间"、坚持保留他们自己的"地盘"

的态度是相一致的。他们对于地方性事物的关注和对于空间和地理权益的关注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并且是适合于当时的社会背景的。

肯定论者认为，作为纪律手段，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现代假定是为了达到约束和封闭的目的而被作用的。“空间可以被弄得使我们看不到某些后果……权力和纪律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之表面上天真无邪的空间性之中”(Soja 1989:6)。福柯认为空间的关系形式是重要的。他指出了一些整体机构，诸如修道院或学校，作为例子来说明组织是怎样利用空间和时间来控制它们原先应该为之“服务”的那些个体的生活的。

人文科学中的后现代时空观

在人文科学中出现了后现代的时间和地理观念，在此有关这两者的现代假定都可以被消除而不致带来太大的惊恐或后果，不过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社会科学里就该另当别论了。例如，文学的乌托邦传统和某些科学虚构形式，诸如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宇称宇宙学》(cosmicomics)，常常忽视历史和地理，公然违抗线性时间和欧氏空间。此类娱乐性幻想增加了人们的阅读趣味，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对人们的创造性智慧力量提出了挑战。但是在人文科学中，几乎没有人认真地对待这些违背常规时间和空间的举动。

后现代小说有一种攻击传统的时空观念的趋势。例如，事件甲发生在时间I，事件乙发生在时间II，但是那些小说在时间I的讨论中却假定事件乙已经发生，而在时间II中则继

续其叙述,似乎事件甲并没有发生过。这反映了一个后现代的虚构世界,"所有的未来和过去,永恒与来世的一切枝节,都已经在那里存在着了,都已经被分裂成点点滴滴的瞬间,被分配在不同的人们及其梦幻之中……因此,时间在那个世界里是不存在的"(Pavic 1988:314—15)。后现代作者有意违背线性次序。故事"的情节顺序颠三倒四,由结尾重又生发成开端,暗示着某个无穷无尽的循环往复特性"(Trachtenberg 1985:234)。汤姆·斯托帕特的《走下楼梯的艺术家》就是一个例子。这出戏有一条潜在的线索,不过作者把它切割成十二个片段,然后又将它们随意地糅合在一起(或重新组合它们),从而使时间和空间都不再有意义。在后现代小说里,故事"突然调头,改变方向,陷入循环,某个事件既是前因又是后果"。故事还会转向自身,与外界隔绝。它们是"循环性的"。在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如果一个冬天的夜晚一个旅游者……》中,故事的主要情节经常被"那些形形式式的传媒(小说中的小说……)中的环环相套的表象"打断,"以至于小说的本体论'视野'实际上被丢失了"(McHale 1987:100)。或者说,某部小说的诸环节几乎是随意地而不是有顺序地组织起来的。在《哈扎尔词典》里,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词条替代了别的东西(Pavic 1988)。人物跨越了几个世纪和几种文化。在那里,梦幻之中的空间与清醒时的空间是一样地实在的。要判断究竟何者为真实可信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迷惑甚至误导读者,鼓励读者对实在之物和杜撰之物的划分提出质疑。但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要求读者去建构他(她)自己的著作。由于时空的常规限制遭到了违反,任何种类的故事就都具有了生存能力。确实,当常规的时间和空间变成了无意义的概念以

后，由于争论究竟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已经变得不可能或没有用处，所以一个人从哪里开始或结束某次解读活动便变得无关紧要了。

后现代社会科学——没有历史，按新时序运作，及空间上的飘忽不定

与人文科学相比，后现代的历史、时间和空间对主流社会科学潜在地产生着更多的麻烦。抛弃这些现代概念的最大影响发生在这样一些领域：城市和区域发展，公共行政学，（城市）规划学，国际关系学和地理学——所有这些学科对于时间和空间都有专门的要求。实际上，假如后现代主义者想要取缔有关历史的所有现代主义的假定，有关时间的所有设想，或有关空间和地理的所有推断，那么整个社会科学必须得到重新创建。

假如现代时空观像怀疑论者要求的那样完全地被废除的话，那么它将导致无法收拾的后果。在某个科学框架之内，没有了线性时间，因果关系就无法得到确定，因为为了区分此一事物与他一事物，暂时的时间先后顺序必须被确立起来。由于此时此刻的意义在同一时刻既接近无限又接近非无限，真理的概率便减低为零。理论也就同等地变成了即兴的、无常的和转瞬即逝的东西，只能应付于一时的东西，产生不了略具永久性后果的东西。知识性断言抗拒着"令人难以忍受的存在的轻率性"（Kundera 1984）。

另外，彻底消除历史的努力（历史终结运动的后现代对等物）对社会科学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如果以为这意味着人们从

过去学不到什么东西的话，那么上述后果将更加严重。许多现代社会科学是以从以往人类经验中提取出来的证据为依据的，而所有那些人类经验从根本上说都具有历史性。社会科学要求我们去利用我们在较早时期所获得的知识，以便改进人类的记录，以便在现在采取更有效的行动。但是，假如事实不存在，假如所有解释都是同样地有趣的（第 7 章，第 2 节），那么历史就发挥不了这个作用。

无疑地，在其研究过程中，指望到历史领域中去寻求灵感的社会科学家们务必小心谨慎，因为他们在后现代社会科学里将会遇到各种目光短浅的狭隘见解；不过，这个警告或许是言过其实的。毕竟，从社会科学中把历史清除出去的不是那场革命。系统分析学家和结构主义的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的东西非常相似于后现代主义者的某种见解，至少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是如此。在消除历史的过程中，有些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走得更远，他们把过去和未来全都融入现在之中。德里达竟走到主张"踪迹必须在实体之前被思考"的程度（Derrida 1976：47）；他的意思是结果必须先于原因，这个观点在后现代主义范围内，也是始终如一的，因为它取消了线性时间。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对于历史、时间和空间观念的修正并没有那么可怕。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可以通过某种既有意思又有创意的方式被融合于现代社会科学的体系之中。并不是每一位后现代社会科学家都要求取消所有这些方面；有些人只想从根本上对它们作出重新界定和新颖的安排。不过，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在后现代主义者中间就如何重新组织和重新安排这些术语而存在的差异已经导致了某些实

质性的意见分歧。

现代社会科学早在后现代重新定义时间和空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①] 例如，安东尼·吉登斯开创了时空意识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并没有要求对这些概念进行后现代的重新组合。就在不久以前他还对后现代的做法表示了极大不满(Giddens 1987)。但是在其更晚近的著作中(1990)，他已经滑向了后现代的方向，这在如下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关注“从社会体系中抽拔出来……从交互作用的局部背景中‘抽出’社会关系并且使其在不确定的时空跨度上得到重建”(1990：21)。吉登斯怀疑“钟表时间”，说它受到了“一定社会条件的影响”。他指出在社会科学中空间和时间都是人们大致认可或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他要求对它们的含意有一种新的觉悟(1984：第3章)。历史学家查尔斯·梅尔认为，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分配期限来说，时间都是政治性的(Maier, Charles. 1987)。这种观点正日益成为指向自由秩序的批评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哈维(Harvey, David. 1989)探讨了时空的压抑作用，而这也激发了对于这些概念的各种修改活动。

后现代时间和空间观念在某些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正在顺利地进行中。在规划和公共行政领域，概念性的观点假定了现代的可控制的时间和空间。可是现在，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诸如控制增长和政策履行(实施)之类的概念都已变得毫无意义。后现代规划更注重空间和时间的政治用途。城市是一个文本，由不同的读者对它作出的不同的理解所构成。后现代规划把空间作为一种易于掌握的、可驾驭的约束力量来

---

①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96)早就区分了绵延和钟表时间。

予以分解，并且用超空间取代了它，超空间观念把空间看作是零碎的和杂乱无章的，是不可判定性的明显间隔。后现代规划是一个大杂烩，是一种拼凑，一种杂乱无章的随意组合(Dear 1986:367，379—80)。后现代主义表示，"应该用一种更加大得多的折衷主义风格来研究乡土传统、地方历史，研究从盛大集会到亲密关系再到大的场面的专有的空间设计"(Harvey 1987)。

后现代主义者对于时间和空间的重新定义也已经在国际关系学领域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现代主义者反对被国际关系学家们大致认可的、根据边界和人口而作出的关于地理和空间的常规划分。他们认为，这些政治实体运用一种"普遍的叙述"，每个政治实体都坚信自己"有权对于全体事务作出某个在部分问题上的唯一解释，并且每个政治实体都在一定的空间、人口统计和时间范围之内获得了那项权利。"国际关系学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地理和空间不是自主、孤立、分离和固定不变的同一体，相反地，它们取决于"竞争的程度"。地理的排他性、沉默性和疏散性来自于一个"冲突的战场"，来自于"多元因素中的权力游戏"(Ashley 1987:409—10)。这些后现代学者运用后现代时间观和地理观以消除国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之间的界限。他们把后现代的国际关系定位在既是国内的又是国际的交汇点上，定位在被称为"非处所"(nonplace)的位置上(Ashley 1989a:39)。

通过使其更适合于后现代的国际关系，阿什利对于"历史性"(historicity)的思考以某种后现代的方式重塑了历史。他把传统历史作为某种虚构的幌子来抛弃，因为它合法化了霸权性话语并且替各种独断的又带有普遍性的实在定义作辩

护。他反对"历史叙述的这样一种结果，即通过特许此主体或彼主体为最高中心，为真理和意义的终极源泉和记录，它导致了历史意义的终结，用那个主体的话来说，所有其他事物都必须得到解释"(Ashley 1989a:33)。受福柯的影响，他提出以散乱的历史或系谱取代国际关系中的历史，因为它探讨在各种千变万化的境况下的斗争、不连贯性和权力游戏，因为它认可了形形色色的解释，认可了真理的不在场(Ashley 1987:409)。

早在后现代主义能够发出如此这般的抱怨之前，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就已经存在着对于现代的时间、空间和历史观念提出质疑的传统。十多年以前，在国际关系领域诸如"政权理论"之类毋庸置疑的某些创新活动已经回避了关于分析之地理单位的传统观点，并为否定和对抗现代的地理和历史概念确立了合法性。虽然后现代主义者鼓励这种努力，不过与此同时他们批评了政权理论的其他方面，并且使那项质疑活动远远超出政权理论的范围而更加广泛地开展了起来。

无疑地，政治社会学家可能会接受某个后现代的时间观念，而这种做法意味着检验昨天的初选结果，不是去证明谁取得了胜利，而是去考虑初选对另一个时刻——如大选——的影响。但是诸如这个实例所提供的呆板雷同不太可能激起后现代主义者的兴趣。关于时间的某个更加令人可信的后现代考虑，是迪尔·德里安对于在现代背景中的速度的后现代分析以及速度在改变国际关系方面、尤其在改变间谍工作方面的作用(Der Derian 1989b)。

夏皮罗和纽鲍尔(Shapiro and Neubauer 1989)以洛杉矶为例讨论了城市方面的空间和地理。他们的目标是明确"一个社会的诸空间形式，例如，休闲空间，工作空间，公共空间，军

事空间，等等”。所有这一切在以往的政治科学中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在证实对这些概念有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并且承认他们受到了法国后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的同时，夏皮罗和纽鲍尔并不反对所有的现代社会科学的假定；相反，他们有选择地利用了其中的许多假定，只是对现代性的那些特别可反驳的因素提出了质疑。

后现代的空间、时间和历史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已经在后现代主义者中间产生了重大的分歧，而且这种情况又导致了某些引人入胜的争论。后现代地理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之间就空间和时间之可比重要性方面面展开的争论是非常有趣的；学科差异是争论的中心。政治理论家们强调后现代的时间比地理更重要。后现代的地理学家们则主张后现代的空间概念比历史和时间概念具有日益增长的优先性。① 通过抬高后现代空间概念的分量，他们希望复兴相对于后现代历史的后现代地理。后现代的地理学家们抱怨，在过去，人们一直在公平地把地理（或空间）误解成固定不变的、无生命的、不能移动的、非辩证的东西——关于空间科学的一种笛卡尔制图学形式（Foucault 1980：170；Soja 1989：4）。他们认为，在19世纪晚期，在社会关系的研究领域，空间或地理一直不公正地被列于次要地位。直到20世纪中期，空间或地理的适当作用才开始逐渐地得到返归。② 他们希望利用社会科学的后现代重

① 在时间概念和历史概念之间几乎不作区分的后现代地理学家认为两者是互相交叉的，并且在概念上是互相依赖的。

② 他们指出，起初，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预示了一种后现代的空间和地理观念并且对它给予了相当的注意（Soja 1989：第2章）。今天，一小批——不过其队伍正在不断增大——后现代地理学家向前推进了这项计划。

建以"重新确定"地理的重要性。

不过,政治理论家们认为,后现代主义使作为某个批判性变量的时间(速度)高于空间和地理(Der Derian 1990:297,307)。按照他们的说法,人类已经没有在空间上作进一步扩张的需求,这样地理的重要性便降低了。影像和视听手段取代了实际的空间旅行,因为它们可以把我们带到不同的地方(Virilio 1989:112—15)。时间和速度是政治性的,"权力在时间里比在空间里更加'实在'"(Der Derian 1990:295)。在速度形式里的时间是暴力,是战争的本质,它改变了整个战役的结果。时间取代了空间;"领土的分布变成了时间的分布"(Virilio 1983:115;1989)。后现代的政治学家们确信,"在我们的武器体系、联络体系和决策体系中,我们没有严肃地考虑过极度的或不充分的速度所导致的政治后果";他们要求"使年代学高于地理学,使速度高于空间"(Der Derian 1990:307,297)。他们主张时间比空间更重要(Virilio 1989:112—15)。

这场刚刚开始的争论不会轻易得到解决;在一场后现代的辩论过程中,无论什么人都不是"赢家"。但是我们确实窥探到了其中隐藏的某种危险性。即使从后现代阵营之智性范围的观点来看,后现代的空间、时间和历史观念也都是有争议的。

小结

关于历史、时间和地理的后现代观点是密切地纠缠在一起的:它们都与现代的各种假定格格不入。反对线性时间自然地要怀疑预设它的传统历史。相似地,正由于历史预想

了时间和位置的某种联系，它便被假定为发生于某个物理的，空间的场所。没有时间，也就不会有精确的开端，因此注重于追本溯源的历史也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后现代主义者会有如下说法就毫不奇怪：他们只是同“我们的一个、并且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即现代打交道(Heller and Feher 1989:150)。时间是相关于两个地理单位之间的距离的，但是在一个后现代的上下文(情景)中，这些地理单位已经不再受已知规则和公制距离的约束。每一个尺度都依赖于其他尺度；某一尺度的传统观点一旦衰落，那么所有尺度的传统观点都将同时地面临被抛弃的风险。理论和现实虽然存在着差距，但是在社会科学中人们不难发现，作者们在对关于这些变量中的一个变量的现代观点进行争论的时候，却未触及关于其他变量的现代观点。

关于历史、空间和时间的后现代的尺度变更以某种可靠的方式相关于其他实质性的后现代主义观点。任何空间(社会的、物理的或认知的)绘制都会产生描述的适当性的问题。正如我们将会在第6章中看到的那样，后现代主义者得出结论说，不存在真正的地图，因为没有一种描绘是真正可靠的(Jameson 1984a:90)。对于主体的后现代怀疑同对这个怪东西在传统历史中的作用的不满联系在一起。没有各种主体，传统历史也会走向衰落(Flax 1990:32—33)。后现代主义者反对启蒙科学，这种观点吻合于重新界定线性时间，重新概念化空间或传统地理的某种激进的后现代行为。



理论的理论和真理的恐怖主义

事实上，理论的秘密在于真理是不存在的。

——Baudrillard 1986:141

任何一种哲学面临的传统难题都在于导致了对于某种终极不可知的知识的认识，并由此激起了认识未知之物本身的认识——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拾。

——Harland 1987:118

在某个后现代的视野之内，真理和理论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章里，我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讨论。理论蕴含着真理，真理，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本身就是理论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对有关这两者的现代说法都持怀疑态度。在这一章里，我首先讨论了怀疑论者的后现代的真理观，尤其是他们的如下见解：因为所有知识都受语言的约束（language-

bound),所以真理永远是武断的。我还考察了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把真理重新概念化为局部的、主观的、针对特殊团体而言的尝试。其次,我略述了对现代理论的后现代辩驳。我考察了对于理论的各种建议,有的主张抛弃理论(怀疑论者),有的主张重建理论(肯定论者)。最后,我提供了来自几门社会科学学科的某些例子,并考察了关于真理和理论的后现代观点对于整个社会科学所产生的后果。

没有现代真理理论的生活:语言问题

几乎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都反对作为一个目标或理想的真理,因为它恰恰是现代性的一个缩影(Foucault 1984:72—80;Ashley 1989a:271—80)。真理是一种启蒙价值并且仅以下述根据为条件:真理涉及秩序、规则和价值取向;真理依赖于逻辑、理性和理智。后现代主义者对所有这一切都表示了怀疑。在现代世界创造知识的尝试依赖于某种真理主张,依赖于断定真理是本质性的知识的某种假定。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为什么要摈弃真理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要么否认真理的可能性(Lyotard 1984),要么只是声称自己不关心旨在发现真理的所有计划(Baudrillard 1983a,1983c)。按照他们的观点,真理要么是没有意义的,要么是武断的(Culler 1982:22)。对怀疑论者来说,两者的结果都是相同的:在真理与最明显的、失真的修辞形式或宣传形式之间不存在差别。[①]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独断的真理主张,而不管那

种主张多么合情合理。用德里达的话来说："不存在自在真理之类的东西。存在的只是对于真理的过分热中。即便真理是为我的，是与我有关的，它也是多元的"（Derrida 1979：103）。这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真理主张只是权力游戏的产物，那些权力游戏受它们为之服务的那些人的利益所操纵。假如情况真是如此，假如真理主张真是非常武断的，那么它们就不配拥有特殊的特权地位或至高无上的权威。正如福柯（Foucault 1975）所说的那样，"我们屈从于经由权力的真理的再生产，除了通过真理的生产以外我们无法行使权力。"他坚信，断定在真理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某种尖锐区别的观点是荒谬的，后者被理解成虚假的宣传（Foucault 1980：132）。把真理和权力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存在关于某个绝对的、无差错的真理的实在可能性。[2]

对怀疑论者来说，真理主张是恐怖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们恐吓威胁和煽风点火（Baudrillard 1983c）。据说真理依据自己的存在使那些持有不同意见者沉默了起来。真理主张"替有权力者作辩护，使弱者感到自己是错误的和不适当的"（Handler `38：1036）。利奥塔德认为真理"取消了""他人"的论点，他人的论点推翻了我们视为真理的东西，虽然它只不过

---

① 当面临某个明确的真理性例 f——例如陈述"天空是蓝色的"——的压力的时候，怀疑论者会回答说这些例子是琐碎的、不重要的（Derrida 1981：105；1979：103）；或者他们会回答说"天空是蓝色的"仅仅在某个解释的上下文之内才如此，所以这不是 ·个真理的陈述（Hoy 1989：456）。

② 尼采显然影响了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真理的理解。他嘲笑对于知识的热爱，强调神秘胜于真理，不过他同等地怀疑"富有创意的谎言"（Megill 1985：54—58）。对尼采（Nietzschr 1979）来说，真理和谎言都是捏造之物。真理和谎言都不存在。声称自己明白真理的人是可疑的。

是我们逐渐地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而已(Lyotard 1984)。

怀疑论者的语言理论把真理转变成了一个几乎是语言学约定的东西。他们认为,关于真理的各种主张从来也无法独立于语言,真理是一个"话语的效果"(Flax 1990:35)。名词和意义,被指物和指示符号之间的关系是成问题的(Derrida 1974b; Graff 1979;Ryan 1988:565)。如果像后现代主义者主张的那样,语言创造并再创造了它自己的世界而没有涉及到现实,那么要确定地说出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语言纯粹是一个人为的符号系统,语言无法担保真理(Flax 1990;Murphy 1988:179)。"关于事件的沟通不是取决于事件本身的特点,而是取决于语言的形象或形式"(Gergen 1986:143)。语言的意义,总是带有主观的和个人特点的因素,是无法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语言有自己的意志和权力。它创造着完全独立于"人类的力量或人的意志"的意义(Norris 1988:176)。不存在语词的精确意义,不存在关于某文本的确定解说,简言之,不存在单一的真理(Descombes 1980:182)。人类的所有机构都"依据于关于这个语词的谎言"(Norton 1988:5)。真理算不得什么东西,它只不过是"我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语言的引诱的产物"(Norris 1988:188)。"假如语言的意义不是来自指向语词外面的某物的指称符号,而是来自语词本身之间的不同关系,假如'语词所指的对象'和'意义'总是必须被区分开来,那么通过一一对应于某个社会的、历史的或心理的现实而取得有效性的某个文学文本观念就再也不可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了"(Miller 1971)。只有一些保留真理概念的怀疑论者对它作了非常大的修正,以至于它不可能在一个现代的上下文中得到认可。例如,瓦蒂莫(Vattimo 1988)建议后现代的真理将是不具有崇高品格的。只有过去的

踪迹,回忆,神话——所有这一切都"肯定是谎言"——编织成后现代的真理。因此,后现代的真理必然是零碎的、不连贯的和变化的。它是修辞学的和美学的,是同体验艺术相吻合的,正如所有艺术都注定要消失那样,它本身也不断地被重构并在终极意义上与死亡相连结。

怀疑论者对真理的理解同他们对于作者、主体、现在(在场)、历史、时间和空间的看法是一致的。真理蕴含着某个作者。这样,摈弃真理也就紧密地吻合于他们的如下见解:任何单个的人(诸如作者)都不能告诉我们某个特殊文本的真实意义。一个读者也无法断定他(她)对某个文本具有"真的读解"。后现代主义抛弃了主体,这种做法是有意义的,因为真理在真理陈述的内容方面必需有一个诸主体的统一体。真理必需有一个明确的客体和主体以便某人能够站在外面并发现什么是真的(Harland 1987)。真理假定了对于在场的信任,假定了在实际地在场和不在场之间作出区别的能力(Schwartz 1990:32),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场从来也不是绝对的:不在场之物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在场,而在场之物总是不在场。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反对把真理当作"全面性、适当性、超验性或自我统合(同一)性的事物。它不可能是某外在的或普遍的本体('在场')或主体的表象或镜子,因为本体和主体都不存在"(Flax 1990:200)。现代历史探索过去的真实轨迹,怀疑论者反对这种努力,在现代时空观不存在的情况下,这种努力是毫无意义的。在不存在能够检验其真实性的某个自主者的情况下,现代的时间和空间定义走向了衰落。

正如我们将在后面诸章中看到的那样,怀疑论者对真理的否定态度也与他们对表象、科学、认识论、方法论和政治学

的见解相吻合。否定真理同后现代的反表象主义密切相关。表象假定了某个真实图像被再生产或被再现的可能性;后现代主义者则断定这是不可能的(第6章),而且真理,就其竭力再现着现实而言,是欺骗性的。后现代主义者怀疑真理的价值,因为他们认为用任何一种确切性都无法估价知识主张的适当性。区分真假的所有标准,评价理论的所有标准,都要求某个人在两类事物之间作出选择,或者,它们要求某个人去建立一个价值等级系统以标明此事物为好、他事物为不好。后现代主义者反对这种区分,相反,他们强调多重现实,主张对于任何现象的某种解释决不可以被声称为优越于任何其他的解释。假如情况果真如此,假如真的不存在针对每一个问题的单个最佳答案,那么就不存在真理的地盘。

肯定论者重新定义真理

和怀疑论者一样,肯定论者也倾向于摈弃普遍性真理,并且抛弃了真理是"在那里存在着的"、有待于人们去发现的观点。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确实接受了特指局部的、主观的、团体的真理形式的可能性。与怀疑论者相比,肯定论者不会轻易地说所有的真理观都是相等的。不过,他们中保留了真理的那些人把真理相对化了,并且取消了它的特定的或普遍的内容。他们要么说真理等同于"自我理解",要么主张真理因地点和历史背景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声称相互冲突的真理不是问题,因为每个真理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都可以是真的(Goodman 1984:30—35)。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真理主张(Ferry and Renaut 1985:287)。最后,他们逐步将某种反理论的真理观发展成给予日常生活和局部叙述以某种实质性关注的理论。

和怀疑论者一样，肯定论者认为真理对语言的依赖性是一个严重的限制，但是他们采取了某种中庸的姿态而不是替极端的语言学相对主义作辩护。肯定论者认为，正如职业社会科学家们而临的情况那样，对语词和概念可以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看法。不过，就如下范围而言，意义仍然是不确定的：它总是被专业的或社会的交互作用所获取、所定形、所发明；社团以某种决非绝对地武断的方式规定术语的意义(Smith 1988：105)。肯定论者认为，某知识社团可以确立关于语言和价值取向的某种一致意见，使得某些真理的沟通成为可能，这些真理尽管不是普遍的真理，但是在某个特定地点和时间它们可以适用于那个社团(Fish 1987)。[1] 但是肯定论者最后还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存在独立于话语的、先验的规则〔真理〕……我们称之为精神或理性的东西只不过是话语的一个效果而已"(Flax 1990：35—36)。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现代现论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否定现代理论并且承认这样一种境况：大量的理论存在着，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声称自己优越于任何一种别的理论。他们对现代理论作出了广泛而全面的实质性的和方法论上的批判。理论建设和真理探索活动一起，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者、新保守分子、实证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的共同特征，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包罗万象的，逻各斯

---

① 问题是，假如社团标准(准则、规则)太强有力的话，某种批判怎样才得以展开。

中心的计划”,一个元叙述,而且每个流派都强调以理论为形式的社会全体凌驾于个别的部分之上(Giddens 1984;Sloterdijk 1987)。然而,后现代主义否认有任何诸如此类的全球计划。它寻求“分延”(différance)[①],寻求部分的唯一性,而不是寻求理论整体的统一性。

正如他们的语言观那样,怀疑论者的反基础、反约束的倾向引导着他们对于理论的批判(Vattimo 1988)。这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理论假定了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实在,可是那个实在实际上并不存在(Baudrillard 1986:141)。理论被假定为可以在每一个背景之内一成不变地发挥作用,可是在一个变动不定的后现代世界里,这一点也是可疑的。理论所依赖的材料和正式法则都不是独立的和客观的;它们至多是互为上下文地相对的,至少是完全地随意的和被建构的(Fish 1987:1781)。正如所有的真理主张那样,理论必须在语言的限制之内发挥作用,这也正是它的主要弱点的根源所在,因为语言“总是已经”无处不在的东西。语言类型及其社会地确定的意义是必然的;它们也使理论成为不可能的。

怀疑论者对于现代理论的广泛批判包括了所有如下指摘。理论是隐匿的、失真的和模棱两可的(Nelson 1987:18);它是“异化的、分离的和不一致的”(Der Derian 1989a:6);它意味着“排斥、整治和控制敌对的力量”(Seidman 1989:636);虽然它声称是科学的(现代科学只是一个“文化工艺品”),但它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和修辞学的(夸张的)(Harman 1988:121)。它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它寻求“不变的根据”并把

---

① 在辞汇表里有定义。

目标指向"巩固一种至高无上的声音"(Ashley 1989a)。理论被说成是对权力垄断的合法化,因此绝大多数怀疑论者认为理论差不多是一种"权威的武器"(Kellner 1987:6)。现代理论无法容忍对立观点的"根本的不可判断性"。它必须作出选择。它不"尊重似是而非的东西",后者被规定为某个对立物,其中绝不存在在两者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的可能性(Ashley 1989a:271—73,278)。最后,怀疑论者认为,现代理论没有实现它为自己确立的目标。它没有提供方向;它不是实践或行动的根据,因为它更是一次特别的辩护,一次对以往实践的概括(Fish 1987:1781—97)。

在其论文"抗拒理论"中,保罗·德·曼认为,现代理论干扰或"抵制"了后现代阅读的革命方面。通过试图详细说明针对特殊文本的某个单一的解释、某个理论,现代理论竭力反对后现代主义者们所强调的多重解释。但是,与此同时,他又认为,理论"本身就是会自我抵制的",而且它不得不以废弃自身而告终。这意味着文本抗拒着应用于它们身上的理论。一次严格的阅读揭露了文本的修辞方面,揭示了对理论的一次抵制,表露了针对每一个假定的明确的理论性解释的一个例外。最后,所有理论都丧失了立锥之地。"任何事物都奈何不了对理论的抵制,因为理论是自我抵制的"(De Man 1986:19)。

一般说来,在理论这个语词的现代意义上,诸如在以推论、观察和经验为根据的理论的现代意义上,怀疑论者没有建构新理论的渴望,甚至也许是没有建构新理论的能力。他们不打算形成一个关于后现代的"理论"。任何一个诸如此类的计划都将是矛盾的,因为它需要现代理性和理性思维,而怀疑论者对这两者都予以反对(参阅第 7 章)。因此,他们不使用

"理论"这个语词。许多怀疑论者用诸如"某种似是而非的阐述的不期而遇的思想火花"之类的其他术语取代了它(Harland 1987:107)。理论被认为是"轻率的"或者是一种"挑起讨论的缘由"(Sheridan 1980:213—14)。斯洛特迪克(Sloterdijk 1987)提出了"肉体政治学和肉体快乐说",以"获取幸福的权利"取代社会理论。假如后现代理论可以被说成是存在的话,那么在怀疑论者看来,它将是这样一种理论形式:它放弃了任何一个专门的考虑(Der Derian 1988b:9;Dear 1986:379)。它感到不一定要符合逻辑,不一定调和对立的见解,也没有在两个理论之间进行检验或作出选择的必要,所以,它认可了不一致性和矛盾(Ashley 1989a:271—80)。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摈弃以现论为中心,并且以日常主活和局部叙述取而代之

虽然绝大多数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放弃对于绝对真理的追求,虽然有许多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要求彻底消灭理论,但是肯定论者不像怀疑论者那么坚决果断。他们或许会反对"理论的清白无辜"(Henriques 等人 1984:12)。他们一般否认理论的真理主张,取缔了它的特许地位。他们削弱了它的作用,减低了它的身价,但是最终许多肯定论者通过把它改变成为普通的、平常的"谈话"而保留了它。他们认为,虽然他们把目标指向终结蕴藏在最高理论中的智力霸权,但是这不一定意味着所有理论都是相等的(Dear 1988)。

对肯定论者而言,后现代理论是不系统的,异质的,散漫的,变化的和局部的。它是非表象的(不具代表性的),它在本

质上是主观的，并且只关注特定的团体。他们的散漫理论被说成是因其自身之故而具有价值的，被说成是从来也不声称自己具有专门权威的理论。[①] 它不需要现代社会科学的主体－客体区分。当且仅当在它自己的话语中它才是"真的"。

一些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试图以对于日常（每日）生活的文本（事件），对于局部知识，对于细节，对于偶然发生的事物，对于主观断言，对于个人和集团的直接经验等等的某种反理论关注来取代现代理论。[②] 他们所创造的东西或许反映了一个具体的经验现实，但是它是一种反实证主义的、热中于逸事趣闻的经验主义，它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替日常生活中的独一无二的事物都留下了特殊的地盘。[③] 它不需要现

---

① 当然，问题是：许多肯定论者以某种矛盾的方式确实给予了他们自己的理论以某个特许的地盘；亨里克斯等人提供了一个例子。这一点将在第8,9章予以讨论。

② 存在着关于日常生活的许多范式，而这个思想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独有属性。对于像亨利·勒菲弗那样的新马克思主义来说，它是一种普通的方法（Henri Lefebvre 1988:77—87）。他放弃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把某种日常生活观整合于某个一般的反资本主义观念之中。日常生活变成了一个"生产模式"，一个"行政社会的模型"；这种"生活经验"与资本主义具有密切的关系。尽管它在总体上是"含糊的和矛盾的"，但是它仍然是"剥削和统治的基础"。不过，假如有一个进步的计划应用于它身上，那么它是可以被改变的。赫勒也强调研究社会现象的日常生活方法（Heller 1986:150—63;1990，第2章）。从她对日常生活的考虑来看，她显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虽然她对日常生活的赞同或许启发了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对赫勒来说，日常生活和日常知识既是情绪性的，又是实用的、具体的、实际的和认知性的。最近几年来，专注于日常生活的、由贝尔克纳普和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系列丛书《私人生活史》也同样是这样。

③ 后现代主义对于日常生活的反理论关注并不是关于日常经验之唯一可能的见解。努力地概括日常生活，在微观水平上得出一些理论结果是同等地可能的。在这个形式里，带有经验主义特点的日常生活焦点将强调具体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所感所知的事物变成了可概括陈述的基础，具有着成为目标的广泛用途。

代的历史，它的主体沉溺于日常生活中，没有独立的自我。肯定论者认为日常生活是直观的、以情感为基础的，在内容上近乎精神性的，并且公开地允许轻浮的言行。日常生活造就的几乎就是存在主义者，他对每天发生的事件有深刻的领悟(Barth 1980:68)。由于这种"普通人的普通生活"(Himmelfarb 1989a:663—65)具有如此丰富的可描述性，所以它代表了对崇高理论、尤其是对企图进行概括的归纳理论的一次背叛(Fokkema 1984:421)。在卧室和澡堂里发生的事情同在战场和政府会议室里发生的事情具有同样的历史重要性。按照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解，现代据说是低估了日常生活经验的价值。传播媒介谈论的是远离日常生活的东西。它忽视了公共事件对日常生活和个人兴趣的影响。[1]

批评家们认为日常生活的焦点只是描述性的，它既不可能是重构性的(Heller 1986:156)，也不可能是实质性的(Himmelfarb 1989a)。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实际情况。[2] 但是肯定论者拒绝放弃政治计划，这意味着他们假定某个日常生活焦点允许的正是这种重构。许多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积极地把他们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同社会的

---

① 对于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这种只提供某种主观见解——那种见解不带有任何关于真理或理论的主张——的个人的、私人的、主观的日常生活经验是公共经验的一个替代者。(第6章考察了后现代主义与公共场所之间的联系。)后现代主义的左翼批评家们认为，公共问题和日常生活的分离导致了对于现状，对于不公正和不平等的认可。

② 赫勒认为，重构日常生活意味着将主体的立足点作为内在于日常生活的一个参与者来运用；由于后现代主义抛弃了主体，诸如此类的重构就都是行不通的了(Heller 1986:158)。当然，对于要求主体之回归的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不过，无论怎样，赫勒确实没有考虑过两种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这个区别。

变化联系起来。他们的目标不仅“在于解释日常生活而且还在于改造日常生活”(Huyssen 1986:157—58)。

作为真理和理论的替代者,肯定论者也强调某类叙述,小范围的叙述,以团体为基础的叙述,而不是重大的叙述。他们赞成谈论如下事物的传统叙述,诸如民间智慧、神话、流行“故事”、传说、智慧的零零散散的、有创意的片段和“小插曲”(小故事)。传统叙述以局部事物为焦点,它维护的既不是真理也不是总体性理论,提出的既不是广泛的理论概括也不是终极真理(Rorty 1979)。它们只是作为许多解释中的一种解释而出现(White 1978:57)。传统的人类叙述接受了错误、不一致性和相对主义。这些解放性的叙述讲述的是“失势者们的集体故事……他们的生活被放到了一个更广大的社会和历史力量的背景中来考察”(Richardson 1988:204)。[①] 它们描述了一个普通的故事;那个故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统一了人们,促进了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系(Miller 1990)。它们向现在解释过去;它们谈论的是零碎事物而不是统一整体。

后现代主义者摈弃现代主义的“伟大”叙述(Hassan 1987a:91),元叙述(Lyotard 1984),以及声称是科学的和客观的、为使现代性合法化服务、并且假定了正义、真理、理论和霸权的叙述。这些现代的元叙述也就是怀疑论者作为逻各斯中心的、线性的和整体性的叙述来拒绝的那些叙述;这些现代叙述者以“去掉所有人类的主观性或可错性的一种来自苍穹的

---

①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消灭了主体,并且提倡反人道主义。因此,不足为怪的是,怀疑论者不在此项借助于传统叙述来探讨现代世界如何使人们丧失了力量的研究活动之列。怀疑论者认为这项研究活动是成问题的,因为它可能重新恢复主体和客体,并且在内容上可能是人道主义的。

全知全能的口吻"(Richardson 1988:203)来同权威人士(诸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耶稣、路德和穆罕默德)交谈。或者作为一种掩饰,真理和客观性是通过没有人类叙述者的叙述(就现代科学而言)而直接地提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叙述者"隐蔽的第一人称〔我,我们〕"正"躲藏在消极声音的荆棘之中"(Richardson 1988:203)。利奥塔德认为,就其声称自己优越于传统叙述而言,现代叙述是欺骗性的。他认为,现代叙述正如传统叙述一样,是主观的、相对的和解释性的(Lyotard 1984:26)。[1]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否定重大的理论是因为后者都主张一个开端、一个终点和一个明确的理论。而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里,这是不可能的和毫无意义的(Taylor 1984:62—69,153)。正如我在第4章里说明的那样,后现代主义者摈弃具有一个起点、一个常规进程和一个结局(即一个线性故事)的历史观(Taylor 1984:62—69,153),尤其是假如这些要素包含着表象或因果性的话,就更是这样。后现代主义者把现代叙述作为表象来批判,"那个表象通过注人被当作固定不变的和独立于它所表象的时间的一个解释的标准和立足点,而制止了模糊性并控制了意义的衍生"(Ashley 1989a:263)。

以日常生活和琐碎叙述取代理论并不是没有矛盾的。代之以局部记忆和团体(社区)真理,恢复以前"被取缔的知识模式"可能也就等于用一种真理观去取代某种已经不再被人接受的真理观(普遍真理),而且假如有人正抱怨一般的真理主张的

---

① 作为一名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德不像如此众多的肯定论者那样将传统叙述作为真理的替代者来提倡。

话，那么这也就会促成不一致性(Habermas 1987a:279—81)。

来自妇女研究、公共行政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几个实例

假如社会科学要想采纳某个后现代的观点的话，那么它就必须适应某种处境，在那里，追求真理的目标已经被抛弃，现代真理和理论的可能性已经不再存在。在这一方面，肯定论者比怀疑论者更加成功也更少威胁性。肯定论的后现代社会科学家们力图发展出一种关于他们的学科的非真理性和非理论性的知识。怀疑论者则要摧毁社会科学的基础。某些实例证明了这一点。

用后现代的真理和理论观来看，妇女研究领域也同样面临着任何现代社会科学所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女权主义者不赞成关于真理的现代启蒙观点，因为那些观点据说是以男性的观点——竞争性的和理性的而不是情感的、关怀的和直观的观点——为根据的(Van Vucht Tijssen 1990:148,156)。把理论作为"家长制的和压迫性的"东西来摈弃的女权主义者从否认现论可能性的那些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寻求支持(Weedon 1987:9)。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的后现代批判也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欢迎(Nicholson 1990:5)。不足为怪的是，许多女权主义者后来投入了后现代哲学的怀抱："像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女权主义的理论家们将鼓励我们在揭露我们之所以需要强制性秩序和结构之根源——而不管这些秩序和结构有多大的武断性和强迫性——的同时，还鼓励我们容忍、接纳并解释矛盾心理、模棱两可性和多重性"(Flax

1990:183)。

但是,同男性统治的现代观点相比,后现代的观点未必会使女权主义者更满意。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假定所有的真理观都是相等的,他们认为同任何别的观点一样,一个女权主义者的现点也是武断的。女权主义者必然地主张她们自己的现点的优越性(Di Stefano 1990)。怀疑后现代方法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必需要有一种认识论,在那里"知识是可能的",在那里,在她们了解世界的探索活动中,她们自己的见解也被接受为"有效的"见解(Harding 1990)。假如真像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主张的那样,不存在真理,不存在区分正确见解和错误见解的客观手段,那么只好借助权力来决定谁的现点将生效;而实际上,妇女属于在历史上一直居于没有什么权力的团体之中。

关于真理和理论的现代与后现代观念之争的另一个例子产生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应用领域:后现代的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的新型的后现代形式不提供"如何去实施它"的情报,因为假如真理和理论被清除了的话,那么将不存在清晰的观念性方案,不存在单一的正确答案或最佳方法。后现代公共行政学领域充满了张力和变化,并认为那些在公共代理机构中具有声称代表真理的某种"使命"或"职责"的人是值得怀疑的。后现代主义者把这些辩护者看作是以"过时项目"为自己谋私利的官僚,因为"现代就是一个过时的东西"(Caldwell 1975:569)。来自现代和后现代之间这个冲突的张力导致了在这个领域里的一种无处不在的分裂:政府与民众之间,政府的行政机构内部,以及每个个别管理者的人格内部。对于后现代的公共行政来说,不再存在任何"正确的"政策或高超的

领导智慧，不再存在共同的假定，因为现代真理或理论是不可能的。那么，后现代的行政官员该如何去处理要求政府代理机关给予立即关注的那些紧迫的环境或经济危机呢？

新的后现代的公共行政把目标指向"先见之明、开创性、灵活性、敏感性和新的知识形式"，它们不是真理主张，不是技术上的或程序化的知识形式，而是"相互作用的合作性的"知识形式(Caldwell 1975)。这种行政观念的支持者坚信，这不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见解，不是一种满足于无知的懒惰态度；相反，他们认为，这是在一个没有真理的后现代世界里对于新知识形式和行政新角色的一种探索。后现代的行政人员将既不是一名技术员也不是一个通才。相反，他(她)将使各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概念化并对之进行描述。这要求他(她)具备同更广大的民众分享信息(不是被定义为知识)的力量和能力。

对于真理和理论的怀疑引导着后现代社会学家朝着相同的方向运动。社会学理论，如果存在的话，将是一种"有趣的"理论：它或许会确定某些问题并明确某些见解，但是它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真实的"。后现代社会学家不是"智力规则和秩序"的执行者(Seidman 1989:636)。他们与其说是真理的给予者("立法者")不如说是真理的"解释者"，也许是两个知识社团之间的仲裁者，而其中每个社团提供的"真理"都是核心于他们自己各自的团体的，但是那个"真理"在别的地方却无足轻重，也没有特殊的地位(Bauman 1987)。这些社会学家不需要普遍真理或终极解释。他们促进了交流而不是决定了哪一个社团再生产了"适当的意义"。社会学家的作用在于"转述在某个以共同体为基础的传统内所作出的陈述，以便使它们可以在以另一个传统为基础的知识体系之内被人们所理

解"(Bauman 1987:5)。

后现代人类学家反对所有现代的人类学真理和现论。仅仅被看作是杜撰的人类学里的真理，正不断地被重新杜撰出来。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人类学创造的恰恰是它试图予以研究的现象，因此它不可能专注于发现真理的问题。一名后现代人类学家引用了新西兰的毛利人的例证。研究这些土著人起源的早期人类学家提供的历史，有时是建立在可疑文献的基础上的，它们后来如此完全地被编人毛利人的神话之中，以至于到了今天就毛利人的起源问题而言，真理和杜撰之间的区分已经彻底地消失了。这个发展被说成是适当的，因为"杜撰在所有话语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常见的事件，因而它决不依赖于某个永久的基础……'传统文化'日益被当作是为当代目标而确立的一个杜撰，而不是从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笔固定遗产"(Hanson 1989:890,899)。

由于后现代人类学家抛弃了真理和理论，他们同时也就抛弃了权威并放弃了责任。着手研究边远地区的某个外国民族的人种志学者的"独白式的权威"再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了，因为这些活动的目标，这些形成理论和真理的活动，再也不是合理的了。因此，一个人类学文本的真理不是依赖于"一个创造性作者的意图"，而是依赖于"一个读者的创造性活动"(Clifford 1988:520)。

后现代的人类学虽然提供不了真理，但是它也不是空无内容的。它是解释性的，"经验性的，对话性的，多音调的。"它是感受，是对话，是对他人的倾听和与他人的谈话。它揭示了"反论、神话和谜语(不可思议的事物)，它通过展示、记忆、暗示和呼唤"而不是通过建构理论和逼近真理来说服他人

(Tyler 1984：329)。在后现代人类学中所能提供的一切都是叙述，零星的幻想，某个人的故事。按照这种观点，人类学是“娓娓动听的虚构（小说)”（Strathem 1987）或诗歌（Tyler 1984)。[①]

在来自公共行政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这些例子里，我们看到，尽管出现了由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发起、并由真理之缺失所导致的种种修正，上述学科仍然是完整的。但是当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看确定在社会科学中重新解释真理角色的议程的时候，这种持续性就不那么明显了。例如，当怀疑论者把政治事件归结为仅仅是语言学描述的时候，它们对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的生命力提出了质疑。对于怀疑论的后现代政治学家来说，“政治语言就是政治现实”，“就事件的意义而言，就参与者(当事人)和旁观者所关切的事物而言”，别无其他的现实(Edelman 1988：104)。如果语言一直是战略，是理性化，是建构，那么真理就是不可能的了(Edelman 1988；第6章)。

在任何一门依赖于真理的社会科学领域里，围绕真理和理论而展开的后现代挑战并不总是容易适应的。例如，从传统的观点来看，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疗蕴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不存在真理，那么也就不存在痊愈(Kristeva 1986)。假如在意识和无意识，显性与潜性，自欺与自觉之间不存在差异，那么又何必为理解它们而殚精竭虑呢？假如心理学领域的治疗专家要想抛弃任何真理主张的话，那么他们岂不就得承认所有

① 麦克洛斯基(McCloskey 1990：36，162)就经济学提出了相似的见解，他认为经济学仅仅是一个“故事”，一种“文学”形式，丰富的修辞学。

的见解都是等值的吗？这种承认不正是损害了治疗活动本身吗？但是这些顾虑并没有阻止心理学领域里的后现代探索。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有的话，在临床解释过程中，读者兼分析者究竟记下了多少患者的梦境文本？"(Kugler 1988:64)

现代心理学长期以来强调的是，在治疗时患者告诉医生的只是一个叙述，一个故事，而不是实际经验的一个真实表象(Howard 1991)。后现代主义者对此表示赞同。但是现代医生的作用或许在于帮助患者理清事情的头绪，深入事物的表层下面，以获得对现实的一个更加充分的理解，而后现代医生却没有这样的意图。没有存在于某处而有待于人们去发现的真实的实在。因此，通过涉及某些边缘化的潜在文本，通过涉及各种选择性的解释，后现代医生仅仅"瓦解了参照构架"和"篡改了各种意义"；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种医生"改变了患者的意图"(Hare-Mustin and Marecek 1988:460—61)。现代真理观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而失败的，而且这种情况对任何一种包含下述假定的心现学、精神分析或治疗方法都构成了威胁，它们假定了现实，假定了某些解释(分析者的解释)比另一些解释(患者的解释)具有较高的真理价值。

后现代的理论观和真理观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后现代的理论观和真理观产生了重大的后果。在今天的社会科学领域，僵化刻板的真理主张已经不再受人欢迎，但是对理论的需求仍然是主导的。每个领域的社会科学家们发现要想如怀疑论者要求的那样去放弃理论是十分困难的。一个没有理论的世界意味着所有话语的绝对平等，意味着基础

主张的终结。社会科学的整个知识氛围将随之发生变化。真理将被一系列的东西所取代，诸如：后现代"明晰"的新形式、与我们自己的怀疑态度有关的嘲弄，对我们个人的"权力意志"的认可，对于"中庸力量"的发现，以及在终极意义上"对于所有价值的重新估价"等等（Hassan 1987：197）。[①]

普遍理论缺乏的某个可能后果是超负荷。这里存在的不仅是没有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种众多理论都完全相等的状况。在不存在利用特定的标准在文本之间、在理论中间作出裁决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就若干相对的真理主张而言，也不存在什么方式以便能够减少其数量、给予其中某些真理主张以更多的关注，并忽略那些明显地不切题的或欺诈的真理主张。

批评家们认为，后现代主义取消了真理和谬误（或理论和胡说）之间的差异，这为虚无主义敞开了大门。"既然不存在真理，那么也就不存在谬误，所有信念都是相等的"（Scholes 1989：56）。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瓦蒂莫承认这种责难的有效性，并且认为虚无主义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和有生气的哲学传统（Vattimo 1988）。但是绝大多数怀疑论者声称，当他们承认真理不可能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认可虚无主义。相反，他们认为取消真理是一种积极的解放活动，因为它接受了"复杂性和纷繁性"（Hoy 1989：45）。德里达认为，真理主张的任何可能性之取消并没有导致虚无主义；相反，它使得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因为极权主义完全依赖于它自己的真理观念

---

① 新世纪后现代思潮（将在第8章讨论）谈到了在某种"精神氛围"的指引下，通过全球统一、全球的世界性和平、"超常规的价值"而进行的一场追求真理的运动（Bordewich 1988）。所有这一切都难以融合于现代社会科学之中。

(Schwartz 1990:10),而后现代主义通过否定真理的可能性推翻了它。后现代的社会科学家们也与此相似地认为,后现代主义针对极权主义作了调和工作,因为通过抛弃真理主张,它肯定了“听、问、讲”等更加平和的实践(Ashley and Walker 1990a:395)。

后现代的观点——不存在真理,一切都是建构——本身就是一个终极性的矛盾。通过作出这一陈述,后现代主义者假定了某个特许的立场。他们坚信他们自己的“不存在真理”的观点是真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肯定了真理本身的可能性。很少有后现代主义者能够回避这种两难状况,不过那些试图相对化每一事物——包括他们自己的陈述——的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和阿什利就是两例)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提出,即使他们自己的见解也不是特许的。他们警告读者,他们表达的观点只是他们自己的观点,并不优越于别人的见解。但是即使是这种相对主义的立场,一旦得到明确的阐述之后,使无疑地假定了真理。他们说,他们所主张的观点并不比其他看法更真实,而在作这一陈述时,他们便假定了真理。因此,除了保持沉默以外,简直就没有别的办法能够从逻辑上回避这个矛盾。

现代社会科学努力创造出能够接受以论据事实(data)为基础的挑战的客观理论。理论是依赖于论据事实的,而在如下的意义上论据事实优先于理论:在方法规则被尊重的情况下,一旦论据事实证明理论是错误的,那么理论必须被抛弃。论据事实和证据是在两个竞争的理论之间作出裁决的根据。两者最终可能都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两者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可是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宣传而已,

因为理论要么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的话，那么论据事实是服从于理论的(Gergen 1987:2)。每个事实自身都是充满了理论的，是一个不具有独立于语言、直观解释或上下文的意义的建构。事实是由社团规定的，甚至杜撰的，事实在那个集体的外面没有意义(Smith 1988:105)。后现代主义者把社会科学知识贬低到故事的地位。

在结束本章以前，我得提出一个忠告。关于后现代主义者和现代社会科学之老一套的实证主义者的观点之间的整个讨论忽视了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点。许多现代社会科学家会同意后现代主义者关于社会世界之复杂性的说法。他们会首先承认尽管真理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目标，但它却无可否认地是一个永远也达不到的目标。但是他们将不同意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见解，后者坚信这种复杂性是如此的绝对，以至于提出这样的看法：所有的“真理”——无论其荒谬程度如何——都是相等的。

后现代主义对于真现和理论的质疑仅仅是它对现代社会科学提出更大挑战的一个方面。两者之间的争端是全面地展开的，但是两者在方法论上的争端尤为激烈。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将在第7章里进行。接下来，我们先要讨论一个相关的话题：表象。



否定表象

人们……应该知道怎样去抗拒各种不同的表象实践，那些实践会反复地折腾他们，消磨他们的时间，控制他们的空间和肉体，强制他们的言行，并决定他们的本质。

——Ashley and Walker 1990a:261

好像每个人都是漫不经心地参加选举的，或者说是猿猴们在参加选举。……在这一点上，执政党们历史地和社会地表现出来的一切没有什么不同。即便他们不代表什么，这也是必然的事：游戏的魅力，得票数，游戏的冠冕堂皇的和统计的冲动是压倒一切的。

——Baudrilard 1983c:132

绝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都是反表象的，他们认为表象是现代性及其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基础机构和哲学的核

心。[1] 现代表象的确是以最宽泛的术语标出其领地范围的。它是代表(delegation);在议院中某一个体代表着另一个体。它是摹写(resemblance);一幅油画在画布上再现了画家所观察到的东西。它是复制(replication);胶片(图像)复现了被摄制者(对象)。它是复写(repetition);书写者把代表他(她)的思想的语词(语言)写在纸上。它是替代(substitution);律师代表当事人出庭辩护。它是复印(duplication);胶片代表着原型。表象以不同形式成为社会科学每一个领域的核心。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论战在这一地带异常激烈地开展了起来(Shapiro 1988)。

在这一章里,我将考察在语言、政治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后现代反对现代表象的状况。我们看到,透过表象的所有各种各样的概念指称,后现代主义者捕获了某些核心假定,而不管它们可能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而且这样做是合理的,因为表象——不管它指的是"游戏性幻想"还是"严肃的现实"——具有某种结构的相似性(Mitchell 1990:12)。在每个领域里,后现代对表象的批判的一个共同点是,它认为,表象蕴涵着将某物、某人、某地点或某时间再现为(或再现于)另一物、另一人、另一地点或另一时间。据假定,这种转移之形成是不会伴随内容的缺失或意图的扭曲的。我揭示了有关民主的表象和公共场所理论表象的后现代批判的内涵。最后,我考察了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对后现代

---

[1] 然而,有些非常同情后现代主义的人不愿意否定表象,这种情况将在后面予以讨论。另一些人则发现对于表象的整个后现代批判是混乱的,这种批判与反表象之间的联系是不清楚的和不必要的(Arac 1986:xx—xxi)。

的反表象主义的某些反应。

有关表象的后现代批判，尤其是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在历史上和哲学上受到了尼采、维特根施坦、海德格尔（参阅 Olkowski 1988）、巴尔特和福柯的启示。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尼采对政治学上的民主代表制和认识论上的客观性所持的悲观主义态度上。尼采（Nietzsche 1954，1967，1969）反对民主代表制，因为它允许社会中的最弱小分子（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去形成一个多数并统治“强者和杰出人物”。这是因为“强者和杰出人物”顾名思义必然地是一个少数。维特根施坦以相似方式强调了语言学的相对主义（语言的难以还原的多元论），以及以语言表现任何“现实”的不可能性。海德格尔（Heidegger 1962，1972，1973，1977）反对民主的个体主义，理性主义，先进的技术，管理者的社会，资本主义，唯意志主义——所有这一切都已逐渐地同义于西方的民主代表制。巴尔特（Barthes 1975：33，56）推论道，语词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表象，它同世界不存在直接的联系。福柯的贡献更为复杂。他认为，在 1650 年到 1800 年之间（经典时期），表象是清晰、可靠而直截了当的；“表象是一个普遍、中性、自觉而‘客观的’思维样式”（Sheridan 1980：82）。但是当人们作为主体出现于十八世纪末的时候，表象便逐渐地变得“昏暗不清”起来（Foucault 1970：310）。因为人是他（她）自己的知识的主体和客体，表象便变得日益复杂起来。它成了次要的和派生的东西，尽管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Foucault 1970：313，361）。福柯得出结论：当表象的客体和主体紧密相关而非独立自主的时候，单纯、自然的表象便是不可能的了（Foucault 1970：10），因此后现代的世界是一个不具有真正表象的世界。

同怀疑论者一样，绝大多数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也敌视现代的政治代表制度。不过有些肯定论者要求新形式的代表制度（例如，可参阅 Mouffe 1988）。支持新的后现代社会运动的肯定论者（在第 8 章将予以讨论）往往是这样，或者同被压迫团体——这些团体仍然为实现充分的代表权而斗争着——有牵连的人们也往往是这样。对于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妇女来说，代表权不应被轻率地取缔掉。因为它是他们的平等要求的本质（Arac 1986：xxi）。肯定论者要求取缔代表权远不如要求更多更好的代表形式来得热烈。例如，有些肯定论者要求以“关于呈现、设置、升华和引述、启示、象征、日常生活及其他相关选择物的政治学”取代现代代表权制度（Nelson 1987：10）。或者说它们将更为具体，理查德·福尔克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告诉我们，现代代表权制度“是相关于主权国家之区域性的，国家主义者是相关于世界政治机构的”。但是在今天，他继续指出，“政治权威的区域划分已经不再有效、公平和精确，新的‘批判的行为模式’在其生效领域中是非区域性的，国家已经破碎，时下实践的包袱压在了未来者身上。”福尔克提出了两个明确而具体的代表权改进方案用以反映后现代现实：首先，一个新的立法院，“国外代表院”（经推选和协约而提名），应被加诸美国国会之上，以便为那些受美国的决定影响而其自身对那些决定又没有发言权的国家提供代表权；其次，他建议联合国增加“一个第三议院，它由世界诸民族的代表以及关心人类事务的非政府阵线代表组成”（Falk 1989：29）。

关于表象的后现代批判

后现代主义在从艺术到心理学的每一个领域都碰到了表象危机，而且到处都在预告着"表象秩序的终结"。代议民主制是异化的；表象艺术是无聊的；表象文学因其对于隐喻、象征性的参照的运用和对于语言的故意操纵而变得庸俗不堪(Elgin 1984:925)；表象的历史是骗人的，如此等等。真正有趣的事物是不能得到再现的，即：观念、符号、宇宙、绝对、上帝、正义，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表象与后现代主义者所看重的事物格格不人，他们看重的是：罗曼蒂克、情绪、感觉。按照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看法，表象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语言学上和认识论上都是独断的，表象标志着征服。他们认为，表象是危险的且本质上是"恶劣的"(Derrida 1982:304; Arac 1986:xx)。它标志着扭曲；它假定某些无意识规则是主导关系。它具体化、终极化并且排除了复杂性。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主张现代表象是欺诈、保守、做作、机械、骗人、不完善、令人误解、不充分、完全不适合后现代时代的，就此而言，他们和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走到了一起。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表象依赖于某些荒谬的假定。因为在终极意义上所有的表象都涉及到了另一些表象，所以不存在永远真实的事物(Mitchell 1990:16—17; Baudrillard 1981)。表象假定了某个摹本的有效性，而那个摹本只不过是一个模拟物，一个摹本的摹本，一个不存在原型的摹本。由于在一个后现代世界里真假之间的区别消失了，骗局和实情便具有了同等的可靠性和真实性(Baudrillard 1983c)。后现代主义者认

为，除了其修辞学意义以外，表象对社会别无其他的意义(Ryan 1982:574—575)。政治修辞学创造了一个心灵中的世界以及一整套的社会关系，那是一个被假想为“再现着”的世界。实际上，它恰好掩盖了它自身对于存在者的操作功能。

终结表象秩序的后现代要求与另一些后现代观念是相关联的。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作者终结观和主体死亡观同后现代主义的反表象论是一致的。作者(主体)必须去再现某小说之被杜撰的角色或某剧本之人物(Touraine 1988a:151—153)。如果抛开这些不管，像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指出的那样(第2、3章)，那么人们就可以抛弃表象而行动自如。表象可以同政治上的人道主义相伴而行，它使得最大数量的人民表露心声成为可能，而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反对表象。理论千方百计地去勾画、描绘(再现)现实。在此意义上没有表象的理论是不可能的。这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真理不在场的情况下，人们应该欢迎多重解释，可是表象则假定现存某物是真实或有效的，因而足以被再现。现代表象假定，“意义或真理先于并决定着将其传达出来的表象。”后现代主义者则反其道而行之；表象创造着据称它们要反映的“真理”(Ryan 1988:560)。

表象假定了在场和不在场之间的某个明确区分。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则把这两者都抹去了。在第4章中，我们看到了后现代的时间观对于如下观念的诘难：某物或某人总是完全地在场或不在场的；后现代的空间观认为表象地图是完全不适当的。表象是把某物当作另一物的实践。它假定了某概念同某个不可定义、不可言说之在场的同一性。[1]例如，“市民代表……在人民不在场情况下确保了人民的在场性”(Norton

1988:5)。

表象同语言、符号、信号的关系引发了一场冲突，而且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表象理所当然地认定了语词、图像、意义和符号的有所指的地位；它假定，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构成了关于意义的一套固定系统，每个人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对它们多少有所了解。一个反表象的态度则假定了相反的观点：对于任何一个符号、姿态、语词而言，许多各种不同的意义都是可能的，而且这些不同的意义是可以被揭示的。语言同实在世界不具有直接关系。相反，它只是一种象征关系(Barthes 1975:33,56)。因此，所有形式的表象都是不适当的，因为世界的图像是依赖于语言的，而且是不可能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确定无疑的相互交流的。所有表象都以语言为中介，表象造就的是"语言学上的反映"而不是与现实的关系。符号"不再表象任何东西，也不再具有现实中的相等物"(Baudrillard 1983a:19)。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不反对怀疑论者对于现代表象的批判。不过在其自身的智力工作中，他们确实使用了现代表象。这蕴含着某种不一致性。但是正如我简要地论述过的那样，肯定论者也要求更适当的政治表象形式。怀疑论对表象的批判是以语言的模糊性为根据的，而这个论题对肯定论者来说不甚重要，这也许是因为把自己的积极计划与他人进行沟通对于肯定论者有着利害关系的缘故(对此在第8章将有更详

---

① 汉纳·皮特金(Hanna Pitkin 1967)对于表象的看法预示了今天后现代主义者考虑到的许多问题。她的工作，特别是她把表象定义为对于非原型地呈现的某物进行再现的活动，显然启发了后现代的政治科学。

尽的论述)。

方法论和认识论中的表象

对于表象的敌视是同后现代对于软性的而非实证的认识论的偏爱,同它对于客观性的厌恶,以及同它关于差异性比同一性更重要的确信相联系的。反表象引导后现代主义者去批判现代科学的认识论,因为后者主张唯物主义的现实观,主张主体和客体的分离,并强调概括。本节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反映的是怀疑论者的观点,而肯定论者只是偶尔对其表示异议。

正如第7章第2节将要阐明的那样,有关解构和直观领悟的后现代方法论抉择并不需要表象。解构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揭示表象声言的不足(Hoy 1985a:44)。表象在认识论上是可反驳的,因为它假定有能力去再造和复制外在现实。对象被假想为直接地指向可以被表象的、外在于它们自身的事物。换言之,表象意味着,事物独立地存在于某个实在的世界中,而后现代主义者则坚信实在已经不再存在。表象某个外在世界的企图也就是断言现实是知识,是普遍,是真理,而后现代主义者反驳了所有这一切的可能性(Megill 1985:94—95;Nelson 1987:17)。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表象同样地假定,"某个个体的信息加工过程"能够实际地表象"外在现实"(Henriques 等人 1984:98)。一个"外在的自然对象通过意义或'观念'的'表象性'中介而被传达给内在的主体或心灵(Redner 1987:674)。后现代主义者怀疑这一点,他们寻求某个更主观的、非表象的现实观

念。他们放弃了任何独立于研究进程、"按照其实际存在的样子"去再现研究对象的企图。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表象蕴含着客观性,即:一个独立于正被表象的物或人的观察者(Baudrillard 1983a:20—22)。在表象的框架之内存在着一个分离的主体和客体,作为研究者的主体试图去表象对象,被研究的对象得到了再现。由于其客观性要求,表象导致了一个"对判断精确或正确的强制行动"(Rosmarin 1985:87),而后现代主义者将它当作毫无根据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判断来予以否定。

后现代主义者相信,表象鼓励概括,在概括活动中它又注重同一,因而忽视了差异的重要性。表象接纳"在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并将之归属于"全等,而否认差异"(Judovitz 1988:68,70—71)。它强调原型和被表象者的相同性。它假定了同一性,那种同一性蕴含着等价和等值。

后现代主义者主张表象总是不确定的,因为对被表象物的规定必然地取决于正在被表象之物和每一个他物之间的差异(Baudrillard 1981,1983c)。当德里达提到"差异也是同一物的一个环节"时(Derrida 1981:9),他说的意思是,"在一场永无止境的运动中,意义从来也不可能停止于某种绝对的呈现,它的明确的阐明被耽搁在从某个实质性的语言学理解到另一个实质性的语言学理解之间"(Abrams 1981:39)。当然,差异从来不可能被确立起来,因为规定被永远地拖延着。

后现代主义者于是对可靠地表象某物的可能性提出了诘难。他们指出,不要关注可概括之物、统一之物、现代世界的平常之物,而要关注差异所暗含的一切,关注决不可能被充分地表象的东西。这需要一个非表象的方法论,否则,则将一事

无成。

后现代主义、民主和表象

尽管有关政治学和后现代主义的问题是第8章的课题，但是由于民主如此密切地同一于表象概念，以至于我们有必要马上对这两者的关系作一番思考。后现代的反表象论采取了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由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提出来的，它是悲观主义的和反民主的。[1] 许多人认为它具有虚无主义、消极和绝望的特性。另一种是由肯定论者强调的，它是比较乐观的和赞成民主的形式。肯定论者赞成对表象进行积极的重构或取代；要不然他们就放弃现代政治表象（代表制度）以寻求更加直接的民主样式。

几乎所有的现代政治体系都在为成为有代表性而努力着。那些假定是被代表的人从“人民”变到“无产阶级”。[2] 尤其是某些被委任的个体、集会、党派、工会组织或其他团体都被授权去代表他人，去为他人辩护，在公共场所去发表别人的意见。假如真的像绝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在大众社会中要代表一大群个体的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是一种错乱之举，那

---

① 并不是只有后现代主义者才主张政治代表制度是一个幻想。埃德蒙·摩根（1988）提出了评论家们称之为“精英论”的来自右翼的观点；他认为，依赖于关于大众主权的杜撰的代表制度是一种纯粹的幻想。几乎没有后现代主义者会对此表示异议，不过单凭这一点并没有使后现代主义者成为保守的（参阅第8章）。

② 假如民主只是意味着“人民治国”，那么它与表象（代表制度）的联系将是空虚无力的。许多极权政府声称自己是出于所有人民的“利益”来治理国家的，在此意义上他们既是民主的又是有代表性的。

么表象危机就不可避免了，民主危机也会随之而来。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把政治代表制度理解成现代西方民主的一个象征，他们对两者都予以反对。[①] 现代代表制度被说成是对政治活动和政治话语的篡改，因为它太容易被人随心所欲地篡改。首先，大众传播媒介，"意识工业"被说成"避重就轻，主次颠倒"，说成鼓励政府工作人员的候选人对某些政治问题仅作出敷衍了事的考虑，从而导致了代表权的失真(Baudrillard 1983a)。其次，官僚政治、行政和管理在其接收政治立法权的过程中作为真正代表的替代者是有过错的。政策制定活动取代了政治决定，委员会的审议代替了公开的公共讨论(Redner 1987:674;677)。结果，人们不再感到他们"属于代表制秩序"。他们不再"谈论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大众受到了调查、测验和测试，但是却不鼓励相互之间有影响的代表制。后者在过去，在社会意义流动于"此次民意测验和彼次民意测验之间"的时候，是得到接受的东西。在今天，被遗留下来的只是一个生活在丧失了实在代表权的状态下的沉默的多数(Baudrillard 1983a)。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民主假定了代表权，由于代

---

① 后现代主义者没有天真地赋予任何单个政治体系以代表违背的属性，相反，他们把目标对准所有现代统治体系，因为它们都蕴含着强者统治弱者的情况。代表制或许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中心果核"，但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要求把代表制作为一种立法手段 (Redner 1987：675)。在代议民主制国家里，人们授权代表们在决策过程中去代表他们的要求、需要和利益（霍布斯和洛克)。按照J·S·穆勒的说法，国家被假定是"代表"人民的。但是列宁遵循相同的路线，认为先锋政党"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为它体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 (Lenin 1905：18—19；1917：403—4)。凯 (Ke 1990) 比较了自由代表制度和社会主义代表制度，发现它们在"程式上"或"实质性"的注重点上存在不同。

表权的失败，所以民主也失败了。[①] 他们由此断定，民主仅仅是大众的聚集，而不同意见则再无可能。代表制强行取得意见上的一致，遵循少数服从多数规则的民主制度控制着少数人和那些持异议者的意志。

由于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坚持反表象(代表)和反民主的观点，他们因此甚至受到了同他们一样对现代性持批判态度的人们的全面批判(Cahoone 1988:228)。假如后现代主义者寻求以"创新"取代艺术中的表象(Graff 1979:23)，那么在政治学中，他们将以自我主义、享乐主义、个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表现形式取代为代议民主制所必需的更加实用的、议院式的动员形式。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由于没有支持政府和决策的参与形式而受到了批评。自然，民主有其不足的地方，但是假如真的抛弃了民主代议制，如某些怀疑论者所希望的那样，那么将更有可能导致诸如权威主义之类的后果。怀疑论的后现代的反表象观点被归因于后现代个体的过分发展、"过分受到保护"的自我感。他(她)无法接受他(她)可能被任何一个他者所"代表"的事实。沿着这条路线，列波韦茨库断定后现代人格从根本上说是反民主的(Lipovetsky 1983:141—43)。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将代议民主制批评为不适当的和不可信赖的，"低劣的和派生的"，它使统治政权合法化了。但是他们又赞成"政治自决和自由"(Redner 1987:676)；这样，当

---

① 反民主的情绪在今天不只局限于后现代主义者。前几年举行的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庆祝活动出版了有关这个课题的许多重要著作，对民主流露出了深刻的忧虑。民主社会运动的潜流，独裁主义，甚至极权主义，是人们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例如，可参阅 Furet and Ozouf 1988)。

他们谈到民主的丧失或死亡时，他们是带有惋惜心情的。其中许多人赞成更直接的民主形式(Walker 1988a)。他们要求"深化民主"(Walker 1988b:116)，要求更广大、更有意义的可靠自治，其中，广泛的民主参与是可能和有意义的。民主必须做到名符其实的"授权"(Walker 1988b:140)。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是反表象的，他们对于直接可信的民主的要求同他们的其他立场是一致的。终结作者(权威)的要求和坚持多重理解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是真正民主的。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否认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独占真理，可是现代代议民主制的各种看法却保证选举的优胜者独占着真理。就在判断艺术、音乐和文学方面抛弃了专家的作用而言，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是反精英主义者。他们要求，民众不以国家为中介而控制着国有资源和社会资源(Aronowitz 1988a:48)。他们提倡作为地方自治的直接民主——在那里，每个公民都可以参加政治讨论，因为这有助于小团体本身的发展，[1] 后现代社会运动借助于它才得以蓬勃开展起来(参阅第8章)。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强调自由选择。开明、宽容(Nelson 1987:10)、自由、人格主义及某些形式的个人主义(Lipovetsky 1983)。他们把这些概念理解成同后现代的民主样式相匹配的东西，而那些民主样式可以包括合作和集体的社会形式(Lipovetsky 1983)。假如这些集体不妨碍个体的自由(Corlett 1989;Harvey 1989:351)，并且因而不剥夺后现代个体的自主

---

[1] 保守主义者以种族、宗教或民族主义为根据来看待小团体本身的过分发展，把它视为对代议民主制构成威胁的一个源泉(Himmelfarb 1989b:25)。

权的话，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是会予以赞同的。

表象、公共场所的表微和后现代主义

公共场所理论，即有关独立于私人场所的公共场所是一个健康政体的本质要素的见解，之所以引起后现代主义者们的兴趣，是因为它并不需要表象(代表)，还因为它也对现代代议民主制持批评态度。不过，对于公共场所理论的各种后现代反应在揭示政治表象和民主之间的重大的内在差异方面是有所不同的。有些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主张复兴某种区别于私人场所的公共场所；他们希望由此走向可靠的后现代民主。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怀疑论者对此持有异议。

我们先从哈贝马斯(Habermas 1974，1989b)对于公共场所理论的描述谈起，因为这种描述最为频繁地引起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兴趣。[①] 然后我将提出对于公共场所理论的各种后现代反应。

在历史上，供人相互交谈、不同于私人场所的公共场所并不承认表象，而只承认引人人胜、受过教育和表达清晰的公民，他们看上去超越了个人的自我利益和私人话题而强调一般的善。在民主国家中，一个健康的公共场所的存在意味着各种决定是理性的批判性争论、主体间的沟通(交际)的结果，在公开场合人们面对面地展开讨论，其见解也在此得到了公开的评论。公共场所承认，政治权威将根据理性批判主义而

① 哈贝马斯自己承认这是一个理想化的、决不可能实现的概念(Habermas 1989b)。参阅卡尔霍恩(Calhoun——Forthcoming c)对哈贝马斯的《公共场所的结构转换》一书所作的概述。

得到判定(Habermas 1989b)。

在公共场所中一定得每个市民都参与、甚或他(她)一定得被代表的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公共话题感兴趣的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讨论,有关某话题的最广泛的见解都可以被提出来,证明和争论的规则得到了自觉的应用。这种活动寻求有关社会需要以及最佳的国家政策的一个明智而深思熟虑的协议。公共场所概念假定:私人个体自由地参与其间的公共对话和公共评议,通过交换意见,可以向真理趋近(Habermas 1974:55)。结果是,各种不同的意见得到了调解——如果不是达到了(完全的)一致的话,至少也是取得了大体上的认同。

但是在今天,有些公共场所的理论家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讨论场所,一个不同于政府部门的领域,公共场所受到了威胁(Agger 1990:29)。公私之别据说正在瓦解。假如公私不分,那么公共场所就不再起作用,对于政府范围的问题的不偏不倚的评价便不再可能。在过去使合理讨论成为可能,并保证了公共场所(言论自由、集会和交往)的完整性的那些机构今天正在暗中损害着它。[①] 就其在现代民主中的发展而言,表象的失败对公共场所的衰微负有很大程度的责任。

哈贝马斯主张,现代表象之所以一直对立于健康的公共

---

① 例如,大众传播媒介的角色不再是向公众传递政治事务方面的信息,不再是促进公共场所的活动。它丑化了公共争论并且把政治学转变成剧场和娱乐(Habermas 1978)。由于人们内在化了传播信息,所以大众传播媒介就取消了私人和公共之间的区分,它变成了他们的现实(Kellner 1989b;Baudrillard 1983c)。被认为是适合于公共讨论的问题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对被认为是有破坏作用的观念的限制"也增加了,因为媒介是根据情绪和形象来确定政治问题的(Bauman 1986—87:90)。今天,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只是保证参与和综合,它不具备独立于私人场所的一个健康的公共场所的功能。

场所的生存有几个原因。现代立法机构和国会不是用以各抒己见，批评和争论的公共场所，因为现代代表是受人委托的。他（她）只不过是复述了或维护了某个先人之见而已，那个见解要么反映了选举他（她）的那些人的集体私利，要么反映了支持候选人取得选举胜利的财政资助者们的集体私利。今天的代表的作用是阐述其选民的各种要求，它可以是政党、某势力集团、劳工组织，等等。[①] 代表制变成了"诸种利益的转换器"（Habermas 1974：55）。立法机关变成了剧院，为宣传提供着各色讲坛。富有意义的意见交换已不存在，人们思想的改变并不是对于不同观点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的结果。

按照公共场所理论的推测，现代代表制所得出的结果不是探寻真理的最佳捷径，也不是有关诸议题的合理考虑。相反，一个对于集体私利的调解以在两个竞争的有机利益之间妥协的形式产生出来了。这种调解的基础往往是秘密的，几乎很少得到公开的评论。没有人为普遍利益负责（Bauman 1987）。妥协取代了正当的真理（Habermas 1989b）。[②]

---

① 这种代表，就其发挥作用的程度而言，是不完备的：首先，并非所有的个体都得到了各种团体的代表，而且还存在着那些"不完全地被代表的"人们（Habermas 1974：34—35）。

② 这位作者持有如下观点：在代表和某个活跃的公共场所之间实际上不存在内在的矛盾。在西方历史上，独立的公共场所曾经风行一时，当时个体代表他们自己，至少对那些有机会影响决策的部门来说是如此。某些条件一旦成熟，代表肯定可以对今天的公共场所的增长有所贡献。代表们必定能够合乎他们自己良知地去追求共同的利益，从而不受拘束地去形成并表达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去考察各种政策后果。国会或立法实体会不得不作为一个由智囊们组成的团体发挥作用，他们的作用在于考虑什么东西是最有利于所有人民的。代表们会代表着广泛范围的不同意见。争论和讨论必须是公开的而不是秘密的；是博采众长而不是囿于一个经严格限制的市民团体之内的。

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问题在于，某个可靠的公共场所的存在是否能促进无代表的后现代政治形式，以及这种做法是否可取。肯定论者为公共场所的衰微而痛惜，但是很少有人把它同表象的危机联系起来。有些肯定论者到日常生活经验中去寻求慰藉，希望即使在公共场所分崩离析的情况下，私人场所仍能够保持其私人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每一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只代表他自己，对于代表的要求便消失了。那些致力于政治计划的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是要求某个公共场所的最热心者。他们赞同公共场所理论将重点放在真正的参与上。他们要求把公共场所的地盘扩张到现代代表成为多余的那些领域。这样，所有公民都可以到公共场所亲自参与批判性的争论活动(Harvey 1989:351)。这一点可以通过增加场地来完成，在那些地方，诸决定是在社团层次上制定的。有些肯定论者把对于新民主形式的要求同对于某种“公共空间”——它作为日常生活的一种表达，独立于政党和州——的革新联系起来。但是他们又告诫说，只有当整个社会愿意为诸论题、诸要求和诸冲突担负责任的时候，这才是可能的(Melucci 1990:6)。那么是否需要某种代表形式以保证这项计划的成功呢？当阿格(Agger 1990)要求某个通过“公共之声”而向所有的人敞开的公共场所时，他的言下之意确实如此。公共之声鼓舞着对诸种声音的某种代表。它反对精英文化，鼓励作者和知识分子都以“新的声音”，一种具有更加广泛基础的自由的行话语言来沟通其思想，并且全心全意地投人到创造一个民主的公共场所的行动中去。[①]

新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有的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关系密切(参阅第8章)——要求创立一个自主的公共场所，

在其中主体间的沟通仍然是可行的。他们指出，这些场所不应该由利润和市场来控制，它们的功能不在于认同政府的合法性（Habermas 1987a）。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对公共场所理论持有更多的保留意见。[2]他们怀疑在一个后现代时代里公共场所得以复兴的可能性，即使可能的话，他们对其民主愿望仍表疑虑，他们把那种愿望视为幌子。他们认为公共场所是现代压迫的一部分，因为在公共场所中的讨论依赖于“强权”。这种讨论是“斗争”的一种形式，比较强有力的主张总是获胜。各种见解不得不屈服于某个“被决定为”是“更优秀”的见解。他们指出，公共场所理论体现了启蒙思想，因为它假定错误的主张是谬误、坏信念、荒谬逻辑的结果，在公共场所的讨论中最后总是假定某人为“胜者”而其余皆为“败者”。公共场所里的花言巧语尽是对竞争的掩饰和忽略，而此种竞争将导致某一方的衰落和灭绝。最后，怀疑论者批判了公共场所理论的如下假定：即便败者也是胜者，因为败者赞同那些规则，并且通过其失败而巩固了社团。

这样，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就把公共场所的“对话思

---

① “民主化专家语言彻底改造了语言，也就是克服了平凡的话语同在此以前一直由好猜忌的专家们垄断的某种更加纯粹的代码之间的差异。”阿格的希望是这种活动能够“促使这些反应迟钝的读者成为作者——公共的人物——本身”（Agger 1990:215,219）。不过，阿格并没有对这项计划的可能性抱着幼稚的想法。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出版活动的政治经济阻挡了知识分子去撰写与公共场所相关的文本（1990）。

② 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也批判了公共场所概念。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太偏向于资产阶级，它忘记了不平等。女权主义者认为它是一个十足的阳性概念（Fraser 1989:117—119,165—69）。

想"作为"迂腐的理想主义"来拒绝(Sloterdijk 1984:199)。这场对话牵涉到某个关心政治论题的、独立行动着的现代主体。怀疑论者怀疑现代主体的可行性对于公共场所是否真的如此必要。怀疑论者强调主体的私人体验是终极实在,公共空间是人为建构(Barth 1980:69)。他们的后理代个体从公共谈话中抽离出来进人到私人的个人场所,他们这样做或是凭借爱好,或是由于对公共的政府机构和社会福利系统缺乏信任。存在着某个"对于个人的诸种关切的一般私人化过程"(Bauman 1987)。在一个后理代时代里,基于其个人的亲身经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保存下来的只是个人意见,是默默无闻、疏远陌生、不为人知并用来使市民相分离的大众政治学。集体已经不再是个人和政府之间的中介。人们都是孤立的。他们喜欢看电视,而不喜欢高声朗读,不喜欢与亲朋好友交往(Lash and Urry 1987:297)。[①]

最后,怀疑论者批判了公共场所理论,因为它假定了进行有效的主体之间的沟通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成功的沟通,公共信息向公民的传通以及有关公共论题的小组讨论将是不可能的。由于怀疑论者强调语言和符号的相对性和主观性,所以他们反对对于公共场所理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那些假定。

---

① 一些左翼的后现代主义者希望有助于促成某个后现代社会的这些趋势或许会导致公共场所的复归。日益增加的大众媒介消费量可能会增加对于公共争论的各种问题的曝光。它可能既增加了公民对于公共权力的知识又提高了政治效率。通过摧毁个别的特殊化实体,它可能鼓励普遍主义(Lash and Urry 1987:297)。有的人甚至在后现代主义自身的大众主义中看到了有希望的和民主的迹象。他们说,在支持增设地方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地方性报纸,扩大电话和传真服务,发展自我表达的新形式(即新的小团体形式,电脑布告台服务)方面,这种大众主义是民主的(Lipovetsky 1983)。

此外，公共场所理论特别重视合理性和理性，而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对这两者也都表示了怀疑。

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家们指出，尽管对表象有着某种一般的共识，但后现代主义者和公共场所的倡导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在一个充塞着陶醉于自我的后现代个体的世界里，公共空间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个体来说，期望值的提高意味着其遵守“公共谈话规则”的可能性的减少，对如何将“规则”置之度外以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的关心的逐渐增加(Sennet 1977:334—36)。如果要保存和振兴公共场所，就必须给予个体更大的选择；他们必须接受更大的责任，那是陶醉于自我的后现代个体予以回避的东西。

有人甚至认为，公私两方面之间的溶合和共同瓦解是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原因。随着体系责任的减弱，随着价值观念日益被认为是相对的，随着消费主义的蔓延，人们对私人场所给予了更多的投人。个体对公共场所的消失感到不满，他(她)离开公共事务，向内转，转向日常生活的琐事。但是，作为实体的私人场所也正在消失中。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指出，留下来的只有虚无。在这种境况下，在这种观念氛围中，后现代主义泛滥了起来。

后现代的反现象论对于社会科学的意义及其例证

终结表象秩序的后现代要求向所有的社会科学提出了方法论的问题和实质性的问题。并且在描述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比较分析方面都带来了困难。我在此提供的实例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

就社会科学家试图按照他们表象它的样子来“描述”社会世界而言，他们的努力受到了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诘难。对后者来说，建构这些描述的任何努力都将注定要失败。如果放弃了此类表象的勾画活动的可能性，怀疑论者显然既无力描述社会世界，又无力构筑有关它的理论。因为这两个过程都假定了表象。肯定论者乐于承认的是：在社会科学中作为描绘活动的表象很可能是不完备的(Jameson 1984a，1988)，但是他们仍然相信努力去表象社会世界的活动是值得的。这种姿态使得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能够继续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从事以某种更加温和的形式进行的、有赖于表象的各项活动：描写、解释和理论建构。

对于表象可能性的摈弃活动有损于一般的现代社会科学方法。不过这种活动对于比较分析的诘难尤为彻底。这种努力揭示相似与差异的比较活动正是一项毫无意义的举动，因为后现代的认识论认为，不可能对那些被比较或被连结的因素作出适当的规定。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对于概括之可能性的保留意见，对于差异的强调(如本章第 2 节讨论的那样)，构成了摈弃比较方法的基础。假如，像他们得出的结论那样，每一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Latour 1988：179—81)，那么在研究和解释相似性和差异性的企图中，比较方法就是无效的，因为它假定了某些维度的一致性(根据另一些变量假定了一定程度的相等性)。[①]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也对语言学表达提

① 理查森讨论了涉及到比较的困境。他试图以后现代叙述的口吻来写作，以便突出每个被研究个案的独一无二性，避免表象上的假定；但是他根本无法谈论任何集体的故事(Richardson 1988：205)。

出了诘难，而任何比较性陈述都必然地建立在那个表达的基础之上。他们还指出，比较分析提出了有关在场和不在场的各种假定，这也是引起争议的一件事情。

人类学领域对要求终结秩序或表象的后现代呼声尤为敏感。有些人类学家把整个后现代挑战都归结为这一表象危机。这样，在人类学领域里，存在着一个范围广泛的问题，它涉及到“描述社会现实的适当手段的不确定性”（Marcus and Fischer 1986：8）。这个问题是这门学科的根本，在此，如此之多的东西依赖于精确的描述，依赖于在学者发现之物和“实际存在”之物之间的某种吻合程度。在人类学中，这意味着描述（再现）别的文化并形成关于它们的理论的可能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了（Rabinow 1986）。不过它也牵涉到对于下列问题的认识：某人种史学者对于其他文化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才是适当的。[①] 在人类学中，作为由后现代反表象论观点激发的内在骚动的一个结果，在人类学家和人类史研究者应该如何书写其他的社会的问题上发生了变化。例如，在这些领域中，有些后现代主义者完全回避使用“表象”（再现，represent）一词；他们以为自己的目标仅仅在于“唤起”（追忆，evoke）。唤起优于再现，因为它被假定为具有使人们摆脱对象、事件、描述、概括、实验和真理的作用（Tyler 1986：129—30）。这种解决办法或许不能让所有的人类学家都满意，因为它蕴含着对于专家权威的彻底抛弃的意思（Marcus and Fischer 1986：8）。

---

① 诸如此类的问题据说要“本质化，因为它们就产生于他们正着手予以质疑的那些模式中”（Bove 1990：53）。

社会学也经历了一个后现代泛滥的阶段，经历了一场关于表象问题的性格认同危机。[1] "整体性的洞察被对于上下文关系、例外、不确定因素及一般的意义的关切所取代（Richardson 1988:200）。一些后现代社会科学家通过彻底放弃理论建构活动来解决表象危机，因为理论建构依赖于时下暗昧的再现能力（Seidman 1989）。后现代的反表象导致其他社会学家降低他们为其学术研究所制定的要求，即把社会学活动变为"讲故事"（构造小型的叙述），而不是研究活动。它变成了一项"讽喻的"或文学的而非科学的活动（Richardson 1988:200—204）。这种策略有其可取之处：假如某人简单地拒绝作出任何知识主张，那么他不会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假如某人抹煞了科学和文学之间的差异，那么他也不会因其不"科学"而受到现代同事们的谴责（Clifford and Marcus 1986:4）。

由一些后现代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出来的另一个策略涉及到抹煞表象主体和被表象研究对象之间的界限。他们提出"到人民中去"并且完全让人们"发表自己的意见"的策略（Partt 1986:32）。这个策略旨在结束"客观性的幻想"并削减对表象的需求。但它可能与其说是解决了表象危机，不如说是把表象的包袱从研究者身上移到了"人民"身上。

后现代的反表象指定了政治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内容的方

---

[1] 在法国，皮埃尔·布尔迪厄较早地预言了社会学领域的表象危机，尽管他几乎没有被当作是一名后现代主义者。早在北美的社会科学家们注意到它以前，他就在他的工作中利用了德里达的认识论、概念和词汇（Bourdieu 1984，就是一个例子）。就在布尔迪厄醉心于表象的两难状况——这种状况是由法国后现代文学团体揭示出来的——的同时，他仍然坚持他的批判的实证主义调查研究方法论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叙述的某个意识形态上的承诺（Bourdieu 1984:482—84）。

向，诸如在民主方面，尽管不是在独一无二的、单方面的方向上确定下来的。[①] 正如怀疑论者提出的那样，后现代的反表象论削弱了对民主的信心，取消了对代议民主制所具有的任何常规偏爱，提出了对涉及代表的平等性的改革斗争的质疑，并且不支持新形式的民主实验。它几乎驳斥了任何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对于现代西方代议民主制形式的卫护。转向公共场所理论的肯定论者同样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在公共场所进行批判性争论和讨论的要求显然非常苛刻，以至于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满足它们。公共场所理论虽然克服了代表制的缺陷，但是它也容易遭到精英论的指责。

在政治科学领域里，后现代的反表象论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极端的怀疑论后现代政治理论家们要求终结"表象的秩序"(或代表制度，Order of Representation)，这包括了代议民主制度。他们对民主所持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按照最近的世界事件来看，显得非常不合时宜。许多以前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最近已经选择了代议民主制。现代西方民主的确有其弱点和缺陷，不过像某些怀疑论的后现代政治理论家那样全盘否定它就显得有些天真了。一些肯定论的后现代政治理论家呼唤直接的民主，但是他们对于能够使民主成功地被应用于广大社会的那些细节和手段不甚了解。许多后现代政治学家，作为"实在世界事件"的结果，都面临着一场信念的危机，它仍然有待于人们去予以解决，并且给予直接的关注。

---

① 在政治科学领域，后现代的反表象的影响显见于一整代新生的政治理论家们的著作中(威廉·康诺利是一个例子)。对于其政治理论生涯开始于60年代的一些学者——诸如默里·埃德尔曼，迈克尔·夏皮罗和亨利·卡里尔——来说，它有助于重新确立他们的学术成果的方向。

7 认识论和方法论：后现代的抉择

"我总是一意孤行，企图发现某个类似于秩序的东西，我要是早知道宇宙间根本不存在秩序就好了。"

"不过在想象某个错误的秩序的时候，你还是发现了什么……"

——Eco 1980：599

在这一章里，我将考察关于被人通称为"根本"问题的后现代观点，并勾画出这些观点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我们何以知道我们知道的一切，我们何以去造就知识；知识自身何以构成，后现代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大部分传统解答都极不相同。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摈弃现代的科学现、认识论和方法论。他们几乎不相信理性，不承认评价知识的传统标准。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在反对有关这些论题的现代看法时，尽管没有那么激进，但他们的确对之统统都提出了进行根本性变革的修改意见。在这里，我提供了一个对

法律研究基础作后现代解构的例子，并考察了缺乏理性和合理性的后现代策略的不可能性。

认识论：现代的和后现代的

受自然科学的鼓舞，通过假定某个独立的现实并要求理论的被检验，现代社会科学试图在认识论假说和反假说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相比之下，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围绕着主观的、直观的和认识论方面的事务来组合知识。它们通常是受到启示的解释学[①]。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则实践着"认识论的不可能性主义"或者"一种无处不在的、极端的、无法克服的不确定性，一种认识论上的虚无主义"(Calinescu 1987:305)。

一种关于实在、无实在和非实在的理论

正当现代社会科学努力地发现和描述它所谓的外在实在的时候，后现代主义者却指出，不存在再现外在实在的适当手段。现代社会科学对于晚近的"外在实在"信心不足而谨慎有余，个别哲学家甚至认为，它只有在常常处于变化之中的范型假定的范围内才能被理解(Kuhn 1970)。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否认任何种类的假定独立于个体精神过程和主体间沟通的实在观念。许多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甚至拒绝参与讨论实在的本质；他们要么怀疑实在观念必须存在的理由(Fokkema

① 认识论务必涉及研究的性质、有效性和局限。在这里它还包括诸如现实之本性之类的本体论维度。

1984:45),要么主张实在观念即使存在的话,它也是"科学活动的结果而非科学活动的原因"(Latour and Woolgar 1979:153,183,236;1988:159)。"有一点务必说清楚,我们的任务不在于提供现实,而在于发明各种(隐喻的)谈论方式以便使无法呈现的事物可以被料想到"(Lyotard 1984:81)。正是这种实在建构观念蕴含着某些谈论方式是"有效的而其他的则是无效的"(Edelman 1988:6)。

鲍德里亚提供了有关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实在观的一个绝好例子。因为他在他的《美利坚》(Baudrillard 1989a)旅行日记中指出:不存在真实的世界。迪斯尼乐园之所以可信是因为它并不希求成为真实的;迪斯尼乐园外面的每一事物,即使被认为是真实的,也只不过是一些影象,一些"假象"罢了。在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符号并非是实在的表象,相反,它造就了实在(Ryan 1988:565—66)。它们"创造性地、混乱地和不负责任地"工作着。后现代的符号通过扩张"每一种在社会上受到控制的系统"而颠覆了现代的符号,并且克服了"受控制的意义系统"(Harland 1987:124)。

肯定论的和少数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赞同建构主义者的实在理论。他们放弃了在精神状态和作为纯粹幻觉的外在世界之间作出区分的努力。"就心灵提供着知性范畴意义而言,除了那些人的精神特性内在所固有的东西以外,不存在实在世界的研究对象"(Gergen 1986:141)。物理世界是梦幻。当一个人"从那个物理世界的'梦幻'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会认识到做梦者是"诸事件和诸关系的原因。意识之外的集体的或普遍的精神是个别精神所体验的世界的创造者"。我们在这个"实在的梦幻"中度过了我们的绝大部分生命。任何

一个事件，一旦脱离了由知觉它们的人所赋予的意义，便是非实在的（Edelman 1988：2）。人类和上帝“共同创造了宇宙”（Harman 1988：125—26）。

一个关于实在的上下文主义理论对于这些后现代主义者来说也是重要的。现代人种学的方法论学者引发了这种观点，不过像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 1989：34）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通过主张如下见解把它提升到了某个重要的位置：所有的知识主张（所有的事实、真理和有效性）只有在其上下文、范式或“社团”内部才是“可理解的和可争辩的”。它们仅仅是在专业社团中所达成的协议的结果。实在是在某个特定上下文中被接受为正常的那个社会过程的结果。[①]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也提出了一种实在理论：他们将其视为语言学上的约定（Eagleton 1983：105；1985）。假如语言自身是相对的甚至随意的，假如语言是我们知道的唯一实在，那么实在至多不过是一个语言学的习惯而已（Murphy 1988：179；Flax 1990：35）。“不存在可以独立地被辨认的、真实世界的所指，关于社会描写的语言同它们紧密地连结在一起”（Gergen 1986：143）。在后现代时代里，甚至自然科学也是“一个散乱无章的领域，其中诸前提本身就是成问题的”（Aronowitz 1988b：432）。它仅仅是一个论域，一种以论述活动自身为唯一根据的辩术（Latour 1987）。这种论述采取权力游戏（Seidman 1990）、斗争、唇枪舌剑、施加压力、进行游说和其他手段的形式以便赢得支持，

① 怀疑论者否认上下文在解释中的任何作用，结果导致了绝对的不确定性。他们所偏爱的方法——解构（本章下面将予以评价）——就假定了上下文是不相关的（Himmelfarb 1989b：665）。

它"招兵买马",调兵遣将,其目的在于确保对于"产品"的智力垄断(Latour 1988:182—84)。没有一个外在实在是真正地作为终极"仲裁者"而存在的(Latour 1987:37)。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更喜欢上下文的和建构的实在观,因为这种观念同其认识论观念比较吻合,他们不同意那种绝对的语言学相对主义。假如社会科学真正值得人们为之努力的话,那么它就应该不仅仅是"一个语言习惯"(Griffin 1988a:20—30)。后现代的社会科学需要这样一种实在理论,它是有能力的,它使内容成为可能,尽管它是"软性的",临时的和情感性的,有些人会说那个实在在哲学上是唯心主义的,相对的和主观的,而不是实证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或客观的(Redner 1987:676;Lambropoulos 1986:50;Bauman 1987:4;Hare-Mustin and Marecek 1988:455—56;Harland 1987:177)。

后现代的实在观由于同唯心主义哲学的实在观具有某些相同的缺点而受到了责难。批评家们指出,对诸如某个独立实在是否存在之类问题的争论只对这样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和其他知识分子)来说是重要的:他们与现实隔离,从未亲身经历过现代社会中频繁发生的暴力、恐怖和堕落。批评家们指的是某个"显然存在的现实"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呈现,那个实在集贫困、饥饿、爱滋病、吸毒和火并于一身。只有在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及其现实既温馨又赏心悦目的情况下,他才会感到实在完完全全地是一个心灵的建构。①

现代的预见性和因果性或
后现代的互为文本关系

互为文本关系是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的因果解释的一个常见的后现代的代用语。现代社会科学一直假定因果性和预见性是解释所必不可少的方面(Feigl 1953a:11);[②]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因果性和预见性都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他们主张,对于时间上的优先性的要求,对于由这些概念所假定的独立的外在现实的要求都是令人怀疑的(Edelman 1988:2)。绝对交互作用的互为文本关系蕴含着对于直接因果关系之可能性的一个强有力的否定。因为在一个每一事物都以一种绝对交互作用的方式相关联的世界里,因果性所必需的时间上的优先性几乎是不可能确立的。

后现代的世界被说成是"互为文本的",对于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人们研究的每一个事物都是相关

---

① 对于在极端意义上的后现代实在观的荒谬性,夏皮罗(Shapiro 1989a:20)举了一个例子。他似乎说过,在现代社会里,由于"经验和知识"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间距,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依靠"知识代理者"来联结这两者。结果,"有兴趣将他们的恐惧与危险处境联系起来的那些人不得不成为由机构提供的表象的消费者,那些机构拥有制造关于危险的各种解释的合法权"。因此,他继续说道,恐惧只是间接地为人所知,它是不可靠的;恐惧自身是"有争议的",因为它仅仅是表象的。不过,当然,那些生活在各种危险——被谋杀,被绑架,在武装冲突时被射杀的威胁——之中的人是无暇考虑恐惧的"有争议性的",他们也不需要以"知识代理者"为中介来体味恐惧,他们只要看着周围邻居的遭遇就知道恐惧是怎么一回事了。

② 曾对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现代科学是以一个可预测的、被决定的世界为前提的,这个世界可以被理解成一个因果关系的系统。据此,某些自变量被假定为用来预测在某些已知的统计性限定之内的因变量的手段(Hoover 1980:76—78;Nachmias and Nachmias 1976:第11章)。在这个模型内工作的人承认,要完全掌握所有因果变项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要努力暂时分离出最重要的变项,并且作出关于某特定现象是如何联系的一个一般性假定。各种因果联系通常以因变量在时间上的优先性为根据,它们是陈述性的。这个程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据说是有效的,因为在任何一个结果里只有少数几个变项构成了总变量中的最大比例(Grunbaum 1953;Hoover 1980:第4章)。

于每一个他事物的(Latour 1988:163)。[①] 在怀疑论者看来,世界是如此地纷繁复杂、杂乱无章和相互纠缠,以至于谁也不可能理出些头绪,不能对前进的方向给出确定的看法,也不能就在我们周围活跃着的那些力量之重要性发表恰如其分的见解。"一只今天在北京拨动空气的蝴蝶下个月在纽约可能掀起轩然大波"(Gleick 1987:8)。[②] 每一个文本(事件)都相关于每一个他文本(事件),这正如我们在第2章所解释的那样。在极端意义上,对于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而言,没有一种解释是可能的,因为每一事物要么都是不确定的(Fokkema 1984:45),要么就都处于如此密切的互为文本关系当中,以至于无法理出头绪来(Laour 1987)。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否认蕴含在唯物主义哲学观中的因果性。所以,他们反对诸如下述主张:"一旦机器运转起来,人们就将被说服。"他们反对围绕阶级斗争观念——它包括如下看法:现代社会科学是服务于资产阶级(资本家)并压迫工人阶级的——而展开的左翼因果解释。但是他们同样坚定不移地反对唯心主义的这个论点:"虽然相关的人们

---

① 帕维克的一本以《哈扎尔语词典》为标题的小说是关于"互为文本的"小说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1988)。每一事物都可以穿越时间(若干世纪)、并不顾棘手的地理障碍而相关于每一他事物的。正如他所吹嘘的那样,这部小说的后现代的互为文本关系的终极"证据"是,读者可以打开他的小说并开始阅读,而不管从哪个部分开始,这部小说都是一样的令人满意。后现代文学假定,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因此一个人从哪里开始或结束某次后现代阅读活动是没有什么差别的(Barthes 1975)。

② 在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些观察证明了理解复杂性的不可能性,而现代科学家们则认为,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这个挑战可以通过提出相宜的(混沌)理论来解决(Gleick 1987:3—8,30,56,118,153,211,240,299,300;Holden 1986;Prigogine and Stengers 1984)。

都被说服了，但机器还将运转”（Latour 1987）。因果性蕴含着这样的思想：社会科学是一个人类的建构。这个思想同如下思想是均等的：社会科学建构了人类。例如，利用社会科学研究技术必然地要求遵守其科学的“规则”，这样，反过来，人们是由研究事业所“建构的”（Latour 1987）。就作者必须同出版业的政治经济制度保持一致而言，著作“写就了”其作者（Agger 1990：218）。甚至像巴斯德氏杀菌法这样的科学程序也被说成是重新创造了社会的和智性的生活，因为细菌、病毒变成了离开实验室进入社会的社会活动者（Latour 1988：第2章）。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为某种软弱的互为文本关系形式增加了目的论的解释。他们比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更有可能把互为文本关系视为表示关系的东西而非完全的杂乱之物。目的论解释旨在把无意义过程重新引回到社会科学之中去(Harman 1988:123)。在这些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解释采用了有意图、有目的的人类结果的复杂形式,其目标指向某个允许考虑无意识过程(深层直观)的终极,它们比现代社会科学的那些形式更具整体性(Griffin 1988a:20—30;Harman 1988)。

后现代的方法论的假定是不同于现代社会科学的那些形式的,后者假定了预见性和确切的可能性陈述。这样,假如后现代要到现代社会科学那里去寻求方法论启示的话,他们肯定会找到诸如系统分析或结构分析这样的方法。在那些方法中,互为文本关系是法则,而预见性模型则是次要的。[①] 但是

① 有些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事实上确实运用了系统分析方法(参阅Capra 1982)。

后现代主义者不限于从现代社会科学中有所借鉴。正如我在下文中将予以讨论的那样，无论是他们对于解释的解读，还是他们的解构观念/发明(杜撰)都为互为文本关系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相对主义和客观性——价值观念的作用和研究中的规范性

有一系列与价值观念和规范问题相关的观点都出现在现代社会科学之内。人们通常假定，价值观念不应该影响研究活动，研究应该是不偏不倚的，研究者应该是超然的。与此同时，人们又承认，舍弃所有合乎常规的价值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研究者必须使它们清楚明白，以期这样能够提醒读者注意它们的存在。

后现代主义者赞成价值观念、规范问题、感觉和情绪都是人类智力产品的一部分。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断定，任何一个特殊的价值系统都不可能被假定为优越于另一个价值系统。在某些怀疑论者看来，这些伦理选择甚至不可能作为一个道德人的规范选择；它们只是一个语言的类型，一个建构（De Man 1979：19，206)。怀疑论者没有从研究活动中取消价值观念；相反，他们认为所有的价值观念都是旗鼓相当的。因此，没有什么特权可以被归之于任何一个特殊的观点。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主张，大多数合理的价值体系都未必蕴含着伦理相对主义。既然存在着不同系列的价值观念，那么就有充分理由去论证在给定的情况下哪一个价值取向是比较可取的。正如肯定论者所者到的那样，事件、意义和

价值不可能被看作是互相独立的东西。当然，后现代社会科学的这种见解留下了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哪一些特定的价值观将被溶合于社会科学之中，因为肯定论者在他们喜欢的价值观方面并没有达成共识。

现代社会科学追求客观性而回避相对主义，而后现代主义者则是反客观主义者，有的甚至投入了相对主义的怀抱。[①]肯定论者号召“人类精神返回”到认识论的记事簿中去（Aronowitz 1988b：535）。怀疑论者则主张，放弃客观性本身就是一个成熟而又宽容的标记（Edelman 1988：5）。假如现实是一个语言学的约定，那么意义和知识就只能是相对的（Wortman 1987：171）。有的后现代主义者走得如此遥远，以至于断定后现代主义自身是“相对主义的联盟与堡垒”（Heller 1987：177）。例如在人类学领域中，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相对主义是一个受到欢迎的信念（Marcus and Fischer 1986：32），因为它承认在他们的研究领域里“没有一种文化传统可以分析性地包括另一个文化传统的论述”（Tyler 1984：328）。

与规范和价值观念的情况一样，肯定论者也是既不满意于极端的客观性，又不满意于相对主义。结果，通常是为了寻求妥协，有的肯定论者采取了一种具有内在矛盾的立场。例

---

① 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后现代主义者，心安理得地被人称为相对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不过北美和英国的后现代主义者更愿意同相对主义，至少是同极端的相对主义保持距离（Dear 1988：11）。后现代主义者回避诸如此类的术语还有别的理由：此类术语通常是作为明确的二分法而被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种二分法自动地蕴含着等级制和双方中某一方的优越性。

如，女权主义者和生态学的后现代主义者对于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和反客观主义抱着一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当讨论转向他们自己的特殊团体时，情况尤其如此。女权主义者欢迎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的后现代主义批判，欢迎它对于男性见解的特权地位的否认。但是他们又谴责后现代主义者没有赋予妇女的呼声以特殊的权威；他们认为，在“强暴，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的个案中，存在着事件和“表达”之间的差异。这些经历的受害者的叙述“不完全是把某个纯粹臆造的意义任意地强加到另一个否则便毫无意义可言的实在上面”，他们警告后现代主义者不要“完全抛弃外在的现实……也不要完全抛弃理性判断”(Hawkesworth 1989:555)。在接受某个后现代哲学的相对主义形式同使它具有某个非常现实的信念以便对一个客观现实发起挑战之间，后现代的女权主义者面临着一个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处境。

后现代的组织研究揭示了关于价值观念的这种诘难和相对主义对社会科学所产生的各种后果，即：它与其说是导致了建构不如说是导致了批判。在这个领域里的后现代主义者指出，现代方法通过将不言而喻的假定强加于基本问题和规范问题的途径，而使所有那些会对它们提出挑战的人“沉默”下来(Arrington and Francis 1989)。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他们的领域是“不确定的”而非“科学的或客观的”，他们号召对学科的“诸信念”来一次彻底而全面的重新审查(Arrington and Francis 1989:1)。

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家们攻击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价值均等主义。这些批评家把怀疑论者的观点解释成对于道德中立的辩护。后现代主义者“无法为他们的常规判断提供根

据，而那些根据可以作为他们同与其出发点有异的人们进行讨论的基础”(Calhoun forthcoming b:44)。批评家们认为，假如所有的规范和价值观念都是相等的，像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声称的那样，那么就不可能取舍和比较各种价值观念，不可能在两种道德抉择之间作出挑选。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者无力阻挡“对于财富和权力的贪婪追逐”(Cantor 1989:2368—69)。此外，如下假定显得非常荒谬：道德选择是不可能的，在诸如善与恶的两极对立之间无法作出选择。这些假定同日常生活的经验是格格不入的。例如，绝大多数现代西方法律体系德假定(心理学家也赞同)10 岁的小孩正常地具有在正确和错误之间作出选择的能力。最后，批评家们主张，承认相对主义和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回事，但是像某些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将它作为美好的东西来开发和培养却是另一回事。

现代方法或后现代主义的“怎样都行”

后现代主义者不习惯于使用方法一词，尽管他们有时用近似于方法论的术语围绕真理和知识来讨论“策略”或“斗争”。不过，在缺乏可以替换这个词的任何一个适当的替代者的情况下，尽管可能招致绝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的反对，我除了仍然使用它以外别无选择。我所指的“方法论”的含义是：某人从事无论什么样的有趣的研究活动的方法和途径；它与研究过程相联系，却没有告诉我们希求发现的将是什么东西。方法并没有被设定为近义于现代科学的规则和程序，我在这里对它进行了考察，以便使其具有更加广泛的

运用范围。

在其被应用于现代社会科学的意义上，某种方法观念有助于为理解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以及他们对于“陈旧、过时、封闭”的传统方法所提供的替代物设置一个参照点（Fraser 1984：138；Agger 1989a：10—12）。现代社会科学受到指导研究行为的一般方法规则的引导。其最正统的实践者假定，只存在一个方法，一个自我矫正的科学方法，在其跨学科的应用范围里它是普遍有效的（Feigl 1953b：382—84；Nachmias and Nachmias 1976）。“科学方法试图以一种训练有素的方式——它使得研究过程中的每一步骤都清楚明白——来达到现实对于思想的检验”（Hoover 1980：36）。[1]

后现代的方法：解构和直观的阐释

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存在方法，不存在他们务必遵守的程序规则，存在的只是他们后现代主义的反规则和“怀疑一切”的严格作风（McClosky 1985：20；Norris 1982：57；Rorty 1979：318）。他们认为，只有声称要成为外在地有效性的、要寻求“先验真理”的逻各斯中心体系才会全神贯注于方法（Fish 1987）。通过否定这些规则，后现代主义者声明，就方法而言，“怎样都行”（Heller 1987；Feyerabend 1975）。

后现代主义以下述这样的方法为目标，它们适用于广泛的现象范围，密切关注边缘领域，强调独一无二性，集中探索难解之谜，评价绝无仅有的变故。后现代主义的所有方法都取消了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上的创造新知识的任何企图。后现代社会科学假定了这样的方法，它们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相反，它们进一步混淆了是非，杜撰了更加精微细致的问题，其

中每一个问题都引发无限的解答。

后现代的方法论是后实证主义或反实证主义的(Fraser 1984:138)。[2]作为"科学方法"的替代者,肯定论者注意到了感觉(Hirschman 1987)、亲身经历、移情、情绪、直觉、主观判断、想象力以及创造力与娱乐的其他各种形式(Todorov

---

① 现代科学的经典模型把它的项目定义为:立足于从实验和具体经验抽取的证据之上,以直接或间接的观察为根据,并由主体间就其观察对象所达成的一致意见来进一步确定(Feigl 1953a;Grunbaum 1953)。这些"约定"——它们"可能被描写成经验科学的游戏规则"——据说通过它们"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一事实而得到了确证(Popper 1959:53—55)。这些科学程序在60年代和70年代受到了全面的挑战(参阅 Mokrzyski 1983:第2章、第3章对于那些起源于历史和文化的挑战的概述)。结果,现代科学变得更加折衷温和了起来:它不再试图去"证明"理论,它要求被提出的假设允许出现证明为假的情况(Popper 1959)。这并没有真正地修正由分类、划界、以现实检验假设、解释结果和建立理论所构成的基本体系(Hoover 1980:35)。它只是使这个基本体系变得更加精致而已。各种概念仍然是根据唯实论的而不是唯名论的术语定义的,并且同这样一些指标相联系,它们允许被测量的价值被指定给表象它们的变量(Bierstedt 1959)。人们从统计的代表性、个人倾向性和一般的公正性来评价材料,借助理性和逻辑来解释材料(Hempel 1988:8)。每一个研究阶段的结果都不得不屈从于其他观察者的确认。当材料反复与某个理论相矛盾时,那个理论要么被抛弃,要么逐渐地随着竞争理论的增加或"研究纲领"(Lakatos 1970)的扩大而衰落。只有当一个更加"放宽的经验主义视野"在现代科学内部得到发展之后,人们才会承认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深刻的理论并没有因为同几个棘手的观察报告相冲突——尤其是在眼下没有更好的理论的情况下——而被抛弃"(Hempel 1988:23,26)。现代科学仍然相信,假如某个错误的理论被人们错误地予以认可,那么它终将得到暴露,并且通过修改和进一步的研究而获得纠正(Hoover 1980:36)。方法论程序的"公正性"仍然被说成是保证结果可靠性和预防随意性的根据。进步观念仍然保留了下来,而这意味着研究结果的积累,意味着"越来越好的经受得起检验的理论"(Popper 1959:356)。由科学方法产生的知识被假定为优越于来自思辨、反思、感觉和直观的知识。后现代主义者不同意上述见解(Graff 1979)。

②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对定性方法和量化方法都表示怀疑。例如,他们反对行动研究和参与性观察,因为它们都必需有一个作者,并且常常假定了代理者(Touraine 1988)。

1984)。不过这些术语的实际内容和方法论意义是比较含糊的，因而难以同其他术语相沟通。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也许不愿意承认其中的绝大多数为方法的替代者，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无法真实地知道任何一件事情，甚至无法知道我们自己的感觉和情绪(Schwartz 1990:32)。[1]

在其更具体的正规表现中，后现代主义包含着两条方法论途径：内省的反客观主义的解释和解构。[2]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清晰明了的，而有人则认为解构"就是解释"(Sarup 1989:60)。但是解构的确注重否定的批判能力，而解释则表达某个积极的观点。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广泛地应用它以考察诸文本，而且，由于每一事物都是一个文本，对解构的使用便不受限制。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一般来说赞成解释而贬抑解构，只是因为他们的诸项计划都需要建构甚于需要解构。[3] 肯定论者也运用解构以连根清除特许的文本，但是他们同时又对它特别地小心谨慎，因为正如任何一个他

---

① 他们乐意接受创造力和娱乐，是因为这些事物不声称自己是实质性的知识。

② 有些后现代主义者反对将解构定义为一个方法，而另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则主张它是一个反方法(Norris 1982:76—79)。不管怎样，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到来，解构和解释同方法具有了日益密切的联系，因此，将它们同方法联系起来并不是一种歪曲(Dear 1986:373;Norris 1982;Culler 1982)。

③ 解构和后现代解释在后现代认识论的大多数方面是一致的。解构是有预谋地、公然地、有意地和强烈地提倡主观主义和反客观主义的(Dear 1986:372—73)。它在把任何观点当作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加以摈弃方面表现犹豫不决。它摈弃普遍性知识或整体性理论，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项反理论的事业。它拒绝建立关于善恶理论的等级系统。后现代的解释是互为文本的而不是因果性的。后现代的解释否定了真理符合论，它怀疑理性和合理性。对表象的挑战(第6章)同如下观点是一致的：不管多少种解释都是等价的，因为表象是不可能的(Hoy 1985a:53)。

人的见解都可以被解构一样，他们的观点也是容易被解构的。

后现代的解释与更传统的社会科学的解释形式只有一点点相像。[①]现代社会科学把解释理解成带着事先确立的目标去细心地考察材料的活动。意义不是随意的，有的解释被假定为优越于另一些解释。现代社会科学允许无限多的非冲突的解释；它还认为，当诸种解释相冲突时，所有的解释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在终极意义上，只有一种解释可以是精确的。清理离题解释的过程可能是缓慢而间接的，但它是毫不妥协的。旧理论可能会被某次重大实验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感人至深的解释所清除，但是它也很有可能作为众多解释之间长期冲突的结果而被消极地抛弃(Lakatos 1970)。在现代社会科学领域里，解释的特点受到严格的规定：它寻求协调，寻求对立真理的统一，而不是寻求各种方案的扩大和增加。

随着后现代新意义的被确定，现代的解释也得到了重新定义和重新展开。后现代的解释是**内省的和反客观主义的**，是一种个体化的理解形式。它是想象而不是材料的观察。它清解了现代实体，消解了自我和他人、事实和价值之间的任何清晰区分。例如，在人类学领域里，它转向"叙述"，强调"倾听"他人意见和与他人"进行交谈"(Tyler 1986:139—41,335)。

---

① 它也不相似于解释学的解释，后者比现代社会科学的解释更加主观但更不具野心。和后现代的解释不同，解释学的解释力图去探索"沉寂的事物"，去揭示某个更深层次的意义，那个意义或许是被遮蔽的和隐藏着的，但是是等待着被人去发现的(Dreyfus and Rabinow 1983:124;Madison 1988:115)。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根本不存在有待于去揭露的"意义"。解释学的解释接受了真理、普遍性和一套共同使用的话语(一个理解共同体)。

在心理学领域，解释理论已经不再"深入根底"。它们只不过是"起中介作用"而已(Kugler 1988:63)。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任何一个文本的无限数量的解释(意义)都是可能的，因为，对于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言不尽意，意在言外。在极端意义上，所有的文本意义，所有的解释，都是无法确定的。[①] 由于任何一个特殊符号都不具有最后的意义，任何一个文本都不存在前后一致的解释，所以，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主张，没有一种解释可以被视为优越于任何另一种解释(Latour 1988:182—83)。[②] 在其多元建构、形形色色的实在、确定性不在场和解读多样化的世界里，后现代主义拒绝让某个陈述高于另一个陈述；所有的解释都是等价的(Miller 1972:8;1977:447)。

有些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也许是出于急欲产生某种影响的考虑，声称每一个解释都是虚假的(Miller 1981:249)；每个理解都是误解(Culler 1982:176)。[③] "对某文本的每个解读在一定程度上总将是一次误读，是以舍弃另一些细节为代价筛选出某些细节、意义或结构特征的一次描述，而批评家的阐述可能考虑的恰恰就是那些被舍弃的细节"(Norris 1988:

---

① 在解释领域绝对多元主义的启示可以追溯到尼采。德里达视解释为游戏的观点是以"尼采的某个确信为根据的。那是一种对于世界游戏和生成率真之充满欢乐的确信，一种对于某个既不具谬误，又不具真理，更不具原型的符号世界的确信。这种确信旨在作出一个积极主动的解释"(Derrida 1978:292)。

② 福柯的"解释性分析法"与之相类似地假定每一事物都是解释；不过由于所有解释都是随意的，因此不存在终极的解释(关于福柯思想的说明参阅Dreyfus and Rabinow 1983:106)。

③ 参阅埃利斯对于这种观点的荒谬性的说明(Ellis 1989:第4章)。他认为它"既不是一种有效的立场，也不是一种无效的立场，而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立场"(Ellis 1989:112)。

129)。实在地被写就的东西并没有如此重要，因为一个文本(任何一个事件)限制不了解释；相反，解释塑造了文本。

解构蕴含着既破解了某文本的神秘，又拆开了那个文本以揭露其内在而又任意的层系和它的前提的意思。它展示了某文本的缺陷及其隐藏的形而上学的结构。对某文本的解构性解读活动旨在发现文本的二重性、盲目性和逻各斯中心性。它"小心翼翼地挑选出文本内部意义的诸方敌对力量"(Johnson 1980:5)。解构不是去分辨某文本的核心论题，而是考察文本的各个边缘(Hoy 1985a:44)；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努力恰恰渗入到了文本的核心地带，并考察它所表达的东西以及它在各种矛盾和各种不一致中被揭示出来的方式。解构对文本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产生一种穿透整个体系的拆解力量，从每一个方向分解它并彻底地界定它"(Derrida 1978:20)。一个解构方法考察的是溢出文本之外的东西，未被命名的东西，被排除在外的东西和被遮蔽起来的东西。但是其目标不限于推倒对立面，因为这将使得新的层系重新被占用(Derrida 1981:59)。解构不是仅仅为揭示"错误"而设置的，因为这将假定真的有真理存在(Vattimo 1988)。[①]相反，解构的目标是转换一个文本——改变它，重新界定它——它们始终在被解构文本自身内部同时发挥作用。解构企图废弃、颠倒、移置和重新安排蕴含在诸如客体/主体，正确/错误，善/恶，实用的/原则的之类两重对立中的层系(Culler 1982:150)。[②] 后现

---

① 假如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像亨利·卡里尔(Kariel，H. 1988a)那样，作出如下假定就是一个错误：解构仅仅是批判，它只不过是在当时的社会科学中"通过故意地连结那些时下流行的陈词滥调而给它们赋予了生机和新意"。

代主义者拒绝去“重构”一个文本，或去断言某个可取的见解，或去重新确立一个支配的范围(Fish 1989:493)。它揭示了诸张力但是没有消解诸张力(Hartman 1988)。追随于尼采之后，“解构解构了它自身，与此同时又创造了另一个迷宫般的幻影，它的权威被它自身的创造力逐渐地摧毁”(Miller 1981:261)。解构的整个过程是复杂的。最后，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文本解构了自身(de Man 1986:118)。

按照前面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解和表述，对许多现代社会科学家来说，解构乍一看来是一个抽象的过程。不过，当解构方法的基本内在原理和策略得到揭炼之后，它实际上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复杂。下面这些指导方针可能就是后现代主义者努力的结果：

——找出文本中的一个归纳的某个例外并把它推向极致，以便使这个归纳显得荒唐可笑；换言之，用例外去破坏原理。

——以最极端的形式解释正处于被解构之中的某文本的论题。

——在解构某文本时要回避绝对的陈述，但要通过发表既骇人听闻又令人激动的见解来激发人们的智力激情。

② 这里是一个对差异(分延)作后现代解构的例子。当涉及个体时，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差异(参阅第6章第2节)。他们不太赞成将它应用于一般(双极的)范畴。他们认为，此类范畴蕴含的不仅是等级划分(层系)而且是某个双极性术语比另一个双极性术语更优越、更规范的判断。德里达主张，双极性的对立在表现出“差异”的同时，它们自己也是这样的(Derrida 1981:9)。

——否认所有二分法的合法性，因为对于任何基于两重术语的概括来说，总是存在一些例外，而这些例外可以被用来摧毁二分法。

——没有东西要被接受，没有东西要被拒绝。假如清楚的见解没有被表达出来就批判某个解构的论题，这将是极端困难的。

——如此书写以便允许最大数量解释的可能性；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与其说应该被避免不如说应该被培植。含糊不清也许会“免受严格审查”（Ellis 1989：148）。这种想法旨在“创造一个既不具终极性又不具完美性的文本，一个读者使用它便可能永远结束不了的文本”（Wellberg 1985：234）。

——采用新奇独特非同寻常的术语以便使“原来司空见惯的立场可能看上去不再那么司空见惯，原来明显相关的学识也可能看上去不再那么明显相关”（Ellis 1989：142）。

——“决不同意变更术语，始终坚持解构论题之措辞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更加无拘无束的构想有损于如下见解：解构立场是独一无二的和卓然不群的（Ellis 1989：145）。

后现代方法存在的问题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坚信解构本身是超然于批判的，因为它“不像其他立场那样是可以被描述和被陈述的”，因为不可能将现代理性和逻辑分析应用于它（Lyotard 1988b：xi）。解构被说成具有它自己的另一套逻辑，而那套逻辑又决不可

能被明确地揭示出来(Ellis 1989:第1章)。[①]例如,阿什利和沃克(Ashley and Walker 1990a:265—66)认为,任何企图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概括后现代文本的做法,任何关于"说它们的意思应该是什么之类的尝试都将是对它们的强暴"。不过,尽管作出了躲避批评的努力,后现代方法仍然暴露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在一个现代视野里,某些解释似乎总是被认为比另一些解释更容易受到维护。即使在激进的不确定性的例证中,某些充足的理由往往可以得到呈现以便挑选出一种优先于其他解释的解释(Graff 1990:174)。文本(事件)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受到政治、经济、社会诸力量的影响,反过来,它们对其生存的环境也施加着潜在的影响。解释被纠缠于由诸种影响和诸种限制编织起来的网络之中。

后现代解释的方法论相对主义使某些后现代主义者感到为难(Norris 1988:188,就是一例)。当然,某些解释的适当性要使每一个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做到下面这一点并不难,即就某个解释捏造出一个平庸的例证,这个例证显而易见是虚假的,以至于人们会一致认为该解释是不适当的。例如,《独立宣言》和《共产党宣言》都是政治文本,它们既形成于人类事务又反过来铸造了人类事务。尽管对它有许许多多的解释,但某些解释比另一些解释更加适当:《独立宣言》和《共产党宣言》都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去打棒球。

为解答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的难题而作出的后现代努力

---

① 埃利斯(Ellis 1989)接受了这个挑战,对在人文科学,尤其在文学批评领域里的解构作出了一个给人印象最深和最彻底的批判性评价。

并不能使人消除疑虑。有人声称要把这个缺陷转变成一种力量，可是，正像批评家们所指责的那样，要是后现代主义被卷入解构主义的无止境的退化过程——在那里，没有一样事物比其他任何事物更优越——的话，那该怎么办呢？后现代主义者回答说：解构也意味着某人被驱逐到一个"无限的广延"境地，在那里他摆脱了"被过分限定的研究项目的智力方面的浅显，以及对它们的充满陈词滥调的捧场文章，即'常规科学'"(Richardson 1988:200)。这种辩解是很不充分的。

尽管提出了诸多离经叛道的见解，后现代的方法论努力并非完全是无秩序的或非精确的（Scholes 1989：834)。确实，上面所概括的解构原则的提要暗示着某个基本的逻辑。因此，它们并不能超然于批评之上。例如，正如解构企图予以拆解的思想体系一样，按照其假定，解构也是逻各斯中心的：

> 假如解构"消除了某个文本的神秘，拆解它以便揭示其内在而任意的层系，以及它的各种前提"，那么这意味着确实存在着内在而任意的层系和前提——它们是确定的某种东西而非别的东西；是可观察的；可描述的；有待于主体间证明的。假如解构可以"揭示"某物，那么某物就必须在那里有待于被揭示。同样地，后现代主义者谈论文本被解构的方式也陷入了"矛盾"和"不一致"之中，这些矛盾和不一致"也被省略"和"掩盖了起来"。要么存在着关于"一致性"之类的标准，存在着确定什么东西"被省略"的、在主体间有效的方法；要么这些句子本身仅

仅是“文本”而已，它们的意义是可以得到的。[①]

在方法论方面，后现代的“怎样都行”的主张是一个夸大其辞的主张。[②] 后现代科学，至少是由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建构的后现代科学，并非没有方法论上的偏爱，尽管这些偏爱有时是以否定的口吻来表达的指令，它们排除了某些方法而不是积极地需要它们（Rosenau 1992）。例如，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现代科学寻求“同一，无论是诸结构的同一还是诸主体的同一”的研究活动。他们用“差异的主张”取而代之。在差异的名义下，“发起了一场对综合和归纳的攻击”（Soper 1986：90）。结果导致了一个关于“怎样都行”的非常有限的观点，因为它把“综合和归纳”也列入被排斥物之中。

一些批评家指出，剥去掩盖在解构上面的某些德里达语言的娇饰之后，它便会暴露出其无聊、琐碎、“雷同”、“单调”的特点。他们指出，它使得“万物千篇一律”，它对所有的文本差不多都说一样的事。通过全神贯注于语言，解构忽视了文本的更广泛意义。它似乎很少关心文本的最重要方面——文本意味着什么（Culler 1982：220）。

还有人认为解构只不过是有关批判的一个一般情况而已。它“告诫人们不要被修辞学的诡计所迷惑”。它提议人们要小心翼翼地处置意义。但是，其中没有一个见解是新奇的

---

① 哈雷·C·布里德迈耶，私人通信，1988年8月7日。

② 拉图尔指出纵使“怎样都行”的陈述也必须予以抛弃，因为它蕴含着一个积极的、肯定的观点，而那个观点，他认为，是无法为之辩护的。拉图尔借此从怀疑论的后现代立场得出了它的逻辑结论，它的最为前后一致的形式（Latour 1988：168—69）。

或只为解构所独有的(Donoghue 1989:37)。假如这就是解构所具有的一切,那么它并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后现代的工具。现代科学也打算做同样的工作。

批评家们还指出，解构并没有作出积极的方法论贡献。它是破坏性的（Habermas 1987a：161）；它并没有建构知识。正如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主张的那样，假如所有解释都是同等有趣的，假如语言的任意性阻碍着对于任何一个给定解释之适当性的判断，那么，所有这些依赖于解释的社会科学领域都将处于危险之中。解构在地理学和人类学领域中的作用是这些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者自己认定在从事着“游击活动”的一个例证。他们的后现代活动旨在表明这些领域仅仅是“虚构”而已。来自内部的后现代修正公开地把目标定为打碎所有这些学科，以便为解释的诸尝试留下地盘（Marcus and Fischer 1986：26；Gergory and Walford 1989）。即使是那些并不强调其“科学性”的社会科学领域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例如，心理分析的解释是定性的而不是可以严格量化的。但是，在一个后现代视野之内，它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方法论保护的十足的神话（Kugler 1988）。这些埋怨不仅来自现代社会科学阵营，而且同样使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感到烦恼，后者有自己的计划：去创立一门新的后现代科学(Rosenau，forthcoming a)。尽管解构取消了任何一个特殊观点的特权，不过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仍然主张，诸如女权主义、环境决定论、和平、生态学和宗教之类的特殊的价值视野和特殊的政治立场具有优越性（Griffin 1989)。一些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解构必定最终导致重构并“尝试着提供一个新的‘主导叙述’”（Dear 1986：376)。如果解构

的逻辑“不是必然地极其适应创造性的、多产的思维活动，而只是适应于制造其虚幻”的话，那么，上述主张也许就不可能了（Ellis 1989：144，第6章）。

以后现代的解释和解构方法取代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是否对社会科学有了任何改进，这还是一个相当不明了的问题。假如丝毫不作修改地全部照搬的话，后现代的方法论就没有为社会科学提供知识的基础，也没有为社会科学提供在相互冲突的解释之间作出选择的合理标准。下面的例子阐明了这一点。

后现代解释和解构之应用：法律研究的案例

解构的影响显见于许多不同领域的例子中。在那些领域，后现代的学者已经着手解构他们各自学科的根本性假定，包括国际关系学（Ashley 1989a，1989b），组织理论（Arrington and Francis 1989）以及社会学（Seidman 1989，1990；Agger 1989a）。它还对更加应用性的社会科学产生了影响。例如，原先被认为是“客观”和“中立”的企业家哲学和组织管理哲学，在被解构了之后，却暴露出了“企业利益高于每一个人的利益”的真相。按照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传统，传统的管理理论将被解构，一个新的后现代管理的元理论将得到发展，后者的目的是“减轻清晰可辨的痛苦”（Carter and Jackson 1987：79—85）。

法律理论是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后现代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观点已经引发了一场最严重的智力危机：它们对司法体系的合法性和法律研究的完整性提出了质疑。在历史上，法律被假定为中立而公正的——以一种非人格的、可预言的、

无争议的方式去解决争端的某个毋庸置疑的方法。对于法律的尊重象征着拥有高度教养的公民的某种先进而稳定的文明。传统的法哲学假定，法律判决能够也应该是注重事实，注重分析，不抱偏见和客观公正的。判决具有确定的意思，法规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它以某种独立于独断和折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因素的方式来编纂法规（Norris 1988：第1章）。

后现代的解释和解构推翻了这些假定。他们认为在法律中不存在确定的意思，他们对法律领域里的任何基于理性的真理主张之可能性都提出了质疑。[1]在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法律是政治的、主观的、有争议的、仅仅因人而异的解释。怀疑论者在激进的非决定论方向上走得更远，声称有关法律的任何一种解释都不是真正合法的。法律文本被说成是自我指称的；其意义，正如文学文本一样，是完全不确定的，在语言学上是相对的，可以有为数众多的解释的，而其中没有一种解释是特许的。[2]意义是被注人的，对某法律文本的每一种解读都被说成必然地是一次误读。[3]所有的法律文本都是“无法决定的”或是“不相融贯的”，因为法律语言，同所有别的语言一样，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要么不具有终极的意义（Hoy 1985b：166），要么仅仅发挥着一种强权关系的功能（Foucault 1975）。

正如第4章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者否认历史的和传记的起源是确立意义的公认的基础；这样，他们拒绝依照起源

---

① 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是批判的法律研究运动的组成部分（Norris 1988：127）。但是他们又极不赞成那个运动的其他流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

来解释法律。他们反对如下观点：对美国宪法只存在着一种真实的解释，其设计者将它一劳永逸地确立下来了。后现代主义者还不同意前述的现代观点：某文本的意思就是其作者所希望它意指的东西（Hirsch 1967；Michaels 1983：344）。作出某个法律判决的一个现代法官假定他（她）正在为未来的判决确立先例，并假定他（她）正在赋予判决以确定的意思。从一个传统而现代的角度来看，某人只需理解这个法律判决的作者确定意思的意图就够了。[④] 正如后现代主义者否认文学作

---

② 这场讨论围绕着法律和文学的争论而展开。其结果依赖于某人如何看待"文学"和如何定义"法律"。假如正像达文波特（Davenport 1983，1985）主张的那样，文学是科学的、解释是客观的，那么关于某文学文本的一个最佳解释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把法律和文学相提并论，将不构成为一个挑战。但是，正如更常见的情况那样，假如文学是主观的，假如它的"意思无法从文学文本中揭示出来，而只能从外面强加于它们之上"，那么法律，假如它仅仅是文学的话，也将被视为独断而随意的（Posner 1988：1—5）。波斯纳反对这种主张。他认为，在文学中将某作者的意图置之不理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法律中，这种做法却是不可接受的（Posner 1988：28—29）。虽然"在研究一个文学文本时仅仅设定几个连贯的令人满意的意义产生不了什么大的后果，但是在法律领域里这么做的话就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可是后现代主义者却不愿给法理学家们以丝毫的安宁，他们假定文学是主观的，并且强烈地否认文学文本和法律文本之间的任何差异"（Fish 1989：第 13 章；Minow 1987：79）。如要了解有关这个话题的更多情况，请参阅"法与文学研讨会"，载于《德克萨斯法律评论》（1982 年 5 月，第 60 期）和"解释研讨会"，载于《南加利福尼亚法律评论》（1985 年 2 月，第 58 期）。

③ 假如所有解读（法律解释）都是"误读"，那么关于如下两者的争论将是毫无意义的：（1）最好按照原作者的意图去解释法律；或者（2）最好重新解释法律，以便它们仍然与当代保持相关关系。

④ 在文学里，最好的解释是最贴近"作者心灵世界，贴近作者以经验为根据的信念世界"（Skinner 1972：407）和贴近上下文的解释。在社会科学中存在着一种关于行为的最佳解释，那种解释最贴近于行为者的意图（Gibbons 1985：785—86）。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最佳解释都是由创造那个文本的发起者（原创者）提供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及其他一些人对此表示异议。

者的重要性一样，他们以同样理由否认了法律作者的重要性（参阅第2章）。他们对作者的权威和法律的权威提出了诘难，并指出法律判决是武断的。

在法律领域的"意图和解释"之争一直是引起人们争议的一个原因（Patterson 1990：136—38），不过后现代的挑战完全是另一回事。传统的法律理论家受到后现代解构如此严重的威胁（他们总是谈论法律的神秘化），以至于他们把后现代批评家称为"虚无主义者"（Fiss 1982；Norris 1988：128；Pangle 1989；Hoy 1985b），因为"假如每个律师和法官对任何法律条款都可以作随心所欲的解读，那么将面临混乱的威胁"（Posner 1988：20）。

关于解释性法律团体的理论——认为法律判断纯粹是意见一致的信念的观点——是传统的法哲学和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解释的绝对平等性之间的一个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理论尽管对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它却因在传统的法哲学和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那里很少获得支持者而告终。它放弃作为某种目标的真理，认为意义是由团体决定的（Fish 1980）。①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见解被说成是为法律团体所共有的语言和现实的一个结果。这样，法律见解提不出绝对的真理主张，因为法律规则没有限制团体解释（Fish 1984：1332）。法哲学被公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和修辞学的。当解释团体发言时，他们无法指认

① 当菲什主张解释不是主观的、因为它受到专门团体的指导的时候，他希望能避开被指责为相对主义。但是他的批评者对此持有异议："假如菲什没有整个地使解释成为主观的，那么其差异也就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了"（Dworkin 1983a：295）。

其确切的意思。[1] 为了使这种观点更中听,至少是更方便,有人提出"法律解释受到从某个解释性团体中获得其权威性的那些规则的限制"(Fiss 1982:762);这对于作出真理声言来说,已经足够了。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正在为建立某个后现代法律而努力着。在谴责那些对现行州法律之批判加以限制的那些人的时候,B·桑托斯(Bonaventura Santos 1987)号召建立一个旨在揭露"法律之潜在或压抑形式"的后现代法律,"在那种形式下,更为阴险毒辣、破坏性更大的社会和人身迫害时有发生"。他希望他的后现代法律将"成为一种有益教化的知识,通过拓宽和深化我们的法律视野,它将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根本民主化作出贡献。只有这样,法律才会是一个无限制的人类之善"(Santos 1987:299)。[2] 汉德勒(Handler 1986:1030)也认为解构法律体系是具有解放意义的举动;他提出了一个后现代的对话团体。在那里,既有改革能力又有立法权的对话关系将赋予法律以纠正错误和帮助社会下层更有成效地面对国家的职责。

---

① 另外一个反对的意见是:这种理论没有解释对解释团体的挑战是如何提出的,或者法律解释如何因时间而改变的问题(Norris 1988)。斯坦利·菲什试图对此作出回答,不过其解答过于复杂,在此无法一一予以概述(Fish 1989:第7章)。

② 桑托斯想要建立后现代法律的计划实际上混淆了怀疑论的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他对尼采、罗蒂和布卢姆的早期工作表现出非常短暂的幻想,但是他的目标仍然是民主的和人道主义的。这个计划很可能被当代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斥之为天真的和逻各斯中心的。

理性的角色和后现代计划的例证

绝大多数现代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都假定了对于理性和合理性的广泛信任(Meehan 1981),尽管这种信任似乎不仅正在社会科学中遭到破坏,而且在整个社会中遭到破坏。后现代主义是这股巨大的破坏潮流的组成部分。在文学中,后现代小说,诸如昂伯托·埃科的《玫瑰之名》,证实了分析理性的徒劳无益和因果解释的幼稚天真。后现代建筑所建造的那些建筑物乍一看来是无法"合乎情理地"期待它们树立起来的。[①] 在社会科学中,对理性和合理性两者加以限制一直是波普尔的"可证伪性"(Popper 1959,1962,1979),库恩的"范式"观(Kuhn 1970,1971),拉卡托斯的竞争性"研究纲领"(Lakatos 1970)和"理性重构"(Brante 1986:190—195)所孜孜以求的事。不过,后现代对理性的挑战更为认真彻底,也正因为如此,它对正统社会科学的威胁也就更加严重。

在后现代主义者中间,针对现性如何被最佳地"战胜"的问题存在着相当激烈的内部争论,可是大部分怀疑论者却号召人们"明确地告别"现代理性(Borradori 1987—88)。[②]他们认为,尽管某个体可以反思某论题,运用"理性的论点",并从事

---

① 也许人们会以为,建筑学领域对极端形式的后现代主义具有免疫力,因为建筑物必须尊重与重力相关的科学规律才得以巍然屹立。但是今天的后现代建筑的先锋派以"对于材料的一无所知"为骄傲,以乐意"用口香糖"去建造为骄傲。据说某人"建造了一个办公人员俱乐部,那个俱乐部的屋顶在举行落成庆典时就坍塌了下来。"在其他一些例子中,由于"后现代的设计根本无法予以建造",所以它们遭到了人们的抛弃(Seabrook 1991:127,129)。

合理地评估证据的活动，但是这与其说给出了特殊的深刻见解，不如说给出了一私之见（Baudrillard 1983c；Lyotard 1984；Vattimo 1988），因为理性是"一件关于趣味和感觉、关于技能和鉴赏力的事情"（Latour 1988）。在对理性作如此理解的范围里，现代科学便不具有独一无二的或特殊的逻辑（Latour 1987；1988：179，186；Latour and Woolgar 1979）。宗教、礼仪和巫术被提升到相等于科学的"合理性"地位（Shweder 1986：172）。逻辑和理性同神话和魔术"处于同等的地位"（Latour 1988：146—50，186，212—13）。

后现代对理性的总体攻击出于几个动机。首先，现代理性假定了普遍主义，统一的整合体，以及同样的规则到处适用的观点。合乎理性的主张被假定是在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不同历史阶段之间基本上相同的主张。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认为每一种情况都是不相同的，它倡导对具体情况作出特殊的理解。后现代主义者假定，"此知识与彼知识的基础是不一样的"（Harland 1987：106—7）。在后现代世界里，所有范式都是平等的，因为每个范式都有自己的逻辑，所以不存在普遍理性存在的地盘。即使存在诸如后现代理性之类的东西，它也是"杂乱无序的，散布于各种形式之中的"（Schrag 1988：2）；它是一种"超越了任何一种理性的逻辑"（Harland 1987：140）。现代理性和合理性被说成是特定于各种环境和文化技巧的，它内在于每个思想体系，并且从来没有受到过批判性的考察

---

② 有时怀疑论的反理性陈述是具有细微差别的，但是它们对于社会科学产生的后果是相同的。例如，如果像瓦蒂莫声称的那样（Vattimo 1988：liii），他只想主张理性和非理性之间不存在差别，那么，这是否真的制造出什么差别来了呢？

(Henriques 等人 1984:124)。理性之所以受到了批判，是因为它"几乎没有为文化特性和个人特性留下地盘"(Toulmin 1990:200)。

其次，理性是启蒙运动、现代科学和西方社会的产物，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作为这种产物，理性在把启蒙运动、现代科学和西方社会的所有缺陷加以联合方面，是有过错的。理性，像现代科学一样，被理解成专制的、强迫的和极权主义的东西(Bernstein 1986)。由于假定了某个"最佳答案"和"某个唯一的解决方案"，它排斥了异端和宽容(Toulmin 1990:199—200)。"其合理方法是临时性的，并且总是极不公正地对待某些人和事。在这个意义上，非理性反而比理性和秩序要温和一点"(Corlett 1989:215)。后现代主义者集中考察了理性和合理性是如何作为合法的工具被用来替现代官僚主义、法律、经济学和政治学辩护的(Wellmer 1985:338—46)。"为了取得效率、统治和强权，理性减少了不确定性、偶然性和民主性的范围"(Ryan 1988:565)。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放弃理性也就意味着摆脱对于权威、效率、层系、强权、技术、商业(商业伦理)、行政和社会工程的现代性偏见(Ryan 1988:563—65)。它意味着不必有以下现代科学的关注：秩序、一致性、可预见性，以及"由某个被公认的范式的权威所决定的制度化程序"(Schrag 1988:3)。这样，理性受到抵制，因为它导致了科学的客观性和军队与政府的强权；后者转而又与二十世纪的暴力、苦难和异化相关联，不管它是大毁灭、世界大战、越南战争、斯大林独裁，还是记录个人情报的计算机档案，情况都是如此。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理性受到进步和人道主义理想的鼓舞。但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理性既没有改善人类的状况，也没有解

决无家可归者、妇女、黑人和其他受压迫团体的问题(Touraine 1988b)。尽管人们给予一切可以想得出的活动以可靠的"理由","但是人们最终得到的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非道德的、或者说是不可原谅的愚蠢的结果"(Edelman 1988:109)。

第三,理性和合理性同后现代对于情绪、感觉、反省和直观、自主性、创造性、想象力、幻想和沉思的确信相冲突。后现代主义者指出,要放弃那些事物的基本在先性,要倡导理性,就要

> 赞同头脑胜于心灵,机械胜于精神或自然……苍白无力的非亲在(客观)事物胜于丰富的亲在(主观)事物;平庸的集体(集合)胜于独一无二的个体,各不相关的颓废个体胜于有机的集体;死的传统胜于活的实验;实证的实验胜于活的传统;静态的成品胜于动态的过程;线性时间的千篇一律胜于谎言的无止境呈现;呆滞、静态的有序胜于动态的无序;混沌的熵无序胜于原始的秩序;死亡的力量胜于生命的力量。(Graff 1979:25)

尽管放弃理性和合理性具有某种智力上的刺激力,但是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采取了更加小心谨慎的态度。其中许多人从彻底地否认它的极端立场上退了回来。有的只是避开理性和合理性的那些比较顽固的形态;有的倾向于赞同对理性抱着近乎绝对信任的态度(Norris 1988:188)。许多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呼唤灵活性,呼唤对"合乎理性"的东西作上下文的考虑(Ryan 1988:564),既不接受合理性,也不拒绝它(Ankersmit 1989:140—42)。他们指出,存在着许多不同种类的理性。其中有的应为后现代主义所保留,其他的必须予以拒绝。当然,后现代主义者几乎不同意理性的在先秩序

(Touraine 1988b; Eco 1983a: 127—30; Agger 1990: 14, 23—24); 只赞成怀疑现代科学(Aronowitz 1981, 1988a: 131)。[①] 不过,工具的或"科学的"理性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被驳倒的(Bauman 1987: 191),这不仅因为它是合理的、有目的的和以主体为中心的,而且因为它强调了功用性、效益性、可靠性、持久性和优越性(Leiss 1983; Leiss 等人 1986)。

一些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理性既本质于他们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的批判,又本质于积极的后现代方案的建构,后者既符合理性又符合逻辑(Griffin 1988a: 30),诸如一门后现代科学或者后现代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发展。假如他们否认理性具有任何合法性,那么他们就将处于一个"不得不去利用"他们曾表示异议的"传统资料的窘境之中"(Sarup 1989: 58)。有人甚至断定"在后现代主义中置换理性的倾向必须予以削弱,因为它实际上是在为一种华而不实的非理性主义摇旗呐喊"(Schrag 1988: 3)。还有的人认为,真正的问题是,理性从一开始就不在现代世界里。他们警告世人,理性的不在场不是认可其寿终正寝的原因(Agger 1990: 175)。有位女权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主张,通过解构现代理性然后重建一个女权主义的合理性,以避免矛盾和二重性(Weedon 1987: 10)。

来自计划和组织理论领域的一个实例表明,抛弃或严重地怀疑合理性和理性将导致社会科学几乎成为不可能的科学。对这些领域的传统叙述都根据定义假定了合理性;它们

---

① 一些肯定论者赞成法兰克福学派对于伦理的实质性理性的支持,赞成它的解放特点,它对人权、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支持。不过,这种观点与其说接近于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不如说更接近于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以逻辑和理性为前提（Cooper and Burrell 1988）。在解构现代计划和组织理论的过程中，对理性和合理性的攻击是其主要的方面。不过，当人们的兴趣转向建构这些领域的新的后现代观点的时候，理性和合理性两者又重新得到了引用。

后现代计划和组织理论的出现一般都以对现代的、传统的陈述及其假定的批判为先导，因为后现代主义者企图放弃如下计划观念，即："一个视野开阔、技术合理、一丝不苟、功能齐全、效益卓著、具有国际风格的计划"（Dear 1988）。现代计划强调效率、整合、政策的协调，以及根据反馈及时作出修改（Meehan 1979）。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种传统的计划形式将导致无序、混乱和生活状况的堕落。这是一个极其目光短浅的资本主义的活动（Dear and Scott 1981）。它假定了某个整合的系统，某个摈弃异端和差异的千篇一律的全体。[①] 一个计划是某个中心计划代理机构的工作，是一个由自称为专家所组成的层层相因的管理团体的工作。据说它有一套工具主义、磋商和行动的修辞学（Dear 1989）。个人的思想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Ryan 1982：187）。在计划和组织研究领域，理性和合理性被假定为对于强权关系的掩饰。后现代主义"揭示出正式组织都是某个自主强权的始终存在的表达，那个强权

① 下面的后现代分析颠倒了冷战时期提出的争论路线，当时，计划被理解成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民主则被看作反计划的（Lindblom 1959）。

在今天对于计划的"后现代"批判经常以马克思主义的语汇表现出来（阶级和资本主义）（Harvey 1985，1987；Dear and Scott 1981；Jameson 1984a；Zukin 1988），但是后现代计划抛弃了任何革命的抱负，任何工具主义的统治理论。不过，后现代计划者确实提出了一个"计划"。其中许多人希望在摧毁它之后重建他们的学科，并最终提出一个具有与后现代时代相适应的一套新的"精确叙述"的计划（Dear 1986：376）。

冒充是现代制度之被想象的合理建构"(Cooper and Burrell 1988:110)。

但是,按照定义,后现代计划和后现代组织现论几乎是一个矛盾。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领域的后现代主义者必须同现代性和理性相妥协而不是彻底地摈弃它们,必须限制自己而作出有分寸的批评。所以库珀和伯勒尔批判了合理性控制和理性解释在组织研究中的作用,并勾画出了正式组织的新的后现代形式。后现代组织研究被描述成"过程"、"非正式的"东西,被描述成"一系列项目、技术和反功能性的策略"。但是理性仍保持原样(Cooper and Burrell 1988:105—10)。后现代计划要么提倡计划的完全不在场,要么提倡在其中没有一个计划可以具有优越性的境况。但是,在以革新精神集中修改其他概念的同时,绝大多数后现代的计划者仍然保留了理性和合理性。例如,他们对客观的、可观察的、可触知的、可控制的空间提出了诘难。他们提出了一个后现代的空间和时间观念。他们反对绝对主义者的解构的相对主义;他们不要求废除理论而要求重创理论。

瑞安,一名具有后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反中心主义、反绝对主义的解构主义者"计划模型。尽管那个模型可能无法被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所接受,但它同样也区别于这个领域的现代的传统观点(Ryan 1982:124—26)。它的创新品格与其说来自对于理性的放弃,不如说是来自其他的后现代的要素。他认为,为后现代世界提供的这个新型计划将不得不以其所有的、不同种类的形式参与和涉人社会集体,"不得不运用多重战略、政策和计划,一切事物都是休戚相关的,不存在唯我独尊的东西。非排他性(它将整合着文化、政治

学和心理学)和非隔绝性(它将不特许被抽象地认识的经济佳境)的原则来自对于源于计划中心的抽象形式主义的解构性取代"(Ryan 1982:188)。"后现代计划始于提供参加机会的投人量,非始于某中心化的效益图,……那个图只注重使社会体系达到标准的要求。"后现代计划旨在"满足社会的需要"。它"强调'相互适应',强调不确定性的作用,强调受制于不同境况和不同背景的修正,强调对包容诸变量而非排斥诸变量的需要,强调对统一规划选择政策的智慧,以及制订一幅整体现实图画的不可能性"。它将需要"基于需求、创造力的变化、情景适应之上的多重输入因素……";需要"对于不同的微观结构基础水平计划的强调,以反对宏观结构的、单一的、整体计划的理论主义倾向";最后,它需要"要素之间的直接相互联系,而不是通过'中心'的间接依附"(Ryan 1982:191—93)。

要想夸大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摈弃理性的做法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就理性持矛盾态度对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是很难的。尽管人们能够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宽容、多重现实和多元主义,但是它对理性的贬损,它的评判标准的含糊性(将在后面讨论)减低了它对社会科学的潜在影响。此外,摈弃理性就要求后现代主义者在自己的阵营内为那些令人怀疑的联盟留下地盘,尽管它们只在某种程度上赞同后现代主义。例如,有的新世纪团体和那些其科学观显然是神秘莫测的团体就是这样(在 Griffin 1990 中可以找到许多例子)。就极端意义而言,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对理性和合理性的敌视鼓舞着反智性主义。当怀疑论者抛弃理性,想方设法把知识和意义贬低为"一堆零乱的象征"的时候,他们还"提出了某个虚无主义的境况",[1]这个境况将为"一个君权神授政治学的重现

提供根据，为甚至比那些被解构了的主张更加过分简单的主张提供根据"(Harvey 1989:350)。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对理性的矛盾态度"也倾向于神秘主义"，并且"开始转向虚无主义"(Ryan 1988:565)。有时候，它吸引了关切宗教和超验世界的个体，而与世隔绝将招致偏执(Levin and Kroker 1984:16)甚至偏见(Ryan 1988:565)。

判断的标准和评价的标准

批评家们宣称，由于后现代主义者要么拒绝利用业已确立的研究标准，要么拒绝"受制于预定的规则"(Lyotard 1984:81)，所以他们无力评价智力产品。受海德格尔(Heidegger 1962,1972)的启迪，后现代主义者对此回敬道，已经不再存在指导研究的任何规则或规范，不存在普遍的有效性，不存在为真理或判断力而存在的普遍的不容争辩的基础(Bauman 1987:197)。假如对于那些赞同现代社会科学的人来说，这些判断的基础是令人满意地被确立起来的，那么对于所有种类的后现代的社会科学来说就该另当别论了。后现代的社会科学可能没有在不同理论之间作出选择的方针，没有对知识主张的全面品格作出评价的方针。[2]

---

① 虚无主义在这里被定义为对于任何肯定(的断言)的可能性的否定(Vattimo 1988)以及对于知识的前景的全面否定(Hawkesworth 1989:557)。

② 我的意思不是说现代社会科学总是寻求确立一个"最佳"理论。譬如，在进行决策时，此类判断只要对诸结果作一简单的比较，以便选出在实验上和规范上都具有优先性的那个结果就足够了(Meehan 1990:78)。

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

现代科学为评价知识主张确定了精确的标准，尽管这些标准并非始终可见：现代科学具有对诸理论表示怀疑，对相反主张给予支持的指导方针。尊重特殊研究规则的研究活动比起对业已确立的研究程序视而不见的探索来，会给人以更多的信心。与此同时，没有必要去假定“经验证据”确证了权威性的知识。现代社会科学的“自由化的经验主义”只是认为，“使科学主张及其真理依附于给定证据的做法是以评价为条件的，并且按照当时被认可为在认识上最理想的适当理论而仍然对再评价开放的”(Hempel 1988:26)。方法论的错误——没有遵循方法规则——通常是怀疑现代科学的知识主张的基础，它们往往也是抗拒一系列特殊研究成果的充足根据。正如预见能力一样，一致性和总体的协同性增进了支持，尽管单凭其中任何一个都是不够的。严格地推断出来的、合理而合逻辑的结论被赋予优于矛盾的、不合理和不合逻辑的主张的特性(Hoover 1980:9—10)。

后现代主义者论标准、准则和评价

后现代主义者，尤其是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关于严格的评价标准的那种思想与后现代主义的整个哲学格格不入(Kariel 1989:128)。他们蔑视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蔑视其评价知识的准则，以及用来评判所有以任何形式(学习、研究和书写)进行的智力探索之结果的“公认的”、传统的手段。他们把矛头指向协同性，是因为“虚假的或要么就是错误的叙述可以互相协调一致，正如正确的叙述可以协调一致那样”

(Goodman 1984)。他们反对以一致性作为标准，宁可要“不一致理论的增多”而不要把坏理论从好理论中清除出去(Feyerabend 1975)。无物可以被证实，无物可以被证伪(Ferry and Renaut 1988:175—90)。他们放弃了根据材料评价理论的可能性，并且认为，即使理论要存在的话，它也必须从材料和观察中解放出来(Gergen 1987:2)。一旦人们放弃了真理是事实与理论相符合的观念，并把它重新概括为一个“发现已赢得一席之地的解释立场的领域和范围”的问题(Toulmin 1983:113)，那么标准也就是不必要的了。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如此地具有特色，以至于认为诸如述行性(performativity)之类的标准是不适当的(Lyotard 1984)。[①] 后现代研究旨在改变“语词知识的意思……它所创造的不是已知物，而是未知物(谬误性逻辑推理)”(Lyotard 1984:60)。后现代的智力活动必须被理解成“冒险活动”，除此以外它不可能有进一步的要求。假如鉴赏力和判断力仍然存在的话，那么它们已经被剥夺了任何特权。如果，暂时性和不确定性作为结果而产生了出来，那么，它们就是必须被接受的东西。后现代主义者不想给予知识，而只想为人们的自决提供一个基础，因为外在于个体、独立于语言的真理是不可能的(Jacquard 1982:195)。

因此，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既不赞成他们自己的分析具有优越性(Ashley and Walker 1990b:368,395,398)，也不想替其言行找到永久的地位。确实，有人(Henry Kariel 就是一例)主张他们有权利在任何时候、不计任何后果地去否定他们在

---

① 参阅本书词汇表对于述行性和谬误性逻辑推论所下的定义。

过去所写所说的每一件事情。他们从来不认为“后现代模式比起现代模式来是一个进步”。要是真这样以为的话，那么就得重新确立进步观念（Bauman 1987：6）。

到底存在不存在试图确立评价这种后现代知识的标准的真正理由呢？卡里尔写道：“我们（后现代主义者）为消除外在对象而奋斗。我们不企求无处不在，所以我们的行为也不是别有用心的。玩乐就足够了，它获得的是内在的满足”（Kariel 1989：xi）。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人们会问，到底有没有可以被称作知识的东西存在呢？或者，假如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认定知识主张纯粹是“谬说”（无稽之谈），就像利奥塔德（Lyotard 1984）所表述的那样，或者，假如，按照本书的词汇表的解释，“谬说”就是虚假的或错误的推理的意思，那么标准又有什么用呢？[①]

后现代社会科学对于为评价知识提供标准的拒绝或无能同另一些后现代观点是一致的。譬如，断言不存在知识得以确立的“其他基础”（Ashley 1989a：278）。它同后现代主义的如下认识论观点也是一致的：现实是由我们造就的，它既非独立的，也非客观的。如果上述假定得以成立的话，那么将无法为关于某理论优越于他理论的明确论断提供根据。在对理性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合理性对后现代主义在对不同观点作出取舍方面提供不了帮助。结果就合乎逻辑地导致了对普遍真理

---

① 利奥塔德认为，后现代的工作“无法按照一个确定性判断来判断，无法通过把类似的范畴应用于其文本或其作品的方式来判断”，因为这个作品“自己正在寻找的”恰恰就是这些规则和范畴（Lyotard 1984：81）。几乎没有几位后现代主义者认同这种观点，也许是因为他们不赞成他的如下假定：“后现代作品自身”就有这项计划，或者只有它有了这项计划，它才可能取得成功。

的否认，对近似于普遍真理的知识的否认。

尽管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否认了判断的明确标准，但是当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并批判他人的观点时，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确实间接地、无意地、或含沙射影地表达了各种隐而不露的指导路线。当然，这些指导路线没有正式地得到认可，而且如果它们被明显地觉察了的话，就有可能遭到否定。但是当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批评现代科学是“矛盾的”或“欺诈的”，是回避反证的，是存在着论题的逻辑谬误，概念的定义有问题的时候，这不正是表明了他们对相反的方面的尊重——如果说不是偏爱的话——吗？当他们在一个文本中寻求“美”或“力量”(Smith 1988:106)或一个网络组织的“力量”(Latour 1988:17)的时候，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运用了内在的指导路线，运用了“评价标准”。他们劝导我们“去倾听、去领悟和去实践迄今为止一直被摈弃的所有的逐渐展开的可能性”。他们寻求“阻碍、分裂和延缓”。他们认为，“不听批评是不足取的”(Ashley and Walker 1990b:395,396,414)。他们强调“情节”和“叙述”之间的张力。他们赞成书写者文本优越于解读者文本，他们认为书写形式优越于口头声音(Derrida 1981)。他们赞叹具有优雅的表现形式和风格，引人入胜的内容，简洁明了的描述的文本(Feyerabend 1975:157)。他们问道，按照我们的亲身经历和鉴别能力，一个文本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他们力图“澄清事物的本性”，“考察”多重形式和功能，设计“针对兴趣(鉴赏力)历史”的描述和说明，在“文化动力学和特定的局部状况”背景下，不去设想“一个统一的智力项目”，自始至终尽力回避任何遵循“包罗万象、统领万物和客观的”路线的事物(Smith 1988:28—

29)。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通常使用这样一些术语:压迫、剥削、统治、解放、自由、反抗和抵制——所有这些术语都蕴含着判断或至少蕴含着一个常规的参照框架。在其中某些确定的偏好得到了表达。他们暗示,对于局部之物、非中心之物、边缘之物和被排除之物的研究优越于对于中心之物的考察。其中有的人甚至认为智力杰作、优秀文本应具有如下标志:"协同性、广泛性、渗透性……在一项工作中发挥指导和贯彻意图的作用,彻底性,适当性,上下文关系性,建议性和潜在性"(Madison 1988:29—30)。还有的人希望按照用来决定价值和评价性质的团体标准来确定标准。当然,这些"标准"是含糊的和不确定的。不过它们确实为后现代评价提供了一些术语。它们一般来说是反极权主义的和不确定的;它们努力避免提供关于假想的优越性的任何暗示,并回避诸如好与坏,一致和不一致之类的常规术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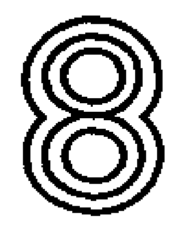
如果后现代研究想要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物,那么明确的后现代标准是必需的。在一个所有用以协调对立观点的手段都被取消的方法论真空中,后现代主义究竟能否长久生存呢?没有作为评估其智力活动的基础、作为区分优劣解释的基础的清楚明白的标准,后现代主义一越出自身之外便没有什么价值;它除了供个人赏玩自娱以外别无其他用处。它"放弃了某种共同的研究的共通感,在那个共同的研究中,个别的认识有待于其他认识的检验和改造"(Ellis 1989:1159)。如果没有任何评判的标准或准则,后现代研究将成为一项没有希望、甚至没有价值的事业。

结论?

现代社会科学同时造就了胜利者和失败者。它的范式——至少在理论上——作出下述允诺:在两个对立的理论中只有一个理论可以最终被认为是"正确的"(Kuhn 1970)。它提供了在证据基础上对两个互相对立的观点作出裁决的有趣的可能性。假如某人尊重它的论证规则,他就必须接受关于他完全错了的判决,而这往往可能是个毁灭性的打击。现代社会科学所提供的分析在范围上是有限的,它必需的证据和它评价研究结果的标准是极其狭窄的。现代社会科学需要简化。它放弃描述的丰富性和对于复杂性的追求,代之以对诸问题的近似答案,后者往往在范围上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在其自身的术语的范围内考虑问题来说,是适宜的。可现代社会科学的许多基本相关的限制因素限定了可从研究中得出可能性结论的范围。现代社会科学往往需要如此之多的限定,以至于广泛而深远的解释被排除在外了。那些被认可的陈述有时给人以琐碎无聊之感。

就后现代社会科学说来,则存在着一个相反的问题。它拒绝作为一系列成功范式的库恩式科学模型,并宣告了所有范式的终结。其结果只能是,缺乏知识主张,肯定多重实在和认可矛盾解释。我们可以使赞成我们的人信服,但是我们拿不出使不同意我们的人信服的根据,在赞同任何特殊的观点具有优越性的时候,我们也拿不出评价的标准。反对我们的人总是会主张不同的解释应该被接受,主张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里,此解释和彼解释一样地优秀。后现代主义者几乎无

意于让别人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最好的——最公正、适当或真实的。最后，后现代社会科学留下来的问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现，每个人都可以有一番自以为是的说法。其中有些说法是挺有意思的和引人入胜的，而有些说法则是有悖情理、荒谬绝伦的。但是后现代主义没有为区分这两者提供手段。



后现代的政治倾向和社会科学

在某些形式里，解构是“反对工人阶级，反对共产主义，甚至提倡种族主义的”。

——Foley 1985:118

“解构参与了保守的霸权统治……它和里根的精神遗产有密切联系。”

——Berman 1990:8

解构“既不是保守的，也不是革命的，更不是进步的……它与此类不相关的事物毫不相同，不可相提并论”。

——Heller and Feher 1989:139

“解构是在本质上倡导极端民主和平等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哲学辞令……可以把解构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

——Ryan 1982:41—43

怀疑论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政治见解表明了他们各自的社会科学观念。我们将会看到，怀疑论者的政治见解是，他们几乎不需要某个高度复杂的后现代社会科学。但是肯定论者需要一个更发达的、崇尚干预主义的社会科学，以支持他们实现其积极的政治目标。

后现代主义究竟先天地是左翼还是右翼的问题也将在后面予以讨论。这两种情况都有人论证过。假如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况是真实的，那么它对于每一门后现代社会科学来说都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有一种可能性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由于采用了某个后现代方法，某人会自动地要么站到左翼的政治立场上去，要么站到右翼的政治立场上去。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后现代社会科学可能会有许多问题，但是自动的左翼或右翼倾向并非是其问题之一。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论政治学：后现代主义的阴暗面

怀疑论的后现代政治倾向以前面诸章提出的一整套见解为基础。怀疑论者崇尚政治犬儒主义，后者同他们视现代性为一个衰落阶段的观点是相适合的；正在不可救药地走向最终崩溃、消亡和自我解构的世界不可能继续苟延残喘下去（Jay 1988：5—6；Redner 1987：677）。怀疑论者在本体论上的不可知论促使他们放弃任何全球性政治规划。他们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意味着他们的政治观必然否认任何特权。由于决定性的政治结论几乎总是蕴含着某个根本性的基础，所以怀

疑论者羞于同这样的主张为伍。他们呼吁，对诸多意义采取宽容态度，对诸多政治信念采取宽容态度，而不是提倡它们中的任何一种。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力图在一个常规空间生存下去，而正因如此，这个空间也就无法超出政治批判的范围。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在如下意义上将政治视为“建构”活动：任何一个政治姿态均非源于结论性的概括，而是源于某些不确定因素、主观理解和矛盾。各种政治理解都是同等地有条件的和不确定的，因为不存在能决定某政治策略比另一个基于事实、真理或科学的政治策略“更加优秀”的基础。因此某种暂时性计划便产生了，政治世界充塞着各色人等，各路领袖及其追随者，他们自己都是由观察者的观察所建构的“建构物”(Edelman 1988：123)。在这里，不存在能容留正义和合理性的任何地盘，不存在设置道德的、自我牺牲的政治信念的任何愿望，不存在激励政治活动的模范形式的任何努力。

在谈到现代正统的政治倾向的时候，即便是最为始终言行一致的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也回避判断。他们不给那些政治倾向贴上“恶劣的”、“压迫的”、“右翼的”或“左翼的”标签。任何断定现代政治体系是片面的、失真的或帝国主义的分析都是判断性分析(Henriques 等人 1984：1)。在把现代政治体系规定为建构、制作、协调、分类或管理的时候，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竭力使用不包含任何贬义的术语。他们不要求抛弃政治体系本身，但是他们也许希望“动摇”或解构传统的政治体系(Henriques 等人 1984：11)。

关于怀疑论者反表象反民主的政治观在第 6 章中已有阐述，在此不再赘述。不过我们还能回忆起来，许多怀疑论者主张，不参与政治是对于现代表象(代表制度)，对于代议民主制

的腐朽，以及对于“不可避免地走向冷漠、无聊和离题的”现代政治的一个健康的、抗议性的回应（Edelman1988：7—8）。[①]这些怀疑论者主张，最好不要再赞同代议民主制（Ferry and Renaut 1985：100，164）。

在怀疑论者坚信切实可行的公共场所已经消失、历史已经终结、真理已经不存在、作者（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代理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如下事件的发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拒绝采取实际行动，他们反对参与政治，或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认为，富于戏剧性的、英雄气十足的政治事业产生不了什么结果。革命“已经被出卖，改革已经走向其反面，甚至连抵制行动都已经举步维艰”。现代政治家们都是“卑劣、腐败和愚蠢的”；他们所领导的政治体系都不具有履行诺言的品格（Nelson 1987）。[②] 这种悲观主义不仅适用于主流的政治参与，而且适用于左翼和右翼政治组织，适用于受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支持、将在下面予以讨论的新社会运动（Kellner 1989b：第 5 章；Sloterdijk 1987；Corlett 1989：216—17）。怀疑论者把低姿态的政治参与（至少在美国）解释成拒绝被欺骗的一种表示（Edelman 1988：7—8）。积极地致力于政治或社会的变革，“在自由、解放和主体的新生上面下赌注”，就是依照“体系的政治

---

① 参见博特威尼克（Botwinick 1990），他在这方面提供了一种有趣的例外。在寻求综合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形式——也许正是本书称之为肯定论的和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的形式——的过程中，这位作者指出，由于确定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存在真理，因为所有解释都或多或少是有意思的，因此所有的意见都必须给予认真的考虑；所以，这导致了一种极端的平等主义，而它“对于扩大政治参与来说，乃是一种不断更新的推动力”。

② 当然，这违反了回避判断的后现代主义企图。这个矛盾将在第 9 章予以讨论。

逻辑"行动。这是做有利于压迫者的事,也就是接受"从属地位"(Levin and Kroker 1984:15—16;Baudrillard 1983a:107—9)。它只会带来微小的、短暂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那些参与者"起着镇静剂的作用"(Edelman 1988:130)。假如历史已经终结,假如"未来已经不再"(Baudrillard 1989b:34),那么为社会变革而进行的任何斗争都将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个别的人不管怎么说也无力影响政府和社会。

拒绝参与、养成"讲反话的超脱习惯"(Baudrillard 1983a:108—9),成了一种积极、进步的政治姿态。当群众的需要和愿望被开发出来以后,他们就表达出真诚而可信的革命热情,表现了具体的抗拒行动。但是这是以不接受、不参与的形式进行的(Baudrillard 1983a:105—6)。群众不接受那些试图动员他们参与到现代政治计划中去的人所说的合乎理性、合乎逻辑的大道理。群众是单纯、朴实、直观的,对政治表现出正当合法的超然姿态。以这种冷漠形式进行的策略抵制对于那类可能耗尽其光阴,支配其命运的政治事业来说,是一种逃避(Baudrillard 1983a:39,105—6)。

在支持后现代退却的过程中,埃德尔曼主张,高层次的政治参与导致了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名义进行的屠杀、镇压和种族灭绝。他于是得出结论:抛弃这一切,世界将变得更美好(Edelman 1988:8)。在极端意义上,我们赞成鲍德里亚的如下见解,政治参与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有趣的事情都已发生过了,革命爆发过了,原子弹爆炸过了,因此,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忧呢(Baudrillard 1989b:34—35)?想要反对工业化社会的大趋势已经为时太晚。我们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放弃"外在目标……对一切都平心静气地泰然处之"(Kariel 1989:ix)。

批评家们指出，怀疑论者的政治倾向存在着某些不健康的因素——他们转向内心，专注于自我。怀疑论者反对决定论，赞成个人主义甚至自我崇拜。他们拒绝对周围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担负起任何责任。他们对政治的冷漠也许反映了他们对自我发展、自我表达、自我意识和自我肯定的关切，或者，在每个人对政治真理的构成方面都应由自己来决定的意义上，它又可能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放纵而已。

只有这样一些积极的政治活动形式引起了怀疑论者的兴趣：对现代正统观念进行抨击，对政治表现出不屑一顾的蔑视态度。这些"超凡脱俗的"参与形式不以确立或维护某个积极的计划为目标。相反，通过采取从无伤大雅的娱乐消遣到恐怖主义的各种形式，他们把毁坏和攻击的含蓄目标（Aronowitz 1988a：49），以及对于死亡和自杀的较隐蔽的关注加以具体化。假如"对现代性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而只有一种合乎逻辑的深化和一种灾难性的解决办法"，那么从自我出发的自我陶醉式的生活追求就只能是唯一有意义的东西（Baudrillard 1983a：105—6）。

有一种政治活动形式吸引住了某些怀疑论者，它就是情绪高涨和狂欢作乐（浓装艳抹、喜剧、马戏表演）（Kellner 1989b：第4章；Eagleton 1983a：108—9）。巴赫京对于中世纪狂欢作过分析，认为当时的整个寻常世界都被各种笑料和戏剧弄得本末倒置了。受其启发，怀疑论者认为这是对于后现代境况的一个健康回应（Bakhtin 1973；Todorov 1984：78—90）。中世纪的狂欢是"放荡不羁，无拘无束的；到处都充满着对于一切神圣的东西的戏弄、亵渎和不敬；诽谤风行，玩世不恭的举动随处可见"（巴赫京摘自 Todorov 1984：78—80）。斯洛特迪

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他提出了一种并非所有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都会赞同的观点,即赞同一种他称之为"根尼主义"(knyicism)的肯定的犬儒主义形式。这是受第欧根尼启发的讽刺的犬儒主义。他告诉我们,它有一个"积极的反其道而行之的反战略",这种反战略寻求"在抵制中,在嘲弄中,在拒绝中,在对整个自然和全部生命的呼吁中获得生存"(Sloterdijk 1987:218)。它专注于肉体的政治学,快乐,冒险,自信,以及在生活中企盼幸福和寻找欢乐的个人权利。斯洛特迪克提出了一个对个体生存有效的策略,但是他的解决办法只适用于个别人。他想象的那些防卫形式不构成一个"计划",不成其为一个对现代性的替代物;它们与反对现代性的无政府主义的游击战争更加一致。肉体是"认知,……社会抗议和变化的首要焦点"(Adelson 1984:189)。斯洛特迪克指出,第欧根尼的榜样怂恿我们当众小便和手淫,胡作非为。尽管他批判了坚定的后现代犬儒主义者,但是他同他们之间的争执并非真的像他对犬儒主义的定义所表现的那么严重,在那里,他把犬儒主义定义为一种开明性的虚假(伪)意识。他提出了一个替代悲观主义的解决办法:一种"在追本溯源过程中轻飘飘的无所谓姿态"(Sloterdijk 1984:93)。

许多怀疑论者断定,在一个后现代的境况下政治活动必然地是随意的、难以预料的、甚至是病态的。索列尔称这些怀疑论者为醒悟的乐观主义者,他们从纯粹的沮丧中超拔出来,转向了后现代的失败主义和恐怖行动(Sorel 1987:192—94)。疯狂和愚蠢的行为具有了某种新的象征意义。恐怖主义、暴力、抗议、骚乱被当作非表象(代表)政治参与的反传统的后现代形式、被当作对参与的"解构性"(破坏性)抉择、拔当作颠覆

代议制、否认合法政府的各种努力而提了出来(Baudrillard 1983a:20—21,54)。暴力变成了一种后现代的相互关联的问题群(problematique),一种"谈话话语和一种征候学……,一种解释样式……,一个反文本",一种后现代的语言,它"以事件创造结构,又以结构创造事件"(Apter 1987:40—43)。

不少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对死亡情有独钟,对解构流连忘返——这种痴迷被人当作是在制定某种政治主张(Scherpe 1986—87:98; Baudrillard 1976; Kellner 1989b:106—8;Wulf 1989)。后现代小说被说成是"对于死亡的模仿",是有意识地专注于死亡演习,是后现代世界中的最后一个基地(地盘、避难所),在那里生者可以学到有关死亡的一切知识(McHale 1987:232)。诗和艺术不是才华的永恒表露,而是对于必死性、残壁断垣、死亡的追忆(Vattimo 1988:27)。在核灾难——一种集体灭绝的形式——威胁之下的生活已经使这些怀疑论者看破红尘,对一切都表示绝望。疯狂和幻想已经难分彼此;"乌烟瘴气弥漫,浪声笑语不断,世界堕落到了崩溃的边缘"(Sloterdijk 1987:xxi)。

对这些怀疑论者来说,终极的自我实现是"大彻大悟的天启,这是他们能够依靠自已实行的唯一行动,一种自我毁灭"(Scherpe 1986—87:123,概括了采纳这种观点的五、六位德国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死亡,自我惩罚性的死亡,自杀,是征服合理性的力量的确证(Baudrillard 1976:221),而且,在以懦弱无力为一般规则的一个后现代世界里,这些情况具有特殊的意义。未来希望的破灭需要有关于终点的某个预知。死亡意志变成了一种肯定的属性,"当有人认识到一个人唯有强大到足以去死方可生存的时候,把死亡作为恩赐来接纳才真正

成为可能"(Taylor 1984:73)。由于怀疑论者没有哲学基础，死亡便成为其唯一的归宿，成为先人所累积起来的"生活体验"中的一座拥有一切的"富丽堂皇的"宝藏。死亡是"仅有的几条规则的源泉，那几条规则能帮助我们在知道我们的生活是毫无目标的情况下，以一种并非杂乱无章的方式去安排我们的生活"(Vattimo 1982:25)。

对最极端的怀疑论者来说，自杀变成了唯一可靠的政治姿态，是最后的和最革命的行动，是后现代抗拒的顶点。它越出了挽回和回旋的范围。它一味地逃避现代性的控制和现代性强行灌输的物化身分(object status)。后现代主义者迫使我们通过"超越死亡"、控制我们自己的死亡、"在尚未死亡之时畅想死亡以后的生活"来超越恐惧(Wolfe 1988:581)。[1]

当后现代主义面临政治挑战的时候，它的这个阴暗面便令人感到不安，面当它获得政治表达时，这个阴暗面便令人毛骨悚然地明确超来。怀疑论者代表了一股孤独绝望和失败主义的思潮(Benhabib 1984:125—26)。通过不介入政治，他们不去干预权力关系和合法权威。这产生了一种愤世嫉俗，虚无主义和悲观厌世的政治论调(Vattimo 1988)。在其最为欢快的精神境界里，他们拒绝政治参与和崇尚狂欢作乐。不过，他们对死亡和自杀的迷恋激发起来的是完全同样的信息：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政治方案，它都与和它相关的现状没有什么不同。就20世纪的历史面言，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而又令人恐怖的主张。

---

① 自杀与后现代在日本受到广泛欢迎有密切的联系。在日本文化内部的抗拒力从一开始就是最为弱小的，而自杀"代表了主体在不进行抗拒活动的情况下作出抗拒的能力，代表了主体向虚无自身发起攻击的能力，代表了主体预先占有死亡和毁灭的能力，或主体废弃历史本身的目的的能力"(Wolfe 1988:588)。

在考察怀疑论的后现代政治倾向对社会科学的后果时，我们可以非常迅速地处理那些专注于死亡和恐怖主义的极少数人的观点。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对社会科学既无兴趣也无要求——不管它是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都是如此。其他的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政治观从消极的逆来顺受到故意的轻浮无聊都有。尽管他们也根本不需要什么社会科学，但是其中有些人仍然对推理的和文学的社会科学抱有兴趣。这样的社会科学对社会的贡献是无关宏旨的。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必去充当正统社会科学的角色。人们也不要求它能以一种新知识的形式提供各种学理上的真知灼见。它不想提高世人的理解力，因为理解力假定或提倡元叙述。它也不必提供作为解决问题或作出决策之根据的知识。对常规的现代社会科学说来成为问题的东西在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却未必是令人烦恼的事。为了制定某个政策，怀疑论者就必须提出某个见解，即关于某件事情必需被实施并且可以被完成的见解，而他们实际否认的恰恰是这一点。怀疑论者只保留了这样的一种社会科学：它表现出对话语的激情，它起着自我探索、自我反映和自我表达的工具的作用，但是它是消极的，因为它并没有超出谈话的范围。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论政治学：积极分子、新世纪和第三世界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展示出各种各样的政治视野（Luke 1989b），由此形成了各种政治观点之东拼西凑的、形式各异的大杂烩，那些政治观点几乎没有什么“共同内容”，并且经

常相互抵触(Ross 1988:xiv;Luke 1989c:第8章;Melucci 1990b:14)。不过它们都同意与政治相关的以下几个维度:对现代科学的摈弃;对现代进步观的怀疑;拒绝参加任何具有他们所谓的某个“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传统的、制度化的政治运动,抛弃具有详尽方案的逻各斯中心的根本计划——不管它们是自由的、中立的、还是保守的,情况都是如此。他们对知识的正式认可的形式,对专家的权威见解、对各种“文件”的资格都提出了诘难。他们是“后无产阶级的,后工业的,后社会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和后分配的”(Luke 1989c:235)。

同怀疑论者相比,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具有一种更乐观的精神,他们支持一系列新的政治运动:从和平、生态与环境、女权主义、绿色政治主张、民族主义、[①]大众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到“心身健康学科”、灵学、心灵致动(psychokinesis)和新世纪运动。他们包括“抵抗团体”,穷人运动和医疗团体。他们把受压迫者,精神病患者,残疾人,无家可归者和一般意义上的下层人物都汇集到了一起(Falk 1990:277—78;Huyssen 1984:51)。有人还会加上动物权利,反堕胎,同性恋团体(Calhoun 1990)。他们不仅可见于现代西方世界,而且也见于第三世界。

积极主动的肯定论者

正如在第6章中所说明的那样,肯定论者不是反民主的,

① 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反对民族主义运动,认为它们同社会主义的和自由的政治运动一样,都是现代的运动(Walker 1988b:28)。

也不反对政治参与。虽然他们把代议民主制作为僵化的制度,作为脱离那些不愿并拒绝参与的民众的制度来批判。但是肯定论者也要求复活真正的民主,要求建构可靠的自治;这些要求为新的后现代社会运动提供了机遇,也为直接或间接地是政治性的后现代复兴规划提供了机遇。肯定论者受到8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和平运动的爆发的启迪(J.Rosenau 1990)。他们仍然相信人民能够把握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为冷战的结束和东欧日益增加的自由而感到欢欣鼓舞,为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而惊慌失措。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也许不会参加投票选举,因为他们把代议民主制中的选举活动视为仅仅是使现存政府"合法化"的一个形式上的"自我表现"。但是不同于怀疑论者,他们把不参加投票选举的活动理解成一次民主练习。他们不投票,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他们认为实际上并不民主的民主社会里。即使他们不参加选举,他们仍保留着他们的投票权(Lipovetsky 1983:187)。

根据他们对于现代性逻辑的理解,根据他们在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怀疑论者在政治上被认为是消极的,但是肯定论者基本上是积极参与的。其中许多肯定论者是政治积极分子和政治辩护士。他们采用了建立在得到明确阐述的价值和目标基础上的积极的政治立场。尽管在否认现代基础并且以某种"更好的"方式阐述其见解的过程中存在着某个理智方面的逻辑矛盾,但是肯定论者从解构和重构转向了建构。例如,虽然怀疑论者和肯定论者都抱怨污染、贫困、社会风气不正和都市的没落,但是肯定论者更可能通过提出一些计划以实际行动来防止污染,改善公共交通,为穷人提供较好的

公益住房，以及创办更好的学校（Bauman 1987：190）。假如现代性威胁到了地球的生存，那么这只会促使他们去获得更高水准的政治参与和新的行动形式。假如他们的后现代主义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示，那么他们很可能会重视压迫并坚持卓有成效的政治策略。假如它更多地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那么政治行动本身便会变成一个目的，一个因其自身而重要的行动。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重视一般民众的活动，注重自觉自愿的联盟，主张开明地对待其他的世界观和不同的政治倾向。他们并不一味地主张自身一定是高人一等的，相反地，他们愿意同政治学、文化和艺术诸领域的各种团体互相取长补短、和平共处；他们寻求蕴涵着各种利益的、围绕着特定问题而展开的共同事业。但是他们也并非不想得出常规的立场。形成某些广泛而兼容并蓄的价值立场是一项需要慎重考虑的任务；它需要有某种相当老练的外交手段和某种交换意见的能力，那种能力不会把教条主义的权威归属于任何一个人。

肯定论的后现代政治和社会运动（有时在文献上被称为当代的或批判的社会运动）已经被人们规定为是对于所有以前存在过的社会运动的反面模型（countermodels）（Calhun 1990）。[①] 但是它们也可以被看作是对于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各种社会运动的诸矛盾要素的一次折衷性的重新组合。无论怎样，后现代社会运动既不相似于旧左翼也不相

① 有人认为旧左翼和传统右翼政治运动是正在衰落的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Elkins 1989—90：57）。

似于新右翼。后现代主义者们强调一种宽容的政治多元主义，这种多元主义同以往的教条主义和严格的意识形态标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不信任正统的政治党派，因为它们“必然地成为官僚主义的、腐败的和不民主的”(Tucker 1990：76)。后现代社会运动不想替工人阶级辩护(Heller and Feher 1989)，因为他们视工人阶级为反动的成过时的阶级，再分配的策略不是他们的计划的组成部分。他们也不替作为旧左翼核心的社会利益作斗争，诸如社会福利或失业保险。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诸如此类的帮助只会带来各种问题(Luke 1989c：210)。他们期待着新的政治形式，那些形式超出了以解放为目标的范围，因为“敌人”——假如他们还存在的话(Vester 1990：7；Walker 1988：154)——与其说还是资本家和老板，倒不如说是官吏，中央政府和“民主地”推选出来的代表(Melucci 1990a；Kellner 1989a：220)。

肯定论者选择的是“生活政治学”而不是“解放政治学”。肯定论者认为，解放政治学之所以遭到拒绝是因为如此之多的旧式社会运动都标榜是解放(从不平等和压迫中寻求正义和自由)，但是结果表明它们仍然是压迫性的。此外，任何一个解放计划都包含着“一个总体方案，一个前后一致的计划，一个项目”。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更向往“生活政治学”，生活政治学被公认的含糊术语定义为亲密性、全球化、自我实现和一体性的认同(统合)。他们“试图增进为全人类实现一种充实而令人满意的生活的可能性”(Giddens 1990：150—55；Vester 1990)。

现代政治运动，以旧左翼为例，具有以下特点：它有高度结盟的和同质的全体成员，有一个战略上有效的、层层相因的组

织结构，以及一个（充满希望地）被明确指定的、极有性格魅力的领导层；然而新的后现代运动却与此不同。它们的成员是有意地异质性的，并且跨越了各种社会类型，诸如阶级。它们除了希望其成员们能够非全日性地、暂时地献身于此项运动以外，别无所求。由于缺乏相互协调的组织结构，它们是分散的、局部的、零乱的和片段的。不存在稳定的后现代领导层；领导者通常很难得到确认。现代社会运动有长期的战略，并且希望能风行数十年，而后现代社会运动却没有这样的想法。它们是"由各种此消彼长的团体和策略交织成的一张网"（Vester 1990:4）。

现代社会运动的计划是务实的和功用性的，但是后现代主义者的计划难得有条理性，难得经过深思熟虑的推敲论证，它们几乎从来不是计划性的和指导性的计划（Vester1990）。假如说现代社会运动是为其成员谋求物质利益的话，那么后现代的目标则是更加模糊不清。不过，一般而言，它们具有反系统和反其道而行之（头足倒置、倒行逆施）的倾向。试图对文化和情绪产生影响的希望有时代替了更加物欲化的目标。如果说是贫困推动了旧左翼社会运动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是受到了痛苦和焦虑的触动（Offe 1987）。他们更看重现行的政治实践本身，而不太关心某个精心策划的战略的成功与否（Agger 1990:19；Walker 1988b:117）。他们一般以和平为出发点，而不崇尚暴力（Falk 1990:227）。不过，批评者怀疑他们的政治有效性（Melucci 1990b:15）。

后现代政治活动一般是以如下方面为目标的：激发斗志，提高觉悟，考察统合政治学，为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人物提供机遇（Luke 1989c:209,235）。在力求达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它运

用了一种新的风格，一个新的政治议事日程和一种极其不同的内容。[1]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强调认识与存在的新观念，这些新观念促成了一种政治学，在其中人们更有意识地关注于语言和谈话。后现代主义者寻求政治运动的新途径和新空间（Walker 1988a:98—99）。这意味着他们不关心国家，因为他们没有要求"攫取权力"的欲望，他们更关心的是周遭的、局部的、地方的和社区的事情。小的就是美好的，而自治则是一个先决条件。后现代社会运动是阐释性的、关联性的（互为文本的）运动；它们试图对日常生活的似乎是非常疏远的结构产生某种影响（Walker 1988b:63，第7章）。他们要求主体的回归，而且，在政治学领域里，新的后现代主体的特定性格正在形成：在那里，后现代个体（主体）除了面对现代代理机构和权威以外已别无选择。[2]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不是提出一个宽泛的政治纲领，而是针对特殊论题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例如，1988年春，由于在欧文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允许小卡尔斯基公司的汉堡包在校园里出售，由妇女、动物权利保护组织、日裔美国人、同性恋者和残疾人共同组成的一个联盟组织了一次联合抵制和纠察队。散发的传单表明：正是多种多样的动机促使这些组织走到了一起；每个组织都有各自的怨愤，但是他们都一致同意：小卡尔斯基必须滚蛋。

---

[1] 在方兴未艾的后现代运动和更现代的政治制度结构之组成部分的人员之间显然几乎没有取得有效的沟通（Melucci 1990a）。不过，后现代运动看起来确实对比较有条理的政治机构和合法机构产生了影响，如，世界观察协会（World-watch Institute），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和海外发展理事会（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Falk 1989:22）。

这些积极的肯定论者的政治倾向向社会科学提出了某些特殊的要求。这些后现代主义者要求拥有一种激进参与的社会科学。它必须超越现代社会科学,因为现代社会科学受到各种繁文缛节和僵化的方法论程序指导的束缚。它必然地应该是一门干预主义的、出自本能的和不可预测的社会科学。由于肯定论者不反对任何绝对意义上的知识主张或理性,其中许多人仍然重视和利用着某种被复兴的社会科学,后者在本质上相似于它的现代式样。

新世纪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

许多新世纪的"感受"(sensibilities)都是属于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的,但是其政治倾向却与其他肯定论者的政治倾向

---

② 并非所有的后现代社会运动都是直接地致力于政治活动的。对于那些试图在后现代主义的怀疑论形式和肯定论形式之间建立联系的人来说,语言学上的、概念上的和定义上的事务往往取代了政治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于那些真正厌恶调和折衷的、制度化的和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的人而言,乃是不可避免的。假如他们提不出明确的目标,假如他们认为具体地谈论"需要做什么"和"如何做"之类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Walker 1988b:137,154),那么他们除了强调语言学的细微差异之外便别无选择。例如,沃克(Walker 1988b:117—28)就解释过后现代和平运动如何通过使"国家安全"超出军事观念的范围而重新定义了这个概念。这个运动要求一个拓宽了的安全定义并且从局部的、地区性的和个人的处境等各种境况下来探讨安全问题。他们把安全的需要集中于人民身上,而不是集中于国家、精英人物和特殊利益集团的身上。他们把安全问题同更高度和更可靠的民主联系起来,把它同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国防政策制定方面有更多的民众参与联系起来。他们把国家安全建立在这样一种政治集团的基础上,在那里暴力只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最后诉诸的手段。他们接受"脆弱性"是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的观点,他们不接受视它为人类为了达到"无懈可击"而必须作出更大努力的一个指示物的观点。但是这种政治活动仍然是潜在的而非完成了的。他们尽管提出了重新概括和重新定义方面的挑战,但是不一定会产生任何具体的变化,假如他们只停留在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水平上,情况尤其如此。

有着重大的差异。[①]新世纪的后现代主义者不喜欢分析的、科学的和理性的事物，他们更喜爱情感上的、非理性的、神秘的和魔幻的事物（Capra 1982）。他们专注于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所有事物，因此，例如，他们提供了理解妖魔鬼怪的住所的指南，并且安排人们去参观常有妖魔鬼怪出没的房子。他们非常相信轮回转世说，因此他们投入大量精力来发现前世生活的各种细节，超自然现象和神秘学也极其风行。非机构性的宗教和新的灵性事物成了核心焦点；这是被当作现代有组织的主流新教或"一元的、普遍的天主教成犹太教的一个替代物"而提出的。异教和泛神论作为后现代宗教而回归。与宇宙性和神秘性的本质相适应，两者都包含有"对于古代和原始民族的精神智慧的庆典"（Fox 1990:37）。有人被黑暗女神、第六感官、神秘、耶稣生活的"失传"岁月、占星术、天体朝圣、算命占卜、特异功能、未卜先知、风水、超感觉力（ESP）、手相术、吸血鬼、狼人、大脚怪、有生命的木乃伊等等弄得神魂颠倒，六神无主。

他们对于后现代多元论和宽容所作出的努力吻合于某些特殊的宗教感情，后者不同于传统宗教的宗教感情，并努力试图使人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诸如"牵引"和"净化"之类的技术被用于开发各种"力量"，以平衡和调整人的心灵能量，而这

---

① 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活动——它的相对主义、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培育了各种新世纪的社会运动，后者注重唯心主义的热情，宗教体验，千禧年主义和其他相似的现象（Bordewich 1988）。例如，德里达的作品在某些心现治疗小组中被指定为必读书目（Anderson 等人 1988:16）。还有，埃哈德的研讨培训班（Erhard's Seminar Training）及其后来的讨论会（The Forum）都大量地吸收了海德格尔的哲学（Gottlieb 1990:23）。

有助于促成那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有时对宗教体验的探索集中在飘逸出肉体之外的感官力量，即到某个异地的精神漫游，或进入另一个人的肉体之内的精神漫游。

新世纪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寻求更深层次的启示信息，它们来自自我的内部或太阳系以外的宇宙。冥想，《易经》，阴相，阳相，神秘的东方宗教，各种瑜伽，以及礼仪上的法术都是例证。比较传统的但仍然是后现代的科学学教会(Church of Scientology)和统一教会(Unification Church)以及它们的世俗对应组织，春生学会(Life-spring)和埃哈德的研讨培训班(EST)也带有后现代统合的某些踪迹。女权主义在这个领域也有影响，它引起了人们对于女神宗教、前基督教女神崇拜、阳相的女性意义研究和诸如医治者那样的好的女巫师的作用的注意。

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新世纪的后现代的相应学科。有新世纪嗜好的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倾心于人际关系、新世纪心理学和为自我发现和人格"转变"提供答案的治疗运动。虽然科学知识受到了排斥，但是对于肉体的关注仍然存在；更健康的身体要通过有创意的联想，自我治疗技术的开发，按摩疗法，以及被认为起治疗作用的人体能量场的发现等途径来求得。后现代对于健康的求助手段可以在一些专营水晶饰品和角锥体的商店里被发现——它们发出来的光芒有变形能力并且能帮助人达到"最高的体验"。好的巫术，同坏的巫术相反，被用于改善身体健康。它们传递着同样的信息：不要去相信理性的头脑；现代医学干的坏事比做的好事要多。在第一世界国家的"现代人口"中，一个小小的但其影响力日益显得重要的部分，正在转向后现代的各种选择(顺势疗法，巫术，教士对

信徒的以手抚顶祝福礼),反对与其说关心人类生命不如说更关心利润的各种学说。"深层生态学"运动利用了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环境的关切,并且为新世纪侵入自然科学领域又增加了一个神秘的宗教维度(Elkins 1989—90;Macy 1990)。受海德格尔和古代中国哲学的启发,"深层生态学"是反增长的和整体论的。它确信"大自然的智慧"并且主动地倾听那种渊博的学识被表达出来。"这种生态意识形式是真正精神性的",据说是与宇宙连在一起的(Capra 1982:412)。

过去的仪式得到了恢复。例如,纽约的莱因贝克区恢复了对于圣杯的研究,在那里,有组织的周末提供了对于神秘的圣杯王国的复归,即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的复归,在那里,故事书中关于道成肉身的传说得到了印证;在那里,各种隐士、处女、武士和坏蛋就在附近,因为每一个体都在试图"创造"其新生灵魂并且寻求同过去发生联系。[①]

新世纪运动研究古代的礼仪,以期发现某种或许同今天有关的东西。从17、18、19世纪流传下来的关于这些事情的著作最近正大量出版。19世纪神秘社团的入会仪式得到了再版。默林[②]的神秘生活和仪式正在得到研究。记载凯尔特人魔术的书籍,古北欧文字,以及它们的北欧日耳曼宗教体系都具有实质上的重要性。正如来自东方的星相说一样,那些来自古印度的各种神秘学说也大受欢迎。有人对古代妖术、毒药、迷药、巫术和恶魔进行了研究。一些教育节目教人如何

---

① A·L·戈德曼,"一个成人治疗营对圣杯的探索",载《纽约时报》1989年8月21日,B1,B4。

② 默林(Merlin),中世纪传说中有名的预言家及魔术师,约瑟王的助手。——译者

诅咒敌人，如何催眠甚至诱导死亡，以及如何躲避别人施加到自己身上的符咒。以前的那些预言家，例如诺斯特拉达穆斯[①]，得到了广泛的解读。

这些反理性主义的后现代新世纪运动明显地是肯定论的和政治性的。他们强调"全体的统一，合作，宽容和通过自我理解而求得的真理"。他们的政治倾向是反理智的，因为理智者（有知识者）传播着现代科学和理性的价值观念。其中许多人是千禧年的信徒；他们都是哲学唯心论（理想主义）者，这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也产生了影响。他们反对传统的政党。他们把共和党人同正统宗教、传统家庭和旧式道德观念联系起来。致力于社会主义、世俗人道主义和政府干预的民主党同样激不起他们的兴趣。这些新世纪团体不讨论蕴含着较高价值体系（与逻各斯中心论相一致）的论题，诸如种族、正义、均等机会和肯定的行动。"新世纪一般的思路是把这些问题看作只不过是一种精神状态而已"（Bordewich 1988：43）。

新世纪者主张，虽然他们的社会运动在目前是散乱的和零碎的，但是一旦取得了"众多的批判的意识"，新的统一的政治形态将会出现。而且一旦他们聚集到一起，他们就将形成"一股强有力的社会变革力量"（Capra 1982：45，418）。但是，即使在现在，从地理分布的情况来看，在那些存在着大量的新世纪后现代主义者的地方，他们成功地支持着与之持有同样观点的那些政治候选人。[②]

---

① 诺斯特拉达穆斯（Nostradamus，1503—1566年），法国星相学家。——译者

② 这些运动的拥护者们来自美国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成员在像他们这样的人高度集中的社区内，并不被当作怪诞的或反常的，譬如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巴尔德地区，就是这样（Bordewich 1988）。

新世纪团体的成员已经在某些社区行使了实质性的权力并且产生了影响。新世纪企业家们和私营机构的领导者们支持与自己见解相同的候选人参与政治角逐。与新世纪有牵连的政治家们提出了用以发展和扩大他们的听众和选民的计划。作为人选的公务员，他们就有可能按照自己的如下观点行事：精神境界的发展和人格转变的证实，同对于现实的确切把握一样，是衡量某人"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一个有效的指示器。在科罗拉多州的巴尔德地区，社区卫生部主任，社区医院各医疗单位的护士长，地方社区大学的管理人员，小学校长和教师们都是新世纪的信奉者。在社区大学开设的课程中，包括了牵引术，水晶研习班[①]，同步性，《易经》，占星学的超人格维度以及炼金术。东方式的冥想在小学里得到传授。声誉好的企业（占了 500 家幸运公司的一半）或雇佣了"新世纪训练者"，或购买了为提高雇员业绩和增加利润而设计的产品（Bordewich 1988：42）。

新世纪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向正规的政治体系提出了挑战，但是他们并非都不相信直接的政治行动的效力。有的人主张"外在"现实是无法改变的，只有人格的转变是有价值的和能实现的（Bordewich 1988）；一个人必须努力地"改造自我"。另一些新世纪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也放弃了当前腐败的政治基础，而致力于"体系"以外的"公民外交努力"。例如在 80 年代初，一个新世纪小组带着"让全世界都充满着和平的'精神气息'"的愿望，把苏联学者和美国国防部成员聚集

① 水晶球常被用于占卜，故此研习班主要探讨如何用水晶球占卜的问题。——译者

到一起进行商讨。某些教育节目，诸如“世界公民课”，运用“《易经》和体外体验作为使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达到形象化的方法”(Bordewich 1988:42)。

像其他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样，新世纪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在理智上也是前后矛盾的。虽然现代元叙述受到了拒绝，但是他们自己的局部叙述，他们亲身经历的“故事”，往往是包罗万象、总括一切的。尽管宗教的复兴是新世纪后现代主义的组成部分——而且在通常情况下是普遍的和多元论的——但是其中的有些宗教是更加原教旨主义的(fundamentalist)(重要的)(Heller and Feher 1988:6)。尽管提出了宽容的要求，但是有些新世纪后现代社团却是排他的和不宽容的。

一些新世纪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相当多的社会科学形式是重要的，但是另一些新世纪后现代主义者则通过主张他们自己的宗教或思想体系提供了所有必需的答案而拒绝了社会科学。具有更强烈的选举倾向的新世纪后现代主义者会毫不犹豫地利用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假如这种知识有利于他们的选举的话。假如一门后现代社会科学能够被建构得包括神秘的和魔幻的因素，那么他们也许会欢迎它。但是后现代的新世纪情愫是如此地纷繁多样，以至于很难创造出让它们都能够接受或对其都有所帮助的一门社会科学。

第三世界的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

在表面上，后现代主义好像首先引起了西方人的兴趣，第三世界似乎很少关心这股思潮(Calhoun 1990;Flax 1990:190—93)。但是更加仔细的观察表明：在第三世界，现代社会的和

政治的运动正让位于政治表达的新形式；在某些情况下，第三世界出现的社会现象具有相当程度的肯定论的后现代的特点。假如现代性已经挫败了第三世界，那么后现代似乎正以其多样性和随意性允许并鼓励第三世界有选择地留意过去和折衷地重建现在。

第三世界的现代政治危机也许不同于其他地区遇到过的政治危机，不过它似乎有可能促进后现代的社会运动；这场危机的总影响仍在悄悄地扩散着。苏美关系的缓和及其友好关系的建立可能意味着第三世界的被人遗忘；超级大国再也不必为获得支持者而进行竞争。作为冷战时期债务和军备开支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个结果，西方国家的财政需要似乎正在增加。所有这一切也导致了对第三世界的外援的缩减。随着第三世界国家处境的日益窘迫，人们可以有理由发问：后现代主义的感染力是否就不会增加了？

后现代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出现仍然有待于作系统的研究。可以确定的是，像在西方一样，它受到了富足者、绝望者和幻想破灭者的欢迎。但是情况又不仅仅如此。在上海，人们从没听说过后现代主义，但是在加尔各答，与唯灵论混杂在一起的后现代主义以某些出乎意料的形式风行一时。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解放运动、时髦的现代主义和信念的失败似乎已经开辟出了一条通往反系统、反民主的后现代运动的道路。今天，第三世界的后现代社会运动正在日益怀疑为夺取国家控制权而作的种种努力，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旧左翼)在它们成功地获取权力的地方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Arrighi 等人 1989)。[①]

后现代的论题——包括反启蒙的观点，反现代的态度，向

基础主义的先天灵性的复归，反科学的情愫和反现代技术——在整个第三世界正在激起日益增长的兴趣。在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中，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沿着这些路线提供了第三世界后现代话语的一个例证。一个虚构的原教旨主义的宗教领袖通过电台从伦敦向他在中东的追随者们发出号召，声称现代的历史、进步和西方的时间观念都必须予以谴责。"历史是邪恶之王、大撒旦的麻醉剂、杜撰物和专利品，进步、科学、权力都是最大的谎言……历史是人间正道的偏离物，知识即是谬见，因为知识的总和早已完结于安拉结束了向穆罕默德启示的那一天。我们将揭去历史的面纱……而且一旦历史之谜得到破解，我们将看到充满着荣耀和光辉的天堂屹立在那里！"而且到那时，"托钵僧的暴政必亡，美国的暴政必亡，时间的暴虐必亡！我们寻求来世，寻求上帝的永生……我们焚毁各种邪书而唯信圣书"(Rushdie 1989:210—11)。

第三世界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被假定为"现代"的同义词的西方观念，已经对他们原初的本土文化的纯洁性产生了一种恶劣的影响。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主张回到过去：追寻在他们自己的、现已丧失的古老传统中所有曾被看作有价值的和神圣的东西，放弃殖民势力获得的一切，找回数十年来西方帝国主义所废弃和毁坏的一切。第三世界的后现代社会运动表达了一个人们仍然记忆犹新的——尽管是被理想化了的

---

① 第三世界的许多共产党正在修正他们的角色。在莫桑比克，共产党声明自己不是工人阶级的执政党而是所有人民的先锋队。尼加拉瓜的桑地诺主义者已经不重视马克思和列宁而强调反美主义和民族主义。

——传统社会，那个社会经世代相传而源远流长，现在正在得到重新肯定。后现代主义鼓励把这种怀旧活动当作克服现代的一种办法(Vattimo 1988：第10章)。这种活动的结果不是复古，不是对于传统主义的一次简单的重新肯定(Baykan 1990：137)，而是某种在性质上新的、不同于以往的东西。有时它采用了现代和非理性之松散联系的形式。例如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学生主修现代医学和计算机科学。这些现代元叙述和他们自身的宗教信仰体系之间的任何矛盾都被忽略了。

另一方面，这些第三世界的后现代主义形式在理智上存在着矛盾。第三世界的后现代主义者虽然拒绝西方的真理主张，但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坚持自己的真现并确信它优越于任何其他真理。他们谴责为殖民者辩护的任何主张。但是他们不是去推翻或反驳那种主张，而是寻求用某个同样充满霸气的——尽管是本土的——作家的主张取而代之。例如，盖特丽·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是一名印度女权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她批评了现代作家描述第三世界的方法。她更多地受益于德里达而不是福柯，她认为印度法律一直受到英国殖民势力的误解。她确信这些误解无法借助于现代社会科学而得到纠正。它们必须通过对于“别国宪法的技术构成”的理解才能被解构、被推翻和被重新揭示。她提出寡妇自焚殉夫作为一个例证，后者是鼓励印度寡妇自焚殉夫的一种宗教规范。她告诉我们，英国殖民官员在抢救这些妇女时是误会了，也是被误导了；这样做也就是把英国人的价值观强加于她们身上，它否认了这些妇女自己的任何呼声。自焚殉夫的妇女把这种行为看作是自己的值得赞赏的选择，是可被效仿的行为的一个例证，是道德优越感的一个象征(Spivak 1988：271—313)。

斯皮瓦克完全赞成这些妇女，同时她一再表白自己无意为寡妇的自焚殉夫作辩护；她的明确的意图是对它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后现代不愿意作出判断，这种迟疑态度怎么也不会允许斯皮瓦克提出如此明确的主张。但是她的分析所具有的政治意蕴将不会禁止对寡妇自焚殉夫的活动重新予以合法化，而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

现代价值观念对受到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和宽容性鼓励的第三世界的许多传统社会制度提出了质疑，于是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妇女的一般角色就是一个例子。第三世界的后现代主义为要求女性采纳被其祖母辈抛弃的穿着形式而提出了某种辩护。它考虑到了重建传统婚姻角色中的妇女的从属地位的问题。它在一定的时候被用于恢复男子的特权，到那时，衡量女子品质的首要尺度将开始发挥某种作用。"存在着一种对于妇女的抗拒。有人失业，就怪妇女占据了工作位置；有少年犯罪，就怪妇女离家上班；公交车拥挤，则怪女人们要挤着车去上班。"[①] 第三世界的后现代主义确实不应对这些倾向负全部责任。不过它恰好被用来鼓励原教旨主义和反动的保守力量。

第三世界的后现代主义对于政治参与风格的强调甚于对于效果的强调。如果说在一个西方的、后萧条的社会里，"生活政治学"比"解放的"政治行动得到了更多的强调，那么，其影响就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要小得多。在第三世界里，生活政治学优先于解放政治学的理论可能会延长痛苦和苦难

---

① 引自《纽约时报》1989年9月23日第4版，作者哈达·巴德朗为埃及儿童与母亲国家委员会助理主任。

(Larsen 1990:xivi)。

第三世界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已经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某些后果。在这些后现代主义形式得以传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现代社会科学没有什么价值。当然,在第三世界,现代社会科学可能会同从根本上不相容的、甚至敌对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一起继续存在于非对抗性的矛盾之中,正如这些国家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不顾其信仰和基本假设的差异而变成了电脑专家一样。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现代社会科学不可能对由后现代主义者统治的第三世界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除非社会科学被完全剥夺关于它除了"讲故事"以外还能有所作为的期望,否则它就不可能受到宽容的对待。它将决不会得到向主流宗教体系提出挑战的许可。能同第三世界的后现代主义相匹配的社会科学的后现代形式也许会被发明出来,但是时至今日它还不存在。

后现代主义是左翼还是右翼?

证明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政治现象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要令人信服地证明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左翼(Cantor 1989)还是右翼(Foley 1985)却是件困难重重的事情。不过这两种情况都得到了充分的论证(Huyssen 1984:49;Jameson 1984b:55)。在这一问题上观点的分歧或许表明,后现代主义(或解构)要么是非政治的,反政治的,政治上模棱两可的(Agger 1989b:103—15;Dews 1986;Malkan 1987:129—35),要么是对政治充满矛盾心理,既爱又恨的(Fraser 1984:142—43;Gitlin 1989:56)。

在1987年和1988年，关于后现代主义政治倾向的阴暗面的问题因海德格尔事件而引起了德国和法国公众的注意，因德曼事件又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注意。海德格尔启示了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德曼据说是把德里达的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解构方式引入了美国，从而为它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运用带来了间接的影响。关于这两个人我们知道些什么呢？他们都曾经积极地拥护纳粹党。两人都被发现故意隐瞒或者否认他们与纳粹有牵连的情况（Farias 1989；Wiener 1988；Lehman 1988）。德曼从未公开承认他与纳粹党的联系（Donoghue 1989：36）；不论是他还是海德格尔都未曾宣布过与纳粹主义或者希特勒断绝关系（Atlas 1988：69）。[①] 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由于海德格尔和德曼对后现代所具有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本身是否内在地有偏见，内在地倾向于右翼呢？

在随后的关于后现代主义之政治倾向的讨论中，看来很清楚的是：并非每个谈论后现代主义政治的人都在讨论同一个后现代主义。区分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我们了解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倾向，但是辨明这种差异并不等于弄清了所有问题。例如，阿格就认为，拥护现存社会制

① 由德曼事件引发的各种反响已经搜集于由哈马切尔等人编撰的著作（Hamacher等人1989）中，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德曼要是没有辩护人，也是不行的。希利斯·米勒明确地否定了涉及德曼的各种断言（Miller 1988：676）。德里达也有类似说法：考虑到当时的背景，德曼的行为虽然“不值得称道”，但也是可以理解的（Derrida 1988）。沃尔特·肯德里克（Kendrick 1988：7）开具了一份目录和一份更长的辩护者名单。弗朗索瓦·费迪耶（Fedier 1988）对海德格尔的批评者们作出了答复。这些辩护采取了若干不同的形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辩护者是想要为纳粹党本身作辩护的。

度(establishment)型的后现代主义是右翼的,它脱离社会实践并且倾向于平息政治活动;激进型的后现代主义则是左翼的、颠覆性的,它以这种形式履行着"启蒙——理性、自由、正义——的使命"(Agger 1990:10—19,33,44—45)。

"左"和"右"这两个术语本身就为定义方面的问题所困扰。两者看起来如此泾渭分明的差别在30年代却一度变得模模糊糊;直至今天这些差别也还是不清晰的、混乱不堪的。左和右的意义已经有了引申,有时甚至被颠倒了过来。[1] 而且,有的时候,作者、文本和概念都既可以从左的观点来解读,也可以从右的观点来解读。[2] 特定问题也不再处于非左即右的独有领域的位置了。那些反对征兵、反对妇女参加武装部队、反对色情作品的呼声来自从左到右的整个政治领域。对在堕胎问题上主张人工流产为合法的态度的问题也可以作如是说。一个人左的或右的政治倾向已不再预示其是赞

---

① 历史上,左翼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右翼注重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的首创精神,即便它们对于集体来说,是代价昂贵的。左翼鼓励积极的干预主义的政府;右翼提倡最低纲领的国家。右翼相信竞争,相信市场机制的自由,以确保一个健康的经济和为全体提供最高品位的生活。左翼更喜爱政府干预、计划和更公平地重新分配社会资源政策的立法。数年以前,关于这些问题的一致看法就已消失。例如,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会主张反对这种左倾立场而赞同国家的消亡。

② 强调客观性习惯上被看作是左翼的,但是今天它被说成是保守的(Graff 1983; 150—53; Gibbons 1985)。同样,那些其哲学鼓舞了怀疑论者的后现代主义、尼采和海德格尔的人,曾经被断定为右翼哲学家。在80年代初,他们又受到了来自左翼的高度尊敬(Graff 1983: 151)。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的是:他们既可以被看作是左翼的,也可以被看作是右翼的(Norris 1988: 190)。还有一个例子是:多元主义的解释一直被当作是保守的,但是另一些人认为它允许一种"怎样都行"的方法论,而那种方法论不仅不是保守的,而且反而不谈政治,并且是完全适合于后现代主义的(Gibbons 1985: 777)。

成还是反对社会低层人员日益增加的政治参与现象（Rosenau and Paehlke 1990）。

尽管海德格尔和德曼与纳粹有牵连，但我觉得还是难以断定后现代主义具有内在的偏向。它的本体论和它的深奥的认识论，尤其是与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相联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既可以按照左翼的观点来解释，也可以按照右翼的观点来解释，况且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①后现代主义容许具有对立的政治含义的、不同的读本的存在。所以，那些想接受某种后现代主义观点的人不必担心为此也要采纳某种左翼或右翼的观点的问题。但是缺乏某种特定的政治身分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中立。左翼阵营中的某些人把后现代的分析视为左的，尽管他们的许多同仁坚信后现代的分析基本上是右的货色。右翼阵营中的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同样存在着分歧（参见 Rosenau，forthcoming）。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后现代的方法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演绎主义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拒

① 我的意思不是说在海德格尔和德曼事件中观念和行动、哲学和实践之间就不存在联系。在思想和政治抉择之间通常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要从具体行动中分离出抽象观念来是件极其困难的事。一旦某个价值取向被确定下来，某个背景被指定下来，实施的有利或不利条件被概括出来，那么，比较抽象的原则的左的或右的后果便会清晰起来。此外，不同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陈述的抽象水准。可以肯定的是，某个学说在其创造者的生活中的体现——本例中的海德格尔和德曼——是在发现其后果方面应予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个证据很难说是独一无二的。虽然这两人在形成后现代主义和解构理论方面是举足轻重的，但是他们并非单独地控制着它的发展。

绝后现代主义。[①] 那些强调他们自己的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之间存在着连续性的人(Vaillancourt 1986a),或许赞同后现代对于"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批判(即认为它的原则、实践和范畴是压迫性的并且通过强制手段保持其统治地位),但是他们发现后现代的解构方法存在着缺陷。他们批评说,这种方法试图成为批判的,但却没有注意到这场讨论的内容。他们指出,后现代的解构方法忽视了对人类压迫的具体现实。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本身是颓废的、政治上倒退的(Davis 1985:109),甚至是反动的(Eagleton 1981;Foley 1985:114, 118; Malkan 1987: 154),后现代主义被认为是迎合了新保守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迎合了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世界性思潮。它的悲观主义和反官僚主义——反对等级制度,反对国家权力,反对行政机构——的政治观点与其特别保守的社会政策是相一致的,后者如排斥行政管理、私有化和削减社会福利等。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用颓废的语言转述一体化的现代主义,是对里根主义的一种调情"(Davis 1985:114),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护卫(Harvey 1987)。[②] 马克思主义者优先考虑的是经济的变化,后现代主义的分析

---

① 这里提到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几乎没有人承认后现代主义的怀疑论和肯定论形式之间的区别,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些问题也不属于他们的讨论范围。

②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承认,在其最具批判性的形式里,解构揭示了社会下层的困境(Agger 1990: 203, 213; Harvey 1987: 279—80)。有时候,它否认主流话语的合法性。它破除了意识形态的神秘性并且批判了意识形态,它还打破了男女二分法(Eagleton 1981, 1983)。但是他们认为,其中没有一项活动反映了它的重大冲击力。就其鼓励自我表现和自我肯定而言,后现代主义是激进的,即便如此,也并不能使它成为左翼的,因为它已经丧失了社会正义的所有意义(Bauman 1986—87: 64—68)。

强调语言、交谈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否认语言是自主的，因为语言是与意识形态、阶级、背景和历史纠缠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后现代局限于语言的狭隘性使之把任何一件事情都归结为话语，这又使得后现代主义成为轻浮的和反政治的流派。他们断言，后现代主义对书写的专注促使它“将语言当作解决困扰社会的诸种社会问题的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而确立起来”(Eagleton 1983)。

反对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作者(主体)对他(她)的政治行为负有责任，他们责备解构方法并未准备触及这个问题。他们毫不含糊地认为，应承担剥削和压迫的责任的是特定的角色，诱发因果关系和担当政治代理的也是特定的角色。他们指出，当后现代主义者把作者排除掉时，也就极大地限制了追究责任的可能性，这样就为那些剥削工人阶级的人开脱了责任(Wood 1986)。他们批评后现代主义者在分析文本时，不考虑作者的动机因素，没有直接关注各种权势关系，其中包括可能利用文本作为掩饰或操纵的一个背景的作者。没有作者，没有动因，一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是不可能的(Eagleton 1981：109)。

这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的许多人都对后现代的认识论提出了反驳。他们的论辩集中于辩证法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认识论的客观主义者；他们认为，实在是独立于观察者的，后现代主义者是哲学唯心主义者(Foley 1985：125—30；Larsen 1990)。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的是一种具体的、辩证的方法(Vaillancourt 1986b)，而后现代主义者不承认这种方法。德里达的解构方法消解了两极因素、二分因素形式的对立，但是他没有提出第三种类型的结构。德里达

说，如果这样做，那么势必要提出一种同样排他的、令人不快的折中立场。与之相反，德里达要求取消所有这样的逻各斯中心的范畴。但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却需要以综合为形式的第三种类型的语词结构，这种综合紧随在正题和反题的冲突之后，它反过来又被另一组两极对立所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与德里达的解构方法是不相容的（Foley 1985：121，127）。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Sarup 1989），批评它拒绝作出价值判断（Comay 1986），批评它支持"反基础主义"。他们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仅仅提供"一种阅读"，而不是"解答"，而他们需要的是解答。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解释是政治性的，是从对它产生影响和制约的政治背景中生发出来的（Eagleton 1983）。他们不同意后现代主义关于所有解释都具有同等的地位并且存在着无限多的同样令人感兴趣的解释的观点（Said 1979，1982）。这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断言他们自己的规范立场、他们自己的反资本主义的价值陈述（Latimer 1984）的优越性，断言确定意义和知识的必要性，批评后现代主义者放弃了"对真理、正义和判断力的基本标准的探究"（Bauman 1986—87：85；Wolin 1984—85：28）。他们遵循以下思路继续他们的论证。相对主义会导致任何政治义务的丧失，[1] 后现代主义因不履行政治义务而维护了这种状况（Kurzweil 1980；Said 1982）。反抗力的这种丧失及其向私人的个人形式的转变证

---

[1] 捍卫解构的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相对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形式，一种政治实践的理论形式。

明，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拒绝“加入到旨在推翻或变革现状的集体事业中去”（参阅 Hartsock 1987：190）；证明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允许不平等的存在和对权力的滥用。“冷嘲热讽式的不偏不倚”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容忍（Callinicos 1985：99）。据说，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缺乏规范性的价值观念并且过分强调宽容，会使后现代主义容易导向虚无主义和纳粹主义。这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非不分地拒绝一切元叙述，拒绝一切理论的做法，为极权主义开辟了道路，尤其是如果一切更负责的可供选择的东西都被拒绝了的话，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某些后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赞成后现代的分析

属于左翼阵营的那些人大多支持后现代的本质立场。[①] 独裁主义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全球性的危机，加快了朝这一方向的进展。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既要

---

① 他们赞同后现代对于人道主义、主体、客观性（Laclau and Mouffe 1985）、权威、官僚政治和科学（Aronowitz 1981）的异议。这些左翼分子认为，支持诸如此类的观念在政治上具有右翼的倾向，他们推断出，后现代对于所有这些观念的反对是左翼的行为（Graff 1983：151—52）。有人怀疑作为终止辩论的符号、作为统一思想的指示器的理性和合理性（Laclau and Mouffe 1985）。他们认为对于理性和合理性的后现代怀疑吻合于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学，因为“资本主义需要理性主义，而这种理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不相容”（Ryan 1982：158）。他们指出，社会主义形式与后现代主义非常相似，也试图超出“理性主义的限制”（Ryan 1982：158）。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赞成后现代对正统共产主义、中央计划和独揽大权的先锋政党的反对态度。推崇无政府主义的左翼分子尤其关注这个后现代倾向，他们把它的意思扩展成：工厂组织的新形式是必需的。

和30年代的自由改革的软弱无力作斗争，又要和60年代的诸如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那样的整体性真理的萎靡不振作斗争。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衰落也是导致危机的一个原因，它促使某些左派投入后现代主义的怀抱。

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对后现代主义产生了好感，他们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①后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原理；他们修正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以适应后现代的参照框架。他们中的有些人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继续，理解为社会的和政治的进步。后马克思主义者也运用后现代主义来表达他们对现代性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不满。E·拉克洛、C·莫非、S·阿罗诺维茨和S·拉希的著作都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分子像后现代主义者一样，是反国家（Laclau and Mouffe 1985）、反等级制度（Lash and Urry 1987）和反中央集权的（Ryan 1982）。他们怀疑对国家官员的任何特许的声援。他们中有人认为，解构可以担当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能够为"建立平均主义的、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提供保证（Ryan 1982：44）。

新马克思主义者仍然保持着他们与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同一和基本联系（Aronowitz 1981），但是他们又指望后现代主义为重振、复兴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灵感

---

① 在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作出区分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两者的倾向都是中间偏左。它们最好被当作允许个体游移于两者之间的交叉性类型。

(Stephanson and Jameson 1988; Woodiwiss 1990)。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建设性的，因为它提醒左派注意自身的假定所具有的弱点（Bauman 1986—87：87—88)。新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的例子包括F·詹姆森和E·W·索娅。[①]

这些赞成解构的左派分子提出理由证明：解构是批判的、左翼的和革命的。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把德里达理解为一个已经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人(Ryan 1981：161；1982)。[②]他们认为解构具有左的政治内容，它开辟了一条革命道路，动摇了现状（斯皮瓦克，转引自Fraser的英文文章1984：129—31)，向居统治地位的话语提出了挑战，而且对等级制度和官僚政治进行发难。他们认为，解构提供了一种抽象的“秩序”概念，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它是激进的（Murphy 1987a)。他们假定，解构主义为边缘群体、妇女、非西方团体、黑人、被统治者、精神失常者、无家可归者和所有被资本主义压迫的人们指出了一条道路。

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本人已经在德

---

① 所有利用后现代分析或向它作出让步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或后马克思主义者都被反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为“修正主义者”、“反革命”和亲无政府主义者（Foley 1985：115—33)。

② 瑞安指出，德里达以前采取的是相反的观点。但他又指出，德里达已经改变了观点，他还认为，如果解构在美国未被看作是内在地左翼的，那是因为文学批判的耶鲁学派和其他的文学学派滥用了德里达的话（很像斯大林滥用了马克思的话）并且将解构描述成非政治的和仅仅是美学的东西（Ryan 1982)。诺里斯赞同瑞安的观点（Norris 1982：91)，认为德里达近来发展很快（Norris 1988)；尽管德里达过去一直是非政治的和相对主义的（这被指责为是错误的)，不过自从德曼的纳粹牵连事件被披露以后，他已经更自觉地从政治上考虑他书写的东西了。

里达之前有所行动（Ryan 1981，1982），是第一个解构主义者（Spivak 1980）。[①]至少，有人会全力支持以下观点：马克思主义和解构可以互相取长补短（Ryan 1981，1982），或者说，解构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所用（斯皮瓦克摘引自 Fraser 1984 和 Foley 1985：122—23）。例如，瑞安提出，通过把注意力引向资本主义的各种对抗力量及其相互矛盾，解构可以修正辩证法，使得它在朝着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不那么直线式和宿命论的，进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更具暂时性（Ryan 1982：43）。

后马克思主义者把后现代主义放在首位并且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辩解。他们断定，马克思本人是开放的、理智的、灵活的，他反对真理性和终极性；后现代主义差不多也是这样（Ryan 1982）。不过，有些后马克思主义者声称，二者的关系已经走向另一个方面：他们提出要解构马克思主义，并且暗示有可能完全放弃它（Laclau 1988）。

在某些方面，新马克思主义者与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有重大差别。后现代主义拒绝元叙述（具有明确的普遍真理性的断言的逻各斯中心论），马克思主义似乎就是其中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德里达在其早期著作中把它当作特别令人反感的东西而挑选出来。后马克思主义还倾向于将元叙述看作是整体性的东西，甚至看作是极权主义的东西。[②]但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说，没有元叙述就没有“变革整个社会制度”的

---

① 阿格令人信服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忘记了马克思只是为了史前史的终结——社会主义，才会保留‘后现代性’一词的”（Agger 1990：19）。

可能性(Jameson 1988:347)。[3]

对马克思的许多概念，新马克思主义者与后马克思主义者都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都不同意所谓马克思的种种概念对于后现代分析具有适用性的说法。后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分析的范畴。他们希望根据当代的政治状况对马克思的"原初原理"进行修正，因为在他

---

② 他们还认为，列宁(或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理论，一个封闭的元叙述，而这决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意图。他们谴责了列宁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单一的历史方向(Laclau and Mouffe 1985)，因为它是"排他的、精英论的、等级森严的和严守纪律的"(Ryan 1982:xiv)。拉希和尤里(Lash and Urry 1987:279)断定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已经不再有效，因为它已经变得"混乱不堪"。其中有些人只是简单地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被人废弃的、过时的元叙述，"它以某些过时的、已被超越的假定为根据"，这些人提出要求超越马克思主义(Aronowitz 1981:126)。

③ 这些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占有优势。他们主张，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元叙述方面是错误的。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它虽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是仍然优越于其他理论，他们希望以一种适应于后现代世界的方式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新理论，这些新理论虽然不是正统的，但是仍然包含了资本主义的范畴，以及它的最终衰亡；因此，他们重新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詹姆森提出了一种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元叙述，它融合了许多后现代思想，包括鲍德里亚对于消费社会的批判(Jameson 1985, 1981)，詹姆森不喜欢那种批判，但承认它是准确的。对詹姆森来说，后现代世界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学"，是一个被扭曲的、散乱的整体网络，它构成资本主义的第三个阶段，一种"生产方式"，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当前继承者(Jameson 1984a;1989:40)。他在后现代世界里看到了一个潜在地大众的和民主的开端，它或许允许某些新形式的政治实践加入进来，而这些政治实践正倾向于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Stephanson and Jameson 1988)。不过，詹姆森的提议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一些人认为，假如他保留整体性和某个元叙述，那么它将把他引向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站在左翼立场上的另一些人则攻击他向后现代主义作出了太多的让步，并指责他的"非政治的千禧年主义"(P. Anderson 1985, 1988; B. Anderson 1987—88)。戴维斯(Davis 1985)指出，当詹姆森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能量的一个标志而不纯然是全球性危机的一个征兆的时候，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支持就过分了。

们看来，当代的政治状况与马克思时代的政治状况是非常不同的。他们争辩说，如果马克思今天还活着的话，他必定第一个赞同这种计划（Ryan 1982：21）。虽然新马克思主义者仍保留着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是他们愿意放弃那些不那么具有本质性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例如，詹姆森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已经不再适宜了，于是他接受了后现代的时空概念。索娅（Soja 1989：75）虽然仍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但是已经用后现代的概念对它们作了补充。

如何修正阶级这一概念以适应后现代的分析，这是那些赞成后现代主义的左派所面临的特殊难题。后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说来是反对阶级分析的，而且他们并不承认工人阶级的特殊作用（Laclau and Mouffe 1985；Aronowitz 1988a：57—61）。所以，他们对于后现代的分析方法排除阶级分析的做法并无异议。例如拉希和尤里（Lash and Urry 1987）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及其作用的定义在今天已难以站得住脚，而后现代主义对于更新这种过时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系统则是有所裨益的。然而，新马克思主义者不那么愿意放弃阶级分析方法。虽然他们对阶级分析方法也作了某些修正，但是他们最终表示仍要保留这一方法。例如，索娅（Soja 1989）试图在后现代的分析范围之内揭示阶级剥削、"性和种族主义统治、文化和个人的反授权以及环境状况的恶化诸问题"。詹姆森（Jameson 1988）也声称他能够做到既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又坚持他认为是进行认识的必要条件的阶级统合概念。鲍曼（Bauman 1987：195）则试图在这方面搞折衷，他一方面承认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富人和穷人毕竟都在同

一个后现代的世界里一起工作。[①]最后，拉菲(Laffey1987:91)告诉我们，后现代主义有可能否定工人阶级的正统性，而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替代者：那些边缘群体构成了一种“代理无产者”。

后现代的分析怀疑权威，而这意味着怀疑马克思主义的作者(权威)。虽然左派总是怀疑别人(不管是耶稣基督、开国元勋，还是现代国家占统治地位的话语)的权威，但是它却不怎么愿意怀疑它自己的权威。在这方面，新马克思主义者同后现代主义的纠纷要超出它同后马克思主义的纠纷。后马克思主义者把后现代主义者看作是反权威的、反主体(个体)中心的。不过，他们却以用“各种随意排列的语言”的形式来充当代理者的身分(Laclau and Mouffe 1985)。他们虽然保留下作者，但是把他(她)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作者有较多的同情，并且对代理的重要性问题容易产生敏感，这对于他们理解政治斗争、对于革命的活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Jameson 1984a:84;1989:41)。

后现代主义并不赋予任何个别的变量或方法以特权；所以，它不同意马克思所强调的经济是分析的首要范畴的观点。[②]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中几乎没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因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早就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经

---

① 鲍曼(Bauman 1986—87:93)认为，同列宁主义具有紧密联系的“重大革命”的模式表明：诸如此类的革命是强行变革的捷径；改良是更加可取的方法，因为人们可以更有准备地接受必要的变革。

② 詹姆森是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这种见解。他认为，正因为后现代主义非常需要一种历史理论，它就应该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求启示(灵感)并完成自己的计划(Jameson 1989:34)。

济因素上了。阿罗诺维茨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经济主义的和"逻各斯中心的"(Aronowitz 1981:127;1988a:57—61)，并敦促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他认为他的这种观点无损于他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坚持(Aronowitz 1988a)。詹姆森(Jameson 1984a)认为，在后现代的世界里文化已经成为自主的文化，虽然他觉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情况未曾发生过。拉克洛和莫菲(Laclau and Mouffe 1985)则注意到，由于3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所进行的抛弃经济主义的尝试受到了抑制，所以，某种因素正促成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衰落。他们说，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者早就会得出后现代的结论了。

许多右派反对后现代主义

许多右派对后现代主义持严厉的批判态度。[①] 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颓废的、非道德的、享乐主义的、机会主义的(Kramer 1982b:40)、破坏性的(Bell 1976:54)、妨碍稳定的(Graff 1983)、无政府主义的、左翼的(Pacom 1989:61;Bell 1976)，是前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避难所(Gitlin 1989)；它造成了对权威的侵蚀；它"攻击动机的和灵魂报应的体系"；它反对对资本主义说来是非常必要的竞争精神(Huyssen 1984)。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正在逐渐地破坏着风俗习惯，破坏着既存的家庭结构和传统的宗教价值观。在社会科学领域，据说，后

① 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右派人物在现代性问题上是分裂的。有的人认为，现代性是"以目标远大和道德高尚"为特征的(Kramer 1982b:42)。有的人认为，现代性同后现代一样都是不可取的。现代的一切都是令人疲惫的，传统宗教对于重建积极的社会关系是必不可少的(Bell 1976:28—30)。

现代主义抛弃了传统的方法和研究方向，却又不用其他什么方法和方向取而代之(Kramer 1984)。

这些保守主义者在若干基本方面不同意后现代主义。他们相信真理的可能性，相信理性，而且相信作为使人类传统世代相传的学科的历史的重要性。他们坚信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反对后现代主义提倡的价值相对主义观点，认为它抹杀了正确与谬误、善与恶、真与假的差别。有些右派同意左派的某些说法，后者抱怨后现代主义是非政治的，批评它忽视了文本的政治内容，批评它不了解政治倾向作为解释的一个有效动机的重要性(Davie 1983)。

在某些保守主义者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出现表明有些事情已经糟糕透顶。他们说这意味着“批评的标准的失效”，意味着“六十年代激进主义又令人讨厌地死灰复燃了起来”(Kramer 1982a:2;1982b;Sayres 等人 1984:10—11)。

某些右派赞成后现代主义

在右翼阵营中仍有人赞成后现代主义，尽管这种赞成未得到充分的展开。问题在于，虽然右派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会间或地存在着与后现代主义基本一致的地方，但这并未导致后现代主义者和右派之间达成严肃认真的政治联盟，因为意见分歧的重要方面仍然存在。例如，在70年代，法国的“新哲学家”运动与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反对理性。在60年代，美国的中偏右政治学家提出多元论来取代“社会主义的”计划理论；他们的多元论定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多元论定义——不断变动的公民群体就各种政治问题构成、分裂和改组形形色色的同盟——是没有什么大的不同的。

某些保守主义者的政治观点与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观点是一致的，尽管可能并非总是出自同样的理由。这些保守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都是反国家、反官僚政治的；他们都要求实行"小政府"，消除大政府，废除福利国家，取消中央政府的权力（Berman 1986—87：62—67）。他们都赞成解除控制，增加个人的选择自由和个人的独立自主（Aronowitz 1988a：49；Rosenau and Paehlke 1990）。在两个阵营中都有人极力论证"历史的终结"（Fukuyama 1989）。

有一小部分后现代主义者甚至就是著名的政治右翼人士。例如S·菲什曾经支持过戈德华特（B. Goldwater）。在70年代，他通过后现代主义抨击现存的制度，在他看来，现存制度在政治上就是左倾的（Berman 1986—87：62；Johnson 等人 1985：89）。菲什还用赞许的口吻声称后现代主义防止了变革。他声称后现代主义的价值相对主义无妨于他的中偏右的政治立场，因为真理只是为特定的理智共同体而存在的，所以真理不是绝对的这一点并不重要。

结论

在后现代主义阵营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观点。有些在政治上是积极的，有些则比较消极。有的人认为后现代主义在政治上是左翼的；也有人认为它是右翼的。由于这种多样性，后现代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的后果（影响）并不是直接的。

绝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的政治观都需要一门被认真加以改变的社会科学。一些怀疑论者想找到一门不甚重要的社会

科学，甚至一个经过修正的后现代社会科学形式。另一些怀疑论者认为，如果社会科学被重建为纯然散漫的理智活动，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了。积极的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由于自己提出的后现代政治计划并不拒绝所有的现代假定，所以可能会利用社会科学知识以达到他们的目标。对于新世纪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和第三世界的肯定论者来说，结果就更加复杂了。

后现代主义不是内在地左翼或右翼的。因此，利用它的那些人并非和它一起无意识地赞同某种意识形态。但是这里再次作出的保证未必就能让人感到十分欣慰。它并不表明政治上的中立态度。它也许只是说明了，后现代主义太抽象，太隐晦，以至于可以被处理得适用于任何一种政治倾向。



评估要点

根据前面诸章所述内容，我在这一章里提出了关于后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概述性轮廓。我对社会科学家们针对后现代研究形式所必须作出的某些艰难选择作了评价。另外，我还评论了在其他地方没有得到阐明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那些挑选出来的批判，并且为后现代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未来考虑了各种方案。

在一个多元(主义)的世界里，任何结论都必然是不完备的，本书所作出的结论也不例外。[①] 按照德里达的分延精神，读者可以选择延期、耽搁或对抗结论的办法。毕竟，结论是以建立层系、具有权威性为目标的。或者读者可以完全重写这一章，可以通过解读过程重新创作这一章。不过，这将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因为这是一个"阅读者的"结尾。[②] 它不鼓励后现代的解释自由。本书作者以一种现代主义者的身分坚持她

---

① J·弗拉克斯(Jane Flax 1990)指出后现代主义不许可有结论。

② 正如在词汇表中说明的那样，一个"阅读者的"文本假定了一个消极的读者，他试图理解作者的意图。这种文本是"书写者的"文本的对立面，后者故意模糊不清，允许多种多样的解释，并且有意地鼓励读者重新书写文本的内容。

的至高无上的在场性，拒绝被他人所忽视。

后现代主义是人文科学留给社会科学的一笔模棱两可的遗产。在社会科学中，有的学科因它而喜，有的学科因它而忧，几乎没有学科会对它无动于衷的。但是它是否真的适合于社会科学呢？有些社会科学家被认为是(这笔遗产的)受益人，并且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它。另一些社会科学家是比较含糊不定的继承者。还有些社会科学家则采取公然蔑视的态度，对诸如此类的遗产一点也不想要。

后现代主义产生于人文科学，而且，它被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或许过于经常地是基于这样的假定，即：在两个领域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差别。后现代主义者借此来为后现代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作辩护。例如，拥护后现代法律的那些人主张法律文本和文学文本是同一的。后现代人类学使人种学和诗学结合了起来(Tyler 1984；1986：138；Clifford and Marcus 1986：4)。[1]

不过话说回来，人们也可以举出相反的事例。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应用或许并没有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它对于社会科学的适当性是另一种类型的问题。在人文科学领域里主体性和思辨也许是好玩的和有趣的，但是社会科学应该是更严谨、更分析性的，它必须把结论建立在理性和此类或彼类证据的基础之上。一个实例可以用来说明

---

① 这种主张也扩展到了自然科学领域：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科学和文学之间不存在区别，两者都不可能求助于某个特殊的实在。两者都被说成是虚构。两者都是文本（Latour 1988：189；Latour and Woolgar 1979：252—61）。两者都仅仅是修辞学（Vattimo 1988）。参阅罗斯诺对后现代科学所作的分析（Rosenau 1992）。

就社会科学和虚构文本的“真理条件”而言，存在着某些重大的差别(Norris 1988:16—21)。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结果具有权力关系的强硬外壳(Hoy 1985b:167)。至少在有的时候，它们同决策的制定是密切相关的，而这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人文科学领域里，假如作者拒绝接受对其文本－事件的责任，那也不会产生什么大不了的后果。人们不会太多地去关心权威有没有消失，代理人能不能被确立起来。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决策者似乎必须承担责任。一个不适当的决定或拒绝作出决定都会对人类生活状况和环境带来严重的反响。这种情况在人文科学中是不会发生的；在那里，允许某个人更从容地对待各种事务而并不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

在文学领域，后现代主义的进展已意味着明确的意义的失落。文学的稳定性遭到了破坏，各种参数被消除。没有什么明确的阅读(解释)被保留下来(Hassan 1987:201)。因而往往是一个无伤大雅而又引人入胜的魔幻般结果的形式。现代的时间、空间和历史在后现代文学中都可以被免去，而结果是使人得到娱乐。但是在社会科学中，情况却并非总是如此。社会科学经常面临许多问题，它们不允许人们退缩，以采取不可知论、虚无主义、语言学的相对主义，或断定人类沟通之不可能的姿态。

按照正被考察的后现代主义形式和知识维度，对社会科学中的后现代主义的任何评价都必须持之有据，言之或理。后现代主义或许会对某些实质性论题的讨论有所贡献，确实，它经常就一系列广泛的论题提出某些引人注目的洞见，因为它以某个文本中不明显的、被忽视的、大多被忘记的方面为焦点，并且考察了各种未言明的、被疏忽的、没有讲清楚的和从

来没有得到明确承认的事物。例如，在国际关系学领域，一本主要杂志从后现代观点考虑的专题有："监视、模拟和计算机辅助的战争演习，武器发送的加速，联盟策略，军备调动，生态的和反核武器运动的地区政治学，国际债务政治学，以及政治机构的产物和变更，等等，这里仅举几例而已"（Ashley and Walker 1990a:265）。结果是富于创新和挑战性的。

就其方法论的重构而言，后现代主义的预测是比较合理的。从一个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它是有严重缺陷的和在认识论上可疑的。在其最极端的、毫不妥协的阐述里，后现代主义产生出显得轻浮的结果。例如，试想一想它对待现代科学的态度。尽管现代科学有错误和不一致的地方，但人们还必须考虑它的利弊。同以前相比，今天活着的人更多，其中有大量的人比以前活得更好更长寿。纵使这一切是在哲学的欠缺和对于线性进步的某个可能的错误信念之下取得的，它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成就。要对提出并取得这项成就的哲学和知识传统提出质疑，如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是一回事情；但是要彻底地抛弃它，如许多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做的那样，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情。后者提出的某种片面的观点既无精妙之处，又无限定条件，因此正在悄悄地损害着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信誉。从这方面来看，后现代主义正像另一股反现代的思潮那样（Lechner 1990；Kellner 1989b:208—9）——那股思潮是颓废的偏激运动的一部分——面临着被人们抛弃的危险（Jay 1988）。

后现代社会科学的实质:概述

后现代社会科学尚处于它的初创阶段,因此像许多早期范式一样,它的整体轮廓和特点还是朦胧的,它的实质性贡献仍然是含糊而零碎、庞杂而多变的。肯定论者试图形成一门新的后现代社会科学,其目标和方法同现代社会科学的目标和方法具有实质性的差异。[①] 但是怀疑论者对某种新复兴的后现代社会科学持有悲观的态度,他们为它设想了一个极其受限制的角色——批判和解构。由于这个缘故,在大体上,构筑一门后现代社会科学的任何一种努力都将更多地依赖于肯定论者而不是怀疑论者。不过,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在其所有形式里,后现代主义都动摇了我们的先入之见,动摇了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的"常规"做法。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一些最具有冲击力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用语词来表达。

肯定论者寻求这样一门后现代的社会科学,它将是宽泛的和描述性的,而不是预见性的和政策倾向性的。他们的社会科学将强调新奇性和沉思性,因为它寻求差异的丰富性,并专注于非常事物、独一无二的事物和原初性的事物(Hirschman 1987)。对这些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对知识的追求导致一种惊奇感和诧异感(Murphy 1988)。它是与意外之物的相遇,一次"通往意料之外的世界的航行"(Graff 1979)。

---

① 现代社会科学强调知识的积累。它在已经获得的知识的基础上继续作出努力。肯定论的后现代模式不寄希望于已经生效的诸如此类的特许的知识实体。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宇宙是不可知的，这促使他们放弃了建立一门后现代社会科学的努力。他们认为世界是零碎的、分裂的、无序的、不连贯的和寻求不稳定性的。在沉思宇宙的时候，他们对于"充满不全面信息、'碎片'、剧变和独断谬论的各种不确定事物、精确控制的限度和各种冲突"感到忧心忡忡（Lyotard 1984：60；Latour 1988：164；Latour and Woolgar 1979：第1，6章）。[①]

在任何新型的后现代社会科学中，积极的后现代读者都将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需要绞尽脑汁以探求文本中的每一个答案，因为没有一个答案是事先提供的。鼓励解释的后

---

① 混沌理论通常被人们说成是支持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观的。但是"无序，混沌，不连续性，不确定性和不规则性"也可以融合于现代科学之中。一门"关于过程而非状态、生成而非存在的科学"正把注意力转向运动、振动和狂暴的旋涡等诸要素。它希望能揭示新的规律，那些规律囊括了这些样式，并迫切要求研究普遍的复杂性问题。研究这些现象的科学家们"考虑到了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进化和有意识智力的性质"。但是他们也赞成混沌是现实的一部分，认为呈现混沌的系统"能够平静下来"；在那些复杂性的形式之内，"结构的诸孤岛"或"嵌人运动网络中的诸样态"可以得到考察，并且等待着人们去揭示。最后，他们似乎赞成"秩序将自发地生发于这些体系之中"。即使"不存在生长点，或生长点的样式"，一种新式秩序也出现了；"样式诞生于无形式中间"。当这些科学家谈论混沌的时候，他们指的是需要进行某种极其复杂的预期或概率性评估，他们的意思不是说"预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系统仍然是"决定论的系统"和"协同体"，它们在那里有待于"被人们去发现"。"剧变和无序交织在一起：那些看似无穷无尽四处乱溅的瀑布其实具有'丰富的结构'。""对混沌的现代研究开始于60年代的一种悄然滋长的认识：非常简单的数学方程式可以将像瀑布那样激烈的体系完全模拟出来。""以前不存在分析诸如生命的基本材料那样的非常规性事物的手段。现在那些手段已经有了。"混沌并不意味着现代科学的终结，而是意味着"一门新兴科学……的系谱学"，它优化了老学科并使其发挥出更强大的作用（Gleick 1987：3—8，30，56，118，153，211，240，299，300）。另请参阅霍尔登（Holden 1986）和普里高津与斯坦格斯（Prigogine and Stengers 1984）在这方面所做的更多工作。

现代社会科学是以作为代理人或权威的作者的不在场为标记的。我们可以期待后现代社会科学文本将更加开放，更少确定性，并且将无视现象的起源。就怀疑论者而言，作为作者的研究者的角色将被取缔。从后现代的研究中产生不出任何无可争辩的结果，只能产生有争议的描述。读者们应该自己从文本中整理出意义，承认他们得出的无论什么样的结论都对任何别的人几乎没有价值，并且避免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他人。其目标将在于探索（而非说明）和创造各种文本，那些文本回避了明确的判断和封闭状态。虽然怀疑论的后现代作者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权威，但是他（她）确实为形式、风格和描述而感到自豪。他（她）力求培植某个不明确的、不稳定的文本。不过，肯定论者在削减作者权力时并没有取消原作者，因而替作为解释者的作者保留了某个小角色。他们没有把所有文本都看作是绝对随意的。

作为个体的人是为怀疑论者的后现代主义所缺乏的，在怀疑论者的社会科学中不存在人道主义的主体、“英雄”人物的地盘。后现代个体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替代品。提倡、辩护被禁止了，只有极少数怀疑论者敢于考虑同其后现代个体观相适合的制度和社会重建问题。例如，那些确实呼唤着不把集体选择或民主决定强加于其成员之上的某个共同体的人，就是这样（Corlett 1989）。沿着与现代主体相妥协的方向，即修正而不是全盘抛弃的方向，肯定论者的“主体的回归”采用了他们的后现代社会科学的形式。他们的后现代社会科学是以过程为目标的。它为社会上敏感而积极的人们留下地盘，以探索某种新式的后现代政治、宗教和一般生活：新世纪，新浪潮，新的后现代社会运动。

假如怀疑论者想要重写社会科学,那么这将是一个以现在为目标的事业。传统的历史将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肯定论者将把历史作为讲故事的一种形式、作为不具特权的一个局部叙述而保留下来,他们将剥夺它的许多威望和影响。于是,正如有关于历史文本的各种各样的消费者那样,将会有许多不同的和冲突的历史。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努力将必然遭到怀疑论者的摈弃。肯定论者则将认为,这些“教训”或许是存在的,但是它们决不会是十分清楚的。他们至多提出暂时的局部的教训,而不同的人将被期待着从历史记录中吸取不同的并且各不相干的教训。

后现代主义者拒绝关于线性时间和可预测空间(地理)的现代观念。有的怀疑论者用后现代的观点(例如,超空间)取代了现代观念,或者说,他们竭力否认现代观念的合法性。在如下情况之下现代社会科学是难以想象的:没有现代的时间和空间,在场和不在场变成了随意的,因果性变成了一种不可能性,现实变成了虚构。肯定论者对线性时间的诘难要弱些。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揭示现代时间假定的强迫性维度。他们以对于局部空间的重视和对于他人空间的尊重取代了现代的空间观念。

就怀疑论者而言,社会科学将不得不抛弃表象,抛弃再现和被再现的客体和主体;研究正如现在所知道的那样,就成了不大可能的事了。在再现的意义上,它决不可能“描绘出”社会世界。它也不会承认再现将要被研究之物以便进行比较分析的可能性。在方法论上后现代的反表象论导致了知识主张的被摈弃,因此,对于最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诸如人种志、人类学和社会学都只不过是一些文学的努力而已,它们在

人文科学中比在社会科学中更加轻松、舒适。

怀疑论者的逻辑——他们对现代知识论、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所有的常规研究规则的拒绝——使他们把任何后现代社会科学的作用都限制在(通过解构的)批判的范围之内。他们会倾向于放弃在社会科学领域建构新知识的努力。[①] 怀疑论者的逻辑包括某个作为绝对地互为文本的社会宇宙观念,包括对于不可约减的不确定性的认可,包括认识论的不可能性主义,或"怎样都行"。他们提出的关于社会科学的任何一种见解都必然是受到极其严格限制的。

怀疑论者拒绝关于理性的现代基本假定,拒绝判断知识主张的所有正式标准。但是他们自己所选择的见解,他们在评价文本时实际地采纳的含糊不定的标准,限制了某种新型的后现代社会科学的任何积极的贡献。怀疑论者虽然对自己的社会科学具有自知之明,但他们仍然会说他们无意于提供"清楚的条理分明的辩护"。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文本不提供"前后一致的论据","并不是所有已证明的论点都是'必要的'"。他们夸口说,"某些实质性问题"是故意"被忘记的"(Corlett1989:第 1 章)。怀疑论者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引导他们放弃"对于把某个一般解释作为一个指导原则来强行灌输"的兴趣(Ashley 1987;1988:95)。他们把目标指向"动摇和揭穿所有要求获得绝对基础的主张"(Ashley 1989a:278)。他们的后现代计划在于"不停地质疑和提问",而不在于"肯定某个新的同一性、可靠性或学术的纯洁性"(Der Derian 1989a:8)。他们

---

① 这一点并不表明认可了怀疑论者的如下论点:他们没有逻辑,没有元叙述。

认为,现代社会科学家们试图予以解答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他们的后现代社会科学只想提供"理论思考的严格持久的整体性"(Ashley 1989a:279)。

肯定论者批判了现代认识论和方法论，尽管他们试图改造它们而不是抛弃它们。与怀疑论者相比，肯定论者对待理性，对待某些用来评价知识的标准的需求，采取了更加矛盾的态度。结果，他们对现代社会科学的批判不如怀疑论者的批判那么绝对，因此就为造就某门可供选择的后现代社会科学作出贡献而言，他们处于某个比较好的位置。这门科学将有意识地回避预见性、实证性、科学性或因果性，而强调信念、情绪和人格完满。这门后现代的社会科学将不提供关于知识、综合和概括之类的任何积累物，而提供复杂性、交互关系，它专注于绝对意义上的差别，专注于独一无二的事物和局部事物（Calhoun fouthcoming b：44)。虽然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会沿着任何方向修正现代的观点，但是他们似乎反对绝对的相对主义，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地要保留着理性和合理性。

肯定论者的后现代社会科学很可能受到了他们的如下做法的影响:他们非常关注处于边缘地区的人,关注被排斥的人,关注对其生活没有控制能力的人,关注那些从来也不知道做一个现代意义上(受控制的)的作家,或者做一个后现代的读者(积极主动的,有创意的,有创造力的)是怎么回事的人。他们的目标是替那些从来也没有作过主体(主动的人)、而相反经常被假定为客体(被观察、被研究)的人作辩护。他们将局部叙述的某些新的呼声和新的形式包括在内,但是他们并不试图去强行灌输规则和责任。

后现代主义者的政治倾向是内在地纷繁复杂和多种多样的，因此，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最终并不直接地提示出关于后现代社会科学的见解。对于后现代方法之左翼和右翼评估的考察表明：左翼分成赞成后现代主义和反对后现代主义两个方面。绝大多数右翼都是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不过也确实存在着支持的情况和一致同意的方面。简要地说，后现代主义既不是先天地左翼的也不是先天地右翼的；正如它否认给于某个解释以任何特权一样，它也蔑视严格的政治分类。

新的后现代政治运动至少已经提上了某些肯定论者的议事日程，那些运动采取了更加广泛和更加可靠的参与和民主形式。虽然对于这些形式究竟将会是什么样子的问题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是有一点已经获得了共识，它们将是干预主义的和偏于过程的（以过程为目标的）。如果说后现代社会科学想要解决什么难题的话，那么它将不得不是介入性的、切题的和积极的，它将敢于处理问题、阐明立场、或者为某些利益集团讲话，以及干预自然状态。其他不太注重参与的肯定论者和新世纪的肯定论者需要这样一门后现代的社会科学：它强调情绪、人的实现、甚至信念、灵性和非理性，但是它既不推崇方法论规则或认识论的一致性，也不过分看重精确性、合理性、规则和责任。这种需要完全可能要求扩充到尚无法预料的领域中去——对于任何后现代社会科学而言，这些领域以前并未被认为是合法的，或是合适的。假如肯定论者的政治要求要表达什么的话，那么其意思具有双重的含义：其一是后现代主义者对于他们杜撰出来的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有不同的期待；其二是任何一种单一的社会科学都难以完全满足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们的需要。

虽然现代社会科学的缺陷是一目了然的，虽然没有人对需要对其作出某些纠正持有异议，但是很难说后现代社会科学是否将能够提供一些富于生命力的替代物。下述事情无疑是不太可能的：在不远的将来，某种形式的后现代社会科学将得到毋庸争辩的认可。从内容上来说，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充其量也不过是最少的——它提供了有限的描述和批判，有时散布着某种沉闷的消极主义。在某些情况下，它会致力于差异，致力于解构它所遭遇的一切事物，而不作任何取代被摧毁之物的努力。在另一些场合，它诉诸于一种破坏性的虚无主义。如果根本就没有任何后现代的社会科学，有些怀疑论者反而会更舒服些。肯定论者的后现代主义提出了许多富于想象力的替代方案，包括后现代科学与神学的综合，这是社会科学向形而上学的事物和神秘事物的开放。但是并没有出现一致的意见，所有这些不同选择的后果至多是一系列无休止的争论而已。

内在一致性和相关性之比较

社会科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提出了某些富于挑战性的问题，并且可能需要作出某些艰难的选择。其中最重要的选择是在后现代主义的怀疑论形式和肯定论形式之间作出选择。在这一节里，我衡量了怀疑论和肯定论的利弊。这两种后现代主义的极端形式——诸如专注于死亡和暴力的新世纪的肯定论者和怀疑论者——比起那些更加规范的变化形式来，对社会科学的益处要少。因此，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怀疑论和肯定论的那些更加温和折衷的形式上。

在其自身术语所适用的范围之内，怀疑论者的后现代主义可能似乎是无法反驳的、前后一致的、甚至是合理的。它的内在逻辑有时会是强有力的，尤其是当人们怀疑现代假定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1] 例如，去掉主体在逻辑上吻合于作者的死亡。象征性地除掉作者——纵使作者对文本不负有任何"责任"——也就是解救了所有的相关事物。提高读者的作用表明，在后现代主义范围之内不存在矛盾，因为读者是复数的，不同的解读表现了后现代的多重现实。许多解释是可能的，所有的解释都是同等有效的。这种文本的开放性使想象力迸发出来。在极端意义上，人们甚至可以接受如下反直觉的见解：读者是由文本造就的（因为根据定义没有文本也就没有读者），与此同时，文本是由读者写就的，正如我们周围的世界是由话语造就的一样。

初始前提一旦得到认同，怀疑论者的后现代主义就创造了一个逻辑圈，一个它自己的世界，一个它几乎无法摆脱的世界。要请后现代主义者回答如下现代主义的问题似乎是不公平的：我们怎么知道此解释比彼解释更好些？因为在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框架之内，一系列两分的对立中没有一个单一的部分可以被判断为是比较优越的。优劣标准是完全不适用的，所有的后现代解释都被假定为是同等地有趣的。还有，这些方法否认建立任何真理主张的目标，而上述现代主义问题则假定了这个目标。批评家们指责后现代主义是破坏性的，

---

① 怀疑论者的后现代主义是以内在一致性为特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任何矛盾。对于这些不一致性的考察将留待下一节进行，这是由于：即便是关于后现代主义合乎一致性的标准的看法也被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个看法蕴含着某个现代的观点。

指责它解构(拆卸)原来的理论,但是没有创造出可供替代的理论。按照它自己的假定,如果知识是不可能的,那么这种批评似乎就是不公正的了。

肯定论者在哲学方面是有意识的,但他们不太关心范畴的认识论的严格性和整体的一致性。他们放弃了理智的一致性,以换取政治的相关性和积极地致力于诸如后现代科学、后现代政治学、后现代宗教运动那样的新计划。肯定论者面临的矛盾是一目了然的。如果他们要求激进的民主,那么他们就得有一个根本的框架,这从怀疑论者的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几乎是站不住脚的(Aronowitz 1988a:52)。如果他们提倡新世纪宗教,那么他们就必然地蕴涵着新世纪宗教优越于各种传统的有组织的宗教的意思,而这就违背了后现代对待判断的厌恶态度。如果他们妥协于对于理性和合理性的后现代怀疑,那么他们将面临自相矛盾的风险。但是假如他们真的拒绝了理性,那么他们也就抛弃了批判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根据(参阅第 7 章第 3 节)。如果他们接受了相对主义——比如说,否认给予压迫者的声音以特权——那么他们就不能认为他们自己的声音(或被压迫者的声音)应该得到特别的关注。他们是前后不一致的,因为如下做法是不可能的:先认为某人自己的观点是客观的,然后把相当不确定的后现代哲学应用到别人身上(第 7 章第 3 节)。尽管肯定论者批判了现代的元叙述,并竭力回避逻各斯中心的政治计划,但是他们暗示了一个更新的政治背景和一种新的精神上的政治实践,它使他们陷入某种双重的标准之中。

假如怀疑论者的后现代观点的基本假定得到认可的话,那么它们便拥有了某种引人注目的内在逻辑;但是作为交换,

我们却被拖入某个绝对不确定性的循环之中。无论怎样，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在修正和更新方面作出了一个实质性的贡献，不过与此同时这要求作出某些重大的妥协，其中有些倾向于理智上的不一致性，甚至使社会科学向非理性事物和形而上学事物开放。

一些批判性后思：后现代主义的非反思维度

后现代主义者有时未能检验他们自己的假定或没有遵奉他们自己的忠告。他们也没有把他们自己的锋芒毕露的批判实践应用于他们自己的智力产品上。对于揭露他们自己的前提或充分地考虑他们自己的假定之后果的这种无能必须予以揭露。自我解构只是偶尔才提上后现代的议事日程，如果真的有自我解构的话，那么除了在前面诸章(尤其是第 7 章第 2 节)中已经讨论的那些内容以外，这项活动将至少揭示出以下七大矛盾。首先，后现代主义蔑视关于理论建构的任何奢望。但是一个反理论的立场自身也是一个理论立场。如果理论是徒劳的，如果把理论同真理联系起来的任何一个企图都必须予以否定，那么这些假定也必须适用于每一种"理论努力的形式，包括这样一些企图，即在对其他各种理论表示怀疑的同时，偷运自己的东西——打个譬方，就是走后门"(Norris 1988:147)。其次，后理代主义者尽管强调了非理性的重要性并且表达了对于理性、逻辑和合理性等启蒙的智力工具的重大怀疑，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分析活动中仍然使用了这些工具。例如，解构是一个高度逻辑的、推理的和分析的过程。第三，后现代主义者对于解释既不作好坏判断也不作优劣评价。但

是他们又建议社会科学要关注被排除的事物，被忽视的事物，边缘的事物和默默无闻的事物，这难道不正表明了某个内在的价值结构，它蕴含着赞成某些见解、反对另一些见解的意思吗？这同他们所谓的拒绝优先考虑某些事物的做法不是正好冲突了吗？假如后现代主义以被遗忘的事物和被孤立的事物为焦点，又假如它要求去除社会科学理论的中心地位，那么这不正是在倾向于对中心事物的忽视吗？这不正是在反对去关注显著的事物，整合的事物和明确的事物，因而有创造一整套新的空白的风险吗？根据定义，假如后现代主义者假定他们自己的观点优越于启蒙的观点，那么他们不正是在断定他们自己的解释比任何一种别的解释更具有特权吗？第四，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互为文本关系，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观点——特别是受到德里达启发的那些观点——又孤立地对待文本。[①] 第五，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反对评估理论的现代标准。但是假如后现代主义者要得出任何一个结论，诸如现代社会科学试图回答的问题的不确定性，那么他们就无法断言不存在有效的判断标准。他们自己肯定有标准，那个标准也许是隐蔽的，他们是根据那个标准来发表诸如此类的意见的。而假如这样的标准是存在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就正在作出一个声明，大意是：世界上存在着某种确定性。第六，虽然对现代性的不一致性提出了警告，但是他们自己反对被认为持有一致性的规范。他们公开否认他们有必要作出任何特殊的努

---

① 并非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致力于以绝对孤立的方式来考虑文本。福柯要求均衡，批评德里达给予语言过多的自主权而忽视了文本的历史和政治含义。他强调文本与权力的联系，以及影响文本的生产和终极形式的许多力量（Foucault 1972）。

力以避免自我矛盾(Culler 1979:173);这似乎是不太公平的。第七,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他们所说所写的每一事物本身只是一个局部叙述,它只相关于它自己的支持者。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完全放弃了他们的著述的真理要求,这一点也导致了自相矛盾。

后现代主义由于在同一时间里既信奉语言决定论,又主张语言的不确定性而受到了批评。语言决定论是语言(能够)说明一切事物的观点。[①] 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变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构成了后现代现实的本质。其逻辑后果是重大的:如果语言决定了每一事物,那么后现代主义者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建构了一个等级系统,那个系统赋予语言以一个特许的地位,并且留给社会以一个低下的地位。但是当后现代主义者主张语词是空无内容的时候,当他们把语言定义为无指称的和无外延的、不受物质限制的时候,他们又强调了语言的不确定性(Harland 1987:5;Vattimo 1988)。批评家们认为,后现代主义者搞多重语言并篡改语言的做法使得语言失去了任何意义(Anderson 1984:43)。语言不确定性的后果同样是严重的。如果语言是相对的或随意的,那么我们的知识主张就是没有根据的。后现代主义者对于这种情况所蕴含的意思再一次提出了异议。肯定论者把它的意思解释为语词无法再现可证明的真理,一个近乎令人半信半疑的命题。可是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语词没有意义,没有一个语词能

---

① 这与被称作"语言基础主义"的那种语言决定论不是同一回事,后者假定了"一个一贯正确的作者,一种完美无缺的语言和一个永恒的上下文"(Scholes 1989:52)。

够被合法地表达出来。这将使社会科学只好保持沉默。

后现代的语言观暗中摧毁着意义的基础,并且对于人们相互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提出了质疑。虽然关于事实和观念的沟通从来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社会科学是以语言为基础的。不过在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和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前者强调内在于沟通中的困难;后者更加极端,主张语词从来不意指我们所思考的事物,沟通的所有企图都是无结果的,因为沟通是不全面的。怀疑论者又一次表现出了只看到沟通的失败并且认为那些失败是理所当然的,或无视成功事例的倾向。不管怎样,如下结论凭直觉来考虑似乎是合理的:在正常用法中,语言并不是如此模棱两可的和有争议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能够完全有效地做到相互了解(Bouveresse 1984:133)。如果不是这么一回事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从昨天走到今天呢?那样的话,我们又怎能有把今天与明天和将来协调起来的希望呢?

假如后现代主义者前后一致地、真心诚意地对待他们所阐发的语言的相对主义,假如他们真的相信成功的沟通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就不会去诋毁别人写的或说的东西。要想避免伪善的话,他们将不得不保持沉默(Weber 1990:143)。当他们声明任何陈述都不具有特许的地位,甚至他们自己的陈述也不例外的时候,如果后现代主义者是真诚的,那么他们将必须不是权威地放弃他们的发言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内在的(心灵的)一致性。

也有人指出,如果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相互沟通是不可能的,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不善于准确地使用语词的缘故。[①]那些至关重要的和引人注目的后现代风格和表现形式,有的时

候不也是晦涩的甚至令人困惑的吗(Ferry and Renaut 1990:12—13)? 如下文本究竟对谁有好处呢? "在那里,各种联系是如此地难以捉摸,以至于变成了私下才有的联系,文本侧向移动,逆向移动,精疲力尽地——并且是不可能地——试图以某种单一而散漫的方式述说每一事物"(Moi 1988:21)。假如某人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可说,那么风格和表现的清楚明白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有的后现代主义者明确表示,"清楚和精确"对他们来说只是次要的问题(例如,Shapiro 1988:xii),"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对于统合性(同一性)的无休止质疑"是他们的关键"资源"(Ashley and Walker 1990a:263)。策略上的理由和哲学上的理由都为这种立场作了辩护。在策略上,模糊的表现允许、甚至鼓励"解释的无限性"。从一个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可贵的品格。它在哲学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某个不太明确的被书写的后现代文本反映了表象(再现)的不可能性。

就这一点而言,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说法蕴含着它的高度的非正统性质,不过这也是应该给予质疑的。后现代主义起初虽然好像要求在社会科学领域实行根本改革和创新,但这只是偶尔的事,而且相当令人惊讶的是,有时它仅仅是强化了正统的社会科学观。[2] 后现代主义可以被用来替已经被

---

① 一些批评家们观察到一部分后现代作者有意识地企图回避被人理解(Ferry and Renaut 1990:12—13),并有意识地企图保留模糊性和不熟悉性(Ellis 1989:134)。

② 社会学家卡尔霍恩认为现代性是如此地纷繁多样,以至于所谓的后现代事物其实只是现代的一个亚型而已,它不应该有某个特殊的新标签,因为它不是一个不同的范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内在产物,不是其真正的对立面"(Calhoun forthcoming a, forthcoming b)。

致力于现代方法研究的人们所采取的那些立场作辩护。它与完全属于社会科学的诸项传统参数的某种观点相一致。正如我在本书第2章和第3章指出的那样，就其比较温和的表现而言，后现代主义平行于结构主义和系统分析。如下观点没有任何新奇之处：我们应该放弃获得某个决不可以被误解或被重新解释的完美作者的要求，或者我们应该放弃为创造某个能让所有读者都理解的绝对地通俗易懂的文本而作的努力，或者我们应该放弃对某个被写成的文本的希望，以便使它的意义决不会发生变化。

此外，后现代主义者并不是最早提出读者的重要性的人。许多社会科学家早就注意到了读者对于一个文本的反馈的重要性，他们对于不同解读的可能性一直是非常敏感的。市场调研和观众对于竞选活动之反应的研究就是例证。传统社会科学直接地考察读者对于某个"文本"之反应的多样性。[①]

与此相类似，在第4章，我勾画出了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同历史终结哲学的相似性、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同新历史运动的相似性。在第6章和第7章里，我们发现后现代主义者不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最先提出取消研究的表象(主体)和被表象(客体)之界限(Heller 1990:77—78)的人，也不是最早主张后现代社会科学家"处于人民之中"并且仅仅让他们"自成一家之言"(Pratt 1986:32)的人。这个方法或许是用以终结"客观性之假象"的一个后现代战略，但是早在二十多年以前，

---

① 但是与后现代主义不同的是，主流社会科学家们利用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去修改某个信息成文本以便达到更加完美的沟通，以便提出具有某个特殊目标的(使得其候选人得以入选)某个更加令人信服的印象(投候选人甲、而不是乙的赞成票)。这种具体目标的意向通常不存在于后现代分析之中。

波罗·弗莱雷(Paulo Freire 1970)在著书立说的活动和提高政治觉悟的努力中,就使用了这种方法。

不过,从另一种意义上看,说后现代主义毫无新意也是对它的一种过低评价。当然就肯定论者而言,后现代主义的形式已由其他人先期提出。但是在其最极端的表现形式里,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现代知识基础的拒绝却不仅仅是重复,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是如此。它所产生的后果要大得多。纵使关于传统社会科学之后现代批判的某些特殊组成部分——在被单独使用时——并非特别地具有进攻性,但是一旦某种后现代批判(尤其是由怀疑论者作出的后现代批判)的所有要素结合在一起并以其更加极端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必然会使人感到既恐惧又荒谬。过低估价后现代挑战对于未来社会科学的基本潜力也将是一个错误,即使这个挑战并不总是完全地具有独创性的,情况也是如此。

后现代社会科学:迎接下一个千年

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后现代主义的未来是向着许多潜在的前景开放的。现代和后现代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斗争的确切后果,或诸后果的结合也许无法确切地予以预测,不过某些已经显而易见了的趋势是同更加广阔的世界范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

没有妥协——学科分裂或少数派的地位

如下情况是非常实在地可能的:对社会科学的后现代挑战最终将使它的每门学科分裂成两个孤立的领域;一个受到

自然科学的启发，另一个具有人文科学（后现代主义）的渊源；一个致力于发现社会现象的原因，另一个则醉心于对语言和意义的批判和考察。[1]

这种结局并不是十分令人不快的。它将使得当代社会科学和后现代社会科学都集中精力去积极地创造/建构它们各自的计划，而不是把精力耗费在它们之间的争论上。由于缺乏为富有成果的交流所必需的共同假定，这场争论最终可能会不了了之。总之，同这个前景相一致，一种比较明智的态度是，让后现代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只是承认差异，然后各走各的路。

学科分裂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这种分离不可能是特别友好的。拒绝同传统社会科学达成任何妥协的做法将可能导致后现代主义者陷入同其更加传统的学科对应物的无休止的冲突之中。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保持心智的纯洁将不会导致学科分裂，哪怕是永久的少数派地位和学术孤立地位。他们或许最终只能互相交谈，即在专业上处于边缘地带范围内的交谈。而这也许就是心智整合的代价。[2]

整合与妥协

另一个前景的目标在于把后现代主义整合于主流社会科

---

① 后现代的问题将不会从一门受到自然科学启发的现代社会科学中被清除出去。后现代主义将是一个有待于被研究和被预测的事物，或是一个"描述性的范畴"（Turner 1989），但是它不是一个特殊的视角（观点），一个独一无二的和不同的方法论，或一种新奇的认识论。

② 这将导致另一个前景，一个在本书中不予讨论的前景，即恢复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盟主地位并且完全地消灭后现代。这种结局曾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人给予特别的考虑。

学之中。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最有可能同现代社会科学取得妥协。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经这样做了。还有，实施这种让步与和解的策略也会引起严重的不利后果，后现代主义者可能要付出较高的代价。要使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的社会科学说来是“有趣的”或“有关联的”，可能必需放弃某种后现代观点的整体性，也就是一致性，它是为强化后现代的基本假定、立场和见解服务的，以便使之能够有效地通过否认其具有任何合法性而避开那些挑战。所作出的每一个让步都将揭露出整个结构的内在矛盾并且潜在地导致不连贯性，使它更容易遭受外来的批判。例如，假如后现代的社会科学家们接受了某些解释比别的解释更好、更有力的观点，那么，“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最佳的解释呢?”这一问题将作为一个令人头痛且使人感到困惑的问题重新被提出来。而且就现代的和后现代的语言框架而言，都不存在可以令人满意的答案。作为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之极端开放性、宽容性和多元论的一个结果，我们都会赞同：它不仅有丧失自身统合性的危险，而且还会丧失抵御形形色色的骗子(各种邪教，新世纪哲学，神话和巫术)的能力，后者有意地把社会科学贬低为一种逗笑的玩具而已。

调和的策略包括放弃那些对传统社会科学来说最为荒谬的后现代的假定，并且同其剩余的假定相调和。从另一方面来看，某个平行的开放性或许会修改对社会科学的要求，优化科学客观性的主张，并且导致对于主观的和相对主义的革新方法论之合法性的某个更加广泛的认可。继起的结合将把以严格性及理性为基础的研究和情感及直观相联的研究结合在一起(Bonnefoy 1984)。毫无疑问，这些计划不会是毫无价值的。结果将可能导致富有成果地相互改变和相互促进。

肯定论者也许会同意“重建”社会科学诸学科，但是怀疑论者很可能会认为这等于是放弃了某个可靠的后现代观点。怀疑论者主张，任何一个“重建”计划都是一个建立某个新盟主模型的计划，而如果后现代主义者想要同他们对于现代主义的批判保持一致的话，他们就不可以实施那项计划。肯定论者的比较温和的呼声可能会成为一股主导力量，要是后现代主义同现代社会科学能够取得什么妥协的话。

与人文科学中创造性的后现代形式的某些方面的妥协正在受到人们的考察。追求这种折衷主义策略的社会科学家们，已经创造出了一些激动人心的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他们竭力地使这些方法相关于他们的特殊问题。其中的某些努力已在本书中予以评论。

未来的趋势

最有可能对于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未来贡献感到失望的人就是那些起先期望过高的人。后现代主义没有弥补结构主义、实在论、系统分析或社会科学中任何其他重大的传统范式的弱点。转向后现代主义以便激励其社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很可能都不会完全地满足于这样一种融合的结果。虽然存在着某些亲和点，但是所有这些团体都可能发现，某些形式的后现代主义成为敌人的可能性与成为盟友的可能性一样大。

在广大世界发生的各种事件也会对后现代社会科学的未来产生影响。这可以采取两条道路中的任一种。某些发生作用的力量也许会促进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和壮大，但是另一些作用力可能会阻碍它在社会科学中的发展。一方面，把后现

代主义带到最前沿的文化和社会力量长期以来一直在发生作用，而且它们仍然是活泼有力的。许多人觉得它们不可能非常迅速地消逝掉(Gitlin 1989)。例如，波斯湾战争与它所表现的人类和生态灾难呈现了未来的暗淡前景。在这些力量中也包括了对伦理纲常产生巨大冲击的、我们始料未及的不可控制的迅速变化和不寻常的技术进步。继续为后现代主义的侵扰推波助澜的职业危机不太可能就在近期消逝。无论作出什么样的选择——整合和心智妥协或孤立和心智上的纯洁性——后现代对当代社会科学的否定都是不可能不产生后遗症的(Schwartz 1990:33)。

另一方面，随着人类事务变得日益复杂起来，诸范式的半存留期(half life)正在变得越来越短。确实，某些指标表明，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在社会科学中的影响正在减弱。怀疑论分析的谬论引起的是嘲笑，不是赞扬。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的衰落，东欧国家的民主可能性的增长，公开性和改革——尽管还没有实现——的希望，核毁灭的可能性的逐渐减少，所有这一切都使怀疑论的悲观主义显得不合时宜，成为70年代或80年代初新的冷战精神的遗留物。由鲍德里亚(Baudrillard 1983a,1983b)和坎珀及伍尔夫(Kamper and Wulf 1989)之类最极端的怀疑论者提出来的世界末日大毁灭的看法也在日益衰退之中。诚然，环境问题可能仍然证实了怀疑论者的最坏的设想，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广泛关注和公民意识有助于得出乐观主义的结论。

后现代阵营内部斗争的结果不能不影响它的未来。例如，关于表象的后现代观点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是，后现代的社会科学家在论述和解释日益增长起来的世界范围的如下要求

时将经历一个艰难的时期：要求民主的多党体系和公民选举权的形式下的更加广大的政治代表性。如果怀疑论者盛行起来的话，那么他们的极端的反表象论将导致这样一种境况：在那里，后现代主义显得不太适应于社会。如果它继续同主要的精神思潮背道而驰、并无视全球性的政治趋势——就像在代表权事件上那样——的话，那么它有可能遭受衰落的命运。

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将要消亡，也不意味着它对于科学和理性的诘难将要走向某个突发性终结。但是它确实表明了，如果我们能超越为"发动战争"而辩护的心态的话，那么温和的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将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在某个世界和平的氛围里，人们会关注肯定论者所提出的自我实现、宽容和人性化技术学的要求。假如某个和平而冷静的时代要获得发展、壮大和持久的话，那么肯定论者的声望将会提高，比起怀疑论者来，他们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就会更大。但是，即便就对"建构"采取极端的批判和拒绝态度的怀疑论者来说，仍然存在着某种潜在的积极贡献。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攻击或许会迫使现代社会科学去加强它的抵御能力和巩固它的优势。纵使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怀疑论者的本意所在，然而却是个不小的功绩(Meehan 1991)。

假如明天的社会科学不是后现代的社会科学——这在今天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了，那么，同后现代的观点的这一次遭遇将会给它们留下怎样的痕迹？至少同过去相比，它们将更加批判性地和不那么天真地评估和利用科学了。它们甚至会降低它们对于科学价值和科学成果的期望。它们会更加广泛地认识到科学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科学的用途和科学的滥用。品质卓著的事物将受到更加广泛的接受和赏识，并且

赢得更多的观众。

有人或许会说，早在社会科学中的人们听说“后现代”一词之前，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在进行之中了。当然，人们或许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于几十年来科学范式之主导地位的某个反动。或者，人们或许将它描述为只不过是范式摆锤的常规摆动而已，而不是由后现代主义促发的运动。不过无论怎样，完全否认后现代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将是一个错误。因为纵使后现代主义只是强化了已经产生实际效果的那些倾向，但是它会把那个摆锤的弧度进一步推向超乎寻常的程度；那样就有可能——只是可能——拓宽社会科学的视野。



参考书目

Abrams, M. H. 1981.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4th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Adelson, Leslie. 1984. "Introductory Note to Sloterdijk." *New German Critique*, no. 33 (Fall): 189–90.

Agger, Ben. 1989a. *Socio(ont)log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1989b. *Fast Capitalism: A Critical Theory of Significance*.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1990. *The Decline of Discourse: Reading, Writing, and Resistence in Postmodern Capitalism*. New York: Falmer Press.

Alker, Hayward, and David Sylvan. 1986.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aper delivered a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August.

Allen, Robert C. 1987. "Reader-Oriented Criticism and Television." In *Channels of Discourse*, ed. Robert C. Alle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Allison, David, ed. 1977. *The New Nietzsche*.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Alter, Robert. 1989. *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Althusser, Louis.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London: New Left Books.

Anderson, Bron. 1987–88.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ameson." *Telos*, no. 74 (Winter): 116–25.

Anderson, Ken, Paul Piccone, Fred Siegel, and Michael Taves. 1988. "Roundtable on Communitarianism." *Telos*, no. 76 (Summer): 2–33.

Anderson, Perry. 1984.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 1988. "Modernity and Revolution."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Angenot, Marc. 1984. "Le discours social; problématique et ensemble." *Cahiers de recherche sociologique* 2 (1): 1–21.

Ankersmit, F. R. 1989.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28 (2): 137–53.

———. 1990. "Reply to Professor Zagorin." *History and Theory* 29 (3): 275–96.

Anonymous. 1982. "Architecture as a Corporate Asset." *Business Week*, October 4, 124–26.

Apter, David. 1987. *Rethinking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Dependency and Postmodern Politic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Arac, Jonathan. 1986. "Introduction." In *Postmodernism and Politics*, ed. Jonathan Arac.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series, vol. 28.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87. *Critical Genealogies: Historical Situations for Postmodern Literary St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ronowitz, Stanley. 1981. *The Crisis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Praeger.

Aronowitz, Stanley. 1988a. "Postmodernism and Politics." In *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ed. A. Ros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88b "The Prod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cience, Ideology and Marxism."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Arrighi, Giovanni, Terence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1989. *Antisystemic Movements*. New York: Verso.

Arrington, C. Edward, and Jere R. Francis. 1989. "Letting the Chat Out of the Bag: Deconstruction, Privilege and Accounting Research."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4 (1/2): 1–28.

Asher, Kenneth. 1984–85. "Deconstruction's Use and Abuse of Nietzsche." *Telos*, no. 62 (Winter): 169–77.

———. 1989–90. "The Moral Blindness of Paul de Man." *Telos*, no. 8[illegible] (Winter): 197–205.

Ashley, David. 1990. "Habermas and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of Modernity.'" In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ed. Bryan S. Turner.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Ashley, Richard. 1984.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 (2): 225–86.

———. 1987. "The Geopolitics of Geopolitical Space: Toward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ternatives* 12 (4): 403–34.

———. 1988. "Geopolitics, Supplementary Criticism: A Reply to Professors Roy and Walker." *Alternatives* 13 (1): 88–102.

———. 1989a. "Living on Border Lines: Man, Poststructuralism, and War." In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ed.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 1989b. "Imposing International Purpose: Notes on a Problematic of Governance." In *Global Changes and Theoretical Challenges: Approaches to World Politics for the 1990s*, ed. Ernst-Otto Czempiel and James N. Rosenau.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 Forthcoming. "The Powers of Anarchy: Theory, Sovereignty,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Global Life." In *Anarchy, Power, Community: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ed. Hayward Alker and Richard Ashley.

Ashley, Richard, and R.B.J. Walker. 1990a. "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Exile: Dissident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4 (3): 259–68.

———. 1990b. "Reading Dissidence/Writing the Discipline: Crisis and the Question of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4 (3): 259–68.

Atlas, James. 1988. "The Case of Paul de Ma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ust 28, 36–69.

———. 1989. "What is Fukuyama Saying?"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22, 38.

Bakhtin, Mikhail. 1973. *Problems of Dostoyevsky's Poetics*. Ann Arbor, Mich.: Ardis.

Ball, Terence, ed. 1987. *Idioms of Inqui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1988. *Transforming Political Discourse.* London: Blackwell.
Barilleaux, Ryan. 1988. *The Post-Modern Presidency: The Office after Ronald Reagan.* New York: Praeger.
Barth, John. 1980. "The Literature of Replenishment: Postmodern Fiction." *Atlantic Monthly*, January, 65–71.
Barthes, Roland. 1970. *S/Z.* Paris: Seuil.
———. 1975.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1977.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and "Writers, Intellectuals, Teachers." In *Images, Music, Text*, ed. R. Barthe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1979. "From Work to Text." In *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 ed. Josue Harari.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audrillard, J. 1976.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Paris: Gallimard.
———.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Mo.: Telos Press.
———. 1983a.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New York: Semiotext(e).
———. 1983b. *Les stratégies fatales.* Paris: Bernard Grasset.
———. 1983c. *Simulations.* New York: Semiotext(e).
———. 1985. "Modernité." In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corpus 12: 424–26.
———. 1986. "Forgetting Baudrillard." *Social Text*, no. 15 (Fall): 140–44.
———. 1987. "Modernit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1 (3): 63–72.
———. 1988. "Hunting Nazis and Losing Reality." *New Statesmen*, February 19, 16–17.
———. 1989a. *America.* London: Verso.
———. 1989b. "The Anorexic Ruins." In *Looking Back on the End of the World*, ed. D. Kamper and C. Wulf. New York: Semiotext(e).
Bauman, Zygmunt. 1986–87. "The Left as the Counter-Culture of Modernity." *Telos*, no. 70 (Winter): 81–93.
———. 1987.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8. "Is There a Postmodern Sociolog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5 (2–3): 217–39.
———. 1989.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0. "Philosophical Affinities of Postmodern Sociolog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38 (3): 411–44.
Baykan, Ayşegül. 1990. "Women between Fundamentalism and Modernity." In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ed. Bryan S. Turner.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Beaudry, Lucille. 1990. "Quelques idées du post-modernisme, aspect d'une réversion du rapport de l'art au politique." In *Les avenues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ed. L. Beaudry, Chantal Maille, L. Oliver. Montreal: Association canadienne-française pour l'avancement des sciences.
Bell, Daniel.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Benhabib, Seyla. 1984. "Epistemologies of Post-modernism: A Rejoinder to Jean-Francois Lyotard." *New German Critique*, no. 33 (Fall): 103–26.

Bensman, Joseph. 1988. "The Crises of Confidence in Modern Pol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2 (1): 15–35.

Berger, Peter, and Thomas Luckmann.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Doubleday.

Bergson, Henri. 1896.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 Paris: F. Alcan.

Berman, Russell. 1986–87. "The Routinization of Charismatic Modernism and the Problem of Post-modernity." *Cultural Critique*, no. 5 (Winter): 49–68.

———. 1990. "Troping to Pretoria: The Rise and Fall of Deconstruction." *Telos*, no. 85 (Fall): 4–16.

Bernstein, Richard J. 1985.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i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1986. "The Rage Against Reas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10 (2): 186–210.

Bertaux, Daniel. 1980. "L'approche biographique. Sa validité méthodologique, ses potentialitiés."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69: 197–225.

———. 1985. "L'imagination méthodologique." *Recherche sociologique* 16 (2): 269–79.

Bierstedt, Robert. 1959. "Normal and Real Definition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In *Symposium in Sociological Theory*, ed. L. Gross. New York: Harper & Row.

Birch, Charles. 1988a.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to Biology." In *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 Postmodern Proposals*, ed. D. R. Griffi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1988b. "Eight Fallacies of the Modern World and Five Axioms for a Postmodern Worldview."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32 (1): 12–30.

Blonsky, Marshall. 1985. *On Sign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ohm, David. 1988. "Postmodern Science and a Postmodern World." In *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 Postmodern Proposals*, ed. D. R. Griffi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Bonnefoy, Yves. 1984. "Image and Presence." *New Literary History* 15 (3): 433–51.

Bookchin, Murray. 1989–90. "Introduction to Elkins." *Telos*, no. 82 (Winter): 47–51.

Booth, David. 1985. "Nietzsche on 'the Subject as Multiplicity.' " *Man and World: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Review* 18 (2): 121–46.

Bordewich, Fergus M. 1988. "Colorado's Thriving Cult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1, 37–43.

Borradori, Giovanna. 1987–88. " 'Weak Thought' and Postmodernism: The Italian Departure from Deconstruction." *Social Text*, no. 18: 39–49.

Botwinick, Aryeh. 1990. *Skepticism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Bouchard, Donald, ed. 1977. "What is an Author?"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uveresse, Jacques. 1984. *Rationalité et cynisme.* Paris: Minuit.

Bove, Paul. 1990. "Discourse." In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ed.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oyne, Roy. 1990. *Foucault and Derrida: the Other Side of Reason.* Winchester, Mass.: Unwin and Hyman.

Brante, Thomas. 1986.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In *Sociology: From Crisis to Science?* ed. Ulf Himmelstrand. London: Sage.

Braudel, Fernand. 1972. *The Mediterranean.* Vol 1. New York: Harper & Row.

Bruckner, D.J.R. 1988. "How to Kill Readers." [An interview with Milorad Pavic.]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Section*, November 20, 15.

Burgin, Victor. 1986. *The End of Art Theory: Criticism and Postmodernity.*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Burman, Erica. 1990. "Differing with Deconstruction: A Feminist Critique." In *Deconstructing Social Psychology*, ed. Ian Parker and John Shotter. London: Routledge.

Burrell, Gibson. 1988. "Modernism, Post Modernism,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2: The Contribution of Michel Foucault." *Organizational Studies* 9 (2): 221–35.

Cahoone, Lawrence E. 1988. *The Dilemma of Modern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Caldwell, Lynton K. 1975. "Managing the Transition to Post-Modern Socie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5 (6): 567–72.

Calhoun, Craig. 1990. "Postmodernism,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al Act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Madrid, July 9–14.

———. Forthcoming a. "The Infrastructure of Modernity: Indirect Social Relationship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 *Social Change and Modernization*, ed. Neil Smelser and Hans Haberkamp.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orthcoming b.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Specificity in Social Theory." In *Postmodernism and General Social Theory*, ed. S. Seidman and D. Wagner.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Forthcoming c. "Introductio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 Craig Calhoun. Boston: MIT Press.

Calinescu, Matei. 1987.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Calinescu, Matei, and Douwe Fokkema, eds. 1987. *Exploring Postmoderni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

Callinicos, Alex. 1985. "Postmodernism, Post-Structuralism, Post-Marxism?"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 (3): 85–101.

———. 1989. *Against Post-Modernism.* London: Blackwell.

Cantor, Norman. 1989. *Twentieth-Century Culture: Modernism to Deconstruc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Capra, Fritjof. 1982. *The Turning Point: Science, Society, and the Rising Cultur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Carravetta, Peter. 1988. "On Gianni Vattimo's Postmodern Hermeneutic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5 (2–3): 395–99.

Carroll, David. 1978. "The Subject of Archaeology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e Episteme." *Modern Language Notes* 93: 695–722.

Carter, Pippa, and Norman Jackson. 1987. "Management, Myth, and Metatheory—From Scarcity to Postscarc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17 (3): 64–89.

Castoriadis, C. 1986. "Les mouvements des années soixante." *Pouvoir* 39: 107–16.

Chabot, C. Barry. 1988. "The Problem of the Postmodern." *New Literary History* Autumn 20 (1): 1–20.

Clark, Stuart. 1985. "The Annales in History." In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 Quentin Skinn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lifford, James.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lifford, James,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bb, John B., Jr. 1988. "Ecology, Science, and Religion: Toward a Postmodern Worldview." In *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 Postmodern Proposals*, ed. D. R. Griffi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Comay, Rebecca. 1986. "Interpreting the Conversation: Notes on Rorty." *Telos*, no. 69 (Fall): 119–30.

Connolly, William E. 1988. *Political Theory and 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Connor, S. 1989. *Postmodernist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the Contemporary*.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Cooke, Philip. 1988.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the Ci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5 (2–3): 475–92.

———. 1989. "Postmodern Condition and the City." *Comparative Urban and Community Research* 2: 62–80.

Cooper, Robert, and Gibson Burrell. 1988.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Part I." *Organization Studies* 9 (1): 91–112.

Coover, Robert. 1988. "He Thinks the Way We Dream."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Section*, November 20, 15.

Corlett, William. 1989. *Community without Unity: A Politics of Derridian Extravaganc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Coward, Rosalind, and John Ellis. 1977. *Language and Mat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Cox, Harvey. 1984. *Religion in the Secular City: Toward a Postmodern Theolog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Crane, D. 1972. *Invisible Colleg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ronbach, L. J. 1986. "Social Inquiry by and for Earthlings." In *Meta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ed. D. W. Fiske and R. A. Shwe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rooks, Cheryl. 1984. "Changes for Amusement's Sake at Six Flag." *Corporate Design* 3 (2): 74–77.

Culler, Jonathan. 1979. "Jacques Derrida." In *Structuralism and Since: From Lévi-Strauss to Derrida*, ed. John Sturroc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2.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3. *Barthes.* Glasgow: William Collin Sons.

———. 1988. "Its Time to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about Paul de Man and His Wartime Articles for a Pro-Fascist Newspaper."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uly 13, B1.

Dahrendorf, Ralf. 1979. "Towards the Hegemony of Post-Modern Values," *New Society* 50, no. 893 November 15, 360–62.

Dallmayr, Fred. 1981. *Twilight of Subjectivit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1987. "Political Inquity: Beyond Empiricism and Hermeneutics." In *Idioms of Inquiry*, ed. Terence Bal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1989. *Margins of Political Discours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Davenport, Edward. 1983. "Literature as Thought Experiment (On Aiding and Abetting the Mus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 13: 279–306.

———. 1985. "Scientific Method as Literary Criticism." *Et Cetera* (Winter): 331–50.

Davie, Donald A. 1983. "Poet: Patriot: Interpreter." In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ed. W.J.T. Mitch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avis, Mike. 1985. "Urban Renaissance and the Spirit of Postmodernism." *New Left Review*, no. 151 (May–June): 106–13.

Deak, Istvan. 1989. "The Incomprehensible Holocaus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8, 63–72.

Dear, Michael. 1986. "Postmodernism and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4: 367–84.

———. 1988.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Reconstructing Human Ge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3 (Dec.): 1–13.

———. 1989. "Survey 16: Privatization and the Rhetoric of Planning Practi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7: 449–62.

Dear, M.J., and A. J. Scott, eds. 1981.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New York: Methuen.

De Certeau, Michel. 1984. *The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eleuze, Gilles. 1983.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1983.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e Man, Paul. 1979. *Allegories of Read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3. *Blindness and Insigh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86.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89. *Wartime Journalism: 1939–43.*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Denzin, Norman K. 1986. "Postmodern Soci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4 (Fall): 194–204.

Denzin, Norman K. 1990. "Reading 'Wall Street': Postmodern Contradictions in the American Social Structure." In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ed. Bryan S. Turner.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Der Derian, James. 1988a. "Introducing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7 (2): 189–93.

———. 1988b. "The Importance of Shredding in Earnest: Read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Culture and Terrorism." In *Cultur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ed. Sut Jhally and Ian Angus.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 1989a. "The Boundaries of Knowledge and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ed.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 1989b. "Spy vs. Spy: The Intertextual Power of International Intrigue." In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ed.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 1990. "The (S)pa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mulation, Surveillance, and Spe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4 (3): 295–310.

Der Derian, James, and Michael J. Shapiro, eds. 1989.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Derrida, Jacques. 1972. *Marges*.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 1974a. *Glas*. Paris: Galilée.

———. 1974b. "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y." *New Literary History* 6 (1): 5–74.

———. 1976. *Of Grammatology*, trans. G. Spivak.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79. *Spurs: Nietzsche's Styl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1. *Posi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2. "Sending: On Representation." *Social Research* 49 (Summer): 294–326.

———. 1985. *The Ear of the Other*. New York: Schocken.

———. 1987. *De L'esprit, Heidegger et la question*. Paris: Galilée.

———. 1988. "Like the Sound of the Sea Deep within a Shell: Paul de Man's War." *Critical Inquiry* 14 (Spring): 590–652.

Descombes, Vincent. 1980.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trans. L. Scott-Fox and J. M. Harding.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ws, Peter. 1986. "Adorno,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ritique of Identity." *New Left Review*, no. 157 (May/June): 28–44.

———. 1987. *Logic of Disintegration—Post-Structuralist Thought and the Claims of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Verso.

———. 1989. "The Return of the Subject in Late Foucault." *Radical Philosophy*, no. 51 (Spring): 37–41.

Di Stefano, Christine. 1990. "Dilemmas of Difference: Feminism,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sm." In *Feminism/Postmodernism*, ed. Linda J. Nicholson. New York: Routledge.

Donoghue, Denis. 1980. "Deconstructing Deconstructi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12, 37–43.

———. 1989. "The Strange Case of Paul de Ma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29, 32–37.

Dowling, William. 1984. *Jameson, Althusser, Marx*.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reyfus, Hubert, and Paul Rabinow. 1983.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2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umm, Thomas. 1988. "II: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 Aesthetics: Habermas Contra Foucault." *Political Theory* 16 (2): 209–25.

Dworkin, Ronald. 1983a. "My Reply to Stanley Fish (and Walter Benn Michaels): Please Don't Talk about Objectivity Any More." In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ed. W.J.T. Mitch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3b. "Law as Interpretation." In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ed. W.J.T. Mitch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agleton, Terry. 1981. *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1983. *Literary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85. "Capitalism,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New Left Review*, no. 152 (July/August): 60–73.

Eco, Umberto. 1980. *The Name of the Rose*. New York: Warner Books.

———. 1983a. *Travels in Hyper Reality*. San Diego, Calif.: Harcourt, Brace and Jovanovich.

———. 1983b. *Postscript to the Name of the Rose*. Orlando, Fla.: Harcourt, Brace and Jovanovich.

Edelman, Murray. 1977. *Political Language: Words that Succeed and Policies that Fail*.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1988.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Spectac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ldridge, Richard. 1985. "Deconstruction and Its Alternatives." *Man and World* 18: 147–70.

Elgin, Catherine Z. 1984. "Representation, Comprehension and Competence." *Social Research* 51 (4): 905–26.

Elkins, Stephan. 1989–90. "The Politics of Mystical Ecology." *Telos*, no. 82 (Winter): 52–70.

Ellis, John. 1989. *Against Deconstru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alk, Richard. 1988. "Religion and Politics: Verging on the Postmodern." *Alternatives* 13 (3): 379–94.

———. 1989. "A Postmodern Presidency for a Postmodern Worl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oward a Postmodern Presidency"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the Center for a Postmodern World, Santa Barbara, June 30–July 4.

———. 1990. "Culture,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A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 Jongsuk Chay. Westport, Conn.: Praeger.

Farias, Victor. 1989. *Heidegger and Nazis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Fay, Brian. 1975. *Social Theory and Political Practice*. Boston: Allen and Unwin.

Featherstone, Mike. 1988. "In Pursuit of the Postmodern: An Introductio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5 (2–3): 195–217.

———. 1989. "Towards a Sociology of Postmodern Culture."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e*, ed. Hans Haferkamp.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Fedier, Francois. 1988. *Heidegger, anatomie d'un scandale*. Paris: Robert Laffont.

Feigl, Herbert. 1953a. "The Scientific Outlook: Naturalism and Humanism." In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 Herbert Feigl and May Brodbeck.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1953b. "Unity of Science and Unitary Science." In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 Herbert Feigl and May Brodbeck.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Fekete, John, ed. 1984. *The Structural Allegory: Reconstructive Encounters with the New French Though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erre, Frederick. 1988. "Religious World Modeling and Postmodern Science." In *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 Postmodern Proposals*, ed. D. R. Griffi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Ferry, Luc, and Alain Renaut. 1985. *La pensée 68, Essai sur l'anti-humanisme contemporain*. Paris: Gallimard.

———. 1987. *68–86 Itinéraires de l'individu*. Paris: Gallimard.

———. 1988. *Heidegger et les modernes*. Paris: Grasset.

———. 1990. *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 [English version of Ferry and Renaut 1985].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Feyerabend, P. 1975. *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London: New Left Books.

Fish, Stanley. 1976. "Interpreting the Variorum." *Critical Inquiry* 3: 465–85.

———. 1980.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4. "Fish v. Fiss." *Stanford Law Review* 36: 1325–47.

———. 1987. "Dennis Martinez and the Uses of Theory." *Yale Law Review* 96: 1773–1800.

———. 1989. *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Fiske, D. W., and R. A. Shweder. 1986. "Pluralisms and Subjectivities." In *Meta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ed. Donald W. Fiske and Richard A. Shwe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iss, Owen. 1982. "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Law Review* 34 (4): 739–73.

Flax, Jane. 1990. *Thinking Fragments: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kkema, Doune. 1984. *Literary History,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

Foley, Barbara. 1985. "The Politics of Deconstruction." In *Rhetoric and Form: Deconstruction at Yale*, ed. R. C. Davis and R. Schleifer.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Fortin, Alfred J. 1989. "Notes on Terrorist Text: A Critical Use of Roland Barthes' Textual Analysi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 In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ed.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Foster, Hal. 1983. "Postmodernism: A Preface." In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ed. Hal Foster. Port Townsend, Wash.: Bay Press.

———. 1984. "(Post)Modern Polemics." *New German Critique*, no. 33 (Fall): 67–79.

Foucault, Michel. 1967. *Nietzsche*. Paris: Minuit.

———. 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 1971. *L'Ordre du discours*. Paris: Gallimard.

———. 1972. *Histoire de la folie*. Paris: Gallimard.

———. 1973.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London: Tavistock.

———. 1975.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English translation, *Discipline and Punish*]. Paris: Gallimard.

———. 1976.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vol. 1 La Volonté de savoir*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Paris: Gallimard.

———. 1977.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ed. Donald Bouchar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79. "What Is an Author?" In *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 ed. Josue Harari.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0. *Power/Knowledge*. Ed. C. Gordon; trans. C. Gordon, L. Marshall, J. Mepham, and K. Sop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1982. "A Discussion of the Work of Michel Foucault." *Skyline*, March, 18.

———. 1983a. "How We Behave." *Vanity Fair*, November, 62.

———. 1983b.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ed. Hubert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4.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 1987.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A Second Look*, ed. Paul Rabinow and William M. Sulliv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wler, Roger. 1987. *A Dictionary of Modern Critical Terms*.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Fox, Matthew. 1990. "A Mystical Cosmology: Toward a Postmodern Spirituality." In *Sacred Interconnections; Postmodern Spirituality, Political Economy, and Art*, ed. David Griffi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Frank, Manfred. 1983. *Was ist Neostrukturalismus?*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 1988. *L'Ultime raison du sujet*. Paris: Michel Guerin.

Fraser, Nancy. 1984. "The French Derrideans: Politicizing Deconstruction or De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New German Critique*, no. 33: 127–55.

———. 1985. "What's Critical about Critical Theory?" *New German Critique*, no. 35: 99–131.

———. 1989.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raser, Nancy. Forthcoming.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 Craig Calhoun. Boston: MIT Press.

Fraser, Nancy, and Linda Nicholson. 1988. "Social Criticism without Philosophy: An Encounter between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5 (2–3): 374–94.

Freire, Paulo. 1970. "Cultural Action and Conscientization."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40 (3): 452–77.

Freund, Elizabeth. 1987. *The Return of the Reader*. New York: Methuen.

Friedman, Jonathan. 1988. "Cultural Logics of the Global System: A Sketch."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5: 447–60.

Fukuyama, Francis.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3–19.

———. 1989–90. "A Reply to My Critic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8 (Winter): 21–28.

Furet, Francois, and Mona Ozouf, eds. 1988.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Belknap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Gebauer, Gunter. 1989. "The Place of Beginning and End: Caves and Their Systems of Symbols." In *Looking Back on the End of the World*, ed. Dietmar Kamper and Christoph Wulf. New York: Semiotext(e).

Geertz, Clifford. 1973a.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ed. C. Geertz.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3b.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Geras, Norman. 1987. "Post-Marxism?" *New Left Review*, no. 167 (May/June): 40–82.

Gergen, K. J. 1986. "Correspondence versus Autonomy in the Language of Understanding Human Action." In *Meta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ed. Donald W. Fiske and Richard A. Shwe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ergen, K. J. 1987. "Introduction: Toward Metapsychology." In *The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Meta-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ed. H. J. Stam et al. Washington, D.C.: Hemisphe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Gibbins, John R. 1989.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ulture*, ed. John R. Gibbin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Gibbons, Michael T. 1985. "Interpretation, Conservatism & Political Practice." *Polity* 17 (4): 777–94.

———. 1987. "Interpretations, Genealogy and Human Agency." In *Idioms of Inquiry*, ed. Terence Bal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7. "Structuralism,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

In *Social Theory Today*, ed. A. Giddens and Jonathan Turner. Oxford: Polity Press.

———. 1990.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iovannini, Joseph. 1988. "Breaking All the Rules." *New York Times*, June 12, 43.

Gitlin, Todd. 1989. "Postmodernism: Roots and Politics." *Dissent* (Winter): 100–108. [Abridged and summarized in *Ute Reader*, July/Aug 1989.]

Glassner, Barry 1989. "Fitness and the Postmodern Self."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0 (June): 180–91.

Gleick, James. 1987. *Chaos*. New York: Viking.

Goffman, Erving.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Goleman, Daniel. 1989. "The Dalai Lama Has Ideas for Neuroscienc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8, 6.

Goodman, Nelson. 1984. *Of Mind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ttlieb, Anthony. 1990. "Heidegger For Fun and Profit."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anuary 7, 1, 22–23.

Gould, Stephen Jay. 1983. *Hen's Teeth and Horse's Toes*. New York: Norton.

Gouldner, Alvin. 1973. *For Sociology*. London: Allen Lane.

Graff, Gerald. 1979. *Literature Against Itsel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3. "The Pseudo-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ed. W.J.T. Mitch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9. "Looking Past the de Man Case." In *Responses: On Paul de Man's Wartime Journalism*, ed. W. Hamacher, N. Hertz, and T. Kenna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1990. "Determinacy/Indeterminacy." In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ed.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ranier, Jean. 1977. "Nietzsche's Conception of Chaos." In *The New Nietzsche*, ed. David Allison.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Gregory, Bruce. 1988. *Inventing Reality: Physics as Languag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Gregoty, Derek. 1989. "Areal Differentiation and Post-Modern Human Geography." In *Horizons in Human Geography*, ed. Derek Gregory and Rex Walford. London: Macmillan.

Gregory, Derek, and Rex Walford, eds. 1989. *Horizons in Human Ge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Griffin, David R., ed. 1988a. *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 Postmodern Proposal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1988b. "Of Minds and Molecules: Postmodern Medicine in a Psychosomatic Universe." In *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 Postmodern Proposals*, ed. D. R. Griffi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ed. 1988c. *Spirituality and Society: Postmodern Vis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York.

Griffin, David R. 1989. *God and Religion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ed. 1990. *Sacred Interconnections: Postmodern Spirituality, Political Economy, and Ar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Grunbaum, A. 1953. "Causalit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 Behavior." In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 H. Feigl and M. Brodbeck.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Gunnell, John. 1988. "After Political Theor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4.

Habermas, Jürgen. 1974. "The 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 (1964)." *New German Critique*, no. 3 (Fall): 49–55.

———. 1978. *L'espace public: archéologie de la publicité comme dimension constitutive de la société bourgeoise*. Paris: Payot.

———. 1981. "Modernity Versus Post Modernity." *New German Critique*, no. 22 (Winter): 3–14.

———. 1983. "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 In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ed. Hal Foster. Townsend, Wash.: Bay Press.

———. 1985.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 1986. *Autonomy and Solidarity*. London: Verso.

———. 1987a.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Boston: MIT Press.

———. 1987b.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Lifeword and System*. Boston: Beacon Press.

———. 1989a. "Work and Weltanschauung: 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from a German Perspective." *Critical Inquiry* 15 (2): 431–56.

———. 1989b.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rans.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IT Press.

Halliday, M. A. K. 1979.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London: Arnold.

Hamacher, Werner, Neil Hertz, and Thomas Keenan, ed. (1989). *Responses: On Paul de Man's Wartime Journalis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Hancher, Michael. 1982. "Dead Letters: Wills and Poems." *Texas Law Review* 60 (3): 507–26.

Handler, Joel. 1986. "Dependent People, the State and the Modern/Postmodern Search for the Dialogic Community." *UCLA Law Review* 35 (6): 999–1113.

Hanson, Allan. 1989. "The Making of the Maori: Culture Invention and Its Logic."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1: 890–902.

Harari, Josue. 1979. "Critical Factions/Critical Fictions." In *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 ed. Josue Harari.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rding, Sandra. 1990. "Feminism, Science, and the Anti-Enlightenment Critique." In *Feminism/Postmodernism*, ed. Linda J. Nicholson. New York: Routledge.

Hare-Mustin, Rachel, and Jeanne Marecek. 1988. "The Meaning of Difference:

Gender Theory, Postmodernism, and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3 (6): 455–64.
Harlan, David. 1989.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Return of Litera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4 (3): 581–609.
Harland, Richard. 1987. *Superstructuralism: The Philosophy of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London: Methuen.
Harman, Willis W. 1988. "The Postmodern Heresy: Consciousness as Causal." In *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 Postmodern Proposals*, ed. D. R. Griffi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Hartman, Geoffrey. 1988. "Paul de Man, Fascism and Deconstruction: Blindness and Insight." *New Republic*, March 7, 26–27.
Hartsock, Nancy. 1987. "Rethinking Modernism: Minority vs. Majority Theories." *Cultural Critique*, no. 7 (Fall): 187–206.
Hartsock, Nancy. 1988. "Epistemology and Politics: Developing Alternatives to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Paper delivered to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August.
Harvey, David. 1985.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87. "Flexible Accumulation through Urbanization: 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in the American City." *Antipode* 19 (3): 260–86.
———.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Hassan, Ihab. 1985. "The Culture of Post-modernism."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 (3): 119–31.
———. 1987. *The Postmodern Turn*.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Hatch, Elvin. 1987. "Comment." *Current Anthropology* 28 (3): 271–72.
Hawkesworth, Mary. 1989. "Knowers, Knowing, Known: Feminist Theory and Claims of Truth." *Signs* 14 (3): 533–49.
Hawking, Stephen. 1988.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 New York: Bantam Books.
Heidegger, Martin. 1962. *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 1972. *On Time and Being*, trans. Joan Stambaugh. New York: Harper & Row.
———. 1973. *The End of Philosophy*, trans. Joan Stambaugh. New York: Harper & Row.
———. 1977.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William Lovitt. New York: Harper & Row.
Heller, Agnes. 1984.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86. "The Sociology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Sociology of Structure and Action*, ed. Ulf Himmelstrand.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 1987. "Mouvements culturels et changements des modèles de vie quotidienne depuis la deuxième guerre." In *La radicalité du quotidien*, ed. Andre Corten and Marie-Blanche Tahon. Montréal: VLB éditeur.
———. 1990. *Can Modernity Surv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eller, Agnes, and Ferenc Feher. 1989. *The Post-Modern Political Con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empel, Carl. 1988. "On the Cognitive Status and the Rationale of Scientific Methodology." *Poetics* 9 (1): 5–26.

Henriques, Julian, Wendy Holoway, Cathy Urwin, Couze Venn, and Valerie Walkerdine. 1984. *Changing the Subject: Psychology, Social Regulation, and Subjectivity.* New York: Methuen.

Himmelfarb, Gertrude. 1987.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9a. "Some Reflections of the New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4 (3): 661–70.

———. 1989b. "Responses to Fukuyama."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24–26.

Hirsch, E. D. 1967. *The Aims of Interpre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3.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irschman, Axel O. 1987. "The Search for Paradigms as a Hindrance to Understanding." In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s, A Second Look*, ed. Paul Rabinow and William M. Sulliv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obson, Marian. 1982. "Deconstructing, Empiricism and the Postal Services." *French Studies* 36 (July): 290–314.

Hohendahl, Peter U. 1986. "Habermas'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elos*, no. 69 (Fall): 49–65.

Holden, Arun V., ed. 1986. *Chao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ollinger, David. 1989.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the Persistence of Historical Knowing."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4 (3): 610–21.

Honneth, Axel. 1985. "An Aversion Against the Universal."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 (3): 147–57.

Hoover, Kenneth. 1980. *The Elements of Social Scientific Thinkin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Adorno. 1972.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Howard, George S. 1991. "Culture Tales: A Narrative Approach to Thinking,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6 (3): 187–97.

Hoy, David Couzens. 1985a. "Jacques Derrida." In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 Quentin Skinner. Bost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5b. "Interpreting the Law: Hermeneutical and Post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s."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58 (1): 135–76.

———. 1989. "Splitting the Difference: Habermas's Critique of Derrida." *Praxis International* 8 (4): 447–64.

Hughs, Robert. 1989. "*America*: The Patron Saint of Neo-Pop."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1, 29–32.

Hunt, Linda., ed. 1989.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urwitz, Roger. 1989. "Strategic and Social Fictions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In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ed.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Husserl, Edmund. 1960. *Cartesian Meditations*. The Hague: Nijhoff.

Hutcheon, Linda. 1986–87.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Parody and History." *Cultural Critique*, no. 5 (Winter): 179–208.

———. 1989.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Hutchinson, Allan, ed. 1988. *Critical Legal Studies*. Totowa, N.J.: Rowman & Littlefield.

Huyssen, Andreas. 1984. "Mapping the Postmodern." *New German Critique*, no. 33 (Fall): 22–52.

———. 1986. *After the Great Divide: Modernism, Mass Culture, Postmoder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ngarden, Roman. 1973.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trans. George Graabowicz.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Iser, Wolfgang. 1978.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Jacquard, Albert. 1978. *Éloge de la différence; la génétique et les homm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 1982. *Au péril de la science? Interrogations d'un généticien*.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Jameson, Fredric. 1972.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1.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London: Methuen.

———. 1983.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In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ed. Hal Foster. Port Townsend, Wash.: Bay Press.

———. 1984a.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no. 146 (July/August): 53–92.

———. 1984b. "The Politics of Theory: Ideological Positions in the Postmodern Debate." *New German Critique*, no. 33 (Fall): 53–65.

———. 1985.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In *Postmodern Culture*, ed. Hal Foster. London: Pluto Press.

———. 1988. "Cognitive Mapping."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1989.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 *New Left Review*, no. 176 (July/August): 31–45.

Jay, Martin. 1985. "Habermas and Modernism." In *Habermas and Modernity*, ed. Richard Bernstein. Cambridge: MIT Press.

———. 1988. "Fin-de-Siècle Socialism." *Praxis International* 8 (1): 1–13.

Jefferson, Ann. 1982.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ed. Ann Jefferson and David Robey. Totowa N.J.: Barnes and Noble.

Jefferson, Ann, and David Robey, ed. 1982. *Modern Literary Theory;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Totowa, N.J.: Barnes and Noble.

Jencks, Charles. 1980. *Late-Modern Architecture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Academy Editions.

Jencks, Charles. 1986. *What is Post-Modern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Johnson, Barbara. 1980. *The Critical Differenc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Barbara, Louis Mackey, and J. Hillis Miller. 1985. "Marxism and Deconstruction: Symposium." In *Rhetoric and Form: Deconstruction at Yale*, ed. R. C. Davis and R. Schleifer.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Judovitz, Dalia. 1988. "Representation and Its Limits in Descartes." In *Postmodernism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ed. Hugh J. Silverman and Donn Walt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Kamper, Dietmar. 1989. "Between Simulation and Negentrophy." In *Looking Back on the End of the World*, ed. D. Kamper and C. Wulf. New York: Semiotext(e).

Kamper, D., and C. Wulf, ed. 1989. *Looking Back on the End of the World*. New York: Semiotext(e).

Kamuf, Peggy. 1989. "Impositions: A Violent Dawn at *Le Soir*." In *Responses: On Paul de Man's Wartime Journalism*, ed. W. Hamacher, N. Hertz, and T. Kenna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Kariel, H. 1988a. "Bringing Postmodernism into Being." Paper delivered a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4.

———. 1988b. "Praxis, the Repressed Potential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y* 21 (2): 401–8.

———. 1989. *The Desperat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Karnoouh, Claude. 1986. "The Lost Paradise of Regionalism: The Crisis of Postmodernity in France." *Telos*, no. 67 (Spring): 11–26.

Ke, Gang. 199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epresentational Paradigms: Between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0 (1): 5–34.

Kellner, Douglas. 1989a. *Critical Theory, Marxism and Modernit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89b.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ellner, Hans. 1987. "Narrativity i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Since." *History and Theory* 26 (4): 1–29.

Kendrick, Walter. 1988. "De Man that Got Away." *Villag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 April 12, 6–8.

Klein, Bradley S. 1989. "The Textual Strategies of the Military: Or, Have You Read Any Good Defense Manuals Lately?" In *International/ 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ed.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 1990. "How the West Was One: 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 of NATO."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4 (3): 311–25.

Knapp, Steven, and Walter Benn Michaels. 1982. "Against Theory." *Critical Inquiry* 8 (4): 723–42.

———. 1987. "Against Theory 2: Hermeneutics and Deconstruction." *Critical Inquiry* 14 (Autumn): 49–68.

Kolakowski, Leszek. 1990. *Modernity on Endless Tri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ramer, Hilton. 1982a. "A Note on *The New Criterion*." *The New Criterion* 1 (September): 1–5.

———. 1982b. "Postmoder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1980's." *The New Criterion* 1 (September): 36–42.

———. 1984. "The MLA Centennial Follies." *The New Criterion* 2 (February): 1–8.

Kratochwil, Friedrich, and John Gerard Ruggie. 1986.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 State of the Art on an Art of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 (4): 753–76.

Krieger, Murray, ed. 1987. *The Aims of Representation: Subject/Text/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rippner, Stanley. 1988. "Para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 Science." In *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 Postmodern Proposals*, ed. D. R. Griffi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Kristeva, Julia. 1974. *La révolution du language poétique.* Paris: Seuil. [Portions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Revolution in Poetics Language.* 1984. Trans. Margaret Wall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Kristeva Reader (see below)].

———. 1980. *Desire in Langua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81. "Women Can Never Be Defined." In *New French Feminisms*, ed. Elaine Marks and Isabelle de Courtivron. New York: Shocken Books.

———. 1986. *The Kristeva Reader/Julia Kristeva*, ed. Toril Mo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roker, Arthur. 1985. "Baudrillard's Marx."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 (3): 69–83.

Kroker, Arthur, and David Cook. 1986. *The Postmodern Scene: Excremental Culture and Hyper-Aesthe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Kugler, Paul. 1988.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Some Implications for a Depth Psychology of Dreams." *Psychiatric 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13 (2): 60–65.

Kuhn, Thoma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1. "Notes on Lakatos." In *Proceedings of the 1970 Biennial Meeting,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ed. R. C. Buck and R. S. Cohen. Higham, Mass.: D. Reidal Publishing.

Kundera, Milan. 1984.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New York: Harper & Row.

Kurzweil, Edith. 1980. *The Age of Structuralism: Lévi-Strauss to Foucaul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açan, Jacques. 1977. *Écrits.* New York: Alan Sheridan.

Laclau, Ernesto. 1988. "Building a New Left: An Interview." *Strategies: A Journal of Theory, Culture, and Politics* 10 (Fall): 29.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 Mouffe.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Lacoue-Labarthe, P. 1987. *La fiction du politique: Heidegger, l'art et la politique*. Paris: Christian Bourgeois.

Laffey, John. 1987. "The Politics at Modernism's Funeral."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1 (3): 89–98.

Lakatos, I. 1970.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ed. A. Musgrove and I. Lakat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8.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Epistemology." In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mbropoulos, Vassilis. 1986. "Polis, Semiotics, Poli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4 (1–2): 43–51.

Larsen, Neil. 1990. *Modernism and Hegemony: A Materialist Critique of Aesthetic Agenc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ash, Scott. 1990. "Postmodernism as Humanism? Urban Space and Social Theory." In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ed. Bryan S. Turner.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Lash, Scott, and John Urry. 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Latimer, Dan. 1984. "Jameson and Post-modernism." *New Left Review*, no. 148 (Nov./Dec.): 116–28.

Latour, Bruno. 1987. *Science in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8.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runo, and Stever Woolgar. 1979. *Laboratory Life*.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Laudan, L. 1984. *Science and Valu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echner, Frank. 1990. "Against Modernity: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Forms of Anti-modernism." Paper presented to the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Madrid, July 9–14.

Lefebvre, Henri. 1988. "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Lehman, David. 1988. "Deconstructing de Man's Life." *Newsweek*, February 15, 83.

Leiss, William. 1983. "The Icons of the Marketplac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 (3): 10–21.

Leiss, William, S. Kliine, and S. Jhally. 1986.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Advertising*. New York: Methuen.

Lenin, V. I. 1905. "Two Tactics of Social-Democracy in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Collected Works*, Vol. 2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4]. London: Laurence and Wishart.

———. 1917.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Collected Works*, vol. 2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4]. London: Laurence and Wishart.

Lentricchia, Frank. 1980. *After the New Criticism*. London: Methuen.

Levin, Charles. 1987. *Pathologies of the Modern Self*.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Levin, Charles, and Arthur Kroker. 1984. "Baudrillard's Challeng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8 (1–2): 5–18.

Levine, George. 1987. "Literary Science—Scientific Literature." *Raritan* 6 (3): 24–41.

Levinson, Sanford. 1982. "Law as Literature." *Texas Law Review* 60 (3): 373–403.

———. 1988. *Constitutional Fai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évi-Strauss, Claude. 1966. *The Savage Mind*. London: Weidenfeld.

Lindblom, C. E. 1959. "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 (Spring): 79–99.

Lipovetsky, Gilles. 1983. *L'ère du vide: Essais sur l'individualisme contemporain*. Paris: Gallimard.

Lipsitz, George. 1986–87. "Cruising Around the Historical Bloc—Postmodernism and Popular Music in East Los Angeles." *Cultural Critique*, no. 5 (Winter): 157–78.

Longley, Clifford. 1989. "Inquest on the Enlightenment." *The Times* (London), March 25, 12.

Luke, Timothy. 1989a . " 'What's Wrong with Deterrenc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emiotic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Interpretat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In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ed.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 1989b. "Class Contradictions and Social Cleavages in Informationalizing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On the Rise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New Political Science* 16/17 (Fall/Winter): 125–54.

———. 1989c. *Screens of Power*.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Lyotard, Jean-Francois. 1982. "Presenting the Unpresentable: The Sublime." *Artform* 20 (8): 64–69.

———.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our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86–87. "Rules and Paradoxes." *Cultural Critique*, no. 5 (Winter): 209–19.

———. 1988a. *L'inhumain, causeries sur le temps*. Paris: Galilée.

———. 1988b. *The Differend: Phrases in Disput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yotard, Jean-Francois, and Jean-Loup Thébaud. 1985. *Just Gam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cedo, Stephen. 1986. *The New Right v. The Co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Macherey, P. 1978.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Macy, Joanna. 1990. "The Ecological Self: Postmodern Ground for Right Action." In *Sacred Interconnections; Postmodern Spirituality, Political Economy, and Art*, ed. David Griffi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Madison, Gary B. 1988. *The Hermeneutics of Postmodernity: Figures and Them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aier, Charles. 1987. "The Politics of Time: Changing Paradigms of Collective Time and Private Time in the Modern Era." In *Changing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 ed. Charles S. Mai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lkan, Jeffrey. 1987. "Against Theory: Pragmatism and Deconstruction." *Telos*, no. 71 (Spring): 129–54.

Marcus, George E., and Michael Fischer.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cuse, Herbert. 1956. *Reason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 1969.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Boston: Beacon Press.

McCloskey, Donald N. 1985.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1990. *If You're So Smart: The Narrative of Economic Experti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cHale, Brian. 1987. *Postmodernist Fiction*. New York: Methuen.

Meehan, Eugene. 1979. *Quality of Federal Policymaking*.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 1981. *Reasoned Argument in Social Scienc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 1990. *Ethics for Policy Making*. Wes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 1991.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ommunity: Social Science and Public Authority." Unpublished paper.

Megill, Allan. 1985. *Prophets of Extremity: Nietzsche, Heidegger, Foucault, Derrid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9. "Recounting the Past: 'Description,' Explanation, and Narrative in Histor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4 (3): 627–53.

Melucci, Alberto. 1990a. "Paradoxes of Post-Industrial Democracy: Everyday Life and Social Movement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Madrid, July 9–14.

———. 1990b. "Frontierland: Collective Action Between Actors and System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Madrid, July 9–14.

Meyrowitz, Joshua. 1985. *No Sense of Pl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chaels, Walter Benn. 1983. "Is there a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ed. W. J. T. Mitch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iller, J. Hillis. 1971. "The Fiction of Realism." In *Dickens Centennial Essays*, ed. Ada Nisbet and Blake Neviu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72. "Tradition and Difference." *Diacritics* 4 (2): 6–13.

———. 1977. "The Critic as Host." *Critical Inquiry* 3 (3): 439–47.

———. 1981. "The Disarticulation of the Self in Nietzsche." *The Monist* 64 (April): 247–61.

———. 1986. *The Ethics of Read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8. "Two Current Debate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une 17, 676.

———. 1990. "Narrative." In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ed.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inow, Martha. 1987. "Law Turning Outward." *Telos*, no. 73 (Fall): 79–100.•

Mitchell, W. J. T. 1990. "Representation." In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ed.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itscherling, Jeff. 1987. "Reformulation de l'alternative gadamerienne au post-modernisme." *Petite Revue de philosophie* 9 (1): 1–24.

Moi, Toril. 1986. "Introduction." In *The Kristeva Reader/Julia Kristev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8.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Style: Recent 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Cultural Critique*, no. 9 (Spring): 3–22.

Mokrzyski, Edmund. 1983.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Montofiore, Janet. 1984. "The Rhetoric of Experience." *New Left Review*, no. 145 (May/June): 122–28.

Morgan, Edmund. 1988. *The Ris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New York: W.W. Norton.

Morgan, Thais. 1985. "Is There an Intertext in this Text?"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3 (4): 1–40.

Morin, Edgar. 1986. "Ce qui a changé dans la vie intellectuelle française." *Revue Le débat*, no. 40 (été): 72–81.

Morris, M., and Paul Patton, ed. 1979. *Michel Foucault: Power, Truth, and Strategy*. Sydney, Australia: Ferral Publications.

Morris, Robert. 1988. "Words and Images in Modernism and Post Modernism." *Critical Inquiry* 15 (Winter): 337–47.

Mouffe, Chantal. 1988. "Hegemony and New Political Subjects."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Murphy, John. 1987a. "Deconstruction, Discourse, and Liberation."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6 (2): 417–33.

———. 1987b. "The Importance of Postmodernism for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34: 233–53.

———. 1988. "Computerization, Postmodern Epistemology and Reading in the Postmodern Era." *Educational Theory* 38 (2): 175–82.

Nachmias, David, and Chava Nachmias. 1976.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Nelson, Cary,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1988.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Nelson, John. 1987. "Postmodern Meaning of Politics." Paper presented a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Chicago, Illinois, September 3–6.

———. 1988. "Discourse, Text or Rhetoric? Postmodern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Paper presented a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4.

Nicholson, Linda J., ed. 1990. *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Nietzsche, Friedrich. 1954. *Thus Spoke Zarathustra*. New York: Viking Press.

———. 1967. *The Birth of Tragedy and the Case of Wagn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69.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and Ecce Homo*. New York: Vintage Books.

Nietzsche, Friedrich. 1974. *The Gay Scien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79. "On Truth and Lies in a Nonmoral Sense." *Philosophy and Truth, Selections from Nietzsche's Notebooks in the Early 1870's.* Atlantic City, N.J.: Humanities Press.
———. 1980. *On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History for Life*, trans. Peter Preus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Nodoushani, Omid. 1987. "Note on Progress: Postmodern Transformation in the Systems Age." *Systems Research* 4 (1): 59–64.
Norris, Christopher. 1982.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Methuen.
———. 1985. *The Contest of Faculties.* New York: Methuen.
———. 1988. *Deconstruction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ory.* London: Pinter.
Norton, Anne. 1988. *Reflections on Political Identit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Oakeshott, Michael. 1933.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56.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ed. Peter Laslet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Offe, Claus. 1987. "The Utopia of the Zero-Option, 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 as Normative Political Criteria." *Praxis International* 7 (April): 1–24.
O'Kane, John. 1984. "Marxism, Deconstruction, and Ideology: Notes Toward an Articulation." *New German Critique*, no. 33 (Fall): 219–47.
Olkowski, Dorothea. 1988. "Heidegger and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In *Postmodernism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ed. Hugh J. Silverman and Donn Walt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O'Neill, John. 1988. "Religion and Postmodernism."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5 (2–3): 493–508.
Pacom, Diane. 1989. "La querelle des modernes et des postmodernes." *Possibles* 13 (1–2): 55–73.
Pangle, Thomas L. 1989. " 'Post-Modernist' Thought."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5, A9.
Parker, Ian, and John Shotter, ed. 1990. *Deconstructing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Routledge.
Patterson, Annabel. 1990. "Intention." In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ed.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vic, Milorad. 1988. *Dictionary of the Khazars.* New York: Knopf.
———. 1990. *Landscape Painted with Tea.* New York: Knopf.
Pecheux, M. 1969. *Analyse automatique du discours.* Paris: Dunod.
Pecora, Vincent P. 1988. "Simulacral Economies." *Telos*, no. 75 (Spring): 125–40.
Pfeil, Fred. 1986. "Postmodern and our Discontent." *Socialist Review* 16 (87–88): 125–34.
———. 1988. "Postmodernism as a 'Structure of Feeling.' "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inter, Stephen. 1987. "Fading Postmodern Subject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1 (3): 140–47.

Pitkin, Hanna. 1967.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latten, David. 1986. "Postmodern Engineering." *Civil Engineering* 56 (6): 84–86.

Popper, Karl. 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62.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9. *Objective Knowled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osner, Richard. 1988. "Interpreting Law: Interpreting Literature." *Raritan* 7 (4): 1–31.

Poster, Mark. 1987. "Foucault,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In *The Aims of Representation*, ed. Murray Krieg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oster, Mark. 1990.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otter, Jonathan, and Margaret Wetherell. 1987. *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Beyond Attitudes and Behavior*.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ratt, Mary Louise. 1986. "Fieldwork in Common Places."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ed.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rigogine, Ilya. 1986. "Science, Civilization and Democracy." *Futures* 18 (4): 493–510.

Prigogine, Ilya, and Isabelle Stengers. 1984. *Order Out of Chaos*. New York: Bantam Books.

Putnam, Hilary. 1981.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binow, Paul, ed. 1984.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1986. "Representations Are Social Facts: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in Anthropology."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ed.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fie, Marcel. 1987. "La crise des savoirs revisitée." *Revue international d'action communitaire*, no. 57 (printemps): 153–59.

Rajchman, John, and Cornel West, ed. 1985. *Post-Analytic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edner, Harry. 1987. "Representation and the Crisis of Post-Modernism."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20 (3): 673–79.

Reid, Herbert G., and Ernest Y. Yanarella. 1974. "Towards a Post-Modern Theory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nd Culture: Perspectives from Critical Marxism and Phenomenology." *Cultural Hermeneutics* 2 (1): 286–316.

Reid, Herbert G., and Ernest Y. Yanarella. 1975.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Post-Modern Critique of Scientism and Domination." *Review of Politics* 37 (3): 91–166.

Renaut, Alain. 1989. *L'ère de l'individu*. Paris: Gallimard.

Ricci, David M. 1984. *The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on, Laurel. 1988. "The Collective Sto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Writing of Sociology." *Sociological Focus* 21 (3): 199–207.

Rochlitz, Rainer. 1986. "Des Philosophes allemands face à la pensée française: alternatives à la philosophie du sujet." *Critique* 42 (464–65): 7–39.

Roochnik, David L. 1987. "Plato's Critique of Postmodernism."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11 (2): 282–91.

Rorty, Richard. 1982.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85. "Habermas and Lyotard on Postmodernity." In *Habermas and Modernity*, ed. Richard Bernstein. Cambridge: MIT Press.

———.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se, Richard. 1988. *The Postmodern President*. London: Chatham House.

Rosenau, James. 1990.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Simultaneity Puzzle: Notes on the Outbreak of Peace." In *The Long Postwar Peace: The Sources of Great Power Stability*, ed. C. W. Kegle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Rosenau, Pauline. 1988. "Post-structural, Post-modern Political Science: Toward Global Paradigm Chan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4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August.

———. 1990. "Once Again into the Fra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ronts the Humanitie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 (1): 83–110.

———. 1992. "Modern and Post-Modern Science: Some Contrasts." *Review: A Journal of the Fernand Braude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s, Historical Systems, and Civilization* 15 (1).

———. Forthcoming. "Post-modern Analysis and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Is Deconstruction Inherently Right-Wing or Left Wing." *Type of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ed. Jean Michel Berthelot and Karl Van Meter. London: Sage.

Rosenau, Pauline, and Robert Paehlke. 1990. "The Exhaustion of Left and Right: Perspectives on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Disadvantag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 (1): 123–51.

Rosmarin, Adena. 1985. "On the Theory of 'Against Theory.' " In *Against Theory: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 New Pragmatism*, ed. W. J. T. Mitch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oso, Stefano. 1987. "Postmodern Italy." In *Exploring Postmodernism*, ed. Matei Calinescu and Douwe Fokkem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Ross, Andrew, ed. 1988. *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ushdie, Salman. 1989. *Satanic Verses*. New York: Viking Press.

Ryan, Michael. 1981. "New French Theory in New German Critique." *New German Critique* no. 22 (Winter): 145–61.

———. 1982. *Marxism and Deconstruction: A Critical Articul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88. "Postmodern Politic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5 (2–3): 559–76.

Said, Edward W. 1976. "Interview." *Diacritics* 3 (6): 30–47.

———. 1979. "The Text, the World, the Critic." In *Textual Strategies: in Perspec-*

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 ed. Josue Harari.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2. "Opponents, Audiences, Constituencies and Communities." *Critical Inquiry* 9 (September): 145–62.

Sangren, P. Steven. 1988. "Rhetoric and the Authority of Ethnography: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Texts." *Current Anthropology* 29 (3): 405–35.

Santos, Bonaventura. 1987. "Law: A Map of Misreading."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14 (3): 279–302.

Sarup, Madan. 1989.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stmodernism*.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Sayres, Sohnya, Anders Stephanson, Stanley Aronowitz, and Frederic Jameson. 1984. *The 60s without Apolog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cherpe, Klaus. 1986–87. "Dramatization and De-dramatization of 'The End': The Apocalyptic Consciousnes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Cultural Critique*, no. 5 (Winter): 95–129.

Scholes, Robert. 1989. *Protocols of Reading*.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chrag, Calvin. 1988. "Liberal Learning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The Key Reporter* 54 (1): 1–4.

Schrift, Alan D. 1988a. "Genealogy and/as Deconstruction: Nietzsche, Derrida, and Foucault on Philosophy as Critique." In *Postmodernism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ed. Hugh J.Silverman and Donn Walt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1988b. "Foucault and Derrida on Nietzsche and the End(s) of 'Man.' " In *Exceedingly Nietzsche*, ed. David Krell and David Wood. London: Routledge.

Schutz, Alfred. 1962–66. *Collected Paper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Schwartz, Joel. 1990. "Antihumanism in the Humanities." *The Public Interest* 99 (Spring): 29–44.

Scott, Jean Wallach. 1989. "History in Crisis? The Others' Side of the 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4 (3): 680–92.

Seabrook, John. 1991. "The David Lynch of Architecture." *Vanity Fair*, January, 74–79, 125–29.

Seidel, Gill. 1985.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Vol. 4, ed. Teun Van Dijk. London: Academic Press.

Seidl, Amanda. 1988. "Property's Lord of the Manner." *Business*, March, 100–102.

Seidman, Stever. 1989. "The Tedium of General Theor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8 (3): 634–36.

———. 1990. "Against Theory as a Foundationalist Discourse." *Perspectives: The Theory Section Newsletter,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3 (2): 1–3.

Seligman, Adam. 1990. "Toward a Reinterpretation of Modernity in an Age of Postmodernity." In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ed. Bryan S. Turner.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Sennett, Richard. 1977.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Knopf.

Shapiro, Michael. 1988.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ing*.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hapiro, Michael. 1989a. "Textualizing Global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ed.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 1989b. "Representing World Politics: The Sport/War Intertext." In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ed.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Shapiro, Michael, and Deane Neubauer. 1989. "Spatiality and Policy Discourse: Reading the Global City." Paper deliver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Meeting, London, March 29–April 1.

Sheridan, Alan. 1980. *Michael Foucault: The Will to Truth*.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Shusterman, Richard. 1988. "Postmodernist Aestheticism: A New Moral Philosoph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5 (2–3): 337–57.

Shweder, R. A. 1986. "Divergent Rationalities." In *Meta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ed. Donald W. Fiske and Richard A. Shwe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weder, R. A., and D. W. Fiske. 1986. "Introduction: Uneasy Social Science." In *Meta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ed. Donald W. Fiske and Richard A. Shwe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lverman, Hugh, ed. 1989. *Derrida and Deconstruction*. London: Routledge.

Silverman, Hugh J., and Donn Walton, ed. 1988. *Postmodernism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kinner, Quentin. 1969.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8 (1): 3–53.

———. 1972. "Motives, Intentions and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exts." *New Literary History* 3 (2): 393–408.

———. 1985. "Jacques Derrida." In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 David Ho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loterdijk, Peter. 1984. "Cynicism—The Twilight of False Consciousness." *New German Critique*, no. 33 (Fall): 189–206.

———. 1987.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mart, Barry. 1990.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the Present." In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ed. Bryan S. Turner.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Smith, Barbara Herrnstein. 1988. *Contingencies of Valu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mith, Paul. 1988. *Discerning the Subjec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mith, Steven. 1984. *Reading Althuss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nyder, John. 1989.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Gianni Vattimo's *The End of Modernity*, i–lvii.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oja, E.W. 1986. "Taking Los Angeles Apart: Some Fragments of a Critical Human Geograph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4: 255–72.

———. 1987. "The Postmodernization of Geography: A Review."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7 (2): 289–323.

———.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Sontag, Susan. 1969.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Soper, Kate. 1986. *Humanism and Anti-humanism*. London: Hutchinson.

Sorel, Georges. 1987. *From George Sorel: Essays in Socialism and Philosophy*, ed. John Stanle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Spivak, Gayatri. 1980. "The Revolutions That as Yet Have No Model." *Diacritics* 10 (4): 47–48.

———.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tauth, George, and Bryan S. Turner. 1988. "Nostalgia, Postmodernism and the Critique of Mass Cultur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5 (2–3): 509–27.

Stearns, Peter N. 1976. "Coming of Ag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0 (2): 246–55.

Steinfels, Peter. 1990. "Belief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0, 12.

Stephanson, Anders, and F. Jameson. 1988. "Regarding Postmodernism—A Conversation with Frederic Jameson." In *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ed. A. Ros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rathern, Marilyn. 1987. "Out of Context: The Persuasive Fiction of Anthrop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28 (3): 251–81.

Struever, Nancy. 1985. "Historical Discourse." In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Vol. 1, ed. Teun Van Dijk. London: Academic Press.

Suleiman, Susan, and Ingre Crosman, ed. 1980. *The Reader in the Tex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usman, Warren I. 1985. *Culture as Histor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Swimme, Brian. 1988. "The Cosmic Creation Story." In *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 Postmodern Proposals*, ed. D. R. Griffi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wyngedouw, E. 1986. "The Socio-Spatial Implications of Innovation in Industrial Organisation." Working Paper no. 20. Lille, Franc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European Center for Regional Planning and Research.

Taylor, Mark C. 1984. *Erring: a Postmodern A/the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ompson, John. 1984.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deology*. London: Polity Press.

Todorov, Tzvetan. 1984.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al Principle*. Special number,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vol. 13.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88. "Two Current Debate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une 17, 676, 684.

Tomkins, Calvin. 1988. *Post- to Neo-*. New York: H. Holt & Company.

Tompkins, Jane. 1980. "The Reader in History." In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From Form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 ed. Jane Tompkin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oulmin, Stephen. 1982. *The Return to Cosmology: Postmodern Science and the Theology of N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oulmin, Stephen. 1983. "The Construal of Reality: Criticism in Modern and Post-modern Science." In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ed. W. J. T. Mitch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5. "Pluralism and Responsibility in Post-Modern Science." *Science, Technology, Human Values* 10 (1): 28–38.

———. 1990. *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New York: Free Press.

Touraine, Alain. 1988a. *Return of the Actor: A Social Theory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88b. "Retour du sujet." Public lecture presented in French, University of Montreal, Montreal, Quebec, October 25.

———. 1990. "Modernity and the Subject."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ongress, Madrid, July 10.

Trachtenberg, Stanley. 1985. *The Postmodern Moment*.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Tucker, Aviezer. 1990. "Vaclav Havel's Heideggerianism." *Telos*, no. 85 (Spring): 63–80.

Turner, Bryan S. 1989. "From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o Postmodern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ulture*, ed. John R. Gibbin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 ed. 1990.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Tyler, Stephen. 1984. "The Poetic Turn in Postmodern Anthropology—the Poetry of Paul Friedrich."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6: 328–36.

———. 1986. "Post-modern Ethnography: From Document of the Occult to Occult Document."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ed.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Ungar, Roberto. 1986. *The 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aillancourt, Pauline M. 1986a. *When Marxists Do Research*.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 1986b. "Dialectics,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ulletin de méthodologie sociologique* (Paris) no. 11 (July): 83–100.

———. 1987. "Discourse Analysis, Post-Structuralism, Post-Modernism, Deconstruction, Semiotic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Polish Sociological Bulletin* 80 (4): 89–100.

Van Dijk, Teun, ed. 1985.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4 vols. London: Academic Press.

van Vucht Tijssen, Lieteke. 1990. "Women between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In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ed. Bryan S. Turner.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Vattimo, Gianni. 1982. "Bottle, Net, Truth, Revolution, Terrorism, Philosophy." *Denver Quarterly* 16 (4): 24–34.

———. 1988. *The End of Modernity: Nihilism and Hermeneutics in Post-modern Culture*. London: Polity.

Vester, Heinz-Gunter. 1990.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Social Movements Under Postmodern Condition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ongress, Madrid, July 10.

Virilio, P. 1983. *Pure War*. New York: Semiotext(e).
———. 1989. "The Last Vehicle." In *Looking Back on the End of the World*, ed. D. Kamper and C. Wulf. New York: Semiotext(e).
Walker, R. B. J. 1988a. "Genealogy, Geopolitics,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Richard K. Ashley and th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ternatives* 13: 77–102.
———. 1988b. *One World, Many World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Wartofsky, Marx W. 1984. "The Paradox of Painting: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Dimensionality of Visual Space." *Social Research* 51 (4): 861–83.
Weber, Alexander. 1990. "Lyotard's Combative Theory of Discourse." *Telos*, no. 83 (Spring): 141–50.
Weber, Cynthia. 1990. "Representing Debt: Peruvian Presidents Belaunde's and Garcia's Reading/Writing of Peruvian Deb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4 (3): 353–65.
Weedon, Chris. 1987.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Wellberg, David. 1985. "Appendix 1: Postmodernism in Europe: On Recent German Writing." In *The Postmodern Movement*, ed. Stanley Trachtenberg.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Wellmer, Albrecht. 1985. "On the Dialectic of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Praxis International* 4 (4): 337–62.
———. 1990. *In Defence of Modernity*. London: Blackwell.
White, Hayden. 1978.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86. "Historical Pluralism." *Critical Inquiry* 12 (3): 480–93.
White, James Boyd. 1982. "Law as Language: Reading Law and Reading Literature." *Texas Law Review* 60 (March): 415–45.
White, Stephen K. 1986. "Foucault's Challenge to Critical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2): 419–32.
———. 1987.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litical Reflection." *Political Theory* 16 (2): 186–208.
Widgery, David. 1989. "Postmodern Medicin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98 (6677): 897.
Wiener, Jon. 1988. "Deconstructing de Man." *Nation*, January 9, 22–24.
Wikstrom, J. H. 1987a. "Moving Forestry into the Post-Modern World." *Ambio* 16 (2–3): 154–56.
———. 1987b. "Moving into the Post-Modern World." *Journal of Forestry* 85 (1): 65.
Wisdom, J. O. 1987. *Challengeability in Modern Science*. Dorset: Blackmore Press.
Wolfe, Alan. 1988. "Suicide and the Japanese Postmodern: A Postnarrative Paradigm?"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87 (Summer): 571–90.
Wolin, Richard. 1984–85. "Modernism vs. Postmodernism." *Telos*, no. 62 (Winter): 9–31.
Wolin, Sheldon. 1985. "Postmodern Politics in the Absence of Myth." *Social Research* 52 (2): 217–40.

Wolter, Louis J., and Stephen Miles. 1983. "Toward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Public Relations Journal* 39 (9): 12–16.

Woo, Henry K. H. 1989. "Taking Method Seriously." *Methodus: Bulletin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Economic Method* 1 (December): 4–8.

Wood, D. C. 1979. "An Introduction to Derrida." *Radical Philosophy*, no. 21 (Spring): 18–28.

Wood, Ellen Meiksins. 1986. *The Retreat From Class*. London: Verso.

Wood, Gordon S. 1988. "The Fundamentalists and the Constitutio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18, 2.

Wood, Gordon S., and Louis A. Zurcher. 1988. *The Development of a Postmodern Self: A Computer-Assiste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ersonal Document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Woodiwiss, Anthony. 1990. *Social Theory After Postmodernism: Rethinking Production, Law, and Class*. Winchester, Mass.: Unwin and Hyman.

Wortman, Marc. 1987. "Book Review of *The Post-Modern Aura*." *Telos* 71 (Spring): 171.

Wulf, Christoph. 1989. "The Temporality of World-Views and Self-Images." In *Looking Back on the End of the World*, ed. D. Kamper and C. Wulf. New York: Semiotext(e).

Zagorin, Perez. 1990. "Historiography and Posmodernism: Reconsider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29 (3): 263–75.

Zeldin, Theodore. 1976. "Social History and Total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0 (2): 237–45.

Zukin, Sharon. 1988. "The Postmodern Debate over Urban Form."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5 (2–3): 431–46.